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的再转型

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的再转型

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的再转型 / 沈志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500-3

Ⅰ. ①冷… Ⅱ. ①沈…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
集 Ⅳ.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962号

冷战的再转型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5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00-3
定　　价	68.00 元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目录

附录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1]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

①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际性的，特别是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1955年1月，苏联国防部提议中苏两国在远东的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中国即派出由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月24日到达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2月6日双方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航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文件：1、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2、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作演习的实施计划；3、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却无中文本，且中国

根据协定增设的情报机构和增加的通信设施还要用俄文向苏方通报。陈赓等人回国汇报后，彭德怀认为这个防空协定没有按照国际惯例以双方文字体现，因而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暂不批准该协定。[①]

防空协定的搁浅，并不说明中国不愿进行军事合作，应该说，中国在远东防空方面对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苏联。显然是苏联军人在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心态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即使苏方再傲慢的举动（如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等），中国也未提出异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中国军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时，尽管苏联仍是同盟当然的领导者，但中国已经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各国的军事战略时开始显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②] 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 月 12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③] 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国在 1950 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86 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2 页。笔者 2001 年 6–9 月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在 50 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

②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的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见 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1996。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14 日。

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1]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

---

① 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①]

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②] 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单方面裁军 64 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③]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④] 5 月 22 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 月 29

---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9–13 页。

② 参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ё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Хрущёва Н.С.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

③ Vojtech 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1949-1956, *Working Paper* №3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March 2002，pp.79-83。由沈志华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26 卷中刊载了 19 件有关苏联裁军的档案，其中一些文件反映了苏军下层人员对裁军的抵制和不满。

④ 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28 页；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pp.81-82。

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①] 于是，彭德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②] 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

1955 年 9 月，苏联国防部再次提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问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苏方进行商谈。行前，总参谋长粟裕和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谈判仅限于双方在防空情报方面的合作问题。但周赤萍于 9 月 23 日到达赤塔后，苏方把已经准备好的协议拿出来要周赤萍签字，其内容包括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议定书还要求中国在东北北部地区增建几个机场，以满足苏军飞机降落之需要。此外，在为对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条件也不对等。因为超出了事前协商的谈判范围，周赤萍便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刘亚楼回电答复：不能同意，应只谈防空情报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复电却是同意按苏方的议定书办，于是 9 月 27 日便在防空协定上签了字。周赤萍回国进行汇报时，刘亚楼感到惊诧，彭德怀则愤怒不已，并报告给周恩来。由于中国代表团与国内的往来电报都是经苏军通讯系统传递的，很可能苏联人从中作了手脚。周恩来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会苏联顾问关于在 12 月开始执行协定的意见。12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例会，会议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投资增建飞机场，并决定告诉苏联总顾问和转告苏联国防部：周赤萍违背总参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两国防空协定上签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受到处分。此协定不能执行。[③] 对事情真相调查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苏方提出的协定本身确实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无疑是导致此期中苏在防空领域军事合作未能具体实施的主要原因。

类似这样不平等的做法，并非仅有。例如，50 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95 页。据参加这次谈话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讲，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9–13 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61–63 页。

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 年 5 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1]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人在同盟中始终保持着那种领导者的心态，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趋势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1956 年 1 月 28 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聂荣臻指出，"欧洲和平和亚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2]

中苏关系表面上的变化是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继续全力配合苏联，这主要表现在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同样，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和空前团结，也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苏领导人之间为军事合作问题爆发了一场严重分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3] 事件。人们普遍认为，中苏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这场正面冲突是中苏国家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4] 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5] 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

---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9 日。

③ 俄文原文 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共同舰队"的。

④ 毛泽东 1966 年 3 月 28 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 1958 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24 页。

⑤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2 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727、728 页。

党，行为方式依然如旧。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友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 月 27 日，赫鲁晓夫在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即席讲话，真诚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①] 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12 月 14 日，中国向苏联提交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中国设想的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 、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②]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更值得引人思考的

---

①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60–61 页。

② 该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专业杂志上，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Washington，D.C.，pp.160-161。

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是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这也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

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1958 年 1 月 27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①]2 月 1 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②] 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③]3 月 31 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④]4 月 4 日，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⑤] 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⑥]4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⑦]4 月 9 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4 月 13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⑧] 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 月 9 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21–122 页。

② 1958 年 2 月 1 日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9，р.8893，л.10-1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24–125 页。

④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1994, Issues 4，p.16.

⑤ Morton H.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Morton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p.136.

⑥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赫鲁晓夫言论（1958 年 1–4 月）》第 8 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522 页。

⑦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7 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36–137 页。

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 年 2 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苏联方面尚未通知驻华使馆，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2 月 28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②]3 月 9 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③]5 月 20—23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④]

① 1958 年 5 月 9 日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ЦХСД，5/49/136/8893/77-81。

② 1958 年 2 月 28 日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00/51/432/6/86-96。不过，关于赫鲁晓夫与刘晓谈话的详细内容，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有反映。

③ 1958 年 3 月 9 日尤金与朱德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100/51/432/6/97-103。另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02。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6 日。

在政治方面，中苏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会议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于是，苏联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并要对南共纲领提出批判。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4 月 5 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尤金，表示非常赞成苏共中央来信中对南共所做的结论，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纲领草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 4 月 5 日和 6 日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周恩来当场给在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商量，因时间来不及，确定推迟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后，又对尤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虽然会议尚未召开，但应该现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中苏两党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尤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祝贺，并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1]4 月 9 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 4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特别说明，这封信尚未发出，因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苏共中央给南共信件的内容。尤金当即递交了苏共的信件，周恩来接着询问了苏共曾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这一情况，并得到了答复。[2] 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纲领及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3] 在 4 月 18 日与克鲁季科夫交谈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批评南共的纲领草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指出，由于它的虚假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些兄弟党，因此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产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在谈到南共纲领草案时，则声明说，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挑衅，对这种挑衅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4]5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应该受

---

① 1958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100/51/432/6/122-134。

② 1958 年 4 月 9 日尤金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100/51/432/6/141-147。

③ 1958 年 4 月 12 日尤金与刘少奇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100/51/172/6/150-160。1958 年 4 月 17 日尤金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ЦХСД，5/49/131/71-74。

④ АВПРФ，100/51/432/8/231-233；100/51/432/9/80.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321.

到谴责》的文章。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1957年底，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作用的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然而，赫鲁晓夫提出的合作方式却令他意外地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察觉到，当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各党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强调的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是各党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党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政党了，而中共领导人一再提出"应以苏联为首"的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者。

三、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与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1958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1]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2] 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

①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6, с.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②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4–165页；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8–209页。

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①]

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②]

建立长波电台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但如何建立呢？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一五二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部研究并提出意见。5月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③]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

①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509页。

②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00–201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80–681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907页。

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1] 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6月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又一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2]

就在这一天，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变换方式。

通过《国防新技术协定》，解决了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3] 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5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4] 同日，周恩来还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聂荣臻报告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5–266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113页；《海军回忆史料》，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160页。

③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5–182页。

④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3–18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

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①]

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4个问题，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立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②]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发出。[③]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谈话内容的主要部分现已在中国正式发表，根据这个节选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

---

①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53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3–644页。

② 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③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陈春华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0–101页。

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①] 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苏联参赞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苏联的指责，如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②]

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③] 尤金还主动提出，他赞同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④] 此外，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那么，可以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吗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⑤] 不过，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说：莫名其妙！并问道：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访美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⑥]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 月 27 日，刘

---

①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2–333 页。

② 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第 101–103 页。笔者核对了中方记录的全文，魏列夏金的回忆相当准确，只是记述简单一些。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60–162 页。这段内容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也被删去了。

④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⑤ 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第 103 页。

⑥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7，с.334；*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с.101-102；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第 103 页。

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①] 风暴似乎过去了。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②]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③] 然而，这些言辞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次事件留在双方领导人心理上的潜在阴影。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

---

①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第103–104页。

② *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c.102.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①]

这次会谈的气氛虽然是紧张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和粗暴了。毕竟，赫鲁晓夫是上门来解释问题和承认“错误”的。而赫鲁晓夫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当然不是因为尤金突然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谈。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引起的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离任回国。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看，尤金并没有歪曲赫鲁晓夫的意图，他的失误充其量是在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后，没有立即转弯、改口，反而进行词不达意的解释，结果使毛泽东抓住机会，大发雷霆。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

① 关于1958年7月31日和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出自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俄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Волкогонов Д.*）私人档案。沃尔科格诺夫生前收集了大量有关苏联历史的档案文献，根据他的遗嘱，美国在2000年公布了这批档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祖伯克（*Зубок В.М.*）整理并发表了这两份档案，俄文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11-128；英文见 *CWIHP Bulletin*, Issues 12-13, Fall/Winter 2001，pp.250-262。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有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无法通过档案文献确定苏联究竟是如何提出这些问题的。

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①]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苏联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②]

的确，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至于苏联最初坚持出资建长波电台（贷款方式是赫鲁晓夫后来在北京提出的）是否考虑到所有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国际合作的方式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存在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赫鲁晓夫想到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③]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④]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

---

①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264–165页。

② 库里克在1997年10月“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记录。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③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264–165页；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8–209页。

④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9–211页。*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c.110.

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1957 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以苏联租借的旅顺海军基地为例，1952 年中国曾主动要求苏联海军延长驻守旅顺口的期限，甚至在 1954 年苏联提出提前撤出旅顺基地时，毛泽东还曾表示犹豫。[①] 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大，地位还不巩固。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虽然一再申明社会主义阵营还要"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这个"头"凡事都要与中国党进行商议。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莫斯科此时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 700 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 7 月 12 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②] 如果赫鲁晓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问题了。

对于莫斯科来说，的确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来临，[③] 但毛泽东却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由尤金汇报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

① *Хрущё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356.

②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年谱》下卷，第 646 页。

③ *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с.102.

中。在这次与苏联领导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小心地把握着分寸，既要给赫鲁晓夫一点教训，让他知道苏联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而现在中国党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地位似乎需要改变了，又要强调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以便实现从苏联得到海军援助的目的。为此，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还有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罗申等等，但唯独没有对赫鲁晓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责，甚至在许多地方还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赞赏和感谢。[①] 毛泽东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决的是长波电台问题。8 月 3 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 11 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 年 9 月 13 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 8 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 年 2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②]

其次解决了防空协定问题。在 7 月 31 日的会谈中，彭德怀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 11 月 20 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 月 25 日至 12 月 7 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③]

最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

① *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c.101. 可参见各次谈话的记录原文。

② 《海军回忆史料》，第 509–512 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 201–202 页。

③ 采访王亚志记录；《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61–63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710 页。

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1]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P-11ФM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鲁晓夫也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3]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无疑使赫鲁晓夫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尽管中苏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做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苏领导人之间1959年10月在北京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冲突，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轻率举动，不仅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最终夭折，而且使得中苏同盟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

---

①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1页。

② 侯向之：《忆〈二·四协定〉的签定》，《海军回忆史料》，第413–415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1–182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65页。

③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页。作者当时是赫鲁晓夫访华的随员。

本文无意追究中苏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责任所在，不过，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确有一些启发。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①] 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① 参见沈志华提交 2001 年 10 月 25 日汉城学术会议论文：《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未刊）；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第 126–191 页。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① 那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就指出：这次"共产主义峰会在莫斯科举行，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凝聚力"，是"第一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体会议。正因如此，共产主义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最伟大的里程碑"。② 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项目批准号：05BSS005）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的部分内容（约三分之一）以《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为题，作为一章，收入笔者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一书。在本文定稿时，笔者又在原稿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如美国的情报分析报告、南斯拉夫档案等），论述的角度也有所调整。特此说明。

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8个党，其中4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8–9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3页。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虽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但有些党的领袖并没有出席，特别是毛泽东、陶里亚蒂，且此时中苏两党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② 中央情报局高级研究顾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1959年7月20日，CIA/SRS-11，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CK3100200854，pp.1-26；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FOIA），pp.1-33。

国、俄国及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研究。[①]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②] 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并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③]1957 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可以视为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④] 但是，莫斯科会议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导致分歧和引起争论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莫斯科会议的路线。[⑤] 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已成为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

①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一书设专节讲述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国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一书也有一章专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莫斯科会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如何召开的，其意义何在，目前的学术论著还没有说清楚。本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利用了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收集的情报信息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情报报告，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回忆史料。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95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 724 页。还有研究著作认为，恢复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倡议，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 1957 年提出的（参见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46 页），这显然就更远离事实了。

③ 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当时的看法是："事实上，尽管两个国家在物质力量和具体权力的先决条件上差距很大，但在政治意识上，至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共产党中国拥有与苏联平等的地位，甚至偶尔在意识形态领域超过苏联。"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中苏同盟的分裂及聚合因素的情报报告，1958 年 9 月 15 日，MF2510409-0106，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23.

④ 与中国学界传统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从 1954 年 10 月开始，尽管苏共二十大期间稍有分歧，但直到 1957 年底，中苏关系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即"蜜月"期。参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 1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8 页。当然，这里借用"蜜月"的概念，只想指明二者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已。

⑤ 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等文，收入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72–464 页。

一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娄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①] 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是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 1947 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②] 后来由于苏共强行把南斯拉夫党开除出情报局，并组织对铁托的政治围剿，甚至以此为名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引起社会主义各国对情报局的极大反感和恐惧。[③] 到 1952 年，即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④] 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问题时，米高扬建议成立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提议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做“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⑤] 目前还没有史料表明，在大会期间苏共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 月 29 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即欧洲两个，亚洲、美洲各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

① 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第 28–70 页。

② 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③ 相关的俄国档案已大量公布，参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1949-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2、23、24、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④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 1951 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参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с.156-161。

⑤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 年 2 月 22 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 оп.8, д.389, л.67-69,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с.106-107, 927。

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①]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②]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致函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③]是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④]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哥穆尔卡谈话时回忆说，米高扬当时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⑤]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混乱，正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委员会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1956年

---

①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34–37页。

②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③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188、189页。

④ 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1-73，232-233；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3–414页。

⑤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1957年11月6日、1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

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条消息。[2]

情报局虽然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为此，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3]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4]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5]正当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6]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

① *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933.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第1版。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4, c.131-152。

③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933, 143, 947.

④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352-368. 1956年7月2日《真理报》和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议。

⑤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7月31日，第6版。

⑥ 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泽东主持中共高层会议达26次之多，认真研究了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问题。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9页。

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①]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共强有力的作用和影响下得以平息，使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显出来，正如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所说：这“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②] 或许考虑到莫斯科面临的尴尬和被动局面，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最好由中共出面。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续同苏共“交换了意见”，[③] 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周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又说，会议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种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

---

① 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对于刘少奇访苏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赫鲁晓夫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他对中共的批评有些耿耿于怀。见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61-363。

② 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③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阎的这篇回忆录非常重要，因为据笔者所知，他在写作时不仅核对了俄国档案，还查阅了中国中央档案馆的大量材料。

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①]

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②]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③]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④]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关于“开会解决问题”的意见。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⑤]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令中共深感意外。按理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并与铁托协商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

---

①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67–270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14页。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0页。

③ 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991。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时任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阎明复（时任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④ 据中国外交部报告，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苏友好关系的新做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91-01，第2–7页。

⑤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24，990-991。

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①] 面对如此被动和尴尬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原来的设想，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②] 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二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会公开发表，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③] 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

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日益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经过秘密的协商和串联，在6月1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会议，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则紧急出动军用运输机，将经过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

---

①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②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③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致使形势发生逆转。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①]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 84.6% 党员和预备党员总计 371.15 万人参加了关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讨论，发言的有 71.35 万人。尽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都表态支持中央决议，但提出质疑和问题者也不在少数。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党组织把这看做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观点，甚至有人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的党委不得不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②]

赫鲁晓夫的麻烦不只来自国内和党内，继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尽管东欧各党大都公开表态拥护苏共中央决议，但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③] 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反应更加强烈。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映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对党内分歧这样处理“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分子也会“浑水摸鱼”。天津市委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进行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苏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决议，认为赫鲁晓

①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0-31；*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3-14。有关档案文献见：*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Маленков，Каганович. 1957，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1998。中译本见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年。

②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66-67；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0，№1，с.10-20；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2255 号，1957 年 7 月 12 日，第 32–33 页。《内部参考》1949 年创刊，1964 年停刊。当时只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查阅到该刊。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138-01，第 1–9 页；109-01124-08，第 91–94 页。

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辈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场。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引起新的混乱？[①]中国驻苏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②]

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③]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④]同一天，苏联驻华使馆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面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决议和致全体党员、候补党员的信。邓小平接收后，大谈中国的反右运动，而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未置一词。[⑤]苏联使馆又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⑥]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⑦]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迫不及待地向中国记者询问，中国报纸对此事有何报道。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大学生的言论很说明问题，

---

① 上海市档案馆藏，A77-2-404，第1–3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248号，1957年7月4日，第15–18页；第2249号，7月5日，第5–6页；第2251号，7月8日，第76–86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51页。

③ 据中国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0–51页。

④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⑤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50，п.424，д.8，转引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p.165-166。

⑥ 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2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9页。

⑦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第1版；7月9日，第7版。

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①] 但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一无所知，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7 月 3 日得到消息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②] 会议讨论的内容，目前不得而知，但有材料说，7 月 5 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③]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和新闻公报。这就意味着，在米高扬见到毛泽东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基本态度。7 月 5 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 8 个小时。在米高扬详细介绍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最后，在陪同人员的提醒下，米高扬又转达了苏共中央希望毛泽东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毛泽东笑着承认，这已经是第三次邀请了。虽然没有最后肯定，但语气中表露出他的莫斯科之行是有可能的。米高扬离开杭州时，兴奋不已。[④]

7 月 6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 5 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称：“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第二天，《人民日报》又转载了苏联《真理报》两天前的社论：《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是不可摧毁的》。

7 月 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米高扬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2255 号，1957 年 7 月 12 日，第 3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57 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92 页。

④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7 年 7 月 5 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第 11–12 页。在毛泽东 7 月 5 日是否答应访苏的问题上，阎、朱的回忆与李越然的讲述和会议记录有出入，笔者根据对其他史料的考查和逻辑判断，采纳了后者的说法。

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会议记录显示，主席团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①] 毛泽东的表态如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同时他也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一方面不能再耽搁，另一方面也更需要依赖中共了。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②] 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回电报说，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会因此而复杂化。[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④] 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⑤] 如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56年苏联曾两次邀请毛泽东访苏，均遭拒绝，而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再次提出邀请时，毛泽东表示研究后再答复[⑥]——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于召开有他本人亲自出席的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时机是有所考虑的。从客观形势看，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反党集团事件后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无论如何是为中共在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7月8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59-59об，*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5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05页。

③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23，д.63，л.64-71，*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1018.

④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0月18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18-19，*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74，1018。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2页。

⑥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1–12页。

弟党透露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①]10月6日和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②]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起程日期。[③]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经中共认可。对此，赫鲁晓夫自然是不敢怠慢的。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函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并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胡乔木看了草案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写。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对胡的修改稿表示同意，尤其欣赏最后一段表述。[④]这次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反映出中共对国际局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方针已经有了一些新的、不同于苏共的看法，尽管毛泽东向苏联人的表述十分温和。

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提法应

①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1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84页。

③ 《周恩来与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7-18，第79页。

④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4页。阎曾回忆说，苏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给中共的，后来的回忆又改为28日。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3页。。

更具一般性，不应当只突出提及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一种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的提法；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希望在宣言中不要指名道姓。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其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其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问题。其三是只由中苏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①]

10 月 30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之处较多，会议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会议还批准了 10 月 29 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②]11 月 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尤金 10 月 30 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并认为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声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③] 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莫斯科仍然留恋他遗留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中央集权领导的传统。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共的崛起，正如美国中央情报不久后的情报分析报告所言，“苏共在重建一个（共产党国际）机构的过程中非常谨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都支持建立某种组织来统一和稳固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很明显，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中国、波兰和自由世界的一些政党——可能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际联盟和组织中唯一可以挑战苏联控制的政党”。[④] 事实上，正是在毛泽东的倡

---

① 《尤金致苏共中央电》，1957 年 10 月 30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 12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 2863–2868 页；另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 724–727 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 9 页。

②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第 16 页。杨尚昆回忆说，中方的修改稿当时就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了（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 3 页）。这大概是记忆有误，详见下文。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 年 11 月 2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6-27，*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79-280，1021-1022。

④ 《中央情报局高级研究顾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1959 年 7 月 20 日）》，CIA/SRS-11，DDRS，CK3100200854，pp.1-26。

议和主导下，国际共运此后便放弃了建立统一的国际组织的传统做法，而采取了“有事开会商量”这种尝试性的措施。这本身确实可以看作中共对莫斯科一贯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风的挑战，不过，毛泽东坚持这样做，还有更重要的考虑，即通过一种适当的方式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

三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目的，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共同追求的，即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①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②这已经透露出，至少在中共看来，他们在某些观点或方针上与苏共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分歧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从后来的结果看，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需处理好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弥合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调解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其中要解决的三个相应问题是：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分歧；波兰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执政党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起草一个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宣言，而处理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各方最关注的就是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地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③但做到这一

① 在处理波匈事件时，中共固然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国的平等和主权地位，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957年1月20日的中苏联合声明中：“双方认为，中苏两国按照上述原则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他们的最高的国际义务。”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20日，第1版。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6–97页。

③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①]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日期，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12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②]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③]11月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8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8、73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20–22页。

③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9页。

10日继续会谈。[1]

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苏共宣言草案最初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绝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2]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发生争吵。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3]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

② *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c.10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8–6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8页。

③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33–734页；《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06–107、133–134页。

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 月 11 日将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①] 中共代表团则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1 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②]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 14 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③]

至此，中苏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其一，在指出和平过渡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字眼）的同时，还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 年 11 月 10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8-28об，*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80-281。

②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 10–11 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290 页。

③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 11 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 年 11 月 12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9，*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 1，с.281，1022。

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①]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直到1963年中苏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之于世。两相对照，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与《莫斯科宣言》的提法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根本界限。[②]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③]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就宣言文本所进行的争论和磋商，实质问题并不在于文字表述本身，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共同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④]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⑤]吴冷西认为，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考虑的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第1版。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6–99页。

③ 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59，第78–84张。

④ 讲到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并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在与陶里亚蒂谈话时毛泽东就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11–11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95–96页。

验将置于何地？应该说，吴冷西的这个感受是准确的——这反映了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①] 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②] 现在看来，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趋势：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人当家的局面正在受到挑战——中共已经有能力、也有愿望参与对运动的指导了。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留下了伏笔。[③]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自 1956 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扮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角色。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在 1957 年初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

---

① 为此，中共在讨论时甚至反对苏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会也表示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中方表示在宣言中无须提到中共八大，各党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第 32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139–140 页。看来，中共不得不同意的那段文字应该是指宣言中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句话，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2 日，第 1 版。在 1960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之间争论最大的还是在会议宣言中要不要提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参见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610–611 页。

③ 李丹慧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考察，可以此反观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 1960 年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异，不同的将来再说。[①]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知也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一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②] 当然，毛泽东并非完全出于不得已的考虑，这里还涉及国际共运领导原则的问题。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③] 因此，在苏方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④]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沉默而已。[⑤] 所以，毛泽东除了劝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

---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278页。这里所说"已经有些改变"是有根据的。1957年3月9日驻苏使馆报告，在波匈事件发生和中国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报刊上的文章，"有意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纠偏"。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19-01，第3–7页。

② 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101，目录5，卷宗982，第25–29张。

③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42.

④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192–19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1–132页。据中国驻苏使馆汇报，早在1955年2月，即赫鲁晓夫访华后，苏联就出现了"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969-01，第1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1–132页。

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至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①

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取得一致。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②会议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地，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③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初周恩来在欧洲进行穿梭外交，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时，波兰就明确表示反对“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在中波联合声明中，也没有出现在以往公开文件中习惯使用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字样。④因此，毛泽东便把哥穆尔卡作为其说服工作的首要对象。

在会谈中，毛泽东首先与哥穆尔卡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5–628页。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1956年12月24日的报告指出，苏联正在“积极调整同兄弟国家的关系”，并一再强调，对于苏联党过去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评”。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8-01，第1–8页。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29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8–99页。

③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1–12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293页。

④ 参见195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劝说道：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但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①] 从会谈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②] 而另一位当事人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③]

11 月 16 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④] 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包括波兰在内的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⑤] 后来发表的宣言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 11 月 18 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

---

①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15 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②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6 页。

③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293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28–630 页。

⑤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293 页。哥穆尔卡在 17 日大会的发言中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9 页。

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①]把这些说法联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毛泽东在为中共日后走上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做铺垫。难怪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②]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③]

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确实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在1956 - 1957年间，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都纷纷援引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国报纸的说法，用来证明中国对自己的理论或道义上的支持。仅此一点便可以显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在节节上升。[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后，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认为，毛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卡斯曼则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⑤]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篇幅刊载了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9–640页。

② 《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10–3222页。

③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192–193页。

④ 有关资料和评论详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3-00097-06，109-01141-03，109-01091-01，109-01090-23；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年12月3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15.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5–596页。

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至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甚至在考试中把这篇讲演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1]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还对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2] 尽管如此，毛泽东坚持“以苏联为首”的说法，在当时还是有利于中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的。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非同寻常，且颇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主动向铁托道歉，努力恢复苏南关系，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与南共联系。[3] 中共是最早与南斯拉夫建立联系的亚洲共产党，[4] 后来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追随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进行了批判，以至在1949年南斯拉夫提出与新中国建交时，中方竟毫不理会。[5] 苏南关系缓和后，1955年3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两党也恢复了联系，尽管当时毛泽东本人并不信任铁托和卡德尔，甚至认为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6] 经过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被社会主义国家接纳。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在接见南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斯大林的大国、大党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一再称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半个铁托，表现出对南共的极大同情。[7] 但是好景不长，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南之间因处理纳吉问题发生矛盾，铁托的普拉演说更令苏共不满，双边关系再度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240号，1957年6月26日，第16–17页；第2246号，7月3日，第15–30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14-01、02）保存着近200页苏联各界人士给毛泽东的信件，其中充满了赞美和崇拜的言词。毛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② 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③ 相关档案见 *Афиани В.Ю.*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1955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 №2, с.3-63；№5, с.3-50。

④ 早在1947年7月，中共就希望与南共“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并提出要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新华社分社或代办处。见林彪致铁托的信，1947年7月11日，AJBT-KMJ（铁托档案馆－南斯拉夫元帅内阁），I-3-b/385。笔者在此感谢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约万·查沃什基提供的这份铁托档案。

⑤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3页。可以作为比较的是，当时中国正在积极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谈判建交问题。

⑥ 有趣的是，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五一节游园活动中，在一幅展出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人还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列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6页；《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5年3月8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0卷，第2414页。

⑦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9–262页。

紧张。[①] 中共也出面批评南共，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明确指向铁托的普拉演说。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极为赞赏。[②] 不过，毛泽东当时还是把南共的错误看作阵营内部的问题，主张对铁托既讲批评，又讲团结。[③] 中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我们批评铁托和卡德尔，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希望澄清事实和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共很重视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尽管 1957 年 6 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的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 10 月 2 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⑤] 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以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 月 25 日中共从苏联驻华大使的通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毛又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笔。毛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⑥] 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 1957 年 11 月 5 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正式会谈，气氛始终十分紧张。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还严厉指责南

---

①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55–468 页。苏南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矛盾详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ёв，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с.10-29。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2093 号，1957 年 1 月 2 日，第 3–4 页。

③ 就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不久，刘晓在莫斯科的中国使馆举行晚宴，与米丘诺维奇举行了亲切会晤。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250–251 页。

④ 《周恩来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 年 1 月 11 日，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 IX，1997.4，c.119-144.

⑤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424–425 页。

⑥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 161–162 页；李越然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 年 10 月，北京）的发言。

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 1948 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词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讲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①

在 11 月 9 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1 月 12 日，在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在讲话中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他希望南共再予斟酌。14 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②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和轻松得多，他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毛泽东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 月 9 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

①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168–170 页；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443–444 页。

②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445–455 页。

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 11 国签字。[①] 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却表现出热情的态度。

在 11 月 18 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②] 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③] 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至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未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 19 日苏共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

① 《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9 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9–640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123 页。

系。[①] 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②]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此时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既强调团结统一，又坚持各抒己见；既拥护“以苏联为首”，又要求“平起平坐”；既承认作为共同道路的苏联模式的统一性，又推崇各国独立发展的特殊性[③]——应该说，这正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④]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

①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456、457 页；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 172–176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23–124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135、149–150 页。1958 年 1 月 31 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 月 27 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97–98 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 1958–1991 年期间，在布拉格用 34 种语言出版，并在 145 个国家发行。

③ 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 1956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波兰使馆招待会上有一番讲话很具代表性。赫鲁晓夫在谈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这句话——‘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他们考虑到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克服了许多困难’。”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 年 12 月 3 日，MF2510408-0717,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15.

④ 从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他为这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 396 件，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个车皮。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第 4 页。

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① 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还必须看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和做法是别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恰恰反映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也构成了日后同盟分裂的因素之一。

四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与此相伴随的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虽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家人表面上还是苏联共产党。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毛泽东事前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② 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的列宁山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殷勤地对毛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而毛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赫鲁晓夫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③

毛泽东在公共场合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与会者即起立致敬；在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

---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 760 页。

② 参见《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 12 卷，第 2863–2868 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第 6 页；109-01100-01，第 9 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 153 页。

③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 158–159 页；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89 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第 19–20 页。

场起立鼓掌，而对其他各兄弟党代表的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还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①]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所有代表都是在会上宣读事先准备好并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而且事先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以至苏联的会务人员和新闻记者都颇感紧张和不便。特别是在 11 月 18 日的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泽东坚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表讲演。[②]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 200 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③]这些细节都有意无意地突出了中共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的特殊地位。

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 11 月 18 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者惊诧不已。

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④]在 11 月 8 日与英共代表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⑤]11 月 17 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

---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287、288 页。

②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с.38-3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116–126 页。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他害过脑贫血病，站着讲话不方便。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1 日，第 1 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0–638 页。

⑤ 毛泽东与波立特和高兰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8 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①]

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似乎是过于乐观了。对此，其他与会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其他一些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也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②]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③]他还不明白，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这里确实隐含了在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的估计上，北京与莫斯科的分歧。[④]

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苏联反党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做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57页。

②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9–10页。

③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④ 关于这一点，苏联人后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讲的“东风”是指中国，而“西风”是指苏联（据库利克在1997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苏共在同盟分裂后为让中共承担责任而寻找的借口。

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1]

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也不要写入宣言，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莫洛托夫。这不能不引起所有在场者的惊诧。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绝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 这大概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不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3]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苏联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4] 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有些坐不住了，当晚与哥穆尔卡谈话时，他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15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15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5]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删去了这段话。

②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3–454页。

③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175页。

④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8日，第1版。

⑤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大概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会议期间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他法国的钢产量为1200万吨时，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万－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话点头称赞。[①] 这番讲话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路——先确定目标，再安排生产；不是根据实际条件和能力，而是按照政治需要来确定生产计划。

在18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②] 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③] 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风靡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也盖源于此。

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国使馆招待会的致词中就表示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有些讲话是多余的。[④] 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

① 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9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③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50–151页。

④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14–215页。

饰地表示了不满。[①] 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②] 考虑到会前不久（10 月 15 日）中苏刚刚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这一事实，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讲演表示担心，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 1992 年正式发表的。[③]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④]

苏共在双方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联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

①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94–395 页。

②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 157–159 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0–644 页。不过，这个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流传于世，并由瑞典学者 Michael Schoenhals 译成英文发表于《共产主义研究》（*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Vol.2，No.2，June 1986，pp.109-126）。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5–636 页。

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①]

尽管中苏两方发表的毛泽东原话有出入，但对比上述两个文献，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并没有本质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本意。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②]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其实，苏共 1957 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 11 月 14 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③]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

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毛泽东讲话的文本后认为，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是：“核战争确实很恐怖，但是共产主义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会发动核战争的现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使世界上一半人死于核战争，那么还有 10 亿人可以活下来！换言之，不仅仅是 3 亿中国人，最终他们将重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摆脱资本主义，比过去更加美好。这令人恼火的观念绝不是只能归属于毛泽东的。事实上，这也是苏联这个先于中国拥有全面核能力成就的国家的传统观点。”美国人的理解或许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客观地看，不能把中国当做不可救药的‘冒险家’。毛泽东曾明确

---

① Правда，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

② 见过该讲话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说，“这份文件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很差”。*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217。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0 日，第 1 版。

声明：中国需要为期 15 年的和平，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苏联和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毛泽东会欢迎一场核毁灭，更不用说去积极地引发一场核毁灭。”[①]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以即席演说这种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②]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③]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又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 1000 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 3000 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 27 亿人，还有 9 亿人，有 9 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

① 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 年 12 月）》，1961 年 2 月 17 日，CIA/SRS-15，FOIA，pp.1-33.

② 笔者曾为此事询问过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李越然，李说，毛当时是即席讲话，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只能是听一句翻一句，无法认真思考（笔者访问李越然记录）。此外，毛泽东有一些私下谈话更叫赫鲁晓夫难以理解。如谈到未来的战争时，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见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2-33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 395–397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 150–153 页。

④ 吉林省档案馆藏，全宗 1，目录 1–14，卷号 59，第 6–8 张。

⑤ 吉林省档案馆藏，全宗 1，目录 1–14，卷号 126，第 16–35 张。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集中报道了一个多月。[①] 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决议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②] 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未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③]

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危机。

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 1957 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政治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④] 在这种情况下，当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很难再“求同存异”了。[⑤] 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第 5–17 页。

②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272–273 页。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已经不再提“议会道路”，同时强调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文件名称，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第 5–17 页。

③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 年 5 月 23 日。

④ 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1957 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获得更稳步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 8 个月的商品流转额增长，“为过去 40 年所未曾有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20-11，第 150–158 页）1956—1958 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年，第 51-52、137、140 页。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 1958 年 12 月下水试航的情况见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1996，c.245。

⑤ 就在会议召开几个月后，美国的情报分析家有一个判断很到位：“无论是否愿意，北平作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中心的出现已经逐渐损害了莫斯科作为世界共产主义中心的无可争辩的地位，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中苏同盟的分裂及聚合因素的情报报告，1958 年 9 月 15 日，MF2510409-0106，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23.

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这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而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1958年8月23日，由于大陆炮击金门和美国的卷入，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通知此事？这个问题涉及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需要做出准确的回答。对此，以往研究者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资中筠和苏格在他们的著作分别指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曾通报苏联”。[①] 而多数学者，如韦斯塔、陶文钊、戴超武、祖伯克、普洛祖缅希科夫、张曙光、陈兼等人则相信，“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对他们隐瞒了行动的时间、过程和目的”，甚至是“有意不让苏联知道”，其动机之一“就是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②] 遗憾的是，所有上述说法，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其注明的史料来源不

---

① 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② 奥·韦斯塔:《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载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4页；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20-221；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p.255；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10；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179。

完整、不准确，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可靠性。例如，张曙光虽然注明其根据是刘晓的回忆录，但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刘晓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恰恰与张著的判断相反。陈兼提到赫鲁晓夫访华时与毛泽东有 4 次谈话，而他只看到 7 月 31 日和 8 月 3 日两次谈话记录，恐怕还不足以得出否定的结论。普洛祖缅希科夫引证的是苏联使馆 1958 年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朋友”是在开始行动两周后，才告知“这次行动所追求的有关政治目标”的。[①] 严格地讲，这个文献可以证明中国事前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但却不能说明根本没有通报此事。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对此一直十分关注，并尽量收集了各方面的证据，也进行过分析和推断，但总感觉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论据，因而始终未能做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因事先得知该书将披露大量中国的档案文献，故笔者在得到这部 130 万字的巨著后，立即进行查找。果然，该书引用了一条重要史料，即 195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无疑，这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证据，它的出现对于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将笔者所能找到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依时间顺序罗列于此，并进行对比分析，希望由此得出的结论能令人信服。

先看当事人的回忆。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口述史料大概是 1970 年代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卡皮察对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的谈话。卡皮察当年曾随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葛罗米柯和我在 1958 年 9 月 7 日赶到北京，去了解中国这次行动的意图。”[②] 除了对访华日期记忆有误，[③] 这个谈话的表述非常清楚——“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但这里存在一个当事人是否因 7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有意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

① TsKhSD（当代文献保管中心，1992 年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RGANI），f.5，op.49，d.239，l.202。

②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 1974 年 7 月 6 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 Michael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1982*”，in *Cold War History*，Vol.3，№2 (January 2003)，p.9。

③ 9 月 5 日晚周恩来在与苏联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谈话时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访。葛罗米柯于 9 月 6 日到达北京并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66–167 页。

接下来是1974年西方根据赫鲁晓夫的录音磁带整理出版的回忆录，在那里，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十分含混：

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

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我们没有作任何举动去约束中国同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

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完全赞成毛泽东解放这两个岛屿，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

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国人开始积极支援蒋，毛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炮战中陷入了困境。[①]

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中国通知“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不是指炮击金门开始前，而是指在战役期间的情况。理由是，中国希望苏联给予空军援助，是在美国加强援蒋且国民党空军使用了美国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以至海峡空战形势发生了突变以后。苏联同意派空军和导弹部队到福建前线，但指挥权不能交给中国，遂被毛泽东拒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事后也曾提起过。[②]显然，仅仅根据赫鲁晓夫这段回忆无法判断苏联是否事前就得知了炮击金门的消息。

还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回忆录，而这个回忆更是混乱，舛误颇多：

1958年8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8月25日我们向金门打炮，并封锁金门、马祖，美方出动了海军第七、第六舰队。赫鲁晓夫着急了，不了解我国向

①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4页。1993年俄国《历史问题》杂志连载刊出赫鲁晓夫回忆录，内容与此大体相同。

②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金门打炮的原因和目的。他亲自匆匆来访北京，直至到莫斯科机场前，才通知中国大使去送行。

赫鲁晓夫来北京与我中央领导同志谈判时，提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苏联。我们回答已通过我国国防部参谋部的苏方顾问把这一事通知了苏联国防部。[①]

首先，葛罗米柯访华不是8月3日，而是9月6日。其次，炮击金门的时间也不是8月25日，而是8月23日。再次，炮击金门后匆匆来访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葛罗米柯。最后，刘晓显然是把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8月初与1959年9月底10月初两次访华混淆了，而赫鲁晓夫是炮击金门一年后两党在北京会谈时才提出事先不通报的问题的。所以，刘晓的回忆同样是靠不住的。不过，他所提到的中方的答复——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却是有文献依据的。

作为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1950年代经常列席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他的回忆录被认为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吴冷西回忆说，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谈起炮击金门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②] 这里，毛泽东的说法是斩钉截铁的——对苏联人一句话都没有谈。

对上述当事人回忆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卡皮察和吴冷西的说法——中国事前没有将炮击金门的计划通知苏联——比较明确，比较可靠。但既然对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必须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才能继续进行分析。

再看有关的档案文献。

赫鲁晓夫1958年访华时，与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中方保留了所有这4次谈话的记录，而目前所披露的俄国档案只有7月31日和8月3日会谈的记录。[③] 笔者仔细查阅了这些档案文献，其中确实没有一句谈到关于中国即将开始炮击金门的内容。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

---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③ 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00-128。这两个苏方记录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先披露的。根据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沃尔科格诺夫的遗嘱，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沃尔科格诺夫文件（Volkogonov Papers）于2000年1月对公众开放。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研究人员在其中发现了这两份文件，并译成英文公布出来。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12/13，Fall/Winter 2001，pp.243-272。

与赫鲁晓夫是否还进行过非正式谈话？是否在非正式谈话中提到过炮击金门的问题？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就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根据《毛泽东传》披露的中方的记录，毛泽东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对赫鲁晓夫说：

那时他们（指美国人——引者）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 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

这个文献与吴冷西回忆的毛泽东在同年 11 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吻合的，甚至毛泽东这两次谈话的用语都是大体相同的。到这里，这个问题本来可以看作是已经解决了，但是两天以后，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会谈时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时，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

关于 1959 年 10 月 2 日会谈的苏方记录如下：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转达一切情况 我还可以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尽管我们向沿海岛屿打炮，但是我们并不想解放台湾。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了解杜勒斯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到的这个指令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向沿海岛屿打炮，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打炮。我不理解你们的政策。坦率地说，我认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 年 9 月 30 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55 页。

为，你们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当我听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很纳闷。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些个别措施。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很不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也许你们会认为，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你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①

看来，刘晓有关中方答复的回忆所依据的正是这个文献。不过，毛泽东在这里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对策——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所说的“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о вашей политике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是特指炮击沿海岛屿的行动，而毛泽东所通报的只是一些“个别措施”（об отдель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由于双方在会谈时发生争执，毛泽东面对赫鲁晓夫的质问而改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接连三次强调事前已经向苏联进行了通报，恐怕也非空穴来风。

那么，毛泽东坚持说在炮击前一个月已经通报的“想法”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的资料，不过，炮击金门前一个月，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的一个报告或许可以说明问题。7 月 25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讲述了中国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政策。但是，在这个长达 75 页的报告中，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或中国对台政策的，只是在论述中国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

---

① 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

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1] 可以推测，如果此时苏联在华外交人员得知将对国民党所控制的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必定要告知莫斯科，并在报告中进行评论。[2]

收到这个报告三天以后，赫鲁晓夫便来到了北京。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在这些谈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台湾问题和炮击金门的事情。当然，随同赫鲁晓夫来访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有机会与其中国同事及在华苏联军事顾问会面，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存在这种会面，也不曾谈到攻击金门的问题。理由同上，假如赫鲁晓夫得知如此重大的情况，是必定会与毛泽东讨论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炮击行动发生后苏联的反应。

炮击金门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3] 一个星期以后，苏联也只是以《真理报》评论文章的形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般性的表态。文章指责“美国侵略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国家一样，苏联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恢复对台湾岛及其他沿海岛屿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因为苏联与人民中国是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的纽带连在一起的”。[4] 苏联作如此反应的依据大概是中国外交部 8 月 26 日的简短通报：“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

---

① 1958 年 7 月 26 日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1-75。

② 苏联使馆对台湾问题一直是很关注的，在此之前已经不断有报告送到莫斯科。如 1958 年 2 月 5 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为了支撑他的政权，美国已经向台湾提供了过多的军队、军舰和导弹。报告还注意到，美国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 月 5 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以及与蒋介石的会见。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他们还注意到，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转引自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Cold War History*，Vol.3，№2（January 2003），pp.7-8。

③ Правда，24 августа 1958г..

④ Правда，31 августа 1958г..

区的冲突。”[1]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不受武力侵犯，国会已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安全。[2]台湾报纸也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3]直到此时，苏联才感到问题严重，并决定派外交部长访华以弄清情况。与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紧密合作的情况[4]相比，苏联如此迟钝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双方缺乏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一年以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回顾台海危机的过程时总结说：“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5]

对上述史料进行解读和分析后便不难得出结论：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前，中国方面的确没有与苏联进行协商，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个意图。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却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这同炮击金门决策期间赫鲁晓夫突然访华的起因和特殊形式有直接关系。

炮击金门和马祖的问题，是1958年3月5日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经过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7、8月调空军进入福建，并“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进行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7月17日彭德怀向总参、总政和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

---

① 1958年8月26日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② 详见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4–88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82–383页。

③ 见《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④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5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1959年12月18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其海上航运，总参要立即拟订部队行动计划。当晚，毛泽东又召集军委及空军、海军领导人开会说，美军登陆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牵制美帝国主义。地面炮兵第一次打 10 万至 20 万发，以后每天打 1000 发，准备打两三个月。两个空军师在炮击的同时或稍后转场到汕头、连城。彭德怀连夜主持军委会议，做出具体部署：空军在 27 日转场，炮兵准备于 25 日炮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①

正在解放军积极准备炮击金门的行动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7 月 21 日，刚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共同对付美国。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中国只是要求苏联提供帮助。②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中共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集体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这个谈话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感到问题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因而“心情沉重”。为此，尤金主动提出，最好是由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③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用意所在。笔者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百思不得其解：苏联只是作为盟国提出了一个军事方面联合行动的建议，不同意就算了，毛泽东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怒不可遏？给人的感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借题发挥，把问题上升到“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的严重程度，似乎就是要引起赫鲁晓夫的重视。不过，毛泽东希望赫鲁晓夫访华，并非要与他协商正在拟订中的炮击金门行动。经过深思熟虑，7 月 27 日早上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和黄克诚，“打金门停止若干天”，“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④这个突然做出的决定确实有些蹊跷，难怪彭德怀也感到不好理解。⑤现在看来，毛泽东是不想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发生炮击事件，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74–675、691–692 页。

② 1958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57–160 页。

③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2–333 页；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陈春华译，《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100–103 页；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笔者对这个过程的详细论述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26–327 页。

⑤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21 页。

以免不得不与他面对面商议此事。

更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建议的赫鲁晓夫离开中国的方式。赫鲁晓夫访华是秘密进行的，本来准备还是秘密回去，也没打算搞联合公报。但是在赫鲁晓夫临走前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赫鲁晓夫是不是公开回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机场组织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有仪仗队，并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赫鲁晓夫感到意外，说昨天已经谈好，怎么来的还怎么走，来华前也是这样商定的。毛泽东说，他本来有三个方案，即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而且无论哪个方案都要搞一个公报。赫鲁晓夫请求还是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借口。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建议他秘密来访是担心敌人利用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搞突然袭击，故仍然坚持公开回国的方式，并说签订公报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赫鲁晓夫只好表示同意。[①] 随后公开发表的公报说："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

由于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③] 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看到公报后，特别是因为双方的国防部长都参加了会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猜测中国可能会在沿海岛屿，甚至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④]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毛泽东便下令炮击金门。[⑤] 这时，杜勒斯更认为"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的行动"。[⑥] 显然，这正是毛泽东坚持赫鲁晓夫必须公开回国并发表会谈公报所期待的效果。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1958年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俄国档案见 АПРФ, ф.52, оп.1, д.498, л.151-15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1, с.100-128。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③ 8月17日在北戴河研究炮击金门问题时，毛泽东突然问起炮击时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23日下达的炮击命令中有一条是"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王尚荣谈、王凡整理：《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259–260页。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294–295页。

⑤ 8月18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7页。

⑥ 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统而言之，由于《毛泽东传》披露的这条史料，现在可以对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盖棺定论了。当然，毛泽东最初有意对苏联隐瞒将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只是要向世人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这是所有东欧卫星国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不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毛泽东采取的这种做法，并非是有意忽视甚至破坏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面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和核威胁，苏联答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空军援助，以及中苏双方所采取的协调行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苏军事同盟在远东危机中仍然具有不容轻视的对抗美国、稳定局势的作用。所以，尽管炮击金门事件在客观上可以看作是对莫斯科领袖地位的挑战，也确实给中苏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中苏同盟在冷战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充分地利用之。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

在冷战结束后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1958年的台海危机是人们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题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对事件发展的基本过程也做出了比较完整的和清晰的描述。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利用的大体是相同的史料，他们的研究几乎也是同时起步的，其主要内容涉及毛泽东的决策、美国的反应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① 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扩展了讨论的范围，他们的重点在于蒋介石的对策及

① 西方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2-199;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8;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Chapter 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apter 7;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Modern China*, Vol. 34, No. 4, October 2008, pp.477-507, 以及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3–168页。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主要的成果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1–36页；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0–51页；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36–75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7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2–5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章；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37–50页。

美台关系内幕。[①] 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即研究者很少专门讨论在这次危机中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苏之间的分歧。尽管不少学者都提到这次危机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大多语焉不详。那么，对于毛泽东突然采取的这次军事行动，赫鲁晓夫究竟如何看待，莫斯科为此做出了哪些决定，中苏之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年来发现的多边档案文献的梳理，回答这些问题。

一、困惑：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

在这次事件中，最令苏联领导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突然决定炮击金门，以至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感到纳闷：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②] 其实，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关于炮击金门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支持中东地区的反美斗争，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也有人认为是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给“大跃进”运动鼓劲；有人认为是试探美国保护台湾的政策底线，以确定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有人认为是要在远东打击美帝国主义，给它套上一根“绞索”；有人认为毛泽东被美国停止日内瓦谈判所激怒，决定教训一下美国，让它回到谈判桌来，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苏联在对美斗争中的软弱表现不满，想通过实际行动显示其外交政策独立于莫斯科。讨论的核心最后汇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毛泽东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不是为了占领金门？[③] 现在看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而这些依据都是来自毛泽东本人说过的话。

问题是，毛泽东谈论炮击金门起因的这些话，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所说的。1958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最初做出炮击决定时说：金门

---

① 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纪念文集中，如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 年；“国防部军务局”编印：《八二三台海战役》，台北：“国防部军务局”，1996 年。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不多，主要有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2001 年 12 月），第 231–297 页；黄文娟：《没有硝烟的“战争”——1958 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2 辑（2006 年 6 月），第 189–211 页；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战后中华民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 年 8 月。

②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c.80-8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03–405 页。

③ 参见前引书目，美国学者之间的讨论还可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 50 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5 期。

炮战，意在击美，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①] 然而，7 月 27 日毛泽东又突然决定放弃炮击行动。[②] 再次决定打炮的当天（8 月 2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25 日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打炮的主要目的是火力侦察，考验美国人的决心，还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后，9 月 5 日毛泽东在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发言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湾，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同时要美国紧张一下，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④] 当天下午，周恩来请苏联参赞苏达利科夫转告赫鲁晓夫，炮击金门只是要教训金马守军，让它紧张，并不准备登陆。[⑤] 第二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会见了来访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再次表示炮击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马。[⑥] 9 月 8 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说金马就是套在美国人脖子上的一根绞索，还说紧张局势对中国有利，可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⑦] 危机消除后，毛泽东解释说：金门和马祖“还是留在蒋介石手里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⑧]

那么，到底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呢？从决策时间上看，支持中东恐怕只是一个说辞，否则就不会在 7 月下旬中东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放弃行动。[⑨] 而一

---

①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19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26–327 页。

③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第 74、76–77 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77–178 页。

⑤ 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 年 9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9-00833-04，第 94–103 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78–181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391–395 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

⑧ 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 年 9 月 15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429-1431 页。

⑨ 7 月 25 日美英法分别函复赫鲁晓夫，同意召开安理会各国首脑会议，但采取了拖延态度。（《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8 月 4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继续在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演习，并呼吁召开联大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中东撤军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58 年 8 月 4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996，л.1-11，*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328-332。）

个月后再次决定实施炮击时，中东事件已经接近尾声了。[1] 从决策逻辑上看，试探美国的政策底线并非目的，而是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和条件，关键问题是知道美国的政策底线后中国要采取什么行动。所谓“调动美国”，“让它紧张”，都是“试探”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的目的，因为当时还不了解美国的底线，如何就知道它会“紧张”，会被“调动”？“绞索”政策也是危机开始走向缓和时想出来的一种说法，是对党内和大众做出的解释。[2] 至于为“大跃进”鼓劲的说法，也很难站住脚。鼓舞干劲有各种办法，但唯一不可取的就是在全国上下集中精力和物力实现“大跃进”的同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能够事先确定这一行动必然成功，而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心中无数的。如果指望行动本身“鼓劲”，则采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大概是最得不偿失的——炮击金门 2 个月消耗的炮弹在“大跃进”中大概是生产不出来的。[3]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否则就很难理解苏联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针对的是什么，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为何产生。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4] 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对于这次战役的真正目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局常委这样极小的范围内有所透露外，是无法明言的。至于后来所说种种，都是事态变化后的解释而非初衷。其结果，甚至直接指挥战役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5]，也就难怪苏联人会胡乱猜

---

① 8 月 8 日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中东危机。8 月 20 日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撤军。8 月 21 日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提案，要求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中东。(《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8 月 22 日，第 1 版；8 月 23 日，第 1 版。)

② 毛泽东特意嘱咐要公开发表“绞索政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80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68–869 页。

③ 据台湾军方估计，到 10 月 6 日，落到金门的炮弹共 474910 发。(王叔铭：金门炮战作战检讨总讲评，1959 年 3 月 25 日，台湾“国史馆”，特交档案·分类资料 2090：B 军事，100：8CKSP。)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门炮战后，利用炮弹皮制作的各种菜刀竟成了台湾的走俏商品，至今盛誉不衰。

④ 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过这样的结论，并进行了合理分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194–195 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第 47–48 页。) 笔者的提法、依据和思路与前者略有不同。

⑤ 参见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 年 12 月 24 日，第 5 版。

疑了。[①]

解放全部沿海岛屿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但这一进程被朝鲜战争打断了。[②] 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新政府采取的"放蒋出笼"方针，蒋军加紧了对大陆的袭扰行动。[③] 1954 年初，中央军委确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解放华东沿海岛的方针。[④] 不久后开始的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导致了令毛泽东一忧一喜的两个结果，忧的是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喜的是中共的军事压力迫使美蒋做出了主动撤离大陈等岛屿的决定。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危机还导致了一个后果，即开辟了两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渠道。[⑤] 这些经验与中共下一步的行动决策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1955 年 3 月 22 日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说明问题："我们当前的步骤是解放我国的沿海岛屿，即是解放金门和马祖诸岛。为了有把握地完成这个任务，在军事上我们还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在外交上也要进行严重的斗争。目前，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蒋贼军从沿海岛屿的撤退。……我们的方针是：利用印度、压迫英国，逼使美国退却。假使有可能在不妨害我们解放台湾的条件下，经过国际谈判使蒋匪军撤出沿海岛屿，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正在本着这个方针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使和平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我们不放弃任何对我们有利的举行国际谈判的机会，我们也要坚决地有把握地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军事斗争。解放

---

① 这一点，当时似乎只有蒋介石看得最清楚。炮击行动发生的第三天，蒋便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使用的是困扰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击金马之企图甚明"。蒋介石日记，1958 年 8 月 25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笔者 2009 年 5 月去胡佛档案馆查阅时，蒋介石日记 1955 年以后的内容尚未开放，遂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淑雅待 8 月开放后代为抄录有关炮击金门的内容，故直到 12 月笔者才得到罗敏和张淑雅发来的有关日记的抄录件。笔者在此对二位学界同仁表示感谢。

② 笔者的相关讨论参见《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34–53 页。

③ 详见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89–199 页。蒋军发起的最大一次突袭行动是 1953 年 7 月的东山岛登陆战，详见"国防部文史局"编印：《海岛攻防战史》，未刊，1959 年，第 12–31 页；孙淑文：《战后国军海军陆战队的重建与迁台初期建军发展之研究》，《军事史评论》第 13 期（2006 年 6 月），第 204–206 页。

④ 徐焰：《金门之战》，第 171 页。

⑤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除上面列出的研究成果外，还可参见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1995 年 6 月），第 411–472 页；罗纳德·普鲁森：《1954–1955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危机的介入》，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 76–112 页；詹奕嘉：《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试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2 辑（2006 年 6 月），第 175–188 页。

一江山岛逼出了美蒋从大陈岛和南麂岛撤退，这就证明，在我们继续为解放沿海岛屿而斗争的过程中，美蒋为形势所逼而撤出金门、马祖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继续坚决地进行斗争，美蒋是决不会自动撤退的。在斗争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不要同它打起来，但是对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①

5月21日，周恩来又向苏联使馆详细通报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方针：“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周恩来估计到中美谈判可能拖很长时间，甚至根本没有结果，但那时在中国实力增强并做出台湾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后，“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甚至“可能从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制定了分两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第一阶段争取“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蒋军按规定时期撤离，我们将并不采取军事行动，否则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谈判可以在中美之间和国共之间同时进行，但“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周恩来最后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②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把中国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考虑和对策讲得十分全面、十分透彻：首先通过中美谈判压迫蒋军撤离金马，实现和平解放；此招不行，则采取军事行动迫使蒋军放弃金马，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已有大陈岛的先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138页。

② 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

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收复金马则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①] 因此，当日内瓦谈判陷入僵局，而福建的运输条件和军事准备完成后，对金马采取的军事行动便开始了。

1958 年 1 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讨论了关于空军进入福建及对金马作战的方案。他们认为，空军入闽对于保卫国防、打击蒋军都是十分有利的，但考虑到国际政治反应，应避免刺激敌人，空军拟不主动轰炸、不出海作战、不接触美机为好。如果对金门和马祖作战，则采用空军、海军及地面炮火轰击和封锁的办法，不用陆军登陆，即可能迫使蒋军撤离。[②] 3 月 5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带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拟在 7、8 月开始行动"，"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 月 8 日毛泽东批复同意，但最后行动时间待定。[③] 7 月 15 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立即有所反应。7 月 17 日，正在准备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的彭德怀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立即拟定部队行动计划。[④] 未等军方拿出具体方案，7 月 18 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 10 万至 20 万发，发后每天打 1000 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彭德怀于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做出安排，炮兵准备于 25 日轰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空军 27 日转场。7 月 19 日总参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⑤]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当时并没有明确将军事行动限于地面炮火轰击。据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回忆，在总参各部召开的会议上，"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特别是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而参加演习的部队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所以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⑥] 从福建军区前

---

① 早在 1955 年 3 月 14 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毛泽东就考虑到马祖及其他岛屿的蒋军可能自行撤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51 页。

② 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 93–100 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74–675 页。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91 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853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92 页。

⑥ 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王凡访问整理，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2–254 页。王说总参部署金门作战的会议是 8 月 14 日召开的，大概记忆有误。

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看，所谈内容包括使用轰炸机，海军对登陆作战的保障，占领金门后如何加强工事等，会议甚至还确定了登陆的大体时间。[①] 看起来，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对于具体作战方式也不甚清楚。还有，根据福建军区的资料，直到7月20日前线官兵才开始大规模构筑炮兵阵地的工事。[②] 而整个战役的指挥权力，是临时决定委任给工作中心已转到地方行政的福建军区政委叶飞的，甚至开始行动的具体时间也交由前线指挥官掌握。7月17或18日叶飞突然接到电话传达的命令后，立即组建前线指挥部，并于19日赶到厦门，开始进行战役准备，于24日完成作战部署。[③] 所有这一切表明，尽管早有设想，但确定开始金门战役的决定是毛泽东临时做出的。

对于毛泽东突然作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中东危机、美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动一次军事攻势，迫使蒋军退出金马。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自己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毛泽东信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作何反应有所顾虑。[④] 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二、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⑤] 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坠五

---

① 福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1958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1，第17–24页。

② 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182–183页。

③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5–25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26–32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

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1] 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2] 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果然来到了北京。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并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3] 第二天的谈话就比较轻松了，赫鲁晓夫谈起阿联总统纳赛尔访苏，并说："发表会谈声明是纳赛尔提出的，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毛泽东立即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4] 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但事后回想起来，应该明白毛泽东的用心了。

---

① 谈话内容详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c.119-121。

②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9–332页；*Верещаги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c.126-127。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发表声明"的内容。

③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1, c.111-126. 中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内容，但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页。）

④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①] 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还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③] 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④]

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⑤] 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26-128.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第1版。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4-45，*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26-327。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8月4日、5日、6日，外档，109-01812-05，第54–58页。

⑤ 苏联报刊的倾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应强调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外交部每周通报》第141期，1958年8月8日，外档，107-00152-03，第27–29页。)

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①] 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②] 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则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③] 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④] 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⑤] 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7 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⑥] 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⑦]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⑧] 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⑨] 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 7 月底 8 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⑩] 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

---

① 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 年 8 月 5 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②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 年）》，台北：“国史馆”，1993 年，第 325-326、328-330 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 年 8 月 4 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August 8，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19,China*，Washington D.C.：GPO，1996，p.45。

③ 蒋介石日记，1958 年 8 月 3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94–295 页。

⑤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August 12，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50-51.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3，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25-126.

⑦ SNIE100-12-58，No.340，*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28 October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 D.C.：GPO，2004，pp.185-190.

⑧ 蒋介石日记，1958 年 9 月 6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⑨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 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35–40 页。

⑩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86 页。

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1]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因为通过中国的通报和自己的观察，当时苏联并不认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957 年 4 月苏联使馆的报告就认为，尽管“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但中国政府奉行的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2] 1958 年 2 月 5 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美国正在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 月 5 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与蒋介石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由于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3] 7 月 25 日，即炮击前不到一个月，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 75 页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竟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的，只是在论述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中国政府认为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4] 此外，苏联人知道中共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也不愿过多干预这类事情。自 7 月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就某些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问题对苏联外交部提出交涉，坚决反对可能导致“两个中国”存在的现象。[5] 以至苏共中央不得不出面，“请中国派负责台湾问题的同志与苏联使馆在 8 月初进行座谈，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6]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

---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 年 9 月 30 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855 页。

② 苏联驻华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1957 年 4 月 22 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90-198。

③ TskhSD，f.5，op.49，d.131-3，p.78，转引自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pp.7-8。实际上，杜勒斯是 3 月 14 日到达台北，第二天离开的。

④ 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 年 7 月 25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⑤ 详见外档，113-00319-01，107-00308-01，109-00787-18，及克鲁季科夫与龚澎会谈备忘录，1958 年 7 月 1 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⑥ 陈毅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 年 7 月 9 日，外档，109-00825-04，第 34-35 页。

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①] 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②] 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三、尴尬：莫斯科不得不为北京提供核保护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8 月 24 日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③] 显然，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将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8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主动通报的情况非常简单："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④] 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当然是在安慰莫斯科。直到 8 月 31 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共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⑤] 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

①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 1974 年 7 月 6 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p.9。

② 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осква：Вопниздат，1975，с.145.)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5 日，第 5 版。

④ 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 年 8 月 26 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⑤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31 日，第 4 版。

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1] 况且，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几天后美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炮击金门前，毛泽东思考再三，犹豫不定，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的干预，所以他想方设法避免刺激美国。准备炮击的指示下达后，8 月 20 日毛泽东又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2]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和叶飞商议。听过汇报后，毛泽东只问了一句：炮击会不会打死美国人？叶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营一级。毛考虑了十几分钟，再问：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叶答：无法避免。毛随即宣布散会。这时林彪给毛写了一张字条，建议可通过正在与美国人接触的王炳南透露一点消息。毛未作批示，把字条送给叶飞看。叶虽不同意，但感觉事情重大，未敢表态。22 日继续研究，毛泽东考虑，先打几百发炮弹，由小到大。叶飞则倾向于突然袭击，由大而小。毛最后决定"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留在北戴河指挥，与彭下榻一处。23 日一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并通过叶飞告知前线：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 3000 到 6000 发；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上午 10 时 35 分，彭德怀传达了最新指示："1、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2、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3、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午后彭德怀又提出，同意福建前指的意见，还是大打，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15 时，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彭的意见。于是，17 时 30 分开始实施炮击，重点目标是金门的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和停泊在料罗湾的军舰。[3] "最猛烈的炮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共打出 2.8 万发炮弹。[4]

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经过反复研究和争

---

① 从 8 月 29 日到 9 月 3 日《真理报》总共刊登了 11 条有关台海局势的消息，且多是外国报纸的评论。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 9 月 6 日，第 16 页。

②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第 194 页。

③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267–269 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 259–260 页。

④ 这是中方正式通知苏联的说法，见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 年 8 月 26 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吵，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立场。① 还在炮击前，美国就不断通过军事援助加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美国第七舰队两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巡弋，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进驻台南机场，拨给蒋军 6 架最先进的 F-100 喷气式飞机，40 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并帮助装备一个斗牛士地对地导弹营。② 战役开始后，8 月 26 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第六舰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 4 艘驱逐舰自地中海调来台湾，加入第七舰队，另调中途号航母和驱逐舰若干自珍珠港来台；即刻交付台湾 2 艘登陆艇；待台湾飞行员经培训可单独飞行后，陆续移交 F-100 飞机；在 60—90 日内，增强驻外岛地面部队的武器装备；调胜利女神地对空导弹一个中队驻台，视蒋军训练情况交付；数日内再提供 3 艘登陆舰及其他舰艇若干。史慕德当晚即前往金门视察。蒋方要求美军直接协防金门，美方称：美国援台，蒋即可增兵金门。③ 9 月 2 日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浬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马。④ 9 月 3 日，美国会授权总统拨借 8 吋榴弹炮 12 门给蒋，即日由琉球启运。⑤ 美国援助的这些新式武器和装备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更让莫斯科和北京紧张的是白宫的政策性声明。

炮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外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 月 27 日蒋又致电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帮助协防金门、马祖；第七舰队承担海峡安全责任，帮助护航；授权美国驻台协防司令便宜行事。⑥ 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公开表态看，直到 8 月底，美国只是对局势表示关

① 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07–213 页。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 1958 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第 125–128 页。

② 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 12-13、17 页。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已于 1957 年 5 月进驻台湾，并在一年后进行了一次试射。该导弹射程 550 英里，时速 650 英里，可以从台湾发射到大陆 200 英里以内的地方。（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 888–889 页。）

③ 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 年 8 月 26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0188，第 145–149 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31 日，第 1、3 版。

④ 黄少谷与庄莱德谈话记录，1958 年 9 月 2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0008，第 148–151 页。

⑤ 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 26 页。王叔铭在 1958 年 9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八吋大炮“之威力极大，可穿透 3 呎厚之水泥工事，对匪炮各阵地甚有威力”。9 月 19 日运达金门。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⑥ 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 年 8 月 24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第 129–135 页；蒋介石致艾森豪威尔电，1958 年 8 月 27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第 106–115 页。

切，谴责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声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义务，而没有表明是否帮助蒋军防守金马。[1] 实际上，此时美国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8 月 29 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会议确定分三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1. 只要中共不企图攻占任何主要岛屿，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2. 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很可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3. 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并由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参联会一致认为，不向国民党人通报该计划。[2] 9 月 2 日，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说明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3]

尽管华盛顿内部讨论的情况并未泄露，但美国人的强硬态度是越来越明显了。8 月 29 日，陆军部长布鲁克在汉城对记者说，如果中国人“低估或误解了”总统或杜勒斯的声明，“将要因此而后悔”。9 月 1 日又在结束访台时发表讲话：“如果共产党进攻金门、马祖而以为这仅将导致一场有限战争的话，那他们实在是在冒极大的危险。”[4] 其实，毛泽东应该已经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5]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表示。[6] 福建前线指挥部因未见到新指示，在一篇广播稿中仍然对蒋军施加压力，说“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见后，立即提出批评，并于 9 月 3 日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再次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7] 同一天，毛泽东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31 日，第 1 版。

② *Memorandum of Meeting*，August 25、29，1958，*Telegram from the JCS to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Felt)*，August 29，1958，in *FRUS,1958-1960,Vol.19,China*，pp.73-75、96-99、100-102.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ion*，September 2，1958，in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pp.115-122.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31 日，第 1 版，9 月 3 日第 4 版；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 年）》，第 618–619 页。

⑤ 炮击三天后，中央情报局做出评估：金门防守阵地精良，库存补给充足，守军训练状态很好，作战意志坚强，官兵士气高昂。（SNIE100-9-58，No. 342，*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26 August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pp.163-178.）

⑥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和机构电，1958 年 9 月 2 日，外档，110-00421-01，第 1–2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377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859–860 页。

下令炮击暂停三天。9月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①]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②]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在白宫看来，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于是，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③]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④]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⑤]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⑥]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并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关于这两次谈话，目前尚未发现档案文献，但有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于谈话的主要内容——中方表示既不要占领金门，也不会解放台湾；苏方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和策略；双方交换了周恩来9月6日声明和赫鲁晓夫9月7日信件的文本，并赞同对方的做法等等——回忆录的描述都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毛泽东是否要求苏联给以核保护。[⑦]葛罗米柯回忆的毛的说法大意是：美国可能冒险，中国已有考虑。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5–166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8–79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3版。

④ 参见《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⑤ 只有蒋介石对此声明感到欣慰，他在日记中叹道："又渡过一难关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⑥ 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另参见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TsKhSD，f.5，op.49，d.133，pp.1-8，转引自V. Zubok and C. Pleshako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4-225。

⑦ 在研究者引发的争论见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74-175；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7–138页。

对其实施打击。[1]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争。[2]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葛罗米柯说，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这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不要你们参加。我们不同于国民党，不会拖苏联下水。至于同美国作战，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这点请转告赫鲁晓夫。[3]笔者判断，中方的回忆比较全面和准确，而葛罗米柯显然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的意愿。[4]从危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5]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制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因此，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对于赫鲁晓夫信函的内容，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9月7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研究一下赫鲁晓夫的信件，并写出书面意见交葛罗米柯带回。毛认为，应肯定的正确部分占90%，可商量的地方只有几段，并建议信中应对中美双方的声明有所评论。葛罗米柯于当天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认为都是"正确的和认真的"。经过修改，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6]根据俄国的档案，9月7日周恩来与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周恩来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猛烈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

---

① 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68–170页。

② *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6, с.61-63.

③ 阎明复：《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6–18页。另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④ 也有可能葛罗米柯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记混了，详见下文。

⑤ 虽然在内部已经确定放弃攻占金门的目标，但在9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宣传提纲中，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挑衅的宣传提纲，1958年9月6日，福建档案馆，101/5/1079，第68-69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7页；刘晓与库兹涅佐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8日，外档，109-01211-04，第30–31页。

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时候，苏联才应该使用核武器给以报复性打击。[①] 此外，苏共中央在9月27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函中也复述了周恩来的这段话。信中说，葛罗米柯转达了周恩来9月7日的谈话内容，苏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但是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如果在中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那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我们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后来（10月15日）在给赫鲁晓夫的亲笔回信中说，中国领导人被"你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并对此表示"衷心感谢"。[②] 应该说，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并非虚情假意。[③]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④] 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在评价美国的声明时，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在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赞同后，赫鲁晓夫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⑤] 应该说，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不是

---

① 苏联驻华大使1959年的报告，TsKhSD，f.5，op.49，d.134，p.84；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10日，TsKhSD，f.5，op.49，d.133，p.13，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5。

② *USSR-PRC Relations(1949-1983)*，*Documents and Materials*，Part 1（1949-1963），Moscow：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985（Internal use only），pp.231-233，转引自Vladislav Zubok，*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219、226-227；AVPRF，f.0100，op.51，pap.432，d.6，p.121，转引自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1。对于这里的一个存疑问题——苏共中央的信为何会在20天后才寄出，大概需要到档案馆查阅原件才能解决。

③ 1957年5月，中国就美国向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赫鲁晓夫即表示苏联也可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但被中方婉言谢绝。（姬鹏飞接见尤金谈话纪要，1957年5月14日，外档，109-00786-12，第80–81页；周恩来接见尤金谈话纪要，外档，109-00786-13，第95–97页。）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1版。

⑤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3版。

没有作用的。[①] 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然而，随着危机的继续，中苏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

四、分歧：中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 月 8 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一艘，美舰不战而退。[②] 同一天，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③] 在澄海空战中，蒋军以损失 1 架战机的代价击落米格飞机 5 架，击伤 2 架。[④] 9 月 11 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 2.5 万余发。[⑤]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⑥] 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试图打通另外的渠道。9 月 8 日和 10 日，周恩来两次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方，最好主动从金马撤军，国共可以再次谈判。还答应只要不让美军护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准许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⑦] 9 月 10 日，周恩来还批准了中方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起草的协议声明（草案），其重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必须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

---

① 早在危机前一个月，美国情报机构就对爆发核战争的前景做出了评估。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苏联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最大，即使美国的核攻击限定在金门和马祖地区，也不能排除苏联以同样方式进行反击的可能性。（SNIE 100-7-58，*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 in the Far East*，July 22，1958，RG263，CIA NIE，Box 3，Folder 106，The National Archives.）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69 页；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 27–28 页。

③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 722–723 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7 日，第 3 版。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8，1958，in *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54-155. 台湾方面夸大了战果，说是击落 7 架。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八，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 年，第 67 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 年 9 月 8 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⑤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701 页。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5 日，第 3 版。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68 页。9 月底台湾方面接到了曹聚仁关于要求国共和谈的信，西方电台也传言台湾与中共开始和谈。蒋介石则“甚叹‘共匪’对中美离间之伎俩奇妙而毒辣”。蒋介石日记，1958 年 9 月 30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果蒋军主动撤走，则不予追击。此后一定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①] 9月13日，为了缓和局面，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②]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毛泽东在中方代表王炳南临行前当面指示他，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③] 但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争吵，王炳南为表示诚意，在休息后宣读了中方的协议草案。美方拒不接受，并于18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先停火，再讨论。中方提出指责后，美方表示，只要事实上停火即可，中方亦不能接受。[④] 谈判陷入僵局。针对美国的停火方案，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要求美国先行从台湾海峡撤军的主张。9月18日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周在说明了中方的反建议后指出，中方停止开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鉴于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与中国存在分歧，周恩来表示，希望中立国敦促美国对蒋军撤出金门做出保证，以此作为对其停火方案的支持。周还说，为了强化关于美军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打算加强针对金马的炮击力度，如果蒋军胆敢轰炸中国内地，将给予全力反击。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会要求美军直接参战，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总之，“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⑤]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方案非常赞赏，认为这个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⑥] 然而，莫斯科的想法却不一样。

9月6日以后，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发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中国支持的言论。[⑦] 9月18日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只改动了两处用词），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

---

① 中美协议声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外档，111-00146-01，第13–18页。当天，中方将草案交与苏联使馆。（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1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16页。

③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2–73页。

④ 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8年9月15日、18日，外档，111-00146-02，第22–25页，111-00146-03，第36–41页。

⑤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8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参见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外档，109-00833-01，第4–6页。

⑥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⑦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9月12日，第4–6页；1958年9月16日，第28页。

信件的全文。[①] 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②] 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实际上，中国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而苏联政府在表示对中国支持的同时，还另有一番考虑。中苏同仇敌忾的外表，掩盖了他们内在的分歧。

9 月 16 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后于 23 日致函毛泽东，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只是图 -16 轰炸机何时进驻及指挥权问题，还需双方另行商定。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为妥，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几天以后，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③] 10 月 4 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④] 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 月 25 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⑤] 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⑥] 刘晓在回忆中说得比较客气，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⑦]

无论如何，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他后来抱怨说：战役开始前，中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中掩护，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他们反应却非常

---

①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员谈话纪要，1958 年 9 月 18 日，外档，109-00833-01，第 4–20 页；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9 年 9 月 19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信件全文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②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799, *Peiping'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September 18, 1958,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MF2510409-0135.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1986 年，第 62–65 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67–46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449 页。

⑤ 《红星报》，1958 年 9 月 25 日，转引自 *Агеенко*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с.145。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86–187 页。

⑦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71 页。

激烈，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其实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没有别的目的。[①] 炮击金门前十几天，周恩来确实致函赫鲁晓夫，说台湾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 F-100 型超音速战斗机，因此急需苏联提供米格 19-C 型歼击机 30 架、C-5 型导弹 32000 发等武器装备，并要求一个月内运到中国。[②] 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中国拒绝了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米格 19 飞机和导弹于 10 月份运抵中国。[③] 不久，苏联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图 -16 轰炸机的要求，同意向中国发放制作许可证。[④] 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但从他两次主动要求派苏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莫斯科未必没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 9 月 7 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以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 9 月 18 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⑤] 9 月 17 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令人注意地没有莫斯科。[⑥] 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9 月 18 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⑦] 外交部长陈毅 9 月 20 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

---

①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2, с.80-81.

②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 年 8 月 11 日，外档，109-00838-03，第 6–7 页。

③ 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 年 10 月 29 日，外档，109-00829-16，第 89–9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86 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 年 10 月 30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4，*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37，1046。

⑤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0 日，第 3 版、9 月 20 日，第 1 版、9 月 21 日，第 2 版。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7 日，第 3 版。

⑦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电，1958 年 9 月 18 日，外档，110-00421-01，第 3–4 页。

诚意。”[1]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9 月 27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 10 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2] 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答应尽快给予答复，并长时间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3] 9 月 28 日，副外长张闻天便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4] 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9 月 30 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5] 10 月 5 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 10 月 6 日起，停止炮击 7 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6] 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1 日，第 1 版。

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及附件，1958 年 9 月 27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9，*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34，1044-1045；РГАНИ，ф.3，оп.14，д.245，л.5-7，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с.891-893。

③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 年 9 月 27 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周恩来在安东诺夫递交的备忘录上批示：“主席明日返京，待到后再议。”见外档，109-00833-02，第 54–55 页。

④ 对苏联备忘录的答复意见（送审稿），1958 年 9 月 28 日，外档，109-00833-02，第 56–57 页。

⑤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 年 9 月 30 日，外档，109-00833-02，第 58–71 页。档案未记载周的谈话内容。

⑥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 年 10 月 5 日，外档，109-00833-02，第 72–81 页。参见 *Верещаги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 14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877–878 页。

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刚提供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①]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②]

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以我为主"。

从苏共二十大到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在危机爆发前3个月，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决定单方面裁军，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③] 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了"东风压倒西方"的论断，并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④] 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⑤] 中国驻苏使馆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第1版，10月3日，第2版，10月15日，第4版。

②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1-83；*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34-335；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3–415页。

③ 达维德给捷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58年6月7日，*Марьина В.В.* 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54-1964гг.，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3，№1，с.145-147。条约草案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第5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0–638页。

⑤ TsKhSD，f.5，op.49，d.34，p.84，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则批评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做法“谨慎有余，政治勇气不足”，“害怕引起战争，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①] 在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在指责美国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实力地位”和“战争边缘”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②] 毛泽东却大讲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③] 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但心里都清楚，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沟通方面已经出现了障碍。当然，赫鲁晓夫的缓和并不是一味退让，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出了柏林危机。[④] 而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了。[⑤] 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各自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⑥]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严重。

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⑦] 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⑧] 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

---

①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7月23日，外档，107-00297-02，第21–22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1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④ 参见关于柏林墙危机的起因，参见 Hope Harrison，*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1*，*CWIHP Working Paper*，№5，1993；Vladislav Zubok，*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CWIHP Working Paper*，№6，1993。

⑤ 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后来评价炮击行动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⑥ 1958年底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在报告中说：苏联对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绞索等说法，都有保留。11月下旬，苏联主要报纸在发表我国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都删去了这类语句。（苏欧司关于1958年苏联情况和中苏关系报告，1958年12月24日，外档，109-01213-01，第1–12页。）

⑦ 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с.145.）

⑧ 详见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11月），第25–64页；《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1] 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线。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2]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的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1 期

① 外交部致驻外使馆电，1958 年 9 月 2 日，外档，102-00006-03，第 14–16 页。

②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①] 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②]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

---

① 例如：R. L. 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 J. Zablocki ed.，*Sino-Soviet Rivalry: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New York，1966；R. A. Rupen and R. Farrell 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1967；M.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1967；W. C. Jr. Clemens，*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Stanford，1968。

②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①]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②] 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③]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

① 其中受到学术界注意的有：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 年；*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Mercy A. Kuo,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除前引著作大都讨论到中苏分裂的原因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5 年第 12 期；W.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Делюсин Л.П.*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 年 10 月，北京）的论文；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 年第 2 期；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pp.141-164。

③ 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M.Y.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M.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提交"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 年 1 月，香港）；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杨奎松：《1958 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提交"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2 年 8 月）。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①] 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②]；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③] 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④] 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⑤] 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⑥]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①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18-219。

②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8–549页。

③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218-223。

④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⑤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一、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映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①] 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②] 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

---

① 1957年10月29日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173-179。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①] 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②] 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③]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 15 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 11 月 18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 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④]12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⑤]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

①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第 93 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123–133 页；1998 年 8 月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② 关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625–645 页。有关莫斯科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3–12 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9–11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89-115、136–145 页，以及 2000 年 12 月 1 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③ 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南共联盟代表卡德尔在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173–17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5 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692 页。

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道：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2] 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4] 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5] 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5，第5张。实际上，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使用了“跃进”一词。有关研究见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制，第44、715页。

③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7、213页。

④ 1958年2月28日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51，п.432，д.6，л.86-96。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

们快，有客观条件。”[①] 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②]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③] 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7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

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①]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②] 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③]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④]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93、311-312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9-700页。

④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①]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②]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③]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④]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⑤]毛泽东还为

---

①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0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张。
④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25-28张。
⑤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①]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 年 9 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 11 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 1960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②]

总之，到 1958 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③] 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④] 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596–598 页。

②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638 号，第 11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2，第 1-6 张。

④ 1959 年 12 月 3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就已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参见杨尚昆:《杨尚昆日记》，第 587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93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02 页。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二、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1958 年 7 月 26 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 1962 年生产 5000 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 7000 多斤等。[①] 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 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 4 年中有 70 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 4 年内才有 60 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②]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 8 月 19 日到 31 日刊登了 4 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③] 在 9 月 1 日到 7 日又刊登了 4 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④] 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 月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540 号，第 11–14 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卷宗 465，第 69-70 张。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575 号，第 8–9 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581 号，第 3–4 页。

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象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①] 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②]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③] 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④]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6日。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774号，第15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2–14页。

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①

---

① 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1-75。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 年 1 月 27 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 1958 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 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②] 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 年 6 月 13 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 5 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 1 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 5 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③]9 月 13 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 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④]

由此可见，至少到 1959 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

① 1959 年 1 月 27 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235，л.27-36。

② 1958 年 8 月 2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第 2803 号，第 12–14 页。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9 年 9 月 16 日。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1]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 86 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2] 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 年 4 月 21 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 166 个。这些项目，在 1959 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 113 个。从 1959 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 1958 年 8 月 8 日和 1959 年 2 月 7 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 125 个企业的建设。[3]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 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 1956 年 4 月 7 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55 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 年 5 月 31 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销、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 1957 年 12 月 14 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 211 个，撤销 45 个，推迟 98 个，即占全部项

①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218-223；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87 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0 日。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9 年 4 月 22 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449 页。

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销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销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1]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2]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3]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4]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5]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6]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

① 李强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建设大跃进与兄弟国家对我的技术援助问题》。

②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pp.153-154。

③ 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 ф.5, оп.49, д.129, р.8891, л.189-192。

④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⑤ 上海市档案馆，全宗C38，目录2，卷宗157，第9、11-12张。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588号，第17页。

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1]《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2]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3]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4]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45号，第5–6页。
② 广西档案馆，全宗X50，目录2，卷宗281，第76-77张。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71号，第13–16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1–12页。

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1]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2]《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3]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其中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4]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

---

① 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189-192。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54号，第24–26页。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

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①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在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②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③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

---

① 只是在苏共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之后，苏联报刊上才开始发表批评人民公社的文章。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第93页。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187–190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66号，第8–10页。从赫鲁晓夫的口气看，Reactionary一词在这里译为“倒退”也许更为贴切。

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①]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②]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指责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③]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④]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⑤]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真实一些。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⑥]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679号，第16页；1959年第2688号，第24–25页。关于1918–1930年苏维埃俄国在农村组建公社、劳动组合及集体农庄的详细研究，可见拙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706号，第15–16页。

③ 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

④ 1958年夏秋，毛泽东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训斥了赫鲁晓夫，又在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炮击金门战役，使得中苏关系多少有些紧张。

⑤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⑥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①

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② 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③ 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了。

三、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④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第2831号，第19页。笔者对译文略做修改。

②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1–232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而且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见1959年9月15日齐米亚宁给外交部的报告。*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170-185。

④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第215页。

“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①] 在这种氛围中，当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原驻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否能实现钢铁生产指标表示怀疑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普遍愤慨，[②] 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9 年 2 月 3 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③]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道：“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 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④] 看起来，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⑤] 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 1959 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 1958 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在 1959 年 4 月 15 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

---

①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1，卷宗 60，第 175-181 张。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704–705 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48，第 8-15 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41–43 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191–192 页。

西，就是确有大增产”。[①] 不过，中共其他领导人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9 年 1 月 2 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②]1959 年 6 月 8 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③]6 月 17 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定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 1958 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④]6 月 26 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⑤]

显然，中共党内对于 1958 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毛泽东刚刚在 7 月 16 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 月 19 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 6 月 20 日编印的《否

---

①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12，卷宗 116，第 52-64 张。

②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 年 1 期，第 70–74 页。

③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9，п.443，л.240-248，转引自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272。

④ 1959 年 7 月 2 日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243，р.8931，л.1-8；АВПРФ，ф.0100，оп.52，п.443，д.10，л.179-186，转引自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38–239 页。

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作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①]7月27日，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②]又过了一天，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的评论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先生这番话所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争论是否——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赫鲁晓夫先生只是在回顾过去。另一种看法是，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这次对农民的讲话显然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是它今天在报纸上的出现显然是得到了这位苏联领袖批准的。”[③]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87–388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1，卷宗60，第237-238张。

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 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2]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3]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4]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5]

此时莫斯科也没有闲着，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了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48、451—45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7-50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04、506—507页。后来《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但立即刊登了另外两个通讯。

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①] 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 月 12 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 月 1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 19 期转载了这篇文章。[②]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③] 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 10 月 4 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④]

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苏联仍然是朋友，"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⑤] 所以，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立即接见了苏联代办安东诺夫，并向他说明，"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⑥] 但是，毛泽东又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而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1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27–528 页。

③ 1959 年 10 月 2 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全文，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c.94-106。

④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493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99 页。

⑥ 1959 年 10 月 14 日安东诺夫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9-96。

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1]

此时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有着同样的心态。一方面，11 月 11 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苏中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2] 另一方面，12 月 18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以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报告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3]

兄弟两个谁都不愿分家，可谁都要在这个家做主，那么就看谁的主张更符合这个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说，中苏之间一场是非之争的论战迟早是要到来的。自 1959 年 10 月的争吵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4] 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 年 2 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01–60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67–268 页。

③ 1959 年 12 月 18 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④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221-223，转引自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9。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

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1] 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如前所述，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 年 4 月，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2]5 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3] 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4]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 195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5] 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6] 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52–253 页。

② 见《红旗》，1960 年第 8 期；1960 年 4 月 22 日、23 日《人民日报》。

③ 1960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与耶斯佩森谈话记录。

④ 1960 年 7 月 13 日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另一个文件讲述了 1959 年以来中共加紧与各国共产党接触，试图“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活动。见 1960 年 9 月 10 日关于中共与兄弟党关系的资料，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8-233。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474 页。

⑥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 1930 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中央编译局的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在 1950 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他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苏联在 1920 年代也犯过。列宁曾设想通过电气化道路，在 10-20 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他说，现在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参见《列宁全集》第 3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11 页。

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并得到中共承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① 于是，出现了苏共在 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② 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决定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③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

① 1960 年 7 月 13 日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② 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71–86 页。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③ 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全文见：*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p.249-250。

难以弥合的裂痕

——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①]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则表明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赫鲁晓夫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援助，毛泽东则因为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②]然而，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之间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此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并随之将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诉诸报刊。中苏关系恶化由此发端。

---

① 在讨论中印冲突对中苏关系影响的论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有：M.Y. 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i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79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8，Issue 3（Summer 2006），pp.54-101。

② 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2章，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披露的中俄两国档案文献及当事人回忆，分析中苏双方在1959年中印冲突发展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的变化过程，探讨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的背景和深层原因。

一、中印纠葛初起及莫斯科的关注

引发中国与印度之间冲突的起因是西藏问题。印度虽然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但出于对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尼赫鲁总理一直期望西藏能以其自治地位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早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挺进时，印度政府就一再发出备忘录和照会，希望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保留由“惯例和协定”带给印度的在西藏的特权利益。中国政府则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解放军必须进藏，以“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①] 不久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②] 解放军官兵和行政干部5万余人随之入藏。到1956年撤走3万多人，还剩1万多人。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何时进行，中央政府完全交由西藏自治政府决定。[③] 这种做法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起来。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规定了贸易市场的数量、地点和管理方式，以及贸易和进香的路线和手续。印度撤退了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在西藏的邮政、电报网点和驿站等移交给中国。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印度的中立政策，印度则同意放弃过去英国的西藏政策。[④] 在

---

① 中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第1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4–168、177–180页。毛泽东的态度更为强硬：“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27页。

② 详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西藏和平解放始末》，《中共党史资料》总第32辑，第163页；宋月红：《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签订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91–101页。

③ 毛泽东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第3–5、5–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至1960年4月）》，未刊，第1–24页（以下简称《中印往来文件汇编》）。参见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王宏纬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63–64页。

1954—1955 年台海危机期间，印度作为“被优先考虑的谈判中间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缓和，受到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1] 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话时，一再表示感谢印度的支持，并称印度“已成为东西方接触的中心”。[2] 1956 年，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一次会见中，印度大使转告周恩来，尼赫鲁总理认为，中印关系的加强，已经成为亚洲团结的重要因素，而且有利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都非常敬重毛主席。为了加强中印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周恩来表示，毛泽东说过，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他一定要到印度去。[3] 毛泽东本人则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批评了斯大林对印度的政策，并承认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对印度的问题上也出现过不少混乱。[4]

莫斯科对此期中印关系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图加里诺夫在一份报告中注意到，为了保持中印友好，中国非常谨慎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例如，尼泊尔与中国建交后提议互派大使，而中国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这一要求。结果是，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此外，在确定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时，正如刘少奇所说，考虑到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否则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并吓跑摇摆不定的人。[5] 苏联驻华使馆在 1956 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其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同时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努力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也都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的做法。

① 详见洛马金致莫洛托夫电，1955 年 2 月 8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2-223，224-227；洛马金与章汉夫谈话备忘录，1955 年 2 月 23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71-276；周恩来与梅农谈话纪要，1955 年 5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5-00056-02，第 6–17 页；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5 年 5 月 21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5 年 5 月 25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107-112。

② 周恩来与拉·库·尼赫鲁谈话记录，1955 年 11 月 5 日，外档，105-00062-02，第 9–16 页。

③ 周恩来与拉·库·尼赫鲁谈话纪要，1956 年 6 月 18 日，外档，105-00327-06，第 1–9 页。

④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6 年 5 月 2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24-130。

⑤ 图加里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 9 月 5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28，д.408，р.5175，л.107-117。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建立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①]

直到 1958 年初，中印关系还没有显出危机的迹象。毛泽东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时说，我们对印度的政策基本上是满意的，如果能主动些更好。在谈到召开大国首脑会议时，毛泽东说，裁军会议最好印度也参加，否则苏联就要一对三了（指苏联对美英法三国——引者）。又说，中印都参加最好，如果中国不参加，有印度参加也好。在国际上印度是“合法”的，中国是“非法”的。[②] 言语间俨然把印度当做了自家兄弟。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友好和谐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从 1958 年开始，中印在国际领域的合作遇到了麻烦。年初，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提议。经考虑后，周恩来主张可以把这一提议与尼赫鲁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中国先出面与印度商议，并由印度首倡，中国再给予支持。[③]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到 6—7 月，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和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也出现了某种逆转。中国认为，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建立“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变得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含混的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④] 更使中国感到不满的是，在北京组织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尼赫鲁不仅袒护铁托，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中国认为，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的。[⑤]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印关系因西藏风波而骤然紧张起来。

1956 年中央政府只是宣布在西藏推迟改革，而在西藏以外的藏民居住区，民主改革依然按计划进行。1958 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

---

① 苏联驻华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1957 年 4 月 22 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64-183。

② 毛泽东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夫妇谈话记录，1958 年 1 月 23 日，外档，105-00372-02，第 1–10 页。

③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 年 2 月 1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9，р.8893，л.10-13。

④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 年 7 月 25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⑤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昌会谈备忘录，1958 年 6 月 7 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49，д.131，л.161-163。

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区部队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①]

毛泽东对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并不感到意外，对危机的处理也显得胸有成竹。早在拉萨的叛乱爆发前，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入藏屯垦的指示中加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②] 3月11日，叛乱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刘少奇等人确定的方针是：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12—15日，毛连续三次致电中央提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围而不攻，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只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

---

①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5卷，1991年，未刊，第200–202页；我方反击印度干涉大事记，1959年5月16日，外档，105-00650-01，第18–25页；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资料》，1959年3月29日，未刊；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71–73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pp.55-99；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3月31日，ЦХСД，ф.5，оп.49，д.238，р.8929，л.42-48。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还说，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万一跑了也不要紧。3 月 17 日刘少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的建议。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①]

看来，中共中央对于西藏的叛乱并不惊慌，甚至认为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推进民主改革。问题的麻烦在于牵涉到印度，而印度当时是中国的朋友和国际合作的伙伴。周恩来认为此次叛乱与印度当局有关，并非一时猜测。早在 1956 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曾提请印度政府注意西藏逃亡分子与噶伦堡当地反动分子相勾结，对西藏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情况。1958 年 1 月 12 日，周恩来在同印度大使谈话时，再次提到这一问题。7 月 10 日外交部给印度的照会指出：根据中国政府掌握的可靠材料，活动在噶伦堡的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当地特务分子以及西藏的反动分子，最近正在加紧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阴谋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噶伦堡作基地，积极策动并组织潜伏在西藏内部的少数反动分子，阴谋发动武装叛乱，以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叛国目的。为此，中国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取缔这些颠覆和破坏活动。[②] 8 月 2 日印度政府复照，否认噶伦堡是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基地，并声明印度政府将“按国家法律对那些从事于任何此种非法活动的人采取行动”。[③]

周恩来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噶伦堡地区的非法活动也未停止。1959 年 2 月 14 日苏联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使馆的一则情报说，印度噶伦堡地区是西藏流亡分子活动特别严重的地区，噶伦堡十之八九的房屋都是西藏人购置的。那里有英国的间谍网，达赖喇嘛的弟弟吉亚洛·丹都和前西藏财政部长齐邦·沙喀巴领导的反华集团就居住在这里。他们控制了泰尔巴·竹林佛教寺，还掌握着有当地唯一的藏文报纸《泰平天镜报》，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并通过走私的办法，把报纸和武器偷运到西藏。沙喀巴的活动 1957 年达到高峰。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印度政府曾警告沙喀巴不要再从事反华活动，现在主要是秘密宣传活动。有人认为，丹都和沙喀巴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第 364–36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211–212 页。

② 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1958 年 7 月 10 日，《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 47–49 页。

③ 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大使馆照会，1958 年 8 月 2 日，《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 50–52 页。

掌握着达赖喇嘛的大部分财物，并与印度高级官员有密切联系。[①] 就连美国国务院也承认："新德里确实以各种非官方的方式鼓励对西藏人的同情，印度收留了 12000 多名西藏难民。"[②]

还在拉萨暴动发生前，印度舆论就对西藏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关切。如《政治家报》说，"达赖喇嘛对政府的管辖权处于危险中"，"中国的直接统治可能取而代之"。还说，印度"在感情上"反对中国对西藏这块"神圣国土"进行干涉。《邮报》指责中国"吞并西藏"，说"印度不得不同一个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打交道"。叛乱发生，特别是平叛开始以后，报刊和电台更是发出一片反对和攻击中国的声音。《思想》周刊指出，中国人要把西藏作为殖民地，而印度则要帮助西藏争取"真正的自治"，这是关系印度国境安全的问题。《政治家报》声称，印度"北部的边境由于自然条件数千年来一直是安全的，现在这种安全已经被打破了"。不过，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比较温和。虽然 3 月 10 日、14 日和 15 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均出面接见了来访的叛乱分子代表，但尼赫鲁于 3 月 23 日发表声明，说印度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相信纠纷会和平解决。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也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针对一些议员要求就西藏问题举行特别辩论的呼声，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说：我们同中国有最友好的关系，本院从来不讨论他国的内政问题。[③] 对此，中国采取了忍而不发的方针。3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示，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暂不公开点名，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④]

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反感。3 月 30 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 日尼赫鲁接见以鲁康娃为首的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⑤] 4 月 3 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 3 月 31 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

---

① 苏联外交部关于噶伦堡地区反华破坏活动的情报，1959 年 2 月 14 日，外档，109-01354-01，第 1–4 页。

②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telligence Report*, №8163, November 25, 1959. *OSS China and India Supplement*, Reel-V-0413, pp.1-6, *National Archives*, *U.S.A*.

③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印度动态大事记，1959 年 4 月 30 日，外档，105-00650-02，第 27–33 页；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涉及同印度等国关系大事记，1959 年 4 月 23 日，外档，105-00650-01，第 12–17 页。

④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120–121 页。

⑤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涉及同印度等国关系大事记，1959 年 4 月 23 日，外档，105-00650-01，第 12–17 页。

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①] 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10日，尼赫鲁拒绝了要求万隆会议参加国举行会议，以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西藏的建议。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提斯普尔，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②]

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③] 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

---

① 印度外文部外事秘书杜德给潘自力的书面谈话，1959年4月3日，《中印来往文件汇编》，第55页。4月16日，印度通过苏联使馆传话，告诉潘自力大使：如印度不收容达赖，国大党的地位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削弱；尼赫鲁愿意与中国保持友好，这是尼赫鲁历次讲话的基础。还说，达赖回西藏有三个条件：西藏恢复秩序；中国政府遵守协定，给西藏自治；保证达赖安全。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4月17日，外档，105-00657-01，第1页。

②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涉及同印度等国关系大事记，1959年4月23日，外档，105-00650-01，第12-17页；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印度动态大事记，1959年4月30日，印度对西藏问题的反应，1959年4月1-23日，外档，105-00658-02，第41-75、74-181页；《中印来往文件汇编》，第56-57页。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先派外交部代表P. M. 梅农与达赖进行商谈。关于达赖喇嘛的声明，梅农曾“力劝达赖喇嘛不要做出这样的声明”，外交部又建议以第三人称发表一个简短的新闻声明，“以求达到委婉的效果”。后来达赖同意了声明的形式，但坚持自己所说的内容。TDCS-3/396、258，23 April，1959. DDRS，CK3100063380- CK3100063383。

③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2页。

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①]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等人写了一封信，为反击定了调子："'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但又特别叮嘱，不要直接攻击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②] 当晚，毛泽东又对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做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③]

尼赫鲁夹在印度右派势力与中国之间，既要安抚国内舆论，保持政治稳定，又不能得罪中国，引起双边关系紧张，颇有些举步维艰。中国发起的宣传攻势，对印度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在5月8日一次宴会上，印度驻苏代办主动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印度珍视同中国的关系。印度给达赖政治避难合乎国际法，也是迫于形势。印度有大量佛教徒，他们把达赖视为活佛。印度希望达赖自愿回到中国，欢迎中国派代表与达赖面谈。[④] 尽管迫于舆论压力，逐渐放松了对达赖公开活动的限制，但印度政府尽力要显示与西藏问题保持距离。22日印度国防部长回答记者问时强调中印友好，说印度不会改变不结盟政策，也不愿卷入冷战。印度渐渐感到，达赖和难民已经成为包袱，多次表示希望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解决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⑤] 6月20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成立大西藏，恢复1950年前西藏的地位，中国人退出西藏。23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达赖的讲话发表意见，但对记者说，达赖所说成立流亡政府的情况不会在印度出现，因为印度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主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7–11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6–187页。

③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6页。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5月9日，外档，105-00659-01，第42–43页。

⑤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5月21日、23日、30日，外档，105-00659-01，第108-109、115、137–138页。

权国家。[①] 6月30日，印度政府发表声明，不承认单独的西藏政府。中国驻印使馆报告，7月以来，印官方人士多次主动与中方外交官接触，“虽仅寒暄，但故示友好，这是西藏问题发生以来少见的现象”。[②]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③] 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评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④] 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有放心。3月31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⑤] 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⑥] 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⑦]

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至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⑧] 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

---

①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6月21日、24日，外档，105-00406-01，第33-34、39页。

②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7月3日、14日，外档，105-00659-03，第155、157页。

③ 利哈切夫关于印度的备忘录，1958年12月25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02，л.40-49。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3月27日，外档，109-01354-04，第54页；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4月1日第5版。

⑤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3月31日，ЦХСД，ф.5，оп.49，д.238，р.8929，л.42-48。

⑥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4月8日、23日、29日，外档，109-01354-02，第7–12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5月1日第2763号，第22–23页。

⑦ 关于苏共中央会议的笔记，1959年4月12日，TsKhSD，f.5，op.30，d.302，l.75。转引自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1。

⑧ 《友军情况》第19期，1959年5月12日，外档，109-01354-04，第62–63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12月9日第2930号，第14–15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9月30日，外档，105-00946-04，第38–40页。

中国副外长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已经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①] 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叶菲莫夫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有4点：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提出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②] 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些有关印度想要平息冲突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③]

到7月下旬，苏联驻印大使告诉中方，印度政府为避免发生尖锐冲突，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使馆还转告了一位接近尼赫鲁的议员的话："整个西藏问题正在消失中。"[④] 然而，就在莫斯科感到冲突即将过去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

二、中印冲突升级与苏联的中立态度

西藏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的只是麻烦，而真正令其不安和恐慌的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1700余公里未定的边界线。印度独立以后，坚持认为18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部边界线。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曾表示，尽管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但中国方面不会越过此线，并愿在此基础上商谈和确定中印东部边界线。由于这一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故双方虽主张不合，却也未发生实际争端。从中方来看，除少数地区（如山南）有藏军驻守外，边界地带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59年4月，追剿叛匪的中国军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在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封锁边

① 张闻天致外交部电，1959年5月5日，外档，109-01354-04，第55–56页。
②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调查部电，1959年5月6日，外档，109-01354-04，第60–61页。
③ 陈毅与尤金谈话记录，1959年5月8日，外档，105-00657-03，第9–21页。
④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7月25日，外档，105-00659-03，第164页。

境，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边界地区，但从未越线南下。[①]

西藏局势动荡引起了印度的担心，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回信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建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应维持现状。3月23日尼赫鲁再函，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这条线是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由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三方划定的。[②] 中方在内部讨论时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近来争议较多，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1959年边界工作任务是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作好准备。除对争议地区进行必要的交涉，加强边防，防止新的侵占外，必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全面部署和大力加强边界的调查和勘察工作，并分别拟出解决方案。中印边界是重点，鉴于一时尚难勘察完毕，无法很快提出一个系统详尽的解决方案，应先就目前几个争执地点进行调查研究，拟出谈判方案，以应需要。[③] 然而，未等中方答复，印度便开始单方面行动。4月印度军队在东段边界向北推进，并越过“麦克马洪线”建立边境哨卡。5月5日，周恩来于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8月9日印军再次越线建卡，占据了朗久地区一个叫马及墩的小村子。8月25日，中国军队行至马及墩，与印军遭遇，随即发生枪战。双方战斗约1小时，印军被击毙2名后退回朗久，8月27日又撤出朗久，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④]

在没有相互承认边界线的情况下，边界争端是不可避免的。笔者同意马克斯韦尔的论断：“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

---

① 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62–69页；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6–88页。

② 《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172–183页。周恩来对尼赫鲁3月23日来信的答复，即9月26日函，见第184–190页。关于西姆拉会议的中方档案，现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根据中国档案记载，中方的确派遣专员陈贻范（Ivan Chen）参加了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会议也的确草签了一个有关中印边界的条约。但是，4月28日中国外交部训令陈贻范，通知英方所签条约无效。直到7月3日会议结束，中方没有同意签约，并拒绝继续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详见唐屹等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2005年，第1–55页。

③ 罗贵波在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3月4日，广西档案馆，X50-3-6，第99–120页。

④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00-101、112–115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95–9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5–316页。有关印度在东段地区的管辖状况及“麦克马洪线”走向的地图，见印度现行政区中所谓东北边区概况，1959年3月20日，外档，105-00944-02，第53–60页。

定的边界时，发生这类冲突是预料之中的。[①] 然而，因一次偶发的边界冲突而酿成一场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并导致中印之间长期对立，甚至爆发战争，则是出人意料的。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再次掀起反华高潮，在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方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尼赫鲁改变了过去的温和态度，数次在人民院和联邦院指责中国"侵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是一种"明显的侵略事件"，中国没有实现其对缅甸和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保证，并强调只有接受"麦克马洪线"才可能进行边界谈判。8 月 31 日，人民党议员辛格呼吁印度政府应派飞机轰炸中国修建的穿越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公路。9 月 4 日，拉达克大喇嘛巴库拉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反侵略措施"。印度各大报纸更是推波助澜，不仅谴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且挑拨中国与不丹和锡金的关系，声称印度有责任保证其保护国的安全。很多报纸攻击中国发动"冷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②] 西方报纸也纷纷指责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威胁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积极策划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③] 按照中国总参情报部的说法：这次反华高潮"来势很凶猛"，"尼赫鲁亲自挂帅"，"右派气焰更是嚣张"。印度国内"霾云满布，乌烟瘴气"，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中印关系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潮"。[④]

面对国际上喧嚣的反华浪潮，9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会议的结论是：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第三，中国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⑤] 第二天，章汉夫副外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了中印边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⑥] 11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作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报告说，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边界纠纷，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

①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 115 页。

② 最近印度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和锡金、不丹问题的一些提法，1959 年 9 月 10 日，外档，105-00944-03，第 61–72 页。

③ 驻德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9 月 1 日，外档，109-01941-04，第 38 页；外交部致驻英代办电，1959 年 9 月 27 日，外档，109-01354-04，第 69 页。

④ 《军情通报》第 18 期，1959 年 9 月 29 日，外档，105-00944-07，第 84–90 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11–212 页。

⑥ 章汉夫与兄弟国家驻华大使、临时代办谈话记录，1959 年 9 月 9 日，外档，109-00870-01，第 32–39 页。

片面主张。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1] 12日，由周恩来改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发表。[2] 对于印度和西方的反华叫嚣，毛泽东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棘手，而让中共非常不满和意外的是，莫斯科竟然宣布中立，甚至也对中国提出指责。

朗久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反应似显迟钝。8月27日，周恩来才召集外交部和军方进行商议，并于当晚报告毛泽东。[3] 29日，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向苏联大使通报了冲突情况及中方的看法。[4] 9月6日，外交部正式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并告知：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5] 直到9月10日前，中国报纸没有报道任何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很可能，中国一方面在了解事情真相，一方面因事态严重，需要与莫斯科沟通。无论如何，苏联在得知中国的看法并即将发布文件的情况后，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并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6] 9月9日上午，苏联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又向陈毅面交了一份塔斯社声明的文稿，并说该声明将在9月10日发表。声明的矛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的，指责最近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喧嚣是为了离间中印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是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扰乱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访。在强调苏联与中国的“兄弟友谊”及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后，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中印两国政府会考虑到双方利益而“解决所产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章汉夫会见安东诺夫，递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52–253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12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49页。

④ 别涅季科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会谈纪要，1959年8月29日，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和编辑：《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第3197-3199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0页。

⑥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с.29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交了周信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希望苏联能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然而，莫斯科时间当晚 7 时苏联还是按照原稿播发了塔斯社声明。[①]

莫斯科为什么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要迫不及待地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事后安东诺夫对中国外交部解释说，联系不畅，使馆给莫斯科打通电话时，声明已经发表。曾涌泉反驳说：塔斯社有点太着急了，既然把声明底稿交给我们看，就意味着要听取我们的意见，因此应该多等待一下。苏方又辩解说，声明的内容并无不妥，且责怪中方提供情况和材料都比较迟，还埋怨说，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在大喊大叫，而中国一直保持沉默。苏联不了解情况，又担心尼赫鲁承受不住压力，故需要表明态度。[②] 苏方的说法自然是外交辞令，但还是道出了部分实情，即莫斯科担心中国的公开表态可能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外交部远东代理司长贾丕才对中国使馆承认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很好，但坚持认为，中苏的主要敌人是美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让局势紧张。[③] 赫鲁晓夫后来也回忆说，苏联急于表态是因为不同意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对抗的做法，更反对把尼赫鲁作为敌人的评价。[④] 贾丕才的回忆讲述了塔斯社声明的起草过程：赫鲁晓夫当时正准备访美，并想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想到此时发生中印边界冲突，他极为恼火。9 月 8 日，葛罗米柯叫贾丕才立即起草一个塔斯社声明。后者在初稿中指出：中印之间发生冲突，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苏联对此表示遗憾。葛罗米柯看后认为太平淡，责令他写得更尖锐一些，还说修改后要立即报送赫鲁晓夫批准。第二天莫斯科广播的就是赫鲁晓夫认可的修改稿。[⑤]

与塔斯社声明 10 日见报的同时，中国按照既定部署，于 10—12 日开始刊出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印度及西方发动反华浪潮的情况及中印两国政府的文件，并于 11 日在《人民日报》第 2 版全文刊登了塔斯社声明。[⑥] 苏联则继续搞平衡政策：12 日和 13 日各大报同时摘要刊登了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国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28–229 页；曾涌泉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9 年 9 月 10 日，外档，109-00873-12，第 76–79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13–214 页。苏联声明的全文见《人民日报》1959 年 9 月 11 日，第 2 版。

② 曾涌泉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9 年 9 月 10 日，外档，109-00873-12，第 76–79 页。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9 月 14 日，外档，109-01354-04，第 72 页。

④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3，с.68-69.

⑤ *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с.63-65.

⑥ 详见《人民日报》1959 年 9 月 10 日，第 1、2 版，11 日，第 2、3 版，12 日，第 1 版。

的文件在前，字数稍多，一般都不加标题，或标以“消除紧张”、“用友好方式消除误解”等字样。与此同时，12日赫鲁晓夫接见了印度驻苏大使，13日发表了关于苏联贷款15亿卢布给印度的协定公报。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边界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态度更加“暧昧不明”；声明虽以“兄弟”和“朋友”的称呼表明了苏联与中、印关系的区别，但对其间的是非问题没有表态，“缺乏鲜明的原则立场”；苏联既要支持中国，“又深怕得罪印度”，“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苏美首脑会见在即，苏联为创造和缓气氛，希望大事化小，避免再生枝节。[1] 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陈毅在转交这封信时说：“声明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许多人非常高兴并欢迎这份声明。[2]

其实，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据悉，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 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4] 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5] 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6] 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

---

①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9月10日、30日，外档，105-00946-04，第36-37、38-41页。

②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1959年9月13日，АВПРФ，ф.0100，оп.52，п.443，д.11，л.181，转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2；TsKhSD，f.5，op.30，d.246，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1。

③ 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据印度财政部公布的资料，从独立到1959年11月3日，印度共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美国援助达113.3亿卢比，特别是1958–1959年美国政府机构提供的援助剧增，占历年总额的43.7%。（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年2月26日，外档，105-01001-04，第26–28页。）仅1959年3月和5月，美国就向印度提供了12.09亿卢比的贷款。（《国际时事资料》特刊第47号，1959年6月12日，外档，105-00946-01，第1–2页。）

④ 《军情通报》第18期，1959年9月29日，外档，105-00944-07，第85–86页。

⑤ 别涅季科夫与高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50-3256页。印共领导不只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⑥ 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期间感到的一些问题，1960年2月5日，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①] 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做法。[②] 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 B. 利哈切夫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倾向："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③] 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相当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④] 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⑤] 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⑥] 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深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⑦] 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⑧]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

---

①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3, с.69；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9 月 10 日，外档，105-00946-04，第 36–37 页。

② 如，在得到西方一些国家正在积极策划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情报后，苏联立即告知中国，并表示苏方将尽力制止这种行为。外交部致驻英代办电，1959 年 9 月 27 日，外档，109-01354-04，第 69 页。

③ 利哈切夫关于印中关系的备忘录，1959 年 12 月 24 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03，л.82。

④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09-241、388–414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247-249、269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26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24–225 页。

⑦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9 月 10 日、30 日，外档，105-00946-04，第 36-37、41 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27 页。

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丧失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①] 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②] 其实，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③] 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④] 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⑤] 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明言，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因此，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启齿。[⑥]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

---

① 最近苏联杂志对国际形势的提法，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9月9日，第2866号，第19–23页。

②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3-294；安东诺夫转交美苏领导人往来信件及赫鲁晓夫致毛泽东函，1959年8月7日，外档，111-00874-02，第7–2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9–460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8月5日，第1版。8月14日苏联在报纸摘发这篇社论时，略去了上述内容。见1959年中苏关系大事记之二：政治部分，1959年11月20日，外档，109-01353-05，第214–241页。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第5、6版。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9页。

⑥ 有俄国学者错误地断言，毛泽东是因为塔斯社声明而转变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立场。*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4。

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借题发挥的“大批判”。

三、中苏领导人面对面的激烈争吵

毛泽东早就开始对赫鲁晓夫不满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爆发出来。1958年夏天苏联提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毛泽东大发雷霆，把尤金大使吓得血压升高，卧病不起。赫鲁晓夫立即带领一干人马赶到北京负荆请罪，收回所有建议，毛泽东自然不便再发火。1959年6月赫鲁晓夫因对中国在炮击金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满，又赶上美苏首脑互访在即，决定暂时停止执行对中国的核援助计划。中国主管部门领导人都义愤填膺，但依毛泽东的性格，虽心中不快却不会为此大动肝火，他决定再等等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的得意之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表示赞同或关注，莫斯科却采取冷漠处之的态度，赫鲁晓夫甚至公开发表讲演，冷嘲热讽。此举恰好又发生在彭德怀庐山上书问罪之时，毛泽东忍无可忍，声言要向赫鲁晓夫“宣战”，还指示把他在波兰的讲演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然而这些举动都没有发生，毛的确不宜为此发作——按道理讲应该允许人家保留不同意见，何况苏联也没有正式表达什么意见。[1] 现在，塔斯社的声明终于让中国领导人抓住了把柄。按照中共的逻辑，苏共在这里犯了原则和立场的错误。不过，这只是理论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带来不好的后果，甚至中国驻苏使馆也认为，苏联的做法“有利于制止帝国主义的叫嚣”。[2] 因此，这件事在感情上不至于对中国领导人造成伤害，但是在争执中却可以作为中共指责苏共的根据。实际上，毛泽东最看不惯的就是赫鲁晓夫对美国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赫鲁晓夫在那里越是得意地表演，毛泽东就越是生气：这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共产党人丢脸，而且完全把中国抛除在国际事务之外。

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尽管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苏联在期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但毛泽东都没有动气。在9月11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3] 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的一通表演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

① 以上详见《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2章；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07–208页。
②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9月10日，外档，105-00946-04，第36–37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04页。

赫鲁晓夫在美国四处演说，一路风光。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赫鲁晓夫充满信心，他18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说，苏联深信，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真理报》也评论说：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苏美关系晴雨表初报晴天。[①] 曾任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回忆说，当时赫鲁晓夫真诚地相信，令苏联外交官伤透脑筋的苏美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他仅跑了一趟美国，就“把一切都摆平了”。[②] 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莫斯科，又带着胜利者的心情来到北京。岂知，迎接他的毛泽东对这一切却颇不以为然。

为参加中国国庆而于9月27日先期到达北京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已经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对美苏接近的冷漠，他当天就不明不白地聆听了一顿周恩来的教训：帝国主义总是想搞垮和平中立的国家，手段是搞军事政变和暗杀。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总是要依靠各国内部势力的，这样才能搞起军事政变和暗杀活动。[③] 苏斯洛夫不知道，其实，更大的教训还在后边。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机场上没有苏联老大哥以往常见的热烈的群众欢迎队伍，也没有听到人们熟悉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苏联人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们彬彬有礼而远非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同几天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天壤之别。[④] 本来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欢迎仪式，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准备致欢迎词。但赫鲁晓夫临时通知中方他要在机场讲话，由于事情匆忙，准备不及，赫鲁晓夫讲话刚开始，扩音设备就出了故障。赫鲁晓夫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讲完了他那长达15分钟的讲话，而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望着远方。赫鲁晓夫的秘书当场就表示，这是故意怠慢苏联领导人。[⑤] 无论中方是否有意为之，客人讲话的内容是主人不愿听到的：“美国之行和在那里进行的会谈是有益的，无疑应当导致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⑥] 赫鲁晓夫刚下飞机就预感到此行的艰难了。

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中方事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讲演稿，并发现其中有影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第1、6版。
② *Шепилов Д.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Т. Шепило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0，с.30.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57页。
④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68；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96页。
⑤ 阎明复、朱瑞真：《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第31–32页。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第5版。

了这一情况，毛临时决定原来准备由他本人发表的致辞，改由周恩来代念。[①] 赫鲁晓夫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果然有许多让毛泽东听来极不舒服的内容："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现在问题是这样：或者和平共处，或者进行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后果"；"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特别是下面这句："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②] 听了这些话，毛泽东能不恼怒？！

第二天的会见更引起毛泽东的不快。10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赫鲁晓夫谈到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性和两大国保障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责任。毛泽东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关于核冲突危险性的意见，并指出，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有核武器。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准备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像保卫自己一样保卫中国。毛泽东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用来自卫。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话题，显然是为了解释此前苏联撤回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专家的举动。对此，毛泽东不便发作，只好说：帮不帮由你们考虑决定，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帮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方向对赫鲁晓夫提出了责难。毛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赫鲁晓夫立刻激动起来，马上反驳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民族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形成的，我们应该做出评价。"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决定是轻率的、主观主义的"。会见不欢而散。[③]

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到第三天终于演变成一场暴风骤雨。10月2日，赫鲁晓夫

① 阎明复、朱瑞真：《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第33-34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第5版。

③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с.68；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中俄双方当事人对这次会见的回忆大体相同，但中方回忆的会见是庆典前在天安门城楼进行的，这里地点恐怕有误。根据报纸报道，当天上午两国领导人是在庆典前几分钟才登上城楼的。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日，第1版。至于撤退核专家的情况，据中方记载，赫鲁晓夫访美前，即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国防科工委大事记》，第34页，转引自东方鹤：《张爱萍传》，第741-742页。

带着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进行正式会谈。[1] 会谈一开始就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最不愿听的话题。在请译员口头翻译了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节录后，赫说："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毛立即应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毛把台海危机的责任推到了美国人身上，因为是他们"试图中断谈判"。赫解释说，美国人认为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 5 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周恩来介绍了在中国拘押的美国人的情况，说明这 5 个人都是间谍。赫鲁晓夫立刻提议，或者驱逐出境，或者用来交换，总之，"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毛泽东（面带愠色）回答："当然，放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毛反唇相讥："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赫鲁晓夫也不示弱："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内部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但对外界只能说"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就会宣布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战争气氛。毛厉声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赫毫不退让："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接着指责中国在炮击金门前未同苏联沟通，而"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是正常的"，又抱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不能理解。[2] 随后，毛与赫为此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只好宣布休息。

会谈重新开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印冲突的问题上，开始长篇大论。赫说，苏联特别不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以苏联解决与伊朗和土耳其的领土争端为例，说明边界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赫指责中国的做法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又断言"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毛立即插话："尼赫

① 以下会谈内容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1959 年 10 月 2 日，见 *Зуб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4-106。

② 在 9 月 30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曾亲口对赫鲁晓夫说，在向金门开炮前没有讲中共的打算告知苏联。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855 页。

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有些发火了：“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赫继续批评中国，认为放走达赖喇嘛就是一个错误，这给印度制造了麻烦。尽管毛泽东做了解释，赫鲁晓夫仍然肯定地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针锋相对：“不对，是尼赫鲁的错。”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是印度人越过边界并首先开枪。周恩来质问：“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赫又把矛头对向陈毅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不应该信口开河”，并说：“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地）说：“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接着，周恩来、林彪、彭真相继发言，与赫鲁晓夫展开辩论。赫鲁晓夫愤怒地嚷道：“我们在这里只有 3 个人，你们有 9 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这时，毛泽东出来打圆场说：同印度只有小小的边界问题，还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并表示中国正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赫鲁晓夫却不松口，又埋怨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周恩来则指出苏联抢先发表塔斯社声明。苏斯洛夫也试图缓和气氛，说：“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毛泽东（带有怒气地）追问：“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苏斯洛夫承认中国政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却又重提印度边防军人被击毙的事，会谈的空气立即再次紧张起来。周恩来、陈毅、朱德、彭真、王稼祥、林彪纷纷发言，指责苏联的声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则百般辩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为中国的西藏政策展开辩论。会场上唇枪舌剑，乱作一团。

混乱中，毛泽东把问题引向了中苏关系，他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党路线。”在周恩来和林彪再次发言后，赫鲁晓夫终于忍耐不住，说出了他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赫举例说，毛泽东在 1958 年 7 月与尤金谈话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听了这一课。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随后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似

乎要结束讨论，便心平气和地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气氛刚有缓和，赫鲁晓夫与陈毅又争吵起来，而且语言相当激烈。赫：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脾气。赫：你不要以为你是元帅就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到的人。①这时，毛泽东、王稼祥、苏斯洛夫纷纷发言劝解。周恩来又通报了中国正在准备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的情况，会场的气温总算降了下来。最后，毛泽东提出谈谈老挝问题，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意见一致的话题。会谈就此结束。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默默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②美国情报机构注意到，这次中苏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未发表公报，毛泽东在所有公开场合都保持沉默，“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双方的观点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签署一个有意义的联合声明都很困难”。③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性转折点。④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几个小时的会谈，除了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如此面对面地争吵，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紧张，在以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交往的历史上从未有闻，甚至在两大阵营敌对国家的首脑会谈中也不曾见过。这种场面所以能够出现，表明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发展到这种状况：一、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对于中共的崛起，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就已露出端倪，甚至大有超过苏共的势头，那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⑤但这两年赫鲁晓夫的自信有所增强，苏共二十一大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⑥而在美国受

① 赫鲁晓夫对陈毅最恼火，认为他语言尖锐、态度粗鲁、行为笨拙，并怀疑他这样讲话是中共有意安排的。见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3，с.69-70。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5日，第1版。

③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Intelligence Report*，№8128，October 15，1959. MF2524609-083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④ 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pp.100-101；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63页。

⑤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

⑥ 详见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55。

到的热烈欢迎，以及轰动一时的成功，更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并自以为他的大洋彼岸之行在美苏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就使得赫鲁晓夫感到再难以承受中共的批评和说教，何况他兴致勃勃来到北京的目的是要说服中国人。[①] 二、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而双方都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至于其他问题，或者稍有涉及，如停止对华核援助和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完全回避，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这些分歧都反映出中苏两党在主要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只是有些问题仅能各自内部讨论，不便公开争论而已。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争论的内容——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于争论的形式——双方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尖刻的言辞和激动的情绪导致的结果是撕破了脸皮，伤害了感情。[②] 这样，裂痕就更加难以弥合了。

四、中印冲突升级与中苏分歧公开化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嘴上都说中苏总体上是团结的，分歧不会成为友谊的障碍，但双方内心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企望对方承认错误。[③] 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接连把几个有关赫鲁晓夫表示与美国亲近的讲话和文件批给中共领导人，要他们阅读，还对人说，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④] 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10月6日）仍然怒气未消，便在群众大会上影射中国的对外政策说：如果有人“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

---

① 对于赫鲁晓夫此时心态的描述，详见当事人的回忆：*Шепилов Д.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Шепилова Д.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0，c.30；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99–200页；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342–343页。

② 以研究赫鲁晓夫经历和个性擅长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陶伯曼从领袖个性的角度讨论了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很值得一读。见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43-244。

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中苏两党激烈争吵的时候，中国的报纸和舆论却是一片中苏友好的呼声。见1959年9月30日至10月5日《人民日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70–57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智的”。[①]

不过，从大局考虑，双方都知道中苏关系不能破裂，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讨论中说，中苏两党在对美国和对印度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会议的结论是：目前应该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②] 10月14日毛泽东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时，对赫鲁晓夫访美这一外交做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即使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关于中印冲突，毛说：那是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关于台湾问题，毛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③]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注意到，无论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至中国公民给使馆的来信，都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了好评，认为这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④] 中苏领导人争吵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也引起了苏共高层的紧张，很多人认为不应与中国把关系闹僵。[⑤] 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与中共完全一样。会议认为，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进行辩论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会议还提出了销毁中苏领导人会谈记录的问题。不过，会议也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斯大林

① 中共中央联络部编印：《赫鲁晓夫言论（1959）》第4册，未刊，1959年12月，第714–715页。毛泽东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后来逢人便说，赫鲁晓夫说他是好斗的公鸡。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43-550、677-680、712–722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27–228页。

③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9年10月14日，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9-96。10月6日毛泽东接见高士时谈到，在中印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并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表示关切。毛泽东与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摘录，195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6–207页。

④ 苏联驻华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9年11月4日，ЦХСД，ф.5，оп.49，д.235，р.8927，л.99-102。

⑤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01页。

的路线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民主化”。[①]

从内部的讨论情况看，中苏双方都有和解的愿望，但又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张，只是暂时不再争论而已。这种心态，加上已经受到伤害的情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来一场暴风雨是难免的。不幸的是，尚未愈合的伤口，很快就崩裂了。问题还是由中印边界冲突引起的。

10月20—21日，中印双方的巡逻部队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再次遭遇并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②] 周恩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尼赫鲁也一再表示他不认为背后有任何“重大企图”，不能肯定是有人“蓄意”制造的。[③] 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毛建议：中印边界维持现状，双方从边境线各后退20公里，形成一个非武装区，然后两国总理会谈解决问题。在毛看来，“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东方”，而不是印度。[④] 然而，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空喀山口事件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应：印度右派报纸和党派纷纷发表反华言论，并在各地及中国使馆门前组织集会和示威活动，有的要求与中国断交，有的要求西藏独立，还有的提议让印度边防军“自由行动”。[⑤] 由于受到极大压力，尼赫鲁拒绝了中国关于双方军队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的建议。[⑥] 中印关系由此急剧恶化，用印共总书记高士的话说，这次事件使印度“反动分子积极活动起来”，“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媒体多次批评中立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44号记录，1959年10月15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2-33，*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389-390。11月11日，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认为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67–268页。

② 关于空喀山口事件，中方的说法见曾涌泉与兄弟国家驻华使节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6日，外档，109-00870-03，第47–52页；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4日，第1版。印方的说法见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16页。

③ 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年11月7日，《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212–213页；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7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65–266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023-1024页。

⑤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10月27日，外档，105-00408-01，第7、8页。

⑥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40页；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年11月16日，《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214–219页。

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中国在印度“失去了自己许多朋友”，而且不排除“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后果。[①]

事件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更加明显的偏袒印度的做法，而尼赫鲁则对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②] 10月24日中国报纸刊出有关空喀山口事件的报道及对印度的抗议后，苏联各报纸均保持沉默。2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以“中印边境冲突”为标题，摘要发表了中印两国的有关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印度的声明给予了详细报道，而对中国的声明则只做了简单的摘引。[③] 第47期《新时代》（11月）刊登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述评文章，支持尼赫鲁关于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讲话，呼吁和平解决中印争端，却没有提到中国关于化解冲突的建议。[④] 11月12日《劳动报》发表了印度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的文章“我们印度需要和平”。11月14日，《消息报》在第1版刊登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70岁生日的贺电，极力赞扬苏印友好，对尼赫鲁领导印度人民摆脱殖民地枷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给予高度评价。印度全印电台特意用华语广播了这一贺电。[⑤] 在印度发表11月16日尼赫鲁致周恩来的复信后，苏联一改过去在公布中方文件的同时刊登印方文件的做法，于21日在电台广播了尼赫鲁的信，22日又在《消息报》摘要刊出，而未等中方对此信的答复。与此同时，对于几天以来中国报纸大量刊载的各国对周恩来建议的支持以及印度右派报刊的反应，苏联报纸则毫无反映。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这一做法可能表露了苏联对印度反建议的兴趣。而苏联在刊登周恩来12月17日致尼赫鲁的信时，又没有摘登或报道周恩来对印方关于解决边境问题无理主张的反驳内容。[⑥]

苏联领导人及外交官的讲话则间接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和批评。10月27日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意味深长地对中国大使刘晓说：我们进入了新的

---

① 别涅季科夫与高士会谈备忘录，1959年10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50-3256页。

② 别涅季科夫与高士会谈备忘录，1959年10月26日；苏联副外长普什金与印度驻苏大使梅农会谈备忘录，1959年11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50-3256、3269-3271页。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10月24日、25日、29日，外档，109-01354-02，第30、31页，109-01354-03，第41页。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11月19日，外档，105-00946-04，第42页。

⑤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年11月14日，外档，109-01354-04，第84–85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12月9日第2930号，第16页。

⑥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并中联部电，1959年11月22日、12月23日，外档，105-00946-04，第45、49页。

时代，其中很重要的是和平共处。[①] 11 月 7 日赫鲁晓夫公开对印度《新世纪》周报记者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边界在哪里。赫鲁晓夫还表示愿意协助寻求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②] 本着这种精神，苏方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规劝中国人。如 11 月 12 日和 14 日，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和副司长贾丕才非正式地劝告中国尽早解决中印争端，以免印度右派集团利用中印边界问题诋毁印度中立政策，迫使尼赫鲁向右转并利用边境事件事来镇压印度共产党。27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一次宴会上对刘晓说：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太糟了，要快些结束类似的事件，应快些和好。[③] 更有甚者，苏联驻印使馆人员在与中方接触中，明显表示出对印度的同情和对中国的埋怨。他们避开边界问题的是非不谈，一再强调如中方不采取措施，"再过几个月尼赫鲁将被右派搞垮"。在一般谈话中都称尼赫鲁为国大党中的进步分子，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④] 由此，中国驻苏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官方拒绝了中国的新建议后，苏联继续采取中立调和的立场，急于看到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对中方的建议一直不表态，也不刊登相关的材料；对印度顾虑颇多，及时刊登尼赫鲁的讲话，积极准备对印度经济援助。其结果，助长了印度右派的气焰，为挑拨中苏关系提供了借口。[⑤]

然而，此时中国领导人关切的焦点已经不在中印冲突以及苏联对此的态度了。[⑥] 如果说周恩来一直忙于处理中印边界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注意力则还在美苏缓和及首脑会谈的问题上。11 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美国的缓和策略及苏联的立场。会前，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找一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缓和的讲话。看过林克挑选的三篇讲稿后，毛同林克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让

---

①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10 月 27 日，外档，109-00882-01，第 3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 11 月 11 日，第 2906 号，第 26 页；11 月 18 日，第 2912 号，第 16–17 页；11 月 20 日，第 2914 号，第 12 页。苏驻南使馆新闻秘书解释说，苏联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表示遗憾决不是不支持中国，而是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如果苏联现在表示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就会触犯印度，而印度在反动分子的压力下可能投向帝国主义，被美国利用，这对我们反而不利，特别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丁曼致新华总社电，1959 年 11 月 11 日，外档，109-01354-04，第 74–75 页。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11 月 12 日、14 日、27 日，外档，109-01354-04，第 76-77、84-85、86 页。

④ 驻印使馆致外交部并中联部电，1959 年 12 月 3 日，外档，105-00946-04，第 48 页。

⑤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9 年 11 月 28 日，外档，105-00946-04，第 46–47 页。

⑥ 毛泽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非常洒脱，他在接见印共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曾说，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 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印度。毛泽东与印共左派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2 月 13 日。

他据此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写一个批注。随后，毛便指示将批注连同三篇讲话全文印发给到会者。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毛还说，美国不是只讲和平，还有战争的一面，目的就是要分化中苏。[①] 12 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问题的。美国的目的就是"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就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毛接着指出：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②]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提倡的美苏接近及缓和表明，他已经掉入了美国的陷阱，并且与美国和反动派一道来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击中国。不过，此时毛主张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对苏联则要进一步观察。

于是，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与苏联团结的态度。在 11 月 6 日与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总书记邓小平强调：统一和团结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也不害怕"。"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双方谈话的气氛显得十分友好。[③] 11 月 1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国之间，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只有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我们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④] 即使讲到中印冲突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也避免直接指责莫斯科。11 月 11 日周恩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我们是尽量想用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最近印度的态度不好，这是有其国内和国际原因的。[⑤]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着又开了两天常委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对赫鲁晓夫的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65–266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141-1142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1022-1023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143-1144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1027 页。

③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1959 年 11 月 6 日，ЦХСД，ф.5，оп.49，д.235，л.107-110。*CWIHP Bulletin*，Issue10，March 1998，pp.169-170。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30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67–268 页。

法，说明了中共的对苏方针。根据毛在会前写的讲话提纲及当事人的会议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帝国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用的是两手策略——武力威胁与和平演变，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就是机会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容易上当受骗；1959 年 3 月以来，苏联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中国将在长时期内被孤立，但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赫鲁晓夫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及世界各国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怕学生超过先生；赫鲁晓夫也不全部是错的，他在国际上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也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中苏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意见分歧，只是暂时现象。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赫鲁晓夫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我们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为系统，还要等等看，应该相信赫鲁晓夫的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①]

然而，莫斯科的态度很快就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了。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反而继续推行苏共的既定方针。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应该是中国。

1959 年 12 月 18 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而全面的批评。报告首先针对中国“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支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被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从而“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接着批评人民公社运动“试图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9 年初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证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报告还批评了毛泽东一向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其结果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和右派的反革命进攻。报告还指出，自 1958 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开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1028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30–23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99-603、604 页。

始受到骄傲和急躁情绪的感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以及好战的情绪都表明了这一点。炮击金门，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和文化往来都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不成熟。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印冲突。报告赞扬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却因西藏问题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印度的革命”。其结果导致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共中央竭力促使和平调解冲突，但“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报告指出，为了协调对外政策，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但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坚持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报告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把和平共处看作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与苏共的看法不同，中共否认“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的政治的优势力量战胜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报告最后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与中国党的友谊，但方法是“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应该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具体做法是“加大力度宣传列宁对外政策的方针和苏联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措施，坚定地捍卫我们关于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问题的观点”。[①]苏斯洛夫的报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之后，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再次爆发之后的立场和观点，其采取的态度与中共针锋相对，而分析的思路则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如出一辙。尽管中共领导人当时并不知道苏斯洛夫报告的内容，但是苏联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充分表明了这种态度。

此时，苏联的注意力也已经不在中印关系了。[②]为了进一步推动缓和的局面，1959 年 12 月 8 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建议

① 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1959 年 12 月 18 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3 卷，第 3288-3324 页。

② 外交部认为，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有证据表明印方的策略是拖延印中边境冲突，为其争取国内大选的选票和外捞取政治资本。利哈切夫关于印中关系的备忘录，1959 年 12 月 24 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03，л.90。

苏联无条件地单方面裁军100-150万人。[①] 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心“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并做了具体部署。[②] 西方国家似乎也在为此努力。21日美、英、法和德四国政府首脑为期三天的会议在巴黎结束，会议公报说，四国首脑在会议中“就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一致同意与赫鲁晓夫举行一次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同日，东西方十国裁军委员会中的五个西方国家外长也在巴黎开了会，并发表公报说，它们决定向委员会中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在明年3月15日前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③] 25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复信，表示愿意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并写道：“我们始终认为，正是通过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亲自会晤，才能最有效地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④]

据中国驻苏使馆观察，赫鲁晓夫访美以后，在苏联领导人讲话和报刊宣传中，对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作了许多具体阐述和新的发挥。主要包括：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执行比较现实和明智的政策的趋势已渐占上风；经常强调艾森豪威尔的和平诚意，认为他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表现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勇气和毅力；认为国际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全面缓和的发展时期，现在已有一切可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根本转折，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强调苏联和平共处政策中的灵活性，认为一定的合理的让步和妥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总的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合理的明智的基础上共处，互相谅解和互相照顾，利用一切可能，哪怕是最小的可能，避免紧张和战争的发生。[⑤] 这些做法与毛泽东的期望越来越远，在他看来，要制止莫斯科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中共必须考虑采取新的措施了。

1960年1月4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讨论国

---

①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1959年12月8日，ЦХСД, ф.2, оп.1, д.416, л.1-9，沈志华整理和编辑：《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5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第251–259页。英译文见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1996/1997, pp.418-420。

②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9年12月14日，ЦХСД, ф.2, оп.1, д.416, л.10,《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5卷，第264页。英译文见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1996/1997, p.420。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3日，第6版。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6日，第5版。

⑤ 苏联对目前国际局势和外交政策等问题的看法，1959年12月22日，外档，109-02064-02，第37–41页。

内经济问题，后期集中研究国际问题。会议期间，驻苏使馆报告，1 月 9 日苏共中央做出并公布了“关于目前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说，苏共“以新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学说”，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及和平共处等问题，“对现代条件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提出了新的提法”。[①] 外交部苏欧司又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材料说，苏联不仅在中印冲突中继续持中立和调和的立场，而且在报纸上全面鼓吹和平共处，普遍宣传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认为目前“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来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理想。[②] 1 月 14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关于裁军问题的长篇报告，驻苏使馆当天即摘要报告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内容：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和缓，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对东西方就召开高级会议问题达成协议表示满意；欢迎艾森豪威尔访苏，相信戴维营会谈的气氛将继续下去；强调苏法传统友谊，表扬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宣布接受访问印度的邀请，赞扬尼赫鲁对加强苏印关系的贡献；重申苏联主张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提出苏联再度单方面裁减 120 万人的建议，并强调这一措施的巨大和平意义。[③] 这些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引发了他在会议最后一天（1 月 17 日）对中苏关系的长篇大论。

毛泽东首先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议，有好的一面，但给帝国主义“擦粉”不好，赫鲁晓夫不善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做革命工作，讲话没有分寸。谈到中苏关系毛指出：苏联多次整我们，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联盟、西藏叛乱，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但这一手不灵了。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时间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过十年他不想受影响也得受。赫鲁晓夫要插手印度和印尼，对中苏双方都不利。和平过渡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至于是否成系统，我们还不做结论。但是，要写文章进行批判，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对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毛肯定地说，对这些原则性问题，我们应公开表示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

①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 年 2 月 20 日，外档，109-02078-01，第 1–4 页。

② 苏联对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1960 年 1 月 13 日，外档，109-02064-02，第 42–48 页。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 年 1 月 14 日，外档，109-02077-04，第 37–39 页。赫鲁晓夫报告全文见《人民日报》1960 年 1 月 16 日第 5、6、7 版。

们应该帮助他，估计中苏是可以团结的。[①]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决定在列宁诞辰90周年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北京将举办报告会，并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同时要求各地均召开报告会和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列宁关于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尽管通知中强调不要批评苏联和兄弟党，但此举的矛头所指是一目了然的。[②]

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③]

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中苏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各共产党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这种争论和分歧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苏联也渡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苏美缓和。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

① 关于毛的这个讲话，笔者看到了三个大同小异的记录：《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22–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049-1050页。

② 中央中央关于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1960年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2页。

③ 详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

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我们倾心研究已近二十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寻找涉及苏联和中苏关系历史的档案，我们曾多次访问俄国和美国，也曾走遍与苏联接壤以及当年苏联重点援助的中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了解开历史叙事中存在的诸多疑团，我们曾广泛采访中苏关系的见证人或其家属，也曾频繁与各国学界同行讨论、交流。当然，时间和精力花费最多的，还是梳理、研究那些堆满书房的档案文献及其他史料。可谓二十年磨一剑，我们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一书终于完稿了，全书约 140 万字，详细讲述了从 1945 年到 1974 年中苏同盟兴衰的全过程。[1]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的头脑中始终悬挂着一些问题：中苏同盟酝酿的过程大约 5 年（1945—1950），友好合作时间不超过 10 年（1950—1959），其中真正的“蜜月”期只有 3 年（1955—1957），而分歧、争吵直到关系破裂则经历了 10 多年（1958—1969）。那么，在近代国际政治中的同盟体不胜枚举，中苏同盟为何如此短命？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中，为什么争吵多于合作？归根结底，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一、一个现象和两种解释

谈到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评估，首先看一个有趣并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作为中苏共同的敌人，美国的情报机构当年对中苏关系前景的判断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失

① 该书主体论述所依据的，绝大部分都是档案文献，其余则是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或当时的报刊资料。囿于篇幅，本文讲述的史实部分不再出注，读者可参阅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专著。

误。尽管1958年夏季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不断表露出来，以至于到1960年夏天已经公开化，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95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推断，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中苏之间“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报告还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①] 此后不久，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②] 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向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导权威发起了一次次挑战，且决心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了，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③] 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目前还“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不过仍然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可能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程度”。[④]

1960年底，美国人看到中苏之间的“冲突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已经将一些基本问题都卷入进来，以致造成了双方严重的不和”，但认为“联盟的核心力量仍然存在”，中苏“都敏锐地注意到双方之间的裂痕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某些共同利益”。因此，“他们不会允许出现公开的、正式的裂痕”。[⑤] 到了1961年9月，中情局的特别情报评估报告还指出，尽管中苏关系面临“日益困难的问题”，但“由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对反

---

① NIE 13-58, Communist China, 13 May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NIC 2004-05,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4, p.124.

② NIE 13-2-59, 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10 February 1959, p.2, 见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所附光盘。

③ NIE 13-59, Communist China, 28 July 1959, p.3, 见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所附光盘。

④ NIE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 *Tracking the Dragon*, pp.218、227.

⑤ NIE 13-60, Communist China, 6 December 1960, *Tracking the Dragon*, pp.249-286.

共世界的共同仇恨，使他们能够在反对西方的行动上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①] 直到1963年夏天中苏两党关系正式破裂前夕，中央情报局才不得不承认：“目前中苏关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破裂”，“在过去一年中，这种话语上的争论已经变得日益激烈和明显。甚至在中苏边境上也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②]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推断显然是一错再错，但他们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他们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一旦这些根本的信念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③] 看起来，美国专家们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④] 不过，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错位。中情局专家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

① SNIE 13-2-61, Communist China in 1971, 28 September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GPO, 1996, pp.138-140.

② NIE 13-63,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ommunist China, 1 May 1963, *Tracking the Dragon*, pp.333-364.

③ NIE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 *Tracking the Dragon*, pp.220-221、224-232.

④ 2004年10月笔者参加了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从历史的角度检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情报工作。在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其他官员面对各国学者的质询，解释了美国情报工作屡次失误的种种原因。

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理念和行为逻辑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

与政府情报分析官员不同，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分析过去。早在 60 年代，美国学者就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产生了兴趣。当时中苏分裂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即 1960—1964 年的理论宣传和政治论战，1969 年的边境冲突及后来的军事对峙。与此相应，研究者的看法也大体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具体表现在非斯大林化、世界革命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等方面——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包括历史纠葛和边界争端——才是引起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②]

冷战结束后，大量的解密档案使得研究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基本事实的考察，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彻底打破。有人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③] 也有人重点考察对外政策对双方关系的影响，[④] 还有人对中苏边界和边疆问题进行

---

① 如见 G.F. Hudson，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Praeger，1961；John Gittings，*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8。

② 如见 Harrison Salisbury，*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New York：Norton，1969；Tsien-hua Tsui，*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in the 1970s*，Ontario：Mosaic Press，1983。

③ 如见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党的文献》2001 年第 2 期，第 53-64 页；沈志华：《对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83-93 页；William C. Kirby，"China' 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 s Republic：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No.188，December 2006，pp.870-890。

④ 如见 M. Y. Prozumensh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1；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5-27 页。

了深入探讨，[①] 较多的学者把中国国内政策变化作为研究的对象，[②] 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③] 比较全面研究中苏关系变化过程的也不乏其人。[④] 这些讨论无疑将进一步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深化。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不过，就导致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而言，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的种种看法似乎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这样的二元分析框架。

我们在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详尽考察后感到，"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尚不足以解释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摩擦和碰撞出现在60年代初，深化于60年代末。所以，国家利益冲突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至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那只是一种表象。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人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政治路线方面，实质上都已经回到斯大林时代，或者说与中共取得了一致。然而，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速走向分裂。这说明，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导致同盟解体的根本原因。

二、我们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对中苏分裂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并为此提出一个

---

① 如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秋季号)。

② 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18-139页。

③ 如见 W. 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3。

④ 如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Lorenz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初步的分析框架或思路，图示如下：

中苏同盟破裂过程及原因分析框架

年代：	1954—1957	1958—1959	1960—1964	1965—1969	1969—
现象：	阵营领导机制发生结构变化	两国政策取向出现分歧	两党争夺国际共运话语权	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敌对	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对抗
因果：	两党团结合作取长补短	对时代特征的认知差异	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失衡	中苏同盟彻底瓦解

理念的冲突 ↗党际关系：国家消亡－国际主义－上下级关系
↘国家关系：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平等关系

首先，我们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友好到分裂的基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1957年，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关系日益密切，并达到高峰。在此期间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而苏共的政治影响力却日趋下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及其内在结构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过去是苏联一党一国单独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则是中苏两党两国平起平坐，共同执掌帅印，而毛泽东构想的形式是苏共在台前，中共在幕后。天无二日，一个阵营出现两个平行的领导核心，就构成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因素。如果二者没有矛盾，同盟可以继续，如果二者发生分歧，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加强，并将随时导致同盟破裂。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的顶点，也是转折点，随后分歧出现，问题就来了。

第二阶段，1958—1959年，在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处理周边关系及确立对美政策等重大方针政策上发生分歧。一个同盟的解体，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同盟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了分歧，没有分歧，自然不会分裂。那么，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发生。

关于中苏分歧的由来，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中共的反对，从而引起中苏分歧，并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但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 1956 年。这里所说的原则性分歧是指双方无法弥合的矛盾，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期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和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所产生的不同意见，不久便被苏共接受了。到 1957 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决定就是 1957 年 10 月做出的。要说分歧，其实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冲突更为严重，但是并没有阻止中苏结盟，因为双方都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容忍了对方。所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分歧的起点不在 1956 年，更不在 1950 年或此前，尽管那时已经隐含着双方不合的潜在因素。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在 1957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开始露出苗头，到 1958 年下半年及以后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分歧就其表现而言，既不是意识形态（双方都承认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是国家利益（双方都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是方针政策的取向：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的激进政策；中国要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缓和。至于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其一，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的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如果没有妥协而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以“和平竞赛”决定胜负，这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同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敌视和封锁。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

政治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也制定和实施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二，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后进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曾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 32 年，而这 32 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第三阶段，1960—1964 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要辩明是非，这就是 1960 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1963—1964 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 1962 年末中共在内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

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能够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他们同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斗争；[1] 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之争——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2] 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3] 中共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

---

① 参见 Melvyn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Introduction。

② 这里使用主导权（dominant position）一词，是为了区别于西方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经常使用的领导权（leadership）这一概念。主导权与领导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西方学者一般强调的是中苏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我们的关注点则在于中苏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路线和方向的把握。

③ 汉斯·摩根索曾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权力斗争，往往“被意识形态的辩护和理性化所遮掩”。见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A.: McGraw-Hill, 1948, p. 99。

本质上讲，1960—1964 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位的斗争。

此时，1956—1957 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国内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寻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非要打破平衡。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现实出发，只能强调“以苏联为首”，但毛寻求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非不知道同盟破裂只能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原意，用“经

典作家”的言词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苏共在政治论战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在 1964 年 11 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宣布改变二十大路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第四阶段，1965—1969 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 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权。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结构失衡”所包含的内容。

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脆弱性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驻军秘密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始终。

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问题在毛泽东，那么他面对斯大林为什么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如果问题在赫鲁晓夫，那么他的下台为什么没有能够挽救中苏同盟？文化差异也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确是影响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这些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不同国家缔结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的障

碍。那么，文化差异又怎能构成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脆弱性和动荡性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分析制约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弊病的表现和症结。因此，对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框架，甚至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中摆脱出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一般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探索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结构，才能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症结和深层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体看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20世纪40—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处在一个从党际关系向国家关系转换的过渡时期，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国家、民族、主权、平等、利益等基本理念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成熟，就往往陷入矛盾和困惑。因此可以说，中苏同盟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失衡，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面向全世界和各民族，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无祖国”是他们长期信奉的理念，一首“国际歌”就可以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即刻亲密无间。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利益差别。及至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及执政党所承担的民族责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立场，他们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们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

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阐述，也可以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1945年中苏条约和外蒙古独立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以国际主义标示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军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和解，就无法保持稳定。

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及其外在形式。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实行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从第一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国际共运一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

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争夺的，下边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既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准则便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10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陷入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主导

权威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党的关系破裂就意味着国家关系破裂。1962 年的新疆伊塔事件以及 60 年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就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和冲突的信号。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抗，终于爆发了 1969 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结论

相对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两种解释——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上述分析和观点或许可以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中共和苏共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无法在同盟内部弥合分歧、实现妥协的根本原因；其二，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而言，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于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关系便经常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同时这种结构失衡也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1980 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恰恰是因为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定位于国家利益。应该说，直到这时，即苏联行将解体之前，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础上。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10 期（第二作者李丹慧）

附录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

引 言

2004 年 9 月，我和李丹慧、杨奎松、牛军先后接到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主任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博士的通知，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将于 10 月 18 日解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并于解密的当天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请中国、俄国和美国的专家对这些文件进行评估。我们几位即是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要求每人写出一篇关于这些档案文件的论文或评论。不久，我们四人便分别收到了威尔逊中心寄来的这批尚未解密档案的复印件。

这批文件汇编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取名 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共 70 件，千余页。其内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 1948 年至 1976 年间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和预测。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四人做了一下分工，每人重点看一个专题或一个时段的文件，并进行相应的分析。我本人负责对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 1958—1959 年形势评估和其后 5 年发展预测的几份报告进行评论。

从历史的角度讲，正如文件分析的，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 1949 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NIE13-2-59，p.2）。就我本人仔细阅读的几个文件而言，中情局对于 1959 年以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总体看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中情局对于此后几年中国发展的预测，则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这个判断具体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关于"大跃进"

在195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中情局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在一五年计划期间有了迅猛的发展，这显示了中共"对资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但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其发展水平仍十分落后。同时，尽管"超速度的"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但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NIE13-58，p.2、p.4）这些就是"大跃进"现象出现的客观条件。至于"大跃进"的效果，中情局在1959年2月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经济增长虽然没有达到夸大宣传的目标，但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NIE13-2-59，p.1）

对于以后几年经济发展的估计，中情局虽然认识到中共的目标"过于乐观"，也看到存在着严重问题，但仍认为"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10%—13%，其预测是，到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650亿—670亿美元，谷物2.15亿吨，棉花200万吨。(NIE13-58，p.2、p.13；NIE13-59，p.10）实际上，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49.3亿元人民币，约合467亿美元，比1957年的450亿美元略高一些，却远低于1958年的531亿美元。1962年的实际谷物产量0.96亿吨，棉花产量75万吨，与预测数字差距之大，令人瞠目。(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492、1505页。）当然，这里有一个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的问题，而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的。但从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看，把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倒退主要归因于老天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市场失控固然会导致经济危机，但计划失控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关于人民公社

报告认为，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基础上出现的"一场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NIE13-2-59，pp.2-3）这正是当时毛泽东心中的目标。除了短时间存在的公共食堂和对家庭的冲击以外，报告敏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乡社合一，"试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

社会的基本单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从而构成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如果城市公社计划再取得成功，那么就彻底完成了“中共政权强大的控制系统”的建构工程。正如中情局看到的，“在组建公社的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要的新的步骤。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还引入了某些纯粹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通过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不仅可以集中资本、动员潜在的劳动力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在建立准军事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满足战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中国“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的榜样。（NIE13-2-59，pp.1、pp.5-7；NIE13-59，p.2、p.12）

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前提下，中情局对人民公社的未来做出了比较正确的估计。虽然由于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不得不“继续调整公社体制”，采取一些“可能会更实际、更符合地方条件”的措施，但中共“肯定会继续坚持公社的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认识到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及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中共无疑将尽更大的努力尽可能顺利而有效地发挥公社的作用”。（NIE13-2-59，p.7）人们看到，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到 1983 年。

三、关于人口问题

中情局的报告非常重视人口问题，认为中国首要的、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就是在“可耕地相对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NIE13-58，p.2、p.13；NIE13-59，p.6）报告指出，对中共来说，最糟糕的就是“连年歉收、农民冷漠、人口增长率上升”这些偶发因素合在一起，“这将使政府面临巨大困难”。（NIE13-58，p.13）中情局因此预言，尽管中共宣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并且应该强调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尽管生育控制计划在“大跃进”时期被淹没了，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这个国家仍将不得不恢复这项计划；不论怎样掩饰，它将会减小人口出生率”。（NIE13-59，p.11.）不过，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还是晚了一些，那是 1970 年代的事情。

四、关于中共的地位

在相关的几份报告中，有大量篇幅对中共的统治地位进行评估和预测，其结论

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的实际发展的。虽然1956—1957年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实引起一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但1958年5月的报告“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的控制中国大陆”，并指出，“很难预测群众的不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和积极的反抗。这种不稳定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可能会发生孤立的偶发事件、小规模的反抗，特别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反应仍可能是默许的态度”。(NIE13-58，pp.1、pp.15-16）不过，还有一点报告没有注意到，当时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而对于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还是拥护和寄予极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的壮观景象。

报告还特别分析了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而保留党的主席后所引起的对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种种猜测，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针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即使因为毛泽东去世或丧失能力而导致党内权力斗争，也“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NIE13-2-59，pp.1-2、pp.7-8；NIE13-59，p.15）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固然不是因为党内有任何反对意见，但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的分歧密切相关。毛泽东在农业实现合作化后就有意开始工业的跃进，但党内多数人主张反冒进，甚至改变了毛泽东原先确定的中共八大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八大提出设党的名誉主席表明，毛泽东这时已经有意退居二线。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以后又搞“大跃进”，毛泽东实际上直接站在最前沿指挥经济建设。但到1958年底，“大跃进”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混乱，困难重重，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难以收拾残局，不得不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退到第二线。

五、关于台湾问题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情局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近海岛屿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是，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NIE13-58，p.3）实际结果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

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以及苏联的核威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大概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

炮击金门后，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NIE13-59，p.4) 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

六、关于中苏关系

中苏之间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在于如何估计这种分歧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程度。过去，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苏分裂始于苏共二十大，这固然是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不足为信，而中情局的估计又过于乐观了。1958 年 5 月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NIE13-58，p.3) 直到 1959 年 7 月 28 日，中情局的报告仍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NIE13-59，p.3) 殊不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庐山决定，他要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半年以后，中苏分歧便公开化，两个盟友终于反目成仇。

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乐观估计的根据，主要出于理性的分析，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美国，所以他们不会做出自相残杀而利于美国的蠢事。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的帮助，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谈到核武器问题时，中情局认为，“到 1962 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NIE13-58，p.2、p.16；

NIE13-59，p.3）现在看来，这些判断是完全错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毛泽东把中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远大抱负，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理想的顽强精神，以及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信念，为了实现这一切，在他个性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是难以纳入理性分析的。

下面选登这批档案中的三个文件：NIE13-58、NIE13-2-59 和 NIE13-59。(注释为原文所有)。

NIE 13-58

共产党中国

（1958 年 5 月 13 日）

问题

分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的中共国内发展状况和对外关系，估计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趋势。

结论

1. 我们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的控制中国大陆。党的领导人继续显示了内聚力和决断力，同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中共是一个得到约 1300 万党员支持的政党，它控制着一支庞大而又有实力的军队和公安系统。我们认为，如果毛泽东去世或者丧失能力，可能会给某些目标的实现带来麻烦，并降低党的政策的灵活性，但这不会威胁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2. 显然，在按照共产主义的模式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方面，中共政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几乎对所有农民都实行了集体化，私营工商业主事实上也被消灭了。尽管中国人赞赏中共政权取得的某些成就，但勒紧裤腰带的生活，以及统一行动、极其艰苦的工作，这些不断的压力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很多不满。在过去的两年，中共承认存在问题，鼓励人们进行讨论，并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得了广泛的支持，但这一方针现在被严厉地中止了。

3. 由于决心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共试图争取得到民众的支持时，将很少考虑物

质刺激的因素。不满和偶发的群众暴乱仍将继续，特别是在农民和一部分少数民族人群中间，但我们相信，这对中共政权方针真正的影响不过是使其复杂化或受到妨碍。由于意识到中共政权的力量，并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会继续默许共产党的统治。

4.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增长率，这显示了他们在经济落后情况下对资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中国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不断在贸易、信贷和技术上提供援助。从很薄弱的基础开始，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6%左右，但1957年底的工业产量仍低于日本和英国的水平。农业产量能满足基本需求，但其发展远远低于经济的其他部分。

5. 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共政权将应付工业超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但基本的问题仍将是人口增长与食品生产不足的矛盾。目前中国人口大约6.4亿，每年增长约2.0%—2.5%；在下一个五年，农业产量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每亩增长最多大概也不超过5%。如果遇到几个歉收年份和农民普遍抵制合作，政权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即使出现这些情况，中共政权很可能凭借其控制的机构维持执政地位，同时保持工业的增长，尽管速度会降低一些。

6. 我们认为，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国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到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与1957年的450亿美元相比，可能达到650亿—670亿美元。其中工业部分与1957年的增长率19%相比，大约是26%。

7. 到1962年，中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将比现在更重要更强大。军队规模可能更小些，但装备更精良更具机动性。空军和海军将加大规模和实效性。在苏联技术的帮助下，中国的军工产业将能够满足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军队对小型武器、火炮、运输和军火的需要。造船和飞机生产将大大增长。然而，对于重型及复杂的军事装备和许多组件，中国仍将依靠苏联。

8. 到1962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共将为此先进武器向苏联施压。到时，苏联很可能提供某种类型的导弹和其他可适用于携带但并不携带核弹头的武器。除非受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议禁止，否则苏联到1962年就可能把核武器引进中国，尽管可以肯定这些核武器仍将在苏联控制之下。无论怎样，即使不在共产党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9. 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北平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而一旦共产党中国在实力和地位上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集团总的

政策形成方面，中国很可能起到日益加强的重要作用。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

10. 在努力削弱和消除西方在亚洲的影响方面，共产党中国很可能主要运用非军事的手段。在继续强调和平共处、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过分的自信。在基本问题上，中国会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在继续做出愿意与美国达成和解的姿态的同时，在整个远东继续从事颠覆性的活动。共产党中国会继续阻止台湾国民党人独立的愿望，让他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在台湾问题上，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近海岛屿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是，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

11. 日本将是北平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因为中日在这一地区不断加剧的竞争。北平将利用日本对卷入核战争的担心，日本与美国在许多方面的摩擦，以及日本渴望拓展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继续谋求削弱保守力量和美国在日本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共产党中国会继续使用安抚和强硬两手策略，中日贸易很可能增长，为此，北平可能在日本获得准外交地位。

12. 假定目前对苏联集团和西方的政策总体说来持续下去，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产党中国将大大增强与自由世界的交流。这种趋势很可能引起许多国家在外交上更多的承认北平，但不是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也会给在联合国排斥共产党中国带来更大的困难。

13. 如果共产党中国保持其现行国际政策，我们认为它在亚洲的威望在下个五年将继续提高。无论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是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这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没必要由于中国威信的提高就得出结论，认为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会采取共产党中国所希望的内外政策。中国在亚洲未来的作用将由五个领域发展的重要程度所决定，而这五个领域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中共的控制：

（1）美苏关系和冷战各方面的发展态势。

（2）苏联集团内部的发展，例如惊人的科技成就或是巨大的政治变化。

（3）各地区共产党，如印度尼西亚、老挝和印度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发展或衰败。

（4）中国力量的发展所引起的亚洲政府日益增长的忧惧，如对中国未来意图的担心，由此导致这些政府至少要采取越来越有效的措施对付自己国内的共产党。

（5）美国对亚洲非共产党政府的信心和信任程度，这不仅有助于这些政府抵御

共产党，而且能满足他们国家的愿望。

讨论

一、导言

14.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实现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的长远目标，中共政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共取得了国民总值的高增长率，特别是重工业产量的增长。对社会进行高速的共产主义制度改造，其结果实际上消灭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私有企业。这些成就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提高了中国对外部的影响，其中既有自由世界，也有共产主义集团。

15. 同时，超速度的改造也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这些压力和紧张是由于共产主义方法的本质特征——僵化和抑制产生的，它也阻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权的进一步支持。他们必然认为，这个政权急切地要把中国人都嵌入一个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干预也加大了社会紧张，在社会所有层面和所有活动中，党的工作人员有指挥的权力，但大多时候，在他们负责管理的特定的教育、社会或是经济组织里，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和经验。而且，国家为了加大投资而极力限制消费，这一点农民感觉特别强烈，因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然而，就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紧张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危险程度，对生产的阻碍也没有发展到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

16.1956 年由于经济问题产生的悲观主义达到了顶点，中共在经历了这一时期之后，现在对于他们能够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有信心的。而这种信心有所削弱，是由于公众对政权的批评程度，这一批评是在短暂地放松了对公众讨论的控制时产生的；是由于出现了党不断脱离群众的事实；由于农民因集体化不能带来收入增长而普遍不满。这种信心受到削弱，还由于更现实的认识到那些基本问题重要性，特别是农业问题。

二、一五计划期间的发展（略）

三、共产党中国在下一个五年期间可能的发展趋势

52. 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共将继续对中国大陆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进一步把共产主义的社会机构和形式灌输给中国人方面取得某些成功。国家很可能使经济保持与过去五年大致相当的增长率，但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这就需要继续严格控制消费。由于国家要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步伐，这就严格限制了其要争取更多群众支持的努力。群众不满和不平的感觉仍会普遍和起伏不定，多少会妨

碍国家的计划，但大概不会转变成有效的反抗。

（一）经济

53. 尽管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但作为政府计划的基础，1956 年 9 月就宣布了这个计划的总纲。我们据此推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增长大概在 7%—8%，或是大约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快。由于来自现有工厂的可以进一步集中使用的资金远远不足，所以生产的增长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无论如何，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投资相对于总产量会继续增长。还会强调工业发展，到 1962 年工业比例将占到总产值的 26%，而 1957 年是 18%，1952 年是 13%。

54. 农业生产。临近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共已被迫优先扩大农业生产，以提供最低消费和保证人口增长的需求；提高农业原材料的生产，特别是棉花生产，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增加出口偿还贷款，为进口重要的基础设备提供经费。优先发展农业将会对工业发展做出某些调整，加大投资生产化肥、农药、灌溉设备和农业器具的重工业。例如，在第二个计划期间，化肥厂的投资占整个国家投资的比例，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 提高到 3%。

55. 中共 1958 年就宣布，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达到 14%，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用于农业的投资将是一五计划的 4 倍，而一五计划的农业投资只有 7.8%。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主要用于大型水利项目，而集体用于灌溉、排水设施、化肥、农具和机器、牲畜及其他生产必需品的直接投资，将继续为农业发展提供主要资金。政府认为，这样的投资和有关技术的进步是迅速提高农业产量最有效的途径。

56.1956 年 9 月，政府提出的 1962 年农业目标是生产谷物 2.5 亿吨，棉花 240 万吨，但到了 1957 年，政府承认这些目标过于贪大，因而在切实增强农业发展努力的同时，降低目标，谷物为 2.4 亿吨，棉花 215 万吨。尽管如此，考虑到有限的化肥要用到那些经过开垦和多种栽培开发出来的已灌溉和播种了的地区，我们认为这些目标仍过于乐观。1957 年到 1962 年间，谷物生产很可能从 1.85 亿吨只提高到 2.15 亿吨，棉花从 164 万增长到 200 万吨。大约 1/4 的增产期望来自增加的化肥供应。

57. 上述估计意味着农业产量年增长率约在 3%，比每年人口可能的增长率 2%—2.5% 稍高一点，但许多偶然性可能一笔勾销这点差距。一个重要而无法估计的因素是农民是否自愿在集体化条件下努力生产。天气及其对种植的影响也是不可预测的。最后，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的可能性。对中共来

说，最糟糕的就是这些偶发因素合在一起——连年歉收、农民冷漠、人口增长率上升，这将使政府面临巨大困难。尽管如此，凭借内部的安全系统和控制粮食分配，中共政权几乎肯定能维持自己的政权。而且，北平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包括贷款或是得到苏联集团的援助，减少出口及进口农产品等措施。同时，在重工业方面政府有足够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尽管会降低速度但能保证工业的增长。

58. 中国人口众多且日益增长，确保其粮食供应成为中国在不确定的将来首要的经济问题。可耕地相对有限，尤其大部分土地分布在海拔高、干旱或是山地而不适宜耕种。目前，约 11% 土地是耕地。通过开垦不毛之地，加大投资和应用现代技术，成倍扩展耕作以增加播种面积，这种可能性只有一半。在雨水充足、生长季节长的重要农业区，通过防洪、灌溉、防虫、耕作方式和施肥等方面的改善，农业产量能得到提高。因此，我们认为，随着投资加大，中共能成倍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如果现在人口的增长依然照旧，那么在 28 年到 35 年间人口将翻番，到时即使实现了农业发展的潜能，也很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59. 工业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定稿，但是基本方案在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大上已经提出了，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在二五期间约 86%，一五计划期间是 115%。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各个工业目标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如计划的那样，由于预计的工业投资水平，工业的总体目标能够实现。

61. 中国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增长很快，但也会出现短缺，特别是化肥和原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提供的机器需求很可能达到 70%，相比较一五计划提供的是 60%。除了优先发展化肥和机械工业之外，二五计划期间将更多地关注商船制造业、制铜业和原油工业。中国政府即使实现了它的原油目标，在 1962 年仍要严重地依赖原油进口，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

62. 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短缺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计划从 50 万院校毕业生中选派三分之一投入各个领域的教学。那些不从事教学的人员，一半将成为工程师，三分之一将从事机器制造、科学、农业或是森林业；约有六分之一将从事法律、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在这期间，政府还计划使目前中小学的在校生增加一倍。到 1962 年，即使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还远远不能满足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对高素质人员的需要。

63. 对外贸易。二五期间的整个出口估计是 320 亿人民币，进口是 292 亿；而在一五计划期间，出口是 233 亿人民币，进口是 252 亿元。我们认为，在二五计划里，共产党中国的大部分贸易仍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特别是苏联。但是，与非

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比例很可能会增加，可能从占整个贸易的22%扩大到30%。贸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是中国将扩大对日本铁矿和煤的出口，对南亚和东南亚消费品的出口；从日本进口化肥、工业设备和钢材，从西欧进口资本货物。共产党中国可能会更多地利用其正在增长的国家船队商船进行国际贸易。

64. 保持目前多边的贸易控制状况，由于日益严重的进口问题、费用的不断提高以及灵活性的不断降低，将会使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复杂化。此外，目前美国实行的单方面金融控制，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并减少了其美元收入。

65. 显然，没有苏联新的长期贷款，共产党中国也会继续进行他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将通过出口为进口工业化所需提供资金，同时偿还一五期间欠苏联的贷款，并为他们自己的援助项目筹措资金——所有总计起来估计有30亿人民币。以他们现在的能力，没有苏联的进一步贷款，中国也能够执行他们的工业发展计划。但考虑到一系列的经济困难，中国人可能谋求和得到苏联在信贷上的某种援助。

（二）党

66. 党在保持活力、灵活性和党内纪律方面可能会继续面临着困难。由于最近大规模安排干部到基层工作造成了紧张局面，而1949年以后党员队伍膨胀所造成的困难还将继续。在形成政府计划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必然会导致党的各级领导中出现政策的不一致。尽管这些问题可能迫使党有时候采取压制的手段，大体上中共政权还是能够通过定期的修正计划，用讨论、说服和行政纪律处分的程序解决党内矛盾。而且，我们认为党在其政策中会保持非常重要的灵活性。

67. 这些问题可能因为毛泽东的去世或是丧失能力而加重。在下一个五年中，谁来继承毛泽东的问题应该提出来了，党的权威很可能在最初过渡到一个小组，小组的成员最有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朱德为国家名誉主席。在缺少毛时，政策的争论和权力斗争会很尖锐。占据毛的位置的诱惑会很大，这可能导致党内权力斗争。我们认为，这样的斗争会使政权要达到的目标复杂化，降低其政策的灵活性，但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

（三）民众态度

68. 我们很难预测，群众的不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和积极的反抗。这种不稳定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可能会发生孤立的偶发事件、小规模的反抗，特别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紧缩和工业化带给人们日益增大的压

力，群众对此的反应可能随时导致政府的强行压制，如果必要，中共领导人会使用严厉的镇压措施让老百姓听话。但是，同时他们很可能避免普遍地和有步骤地使用恐怖手段。还会有很多不满，但我们认为，这对政府计划的真正影响不过是使其复杂化或妨碍计划的实施。尽管政府将继续谋求更多的积极支持，由于其决定推行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它的努力将获得有限成功，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反应仍可能是默许的态度。

69. 政府将继续处理知识分子问题。1957 年春，来自大学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向政府表明，尽管它努力教导但没能迫使多数的学生和教授接受共产主义的道路。由于缺少高等教育设备，以及给毕业生提供的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赢得学生这一代的问题变得更困难了，因此需要加强纪律和对学生的政治控制。此外，国家很可能继续强迫大批中学毕业生接受到农村长期的农业劳动。

70. 农民肯定还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政府承认二五计划期间的主要问题是改善集体农场的管理，让农民更多地接受集体制度。政府可能会通过更严的控制让农民保持一致，而在收成好的年份允许适当提高消费。

（四）军事建设

71. 在下一个五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几乎肯定会继续提高。尽管军队在规模上会缩减，但它将装备新的更好的武器，比目前更具有机动性和受到更好的训练。空军和海军在规模和实效上将有所提高。尽管军队力量的平衡会好一点，但保持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主张将仍然盛行。中共很可能会保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除了它的进攻和防御任务外，还作为基本力量控制中国大陆，并继续在亚洲发挥威吓作用。

72. 到 1962 年，空军总共可能会有 3600 架飞机，增加超过 700 架。中共可能把他们的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转换成喷气式飞机，也许到时会有些喷气式中程轰炸机。在强调提高国土内水域的防御能力的原则下，海军会继续高速发展。可能会重点加强潜艇的力量，替换超期服役的船只，提高海军行动的实效性。

73. 军事工业将在规模上和效率上得到提高，但在二五期间，对于多种重型和复杂的军事装备，以及技术支持，中国仍将严重依赖苏联。1958—1962 年期间，军事工业也许能够满足军队对小型武器、几乎所有火炮、运输工具和弹药的需要，但仍不能满足装甲战斗运输车和更复杂的火力控制系统的需要。制船业也将继续扩展。国内飞机生产会有一定的提高，但中国在许多组件上会继续依赖苏联。

74. 由于缺少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军事和经济计划对其有限资源的需求，到

1962年，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中国没有自己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的生产能力，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共产党中国会向苏联施压获得如此先进的武器。在下一个五年，苏联可能提供给中共某些种类的导弹和适合用携带核弹头但只带常规弹头的武器。中共和苏联在把核弹头（包括炸弹）引进中国来的问题上看法还不确定。除非遭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协定禁止，苏联到1962年可能把核武器引进共产党中国，尽管可以肯定这些核武器仍在苏联控制之下。无论怎样，即使不在共产党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李锐译，沈志华校）

NIE 13-2-59

共产党中国当前的发展趋势

（1959年2月10日）

问题

评价“大跃进”和公社计划的重要性，它们与毛泽东领导权问题的相互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共对外政策

结论

1. 中共的“大跃进”方针多半建筑在巨大耗费人力的基础上。尽管很难精确评估中共所宣称的数字，但据我们初步判断，1958年的生产确实有显著的增长。农业至少提高了10%，可能是20%；某些方面的工业生产，例如钢、煤和机床，几乎可能是1957年的两倍，尽管有些增加的产品质量可能很糟糕，没有多大用处。今年肯定可以看到总产量会有另一个大幅度提高，但前进速度在1959年之后很可能不再继续，因为在这疯狂时期产生的某些人为的和经济的问题开始显现。

2. 几乎所有的农村在不同程度上都被组织成了公社。我们认为，中共党在最近一个时期采取的缓和公社发展的方针，包括推迟城市公社的建设，反映出中共在重新向前推动以前需要把人心团结起来。尽管已经考虑到民众会有负面反应，不过很少会出现明显的反抗迹象。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强大的控制系统及其所显示出的灵活性，能够使北平既避免流血镇压，又不会被迫从公社做法后退。

3. 毛泽东宣布他打算辞去政府主席的职位，引起人们对他在党内地位的猜测。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

4. 尽管“大跃进”和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间引起一些新的摩擦，但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

5. 至于说到 1958 年期间共产党中国对内对外的冒险，没有坚实的证据说明二者有什么确定的相互关系。二者都是作为加速共产主义革命进程这一运动的一个方面出现的。虽然北平可能估计，挑动台湾海峡危机有利于团结人民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我们不认为，这是触发危机的主要动机。

6. 在近海岛屿危机中，美国和国民党中国的回应以及世界的反应，或许对于北平总的外交政策思考会起到某些缓和的作用。较少强调美国所谓的弱点，而更多强调中国在亚洲的目的及其政策的“和平的”、“合理的”特征。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中共强有力的行动会受到阻止，特别是那种在有机会实现其某些目标时所采取的行动。

7. 对于“大跃进”和公社计划的社会代价，亚洲已经有了某些负面反应。如果这些计划惨败，共产主义在亚洲就没有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对其他亚洲政府的影响力也将减弱。然而，在执行这些计划时，任何事情只要不是大的失败，仍能让中共政权处于对邻国施以巨大压力的地位。如果这些计划成功了，在南亚和东南亚对中国的顾虑会增大，要防止诸如柬埔寨、泰国这样的小国迎合中国的要求就更困难了。成功将大大增强北平领导人的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加快实现国内和国外的目标，并且强化他们的信念，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指南。

讨论

一、导言

8. 在过去一年里，共产党中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也许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其在苏联集团里的作用，这些事件的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 1949 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

9. 推行“大跃进”方针，寻求更充分地动员共产党中国广大的不发达的劳动潜力，这使已经发展很快的经济速度突然有了巨大的增长，也引起了共产党中国已经确立的经济形式的重要改变，这种形式最初是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的。这是一场

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它试图创建公社，并作为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这些庞大的计划伴随着武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不断加强的充满自信的声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经常性的挑战，包括在台湾海峡挑起严重危机。就在这一年底，宣布了毛泽东打算从国家主席退下来同时仍保留党的主席职位的消息。

10. 毫无节制的、急风暴雨似的“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公社组织的发展，令世界震惊。1958 年以前，中共政权在各项计划上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牢固地确立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目标总体实现或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 7%—8%；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农村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北平在社会主义集团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得到认可，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大大加强了。1956 和 1957 年出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但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好的，也没有对政权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于那些不像北平统治者那么有雄心的人，这样成功的业绩可以使其继续原有的经受了检验的政策。

11. 相反，过去一年发生了激进的改革。尽管到年末缓和了一些，但这些改革表明，中共领导人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共产主义信条的，在“不断革命”的理论下，强制地向前推进，以确立现代工业经济。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

二、“大跃进”和公社计划

（一）这些计划的动机

12. “大跃进”。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根本地是源自中共领导人中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认为，尽管在某些领域很快地有所收益，但现存的经济计划框架还不能达到最佳结果。这种想法在 1957 年间明显地增强了，因为 1956 年当局正在应付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混乱。党也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证明，在 1957 年整风运动中特别强调的口号“依靠群众”，可以产生具体的效果。

13. 从 1957 年重新审查经济计划起，当局明确地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地单一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这一脱离实际的模式过多依赖中国的进口能力和技术，而阻碍了更多使用中国资源的产品发展。由于缺少苏联信用贷款，以及出口产品和市场受到明显的限制，当局只有通过一项较少依赖进口资源的项目来大幅提高其国内投资。当局在继续鼓励重工业的增长，优先进口对工业有用的货物，发展国内资本货

物产业的同时，也努力大规模地动员农村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发展地方工业。

14. 计划的制订者也承认，农业生产是一五计划发展最薄弱的一个方面。我们估计，农业增长大约是13%，与中国膨胀的人口持平。当局已经发现很难扩大粮食出口、不断增加粮食供应和为城市提供农业原料。而且，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有限的耕地资源，马尔萨斯的灵魂已萦回在计划者的脑际。同时他们越来越确信，在能供应更多的化肥和农业机械之前，强化劳动效力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途径。

15. 从1957年底开始出现新的集体劳动的方式。在9月份党宣布，农业生产更大的增长能够实现，而且必须实现。劳动大军（据报道总共有1亿人）将被组织起来，利用相对空闲的冬季参与农村规划，特别是灌溉工程。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志愿者”每周要花好几个小时到农村劳动，如挖渠、积肥。有关扩大地方工业可能性的讨论越来越多。

16. 令人惊讶的是，2月宣布的1958年度经济计划仍然是适度的。但是，当冬春动员的结果变得明显时，当局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而到5月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人正式发动了“大跃进”，号召“多快好省”地加紧生产。大规模的宣称运动点燃了党员和群众的热情，提出了如“一天等于20年”等极为乐观的口号。“大跃进”的生产目标有时高得出奇，而且不断攀升。

17. 公社。为了实施新的经济计划，需要发现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将打破各农业集体之间的界线，而建立一个强大到能够自行筹集资本并在最大限度内动员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的单位。从1956年起，各种分散存在的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到了1958年春，在一些省出现了逐渐加快的合并趋势。湖南的这样一个单位，后命名为“卫星”公社，成为后来公社运动的范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特征是：(1) 将一个乡的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在一起；(2) 乡政府与公社管理合并，实际上控制着该区域的农业及其他各种活动；(3) 通过扩大集体化的范围使剩余的私有制进一步缩小；(4) 孩子被送到公共托儿所、学校，在集体食堂吃饭，以便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去参加劳动；(5) 工人按照军队方式组织起来，并被派到田间或是小工厂。

18. 这些经验显然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组织方式，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甚至包括孩子和老人，以满足“大跃进”方针的需要。因而，1958年8月突然发动了集中推进城市公社的运动。

19. 在组建公社的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的整风运动表明，有些中共领导人感觉到革命正在失去动力，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

一个重要的新的步骤。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还引入了某些纯粹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通过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这也许可以满足意识形态进步性的迫切需要。

20. 此外，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采取军事化手段控制所有人，这使得对每个人的监督和人身控制变得更容易了。公社内部的群众性的民兵组织强化了这些作用。家庭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能够与国家和党分享忠诚的单元，但公社的共同生活状态正在促使家庭的解体。最终，从幼年起开始管理和控制公民的公社制度得以不断加强，这有助于实现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一代人的目标，最终把中国人塑造成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21. 促动北平的还有战略上的考虑，公社体制所固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下放和分散，符合战备的需要。中共报刊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战争爆发，国家在新的组织形式下就不那么容易崩溃。

（二）“大跃进”和公社时期的发展

22. “大跃进”。到目前为止很难精确判断中国所公布的产量，但据我们初步估计，1958 年的产量确实显著提高了。我们认为，农业的产量超过了 1957 年，尽管实际产量远低于他们所说的，但至少达到了 10%，也可能是 20%。在老天帮忙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已实行了集体耕作，在一个年份里有这样的增长，公平地说也能称为“突破”了。工业生产是实际产量在多数情况下接近所公布的数字，但要考虑到增长的部分主要是机床、钢铁和煤，且质量很差，用处有限。

23.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关于农业的统计数字，突然恶化。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各级组织为实现不断上升的目标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领导者则急于要向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飞跃发展。此外，报告“大跃进”的情况需要庞大的统计工作，有很多毫无经验的新手参与其中，还要用到新的统计技术，况且几千份来自地方工业的原始报告材料又非常不规则。由于在丰收季节开始实行公社计划而引起行政管理机构的改变，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最后，我们认为，党的领导人感到这些生产数字应该可以证明，在共产党中国新的强迫式的前进道路上，没有那些以前的和“比较保守”的（如果不是更现实的）指标的一席之地。

24. 公社。1958 年 11 月初，北平宣布 99% 的农村人口组织成了 26500 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 4750 户。可以使用的证据显示，到这个时候，公社组织发展的实际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极端是这样的组织仅存在于纸面上，另一个极端是如同

“美好新世界”一类的公社，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孩子由公社养育，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由国家供应。然而，到1959年1月，我们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如下的判断，属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的公社只有极少数。无论如何，如果考虑到公社组织基础的相当部分已经存在了，那么，公社化表现出来的这种速度还是颇为可信的。由农业高级社合并而形成公社的这种乡一级单位已经存在，并且在乡的范围内，农业高级社及其他经济组织中的各种经济合作，在1957年后期已经开始了。

25.1958年12月10日，中共发出指示，要求纠正一些公社的极端激进的现象，要求过于热情的组织者不要急于用他们的“命令主义”对待别人。中央的指示和后来发表的社论还警告说，公社采取的“供给”制不要推行得太过头，对于孩子的教育父母要有些选择权，减缓推行军营生活方式，减少过度劳作而多睡觉，总之要全面纠正错误和弊端。在激进者之后紧跟着一个调整期，调整是中共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看到调整时期很可能误以为是软弱的信号或是当局改变了主意。

26. 试图在城市里组建公社的努力一开始就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把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城市社会完全机械地组成大小容易控制的半自足单位，证明是不行的。另外，此举也遭到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强烈抵抗，以至共产党报纸抱怨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残余”。由于这些困难，北平推迟了城市公社计划。

27. 在12月发布的整顿指示反映出存在不少公众的不满和消极抵抗，当局也承认这一点。为了有助于转变公众的态度，中共决定减缓推行某些更激进的社会措施，着手加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困难还不足以对其政权和公社计划构成任何大的威胁。

（三）1959年的展望

28.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生产在这一年将继续增长，只是稍逊于1958年的成就。整个年份会继续充分动员劳动力，保持比1958年稍高的效率，同时将停办一些小的生产项目，包括许多小工厂。农业生产远低于所说的目标，但仍会大大提高（假设有好的天气）。1959年的工业发展实际上将会接近许多雄心勃勃的目标。随着新工厂不断投入生产，工业产品也会提高，特别是轻工业能够从1958年工业的高水平成果中获益。

29. 然而，这一年可能会出现新的严重问题。导致1958年生产明显上升的主要因素——未充分就业的人力资源已经基本耗光了；现在已没有尚未开发的人力储备。此外，甚至这些中国人也都没有力量或不愿意无限制地继续1958年下半年那

种狂热的速度了，一种可能性已经在12月公社调整中反映出来，人们表达了诸如一天8小时睡眠这样的需要。在如何调配快速增长的产品，以及进一步加快发展已经超负荷的运输系统方面，当局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更大的困难来自于农村产品的质量低劣和缺少行政及专业技能。这些也许由于即兴式的和地方上的首创精神的继续而得到部分弥补，这种精神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展现出来，但是中共大概不再能保持1958—1959年的增长速度。

30.1958年浮夸的统计很可能到1959年底给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带来麻烦。这一问题在农业方面特别尖锐，1959年的主要粮食产量目标差不多比1958年所宣布的产量增长了一半，大概是1957年的三倍。由于缺少可靠的统计数字和经常改变生产目标，给共产党中国制订均衡发展的经济计划带来了严重问题。此外，在声称粮食生产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有限的消费计划无疑是困难的。

31.1959年将继续调整公社体制，减少一些极端的做法，一些措施可能会更实际、更符合地方条件，但当局肯定会继续坚持公社的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认识到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及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中共无疑将尽更大的努力尽可能顺利而有效地发挥公社的作用。问题仍存在的同时，我们认为当局总体上会成功保持现有的进程。

32. 会有零星的主动对抗和不少消极对抗，以及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公社计划已产生了广泛反响，当局在年底前放慢步子就是对此做出的部分回应。对传统家庭的冲击是公社革命中最敏感的部分。但是，这种冲击还将持续近10年，过去的经验表明，北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交易可做，它可能继续努力调整步伐以避免严重的不满。这种灵活性加上当局的控制，我们无法期望会有全国范围的抵抗，足以导致流血或是迫使当局从公社运动中后退。

三、毛泽东的地位

33. 毛泽东宣布今年春天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尽管还保留党的主席，还是引起了人们对他在党内地位的猜疑。可以想象，毛的政策在党内受到攻击，他的助手们现在联合就足以挑战他的领导，只要他们想这么做。在党的报刊上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对于“双百方针”是否得当、在推行对外政策目标时中国能够承受的冒险程度、经济发展的最佳速度等方面，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此外，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可能有分歧，在如何对待当前“大跃进”和公社计划所引起的困难上，也不完全一致。

34. 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说党内出现了分裂主义，我们也不能确定任何组织或

集团想要剥夺毛的权利。相反，在过去的岁月，党多次声明强调毛在领导党和制定主要政策中的作用。处于最佳地位反对毛的人，是那些与当前“大跃进”和公社决策密切相关的人。此外，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

35. 因此，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毛自己提出了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他大概希望用更多时间来巩固他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的领导地位，解决政权面临的各种国内外的问题。毛公开宣布辞去主席一职至少有一年了。国家主席权力不大，只是象征性的，所以毛没有牺牲任何重要的权力，只是减少了耗费时间的礼节性活动。

36. 毛辞去国家主席对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多大影响。他肯定仍是党和国家的领袖。谁来接替毛的国家主席之位尚无定论，很可能是一位有些威望，但在领导层很少露头角的人，他不会是毛的党领袖的潜在接班人。

（李锐译，沈志华校）

NIE 13-59

共产党中国

（1959 年 7 月 28 日）

问题

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发展状况和对外关系，评估其接下来五年内可能的趋势。

结论

1. 在其执政的第十个年头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也不断上升。去年国内激进的政策和措施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亚洲国家也不断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中无情的一面和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性企图。这些问题的确会使共产党中国在未来的五年里相当困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政权有能力解决其国内问题，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在未来五年里将会得到相应增强。尽管该政权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其国力仍将会远远低于美国和苏联。

2. 虽然 1958 年的生产增长远没达到当时北平提出的夸张标准，但是当年的经济产量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们认为 1958 年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 20% 的增长纪录，其中，工业产量增长了 40%，农业产量增长了 15%（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年的气候条件相当好）。然而，这些生产记录是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获得的。

3. 在接下来的 5 年里，为了保持高速的生产增长，共产党政权将遭遇生产动力、生产和运输中的混乱、错误的统计数据、意识形态的压力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有能力使其 195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2%—15%，在余下的三年里，即在 1960—1962 年，也能成功地维持每年 7%—10% 的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可能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增长 65%—85%。工业的年增长率可能比 1953—1957 年间 16% 的惊人的增长率要平均高出 50%。接下来的五年里产出上最具戏剧性的增加恐怕是在基础工业的产品方面。比如，共产党中国可能有能力将粗钢的生产量在 1962 年提高至 2000 万—2500 万吨，这些粗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西方的标准，却具有其商业价值。

4.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在被评估的时期可能无法获得如此戏剧性的增长。1958 年 15% 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再现。在整个“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 年），农业的总增长速度可能是在 20%—30% 之间。这样的速度对于支撑经济发展可能是足够了，但却赶不上消费的极大增长。

5. 公社体制为共产党政权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来动员和指挥其巨大的潜在劳动力。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一政权在试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公社的努力上却面临严重困难。公社计划给当局带来的极大困难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困难和经济混乱，迫使共产党政权修改了公社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政策。我们认为，如果在经济或政治上有必要的话，北平会继续推行公社计划并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变。这些不断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压力在民众当中可能引起的后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勉强的顺从。然而，鉴于这个政权具备应变能力和监控能力，民众的反抗不可能达到迫使政府在血腥镇压或者放弃公社之间做出选择的地步。

6. 尽管有迹象表明过去 25 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独一无二的凝聚力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减弱，但我们认为毛泽东仍将是共产党中国的主导人物。选举刘少奇作为毛的继承人而担任国家主席，这可能也意味着确定他同时继承毛而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果毛泽东逝世或丧失了工作能力，将权力移交给刘可能就不会遇到

什么挑战，但是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可能会下降。

7. 接下来的五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装备实力将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然而，共产党中国在我们评估的这段时期可能不会研发值得重视的本国导弹项目。苏联可能提供或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生产不够精密的导弹。在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国共产党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导弹是苏联设计的，它们是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短程地对地导弹。共产党中国可能已经启动了核武器研发计划，但也几乎可以确定，1963 年它还不会具备自己生产核武器的能力。[1]

8. 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武器方面的利益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苏联不愿意看到共产党中国得到他们自己能控制的核武器，这一点基本上是确定的。从共产党中国方面讲，也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想拥有核武器，并承认一旦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其发展核武器的机会就将大大减少。对于共产党中国是否拥有核武器，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认为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的禁止，在我们评估的这个历史阶段，核武器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当然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

9.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然而，随着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和地位的提高，它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也将不断上升，中苏利益的调和也会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核武器、对待西方的态度和策略、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同时认为，虽然莫斯科欢迎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集团力量所做的贡献不断增加，但它更关心共产党中国力量不断壮大背后的长期影响。尽管如此，双方无疑都承认，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联盟本身的必然结果，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

10. 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国内计划、西藏局势和对外政策上的侵略性特点，造成整个亚洲对共产党中国的强大及其意图的忧惧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

---

① NIE 100-2-58，1958 年 7 月 1 日的报告“第四类国家核能力的发展：可能性和后果”估计（第 75 段），共产党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将来的 10 年内可能拥有小型的不受约束的核武器”。

的几年里遭受了外交政策上的挫败，他们大概仍有相当的信心乐观地面对未来。我们认为将会有不断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战特点，显示他们想作为被承认了的大国身份而出现的急躁心态。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来自世界范围的压力也将增加。中国共产党人或许主要会通过政治和颠覆性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也将继续他们的贸易和援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这种努力可能依然是受到限制和有选择性的。然而，强调非军事手段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去开拓一些其他的目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对一些情况做出反应。这些情况可能被解释为对他们在亚洲的地位的一种严重威胁。

11. 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但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共入侵几个主要近海岛屿是不可能的，除非北平开始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政府防卫这个海岛的决心已减弱。中国共产党人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

讨论

一、导言

12. 在过去的一年里，共产党中国大力提高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速度。其结果是遇到了建国 10 年来所经历的最大的困难。高产出导致了生产的严重不平衡和供给的分配不均。人为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人口过度劳累，食不果腹，因而士气严重下降。人民公社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共产党政权对人口的控制，但是，它和同时进行的“大跃进”运动一起，由于管理不善给早已危机四伏的政权增加了更多困难。当共产党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恢复其自信的时候，作为一种反应，一些困难也随之而来了，这些困难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引起苏联的不满，以及在与台湾、日本、西藏相关的问题上对外政策遭遇的挫折。北平选择的通向世界强国的道路显然是不平坦的，但这些困难并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1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计划是中国共产党自 1955—1956 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最新的，也是最激进的。在此之前，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然而，从那时起，中共领导人越来越相信这种发展模式不会给经济带来足够快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世界强国，加快经济发展速

度和进行激进试验是必须的。

14. 存在的大量问题。人口的增长几乎与农业生产的增长相等。主要依赖税收和市场控制的共产党政权发现，调动供给以喂饱飞速膨胀的城镇人口和获得用于出口的产品都很困难。快速的工业化需要不断进口和引进资本，这时优惠的苏联贷款也终止了。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进口需要。此外，调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革命精神再次显得必要，因为当局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它一开始得到的普遍支持。同时，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得到来自外部的重大补偿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它没有成功地获取台湾，也未能取代“中华民国”而加入联合国。最后，由于苏联领导层中出现的混乱，非斯大林化，匈牙利革命，共产党中国自身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共在核武器领域需要苏联帮助的愿望未得到满足等等原因，导致了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15. 自1956年初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和政治计划上的根本变革——通过一次接一次的试验——都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显然，从1956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前进的速度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到1958年中期，共产党似乎已定下了一套大胆的和激进的路线。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表明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强硬观点的胜利。与这些措施相伴随的，是官方授意的统计数据和经济目标的公布，以及对外政策的好战性、苏联集团内部的教义主张、共产党中国内部意识形态认同的显著增长。到1958年末，不断加剧的紧张带来了一些退却。当然，这些只是调整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不是发生了变化。至少，未来几年总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似乎已经建立。

16. 在过去的一年里，北平的行动表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决心迅速地和残酷地实现其野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们不发达的国家完成工业化，使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使其人民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塑造中国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任共产党领导人是第一代革命者，对于他们的共产主义教条的标牌和“不间断革命”的概念非常认真。然而，在他们的观点中也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一定会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民族主义成分有利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的前进速度，但是这种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联盟友的需要之间的融合问题可能会变得日益困难。

17. 在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制性速度。他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时，会继续灵活地改进手段和方法，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基本目标。

二、"大跃进"

(一) 背景

18. 共产党中国有两个基本经济问题。第一个且最根本的是，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食品刚刚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共产党政权仅仅通过对农村地区稳步增加的控制以及通过限制消费，来拨出农产品中必要的剩余部分，以满足城镇人口的增长和出口需要。然而，虽然工业产品的大大增加，日益严重的波动依然会强烈干扰发展轻工业和增加出口计划。

19. 第二个问题是获得高强度资金积累的困难。为了把共产党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进口相当数量的高级设备。在严格控制消费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农产品产量这一措施的失败，限制了资金的数量，而这些资金本可以通过现代工业产生的。苏联集团已经满足了共产党中国进口资本货物的需求，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贷款得到的，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共产党中国已经从其富裕的苏联盟友那里收到过一个红色戈比的经济补助。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军事借贷，北平从莫斯科那里得到的所有资助就是两次总数为 4.3 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自 1956 年以来，北平从苏联那里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是以货款两清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为了报答前几年苏联的贷款，北平还必须大力提高出口。

20. 1956 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共产党政权在 1957 年开始了一段经济巩固时期和对发展政策的再考虑。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很显然无法解决共产党中国资金短缺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首先，这样的发展规划要求进口大量的资本货物，而共产党中国为此需要付出其自身的资源。其次，它不能充分利用巨大的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城市人口无法充分就业，而且每年都有几个月，5 亿农民相对没有产出。同时，1957 年的经济发展为 1958 年的扩大生产铺好了路。[1] 即使没有"大跃进"的推动，1958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会达到 1956 年所创造的 12%—13% 的纪录。

21. 虽然共产党中国领导人一开始为 1958 年制定了相对保守的目标，然而在那年的上半年他们做出判断，比他们计划预见得更快的发展速度也是可能的。他们决

---

① 1957 年，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它们为 1958 年的轻工业提供原材料——的产量极大提高。伴随着 1957 年消费的稍微减少和资本投资的下降，消费品和生产品的库存充分增加，足够弥补 1956 年库存的下降。由于 1956 年和 1957 年的国家投资要远多于 1953-1955 年的，1958 年是可以被期待的。当许多项目能按计划完成，一些关键工业的产值会有重大的提高。

定利用中国众多人口的劳动潜力，在各个领域发起“大跃进”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投资模式和财政价格政策将会继续，但是除了现有的计划，也会采取新的措施。

（二）特点

22.“大跃进”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更加重视中小型产业的发展，与大型的产业相比，这些中小型产业需要的资本投入、技术和知识含量较小，并能迅速产出并盈利。与此同时，对这些中小型产业的监管权也移交给了地方政府。这一举措促进了地方工业和地方建设的进程，同时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劳动力和地方资源。重工业工厂和其劳动力的过度使用也使得这一产业生产力有所提高。工人进行多重轮班工作，并时常受到超额完成更高目标口号的鼓动。

23. 然而，中国共产党“大跃进”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农业生产中所迸发出的惊人的生产能力：[①] 灌溉工程，数以千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后院工业。这些后院工业的最佳代表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农田间、校园内、办公院里众多的小型炼钢炉。这些自制炼钢炉一般由学生、家庭主妇、职员和农民等志愿者操作，使用一切能够得到的碎钢片（包括农民烧饭用的锅）和地方上生产的矿石和煤炭。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占 1958 年生铁总产量的 40% 和钢总产量的 20%。然而，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质量低劣，根本无法使用。

24. 人人参与劳动：幼儿园儿童拔草；小学生做鞋子；家庭主妇挖水渠，为炼钢炉加燃料；老人养猪，照顾小孩。劳作的时间长，而志愿者也没有假期。同时，追求“多、快、好、省”的压力常常存在。发动并保持这一史无前例的工作狂潮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动机、组织和管制的绝招之所在。

（三）成就[②]

25. 尽管还远远没有达到北平政府的生产目标，中国在 1958 年的生产力纪录仍是引人注目的。在这一年，农业和工业第一次同时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我们估算，1958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 1957 增长了 20% 左右，大大超过了 1956 年增长 13% 的现有纪录。

26. 据中国官方声称，1958 年的农业产值上比 1957 年增加了 64%，而基本粮

---

① 农业中劳动力的组织和利用，在第 41 段的开始讨论人民公社的部分中有所论及。

② 我们对经济的估算与前些年相比不太确定。这是由于共产党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和激进变革以及中共 1958 年已明显恶化的数据统计。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的全景式描述是应当是精确的，但是一些具体的数据估算并不精确，特别时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附录 4 中国共产党的新统计数据中展开。

食作物的产量比 1957 年增加了一倍。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可信的，可获得的信息无法支持这些数据，同时参考中国所实行的密集型农业状况，这些数据也是难以置信的。因此我们相信，农业产量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增长，可能是在总体上是 15% 左右，而基本粮食作物的增长在 15%—20% 之间。[①] 而这一增长的三分之一得益于风调雨顺的气候。在持续数年进行的发展项目下，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大幅度增长，并超过了整个“一五计划”。然而，蔬菜，肉类和其他农副产品一般只作为农民个人的副业而被忽视，可能实际上衰退了。

27. 一方面，粮食产量在 1958 年取得的显著的异常的 15%—20% 的增长率，而另一方面 1958 年到 1959 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a) 高密度的劳动使得对于食物和热量的需求随之显著增长；(b) 最初国家在通过公社分配食物的过程中总的来说过于慷慨；(c) 粮食产出中用于非食物用途的部分可能增加了，例如农业项目中不断增加的种子、饲料需求和用于制造业的粮食的膨胀；(d) 交通运输条件的缺乏阻碍了粮食从富裕地区转移到缺粮地区，特别是城市。此外，由于农副产品（肉类和蔬菜类）的减少和以土豆代替谷物的情况不断增加，使得人们的膳食结构不断恶化。1958 年 7 月到 1959 年 6 月国家粮食储备目标是比上一年增加 43%，但是北平政府承认 1958 年下半年的粮食储备的增长只有 24%。尽管粮食产量增加的 50% 可能予以保证，但是整个一年的粮食获取量可能远远落后于既定的目标。在 1958 年的下半年，官方的粮食售价比 1957 年同期增长了 33%。这阻碍了粮食储备增长计划地实现，并造成出口上的减少。

28. 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工业数据相比农业上的夸张的成分少一点，而我们所

---

① 估计基本农作物的增长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播种面积较 1957 年并无明显增长，但是有相当多的土地转向种植红薯，而较之少的土地转向种植谷物，这些土地主要是从种植小麦和其他各种低产量作物的土地转来的。单单政府主导下的这一调整（不算入各种作物平均产量的变化）就带来了较之 1957 年 4% 的增长。另外 1958 年的气候条件较之 1957 年更加适宜农作物的成长，尽管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这样宣称的，用以鼓吹其生产措施的有效性。这一因素大概使得产量增加了 5% 左右。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是采用的生产措施对于产量提高的影响。这时期展开了巨大的灌溉工程建设，使得 1958 年的已开发耕地的灌溉面积比例从 30% 提高到 60%，这一增长比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要达到的增长标准多出一倍多。有机肥的使用例如粪肥和池塘积肥的使用据称较 1957 年增加了 10 倍。然而，声称的新近得到灌溉的土地中只有一小部分在 1958 年得到收益，而所附加的有机肥料是低级的化学肥料，其可获得量由 100 万吨增长到 280 万吨。但是如此数量对于基本农作物产量增长的影响只能小于 2%。深耕，密植，改进的种子和其他新技术的使用，也被视为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这些措施也只局限于小面积，同时其中的一些措施实施到最后也基本无用。此外，由于竞争，提供足够的丰收作物，这些生产措施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被抵消，从而给正常的丰收带来损失。我们估算，这些生产措施对于基本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贡献率在 7% 到 10% 之间。综合其他因素，估计 1958 年基本粮食作物的总增长量为 15% 到 20% 之间。

获得的数据也比农业方面真实可信。我们相信，1958年总体的工业产量大致增长40%，约是官方所称标准的三分之二。这一增长是目前幅度最大的一次增长，也是最大的一次绝对性增长。轻工业大概增长了20%左右，而重工业增长了60%左右。同时工业扩张出现在广阔的领域中，而主要的重心放在了钢铁工业上。我们认为总的钢产量也许正如声称的为110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即使不算上大多数来自本地小规模工厂350万多吨的标准产品，1958年的钢产量也比去年增长了40%。然而，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钢铁的进口不得不翻一番，达到100万吨，并且加快了所有现代钢铁厂的建设。煤产量的增幅可能已经接近了所声称的增长一倍，但是增幅中大约有40%为来自本地经营的低档煤产品。共产党中国可能已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煤国。机械工业和化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增长。

29.1958年的产量记录的取得是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为代价的。对产量的迷信和家庭工厂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特别是，劳动力经常不必要地浪费在几乎没有产值的工作上。结果，大量的庄稼要么无人收割，要么收割得太晚，要么在等待运输的过程中腐烂。在超负荷运转的工厂里，由于任务紧迫，管理人员不愿收回设备做维护和修理，而维修厂也转向了生产。

（四）前景

30. 在“大跃进”的头一年，保守主义成了诅咒，计划也让位于即兴创作和生产的仓促扩展。到1959年中期，北平政府仍然没有正式采用第二个五年计划，且于1956年9月宣布的暂定的五年目标也因“大跃进”而被认为是陈旧的。这个国家致力于继续保持1959年强劲的发展步伐，但同时也认识到必须纠正生产不平衡并改进新机构的安排，特别是要整顿人民公社体系。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想放弃他们原来准备将“大跃进”再延长三年的计划。然而，他们已不得不稍稍减缓压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能再重新恢复并保持在1958年取得的增长速度和人们努力的强度。

31. 事实上，这个国家在试图维持目前“大跃进”的步伐上也面临很多问题。一个首要的问题将是维护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产量的增长应该相应地使消费有适度的增长，但是这在部分上却为长期的分配困难和供应的不平衡所阻扰。甚至，工人和农民可能认为他们在消费上的增长太少，与他们被要求付出的努力是不成比例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续夸大农业产量，这种不满的情绪将会增强。

32. 规划者如何纠正1958年来形成的不平衡的能力将决定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产量的“大跃进”带来对运输的要求远远超过运输系统的容量。在交通上很大

一部分的增长包含为迅速发展的钢铁产业运输煤矿和矿石。在调配和运输上的需求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超过运输可负担的容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国家政权将总投资中用于运输和交通的比例从 1958 年的 13% 提高到 1959 的 21% 弱。1959 年货车产量的目标大概是 1958 年产量的 2.5 倍。以这种增长的比率继续投资于运输工业将必须持续很多年以弥补现存的差距并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需求增长是由于产量的增长（尤其是钢产量及其原材料）、产业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以及因为经济的发展城镇和农村相互依赖的增强的结果。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铁路到 1959 年计划将其运输能力增强 37%，即便是达到了这个目标（虽然我们认为不大可能），1959 年间仍会发生一些交通堵塞，需要有严格的运输先后次序。

33. 1959 年，产业不均衡导致一些经济部门不得不减产，并且转换投资方向，这些变动代价高昂。到 1958 年底，当局承认国产煤炭、生铁和钢的质量低下，导致这一项目的急剧减产。现代钢铁项目中原材料的不足导致 1959 年第一季度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可使用的钢铁的减产。成品钢的生产量落后于粗钢的产量，而由于在种类和型号上的限制，钢铁生产不平衡。北平仍然将努力集中在生产的现代化和设备的扩展上，而且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钢铁及相关产业上的投资显著增长。机械产量在 1958 年大幅增长，建立了很多不考虑需求的产出项目，但是这个产业因为新的先后次序的需要而被限制了其主要能力。这就导致许多种设备的机械重组和产量减小，因此限制了在 1958 年末取得的产量增长率。这些不均衡不会因为一些快捷和简单的方案而得到解决，反而会因为国家政权强迫产量大幅度增长而在一些产业部门持续下去。

34. 这一政权还面临着如何使它已经重新组织起来的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那些被不断赋予权威和责任的人民公社及地方政府有效运作的困难。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将受到困扰，其原因在于错误的统计资料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地蛮干。他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变得更加复杂。

35. 虽然有这些困难，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将以平均每年 10%—13% 的速度增长。这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将使 1962 年与 1957 年相比总产值提高 65%—85%。这个判断来源于我们认为在 1958 年取得的 20%、1959 的 10%—15% 以及 1960—1962 每年的 7%—10% 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此后四年会以巩固 1958 年异乎寻常的成果为特征。

36.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新的投资。这是有可能的，一是因为重工业增长速度很快，二是当局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只把财富的一小部分用于分配和国民的消费。因此我们估计，在 1957 年，21%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内总投资，这个百分比在 1958 年大约增加至 28%，并且我们相信 1959 年将至少将达到 30%。我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大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倍。

37. 将国家预算的 65% 投入工业并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入比例为 9：1 的模式很可能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下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将在 1953—1957 年每年 16% 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加 50%。1959—1963 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基础工业产品产量的显著增长，这个增长在 1958 年“大跃进”前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例如，现在我们认为，相对于 1957 年 535 万吨可使用的粗钢产量和 1962 年 1050 万至 1200 万吨的原计划产量指标，共产党中国有可能在 1959 年将可使用的粗钢产量提高到 1400 万吨，到 1962 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大约 2000 万到 2500 万吨。然而必须意识到，就成品钢的种类和质量而言，炼钢业还是远远落后于日本和西方国家。此外，也不是所有炼钢部门都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

38. 尽管这个国家将继续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但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中，农业产量不会以 1958 年的 15% 的速度显著增长。如果化肥总产量翻一番的雄伟目标可以实现的话，将足以实现农业总产量 5% 的增长。灌溉、优化品种等计划的实施将有可能促进产量的增长，同时“大跃进”的浪费措施也取消了。如果实施了这些计划，到 1962 年农业总产值将会在 1957 年的基础上提高 30%，或者说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翻一番。然而，公社的不稳定，人们不能或不愿执行目前的一些计划，将使产量的增长限制在 20% 以内。数年连续的坏收成使这个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①] 然而这个国家几乎肯定可以维持它的政权，并将保持工业增长，虽然比率减小。

39. 人口增长。如果目前人口继续维持大约每年 2.5% 速度增长，共产党中国的人口在 1963 年将达到 7.4 亿，比 1959 中期多 8000 万。中国共产党现今声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并且应该强调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然而，在有限的土地上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改进的生活条件仍将是这个国家一大难题。这

① 尽管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洪水可能已经造成当地严重的困难，我们仍相信它们对今年农业总产量的影响将是很轻的。

个国家在 1957 年实行了生育控制计划，这个计划虽然的”大跃进”时期被淹没了，官方的生育控制工作仍然在小规模和未公开地进行。从长远角度看，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这个国家仍将不得不恢复这项计划；不论怎样掩饰，它将会减小人口出生率。同时用加工制造品作交换来减少粮食的净出口并增加肥料的进口的任务也是非常紧迫的。

40. 外贸。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共产党中国将有可能以平均每年 10% 的增长速度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产量的全面发展步调一致。然而由于生产和计划中的困难影响共产党中国出口的水平，增长将是不平衡的。从非结盟国家的进口在 1958 年末加速了，大部分靠几近枯竭的外汇贮备支付。在 1958 年末和 1959 年的前半年，北平没能实现对于西欧的某些出口承诺，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拒绝签署进一步的外贸合同。尽管与非结盟国家的贸易在后半年会有所恢复，1959 年的对外贸易很有可能相对于 1958 年有所回落。因为与结盟国家的贸易在 1959 年有所增加，与许多结盟国家长期的贸易协定已经缔结，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模式在这一时期将有可能继续以结盟国家为主。[1] 共产党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长足地扩展贸易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投资项目的需求。矿产和轻工业产品将会逐渐代替农产品出口。

三、公社和人民

41. 人民公社计划的动机。为了实施于 1958 年制定的新的“大跃进”计划，这个国家探索到一种组织和控制形式，它既能突破集体农业的限定界限，又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能产生自己的资本并将可获得的人力资源发挥到最大效力的单位。从 1956 年开始，中国通过将合作社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而进行了零星的试验，1958 年春，一些省市中出现了这种合并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湖南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被命名为卫星人民公社，后来成为公社运动的典范。这种新组织形式的特点是:(1) 将一个乡镇里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2) 乡镇政府管理和公社管理合而为一，并被赋予在其区域内拥有从农业生产到其他任何事务的控制权；(3)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展，私有制的残余进一步减少了；(4) 儿童寄宿在公共托儿所或学校，在食堂里吃饭，从而把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劳动生产；(5) 工人们以

① 1958 年，中国与苏联的贸易额大约占其 30.8 亿的贸易总额的 40%，与欧洲及亚洲苏联的卫星国家的占 22%，与自由世界国家占 38%。1955 年以来，共产党中国从苏联的进口大于它的出口，然而这种形式从共产党中国必须压榨国内人民来获得出口的时候开始转变。1950 年 2 月，这两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协议，要求苏联在 1959 至 1967 期间提供价值 12.5 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来支持共产党中国建造 78 个新的主要工厂。而中国在同一时期有义务出口等值的商品和服务到苏联。此协定不涉及任何贷款和承诺。

军队方式编制并配置到田地及小企业中。

42. 这种尝试显然使共产党领导层确信他们至少已发现一种组织形式可充分利用全国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儿童乃至老年人，并满足“大跃进”事业的经济需求。因而，全面组建城市公社的运动在 1958 年 8 月突然开展起来。

43. 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合作社试验的探索中自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7 年的整风运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感觉到革命开始失去动力，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大的新步骤。到 1958 年年中，由“大跃进”激发的热情和乐观在意识形态复兴潮流中反映出来。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大步前进的迫切要求在公社激进的概念中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一举建成公社体系，不仅可以巩固社会主义的成就，甚至引进了一些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共产党中国将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

44. 而且，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权力集中到一个行政组织和对所有成员的军事管理极大地解决了对个人的持续监控和人身控制这个问题。公社里全民皆兵也加速了这个进程。公社共同的生活状态正在导致家庭这个唯一能够与国家和党分享忠诚的单元加速破裂。最终，公社对每个公民从小就进行关怀和监控使得对他们不断灌输思想的过程得以存在。

45. 公社制度中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分权所带来的分散性暗示可能也激励了北平，虽然这可能只是北平的次要考虑因素。中共的媒体明确指出即使战争到来新体制下的国家也是牢固的。然而，实际上，这可能是试图为他们因为其他原因而进行的计划争取更多的支持。

46. 关于公社的记录。1958 年 11 月初北平宣称 99% 的农村人口纳入到了 26500 个公社中，平均每个公社拥有 4750 个家庭。可以使用的数据表明，到这个时候，公社组织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极端是，这样的组织仅停留在纸面上，另一个极端是，作为一种高度管制的社区团体，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孩子由公社养育，衣食和其他必需品都由国家供应。然而，到了 1959 年中期，属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公社只是极少数。很多纸面上的组织至少被部分地实现了，而高级公社一些极端的特点已经按照中共 1958 年 12 月 10 日的指示做了修改。

47. 当这些公社成立到 4 个月时，他们的倡导者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了。一开始，新的形式尚未完善，旧的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结果是在管理、账目、税收、地区商业等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对农民管理的加强和对其时间的额外征用造成了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急剧减少（共产党中国认为谷物和甘薯之外的都是辅助粮食作物），

如织布、工具制造等的传统家庭副业也遭到相应损失。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也很难完成艰苦的长时间的劳作。尽管现在公社最长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允许有8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仍会要求一日18小时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计划不可避免地给政权带来很大灾难。

48. 尽管全国范围没有农民暴动的风浪，但是很明显农民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怨恨公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痛苦。许多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越境逃到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这其中很多人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且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将受到严厉的报复。写给境外亲属的信件反映了对公社生活的不满。然而，任何公然的反抗都被无情的压制住了。其他类型的反抗，如盗窃集体的生产资料和保留上交国家后返回的粮食等事件都发生了（这些事件有时还有共产党干部的参与）。但是随着国家管理机器的健全，这些行为都为禁止住了。再做这些事情就被认为是冒险了。

49. 公社计划中一个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也就是根据公社成员的"需要"分配食堂饭菜、其他物品和服务。1958年上半年粮食丰收使国家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有可能在保证最大限度的国家积累的同时可以采取公社大锅饭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在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下，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农民在总体上比以前吃得好得多的情况。但是粮食消费的略微增加就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夸张的统计数据。公社社员一开始是抱怨饭菜冷而无味，而现在开始抱怨吃不饱。1959年初很多公社关闭了食堂，"允许"农民在自己家吃饭。最近，官方发言人指出公社成员可以从公社食堂中退出。国家同样也关心起"免费供给"制度造成的革命动力的损失。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得不提醒过公社领导不要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供应公社成员，并且近来食堂饭票的发行量已经与完成工作的类型和数量相挂钩。

50.1958年12月发起的原本只有三个月的"大跃进"运动还在继续；在1959年，对公社的改革和巩固也将继续进行。很多激进的措施已经被停止了，过去农业高级社的一些措施也被重新采用。重心已经转移回奖金鼓励，允许个人经营一些副业（包括养猪），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也减少了。公社在城市推广的计划也推迟了。对民兵体制的大规模特性的强调开始减少。

51. 前景。然而，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公社的终结。高层领导人对此具有坚定而又明确的信念：公社——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方法。我们相信虽然该体制还需要完善，甚至包括一些战术上的退却，但是在农村公社会保留其基本的形式。公社的形式和实践会变得更加

标准化和制度化，而且奖金制度会进一步发展。现今，将公社联合成一个更大的公社的运动很可能继续进行。城市中的公社现在正在试验，主要在湖南省；在1963年前，一些城市公社类型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采用。

52. 在执行公社计划时，当局将面临无数的困难。在计划和管理中可能存在代价高昂的错误。无休止的奉献和廉价的回报可能引起某些农民的公然反抗，但是反抗将会遭到严厉镇压，这些反抗很少或者根本不会被公开。很多农民显然认为公开对抗公社是没有指望的，消极抵制可能才是这个政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然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必要时当局具有应变的能力，而且它会在需要的地方采取任何形式的集权压制和监控。

53. 公社计划直接牵涉到5亿人，对他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是历史上急剧变革社会的一个最大胆的尝试。尽管该计划有很多方面都会有改动，北平对该计划评价很高，不想也不能完全放弃该计划。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对政权有利，但是对人民施加的必要的和无休止的压力最多只能在民众中间造成勉强的顺从。但是这种勉强的顺从与公社要创造出“共产主义新人”的意图有很大差距。不能成功地激发人民热烈的拥护，这在将来只会导致更多的怀疑。然而，鉴于当局具备应变能力和监控能力，民众的反抗不可能达到迫使政府在血腥镇压或者放弃公社之间做出选择的地步。

四、党的问题

54. 党的领导阶层和团结。虽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之间基本上仍是团结的，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25年来的紧密团结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两年来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重要的新计划和项目上持不同的意见。这些问题包括集体化、“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性质、整风以及公社。对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及在推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时当局所能承受的冒险程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此外，在中苏关系的某些问题上，领导人的意见也不统一。

55. 毛的个性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一些党员认为毛对政策的引导是错误的、不明智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毛本人主动放弃了次要的职务，目的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党主席的职务上，投入到基本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而且，毛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明确的最高领导人继承次序。很明显，毛至高的地位没有遇到挑战。现在，他比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刘少奇还要更加引人注意，得到了更多的好评。毛还是党的首脑，我们认为他会继续在中共内保持其主导

地位。

56. 党内二号人物刘当选为国家主席可能确定了他是毛在党内领导职位的继承人。过去两年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与刘的观点相一致。与其观点相符的几个人都处在党内有影响的位置，其中突出的是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继续保持他在党内第三号人物的地位，是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联结者。

57. 如果这段被评估的时期内，毛去世或丧失了工作能力，权力可能会自然地转移给刘少奇。然而，党内可能出现分裂，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可能会下降。

58. 政党和人民。中共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避免党的革命活力低落，这种低落可能会削弱党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党必须保持这种精神以实现其目标。而且高层领导人已经从匈牙利革命的客观教训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不能允许自己脱离群众。中共已经寻求各种途径来避免产生与人民脱离的“新特权阶层”。这些途径包括党内整风，把官僚和党内积极分子大量地输入农村，送官员到部队基层服役。毛本人和其他领导人也偶尔参加体力劳动。

59. 党可能会继续展示以往的灵活性以试图与人民保持一致。然而，国家的计划使得许多群众疏远了，而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又被当局所能提供给人民的有限地物质补偿所束缚。巨大的钢铁产量的数字不能当饭吃，而且相当大比重的经济利润将不能转化成消费，可以确定的是，饥饿疲惫的民众不会对共产党有亲密的认同感。

60. 政党和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其雄伟的目标，共产党中国必须全力使用知识分子和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尽管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非马列主义者，对中共态度冷淡。这些人被任用但是并不被信任，这和当局多方努力要求他们全力支持的做法是明显矛盾的。

61. 这种需要是毛 1956—1957 年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他已明显地确信，共产党体制在中国已经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并认为更为自由的氛围将促成知识分子为这个政权提供更加热心的支持。关于这次冒险是否明智，党内很明显有相当人持怀疑态度，当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提出批评（1957 年 5 月）并开始攻击政权本身的基础时，这样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这些人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农村改造或以其他的方式被镇压。尽管共产党还继续采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名义上恢复了一些被指控为“右派”的人的地位，但是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的政策似乎只是容忍知识分子和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

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62. 共产党和少数民族。中共去年对几乎所有方面的野心勃勃的态度也反映在其对待少数民族的措施上面。不仅在西藏，同时也在甘肃、新疆、青海和云南这些省，过去一年中，这些省份零星地爆发反抗汉族统治的事件，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不满汉族的统治以及汉族对他们民族习俗和制度的摧毁。而在西藏发生的反抗，则是因为藏族高层对于政教分离政策的不满，以及由似乎威胁达赖喇嘛地位的事件所点燃。中共的强硬反应起因于西藏对他的直接威胁，这几乎确切地反映了北平对于共产党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关心。

63. 共产党从根本上调整它的高压政策是不可能的，虽然它可能根据当地的形势予以调整。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样也不可能减少，虽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抵抗力量未必会有完备的领导、组织、武器和食物供给，以使他们的活动能超出打游击战的范围。在西藏，中共无疑试图摧毁达赖喇嘛的西藏领袖的地位，这是由于他坚持了西藏独立的愿望。中共尝试维持西藏的自治和宗教自由，但是却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试图尽快使西藏成为共产党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4. 中共和军队。党和军队的关系总体上是紧密的。1958 年林彪元帅被提升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六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尽管如此，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职业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党和军队之间一向团结的关系带来分裂性影响。1957 年秋到 1958 年秋，北平电台和报纸上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批评了“军队中的一些人”，这些人持有“军事绝对化的观点”。党对军队完全领导的观点被重新强烈强调，“分裂分子”也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认为现代战争具有“突发性和复杂性”，军事力量中的党军双重模式会让军队力量很危险而且没有效率，或者他们过分重视现代武器的作用，忽视了战争中“人民的作用”。对这些人教育的措施包括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计划和颁布法令让官员定期到部队基层进行短期服役。这样党和军队的矛盾可能不会很尖锐。但是创建一个职业的、高素质的、像过去一样完全听命于党控制的军队的尝试，有时很可能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肖瑜译 陈丹、沈志华校）

发表于《国际冷战史研究》第 1 辑（2004 年冬季号）

关于中苏两党分歧的俄国档案

1958 年 7 月，毛泽东对苏联提出的长波电台问题和“共同舰队”问题表示出强烈不满，赫鲁晓夫立即秘密访华，试图消除分歧。然而，从 1958 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却不断显露出来，前者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后者主要表现在 1958 年炮击金门和 1959 年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上。1959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中苏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和辩论。随后，双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各自政策取向出发，表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在 1960 年 6 月的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中苏两党代表之间出现了正面冲突，他们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在愤怒之余做出决定，立即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从而迈出了中苏国家关系破裂的第一步。

这里刊出的有关上述内容的部分俄国俄国解密档案中译文，节选自沈志华、李丹慧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即将出版)，原文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1-15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

文件 01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备忘录

（1958年1月10日）

在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我提出请求，想同中国国务院某位负责同志就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赞同我的想法，建议同薄一波副总理谈一谈。

在1月10日举行的会谈过程中，薄一波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1957年经济建设总结，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会谈一开始，薄一波指出，1957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工业、农业、基本建设、外贸和内贸等领域所规定的许多任务都超额完成了。薄一波说，1957年初，规定工业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4.8%；实际上到年底增长9%。钢、生铁、轧材的生产指标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比如，1957年的轨钢生产比原先计划的多生产58万吨。1957年初，计划生产棉纱440万件（根据1957年计划，棉纱生产数额为463.5万件。看来，薄一波所说的计划是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实际达到465万件，即比规定的指标多生产25万件。计划采煤增加到1.1亿吨，实际达到1.2亿吨，即比计划规定的多采1000万吨。木材生产比原先规定的指标多出90万立方米。由于许多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年度计划，薄一波说，不少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957年的工业计划指标是不是定低了，这是否是保守的表现。所以，薄一波指出，《人民日报》于今年1月6日发表社论，号召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薄一波说，这一号召，意在反对领导经济工作中的保守主义。

鉴于我插话说，超额完成计划总比完不成好，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对此开玩笑说，如果说订1957年计划时犯了右倾错误，那么这一右倾给我们带来了高兴，让我们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所以可以称他们“愉快的”右倾。

谈到新的企业投产和现有生产能力的使用情况时，薄一波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报刊已经报道，到1957年底，将有450个项目交付使用，其中57个在苏联帮助援建的156个项目里。薄一波说，实际上，交付使用的项目数字要比报道的数字大。

薄一波说，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已建成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能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长春汽车制造厂现在每年可生产3万台

汽车，而如果再增添一些设备，便可生产 4—5 万辆。但去年工厂仅生产汽车 8000 台，1958 年计划生产 1.3 万台。谈到工厂生产能力吃不饱的问题时，薄一波说，原因之一是原料不足，其中包括优质钢；另一个原因是工厂生产的汽车没有充足的销售市场。长春汽车制造厂只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解放”（吉斯 -151）……[1] 必须改造这些企业让他们能生产几种产品。其他人认为，在进行这种改造的条件下，新企业的现代化设备将得不到充足的运用。此外，企业的类似改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规模的某种下降。例如，如果长春汽车厂现在每年能生产 5 万台汽车，那么经过改造生产 4—5 种类型的汽车之后，汽车生产数量自然要减少。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问题，薄一波说，现在正在认真研究，但如何解决，现在还未彻底定下来。

谈到农业形势，薄一波指出，今年收成可望达到中等水平。1957 年粮食收成为 1.85 亿吨（不包含大豆），即比 1956 年略有增加。棉花丰收，达到 3280 万担（164 万吨）。1957 年初，薄一波说，预计中国棉花不够，必须请求苏联援助；但现在由于棉花丰收，靠自己的力量也可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大豆收成也很好。

薄一波指出，1957 年全国农业严重遭灾。中国北方各省旱灾损失严重。由于去年农民增产不大，某些同志问，薄一波说，在领导农业生产问题上，1957 年初是否有保守主义倾向，不过到年底，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生产高潮，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薄一波说，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也超额完成了。原计划是 111 个亿，结果完成 120 个亿。这也给某些同志以理由，说 1957 年初在确定基本投资计划指标时过于谨慎，容忍了保守主义倾向。

1957 年计划预算收入达到 294 亿元，实际收入超过 307 亿元。与此同时，预算支出缩小了。年初预计，企业原料供应和日用品市场将很紧张。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到年底，原材料和商品还有某些剩余。在确定零售贸易额计划指标时，其出发点是保障 473 亿元的商品，实际上所需商品比这要低。在 1957 年计划中，确定零售贸易额（包括服务）为 473 亿元。据掌握的材料，实际完成 477 亿元。而且，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减少和其他一些措施，对保障商品的需求有所减少。结果到 1957 年底，仓库所存商品的价值将近增加了 2.8 亿元。

所有这一切，薄一波强调，说明国家生活是稳定的，运行正常。1956 年，生

---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一页字迹不清。

产发展很快，但到1956年底发现，由于某些部门发展过猛，导致某些货物和物资供应紧张。1957年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做了某些相应的调整。这些部门的生产发展指标定得有些低。但在执行1957年计划过程中发现，年初所定某些指标过低，于是在1957年4月对计划做了某些校正。但总的来看，薄一波指出，可以说1957年是明显的经济建设喘息的一年。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指出了1958年经济发展速度有提高的可能性。

在回答我1957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问题时，薄一波说，1957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在1956年的水平上，只比1957年计划的提高了2.2%。1957年的成本降低4%。195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原因是，1956年工业企业招收了大批新工人。他们的劳动效率很低。他们许多人工作量不足。

现在全国工人和职工有2400万人；其中生产工人1300万，机关职工（包括国家机关）1100万人。1300万工人中有400万人，1100万职工中有300万人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企业和机关中有富余人员700多万。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也不合理。例如，在工业企业中，车间管理干部占35%—40%，而真正工人才60%—65%。很明显，薄一波说，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过大。对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薄一波说，这方面问题进展还很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没解决。这方面口头上讲得很多，薄一波说，但实际上做得很少。企业里许多领导干部还有干部国家保障制度的余毒，还有所谓“供给制”观点。众所周知，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在于，干部不必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保障，但对他们也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更好地工作。所以，薄一波说，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工作不工作，反正是二斤半小米。正是不少干部对事情的这种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实行核算制的困难。一直到目前，薄一波说，企业还是将全部利润交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银行那里领取必要的资金，其数量同企业利润无关。这样，对他们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多交利润。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没有经济核算制度，薄一波说，中共中央提出了励行节约的口号和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这一方针目前包括以下基本措施：

一、从1957年起，派干部和国家机关职员参加生产，主要是去农村。计划最近派200万名行政干部和职员去农村工作。这方面，薄一波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派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生产问题。计划学生毕业之后将被派往企业和农村进行3年劳动锻炼。机关干部也将分批到农村工作2年。例如外交部，薄一波说，已派往农村一批干部。干部和学生下乡运动已收到好的结果。这一措施

改变着干部和学生对体力劳动和农村工作的态度。此外，城市干部下乡阻止了农民涌入城市，农民看到，城里人已到他们农村来，这就打消了他们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念头。对招收劳动力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工厂未经中央批准无权招工。

二、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二项成果措施是整顿企业的工作作风。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在工人和职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基础上，对企业行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监督。这种群众监督，薄一波说，还将促进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企业整风运动是从1957年8月份开始的，比机关学校开始得晚。薄一波指出，某些工作人员害怕企业开展鸣放运动，认为这将引起工人间的混乱。但实践证明，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风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整个气氛的健康，对经营工作干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过去，许多工厂经理独断专横，浪费严重，违犯纪律，无所顾忌。现在他们最怕通过“大字报”以及通过《人民日报》批评自己。来自下面的批评帮助揭露和纠正了企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总的来说，整风运动和整风过程中广泛发表意见，薄一波说，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和超额完成计划，促进了节约制度的贯彻执行。

大鸣大放运动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形势，而且改善了国家机关和党内的形势。在这一批评过程中查清了一些在日常系统学习中很难搞清的问题。例如，在浙江省党组织中揭露出了一些敌对分子，其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汉。广东省揭露出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在被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是省委书记，他们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甘肃省在整风运动中揭露出了一些钻进党内的奸细，其中一个是中共省委的书记之一。利用一般的方法，薄一波说，不能在短期内办成如此重要的事情。正是群众运动，让所有人开始讲话，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这种状况，才使有可能完成类似的任务。所以，薄一波补充道，毛泽东主席说：“必须一年一次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立的统一。”政治司法机关也揭露出了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

1958年3月，薄一波说，将召开中共八届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是讨论整风运动的总结，还可能讨论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

三、实现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三项重要措施是目前开展的反对浪费运动。由于企业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中共中央打算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上海“梅林”罐头厂浪费的事实，实际上这是全国广泛开展反浪费运动的开始。

最后，改善企业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完善工业管理结构。扩大地方政权机关对工业、商业和财政企业的管理权限，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薄一波指

出："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研究苏联工业管理改革的经验。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薄一波强调，因为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最后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管理系统上。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中国企业工资等级和劳动工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方面也有不少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是采用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但劳动定额和劳动工资上还有不少缺陷。生产定额很低，工人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在鞍山，现有标准规定，6级工资每月90元。但实际上，由于劳动定额低，许多工人工资达到180元。

许多工人仅用两个半小时便完成所规定的定额，剩下的时间为获得奖金而劳动。平均奖金占工人工资的25%，在个别企业，如电力和冶金，则占到35%。现有定额是2—3年前规定，已经过时，必须重新考虑。但这是一种非常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涉及广大工人的物质利益。增加工资很容易，薄一波指出，但要降低则很困难。行政机关企图提高劳动定额，但遇到了工会组织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指出，国家和工会之间存在矛盾。

这样，薄一波继续说，我们在组织劳动方面，碰到了一下几个主要问题：(一)生产定额定得低，必须重新审定；(二)企业里有一大批多余的工人和职工，但国家不能解雇他们，必须给他们发工资；最后，(三)在工人劳保和其他生活补充保障方面有许多过分的东西，与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符。

然后薄一波回答了有关公私合营的形势方面的问题。1956年上半年，薄一波说，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已全部完成。虽然形式上合营企业是独立的一块，但实际上他们已同国营企业没有区别。他们同一般国营企业的区别仅在于：(一)在某些公私合营企业里，还有资本家担任副经理或工程师，如果他们有技术素养；(二)作为他们交给国家生产资料的"赎金"，领取国家5%的保证金。在合营之前，私人企业设备的总价值，薄一波说，约为22亿元。从1949年到1955年底，按利润的形式获得18亿元。预计，到1962年底，作为利息，每年将给他们支付1.2亿元，7年共计8.4亿元。这样，从1949年到1962年，资本家将获得"赎金"近21.4亿元，即给他们几乎支付了他们企业的全部价值。[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薄一波说，国家彻底实行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赎买"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较好的结果，因为国家支付给资本家的资金得到了补

① 原文如此，疑计算有误。

偿——生产没有受到损失。此外，资本家毕竟主要靠工资生活，即主要靠定息生活（他们购买了国债券）。保证定息，薄一波说，这仅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尾巴”，它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

但是，尽管私人企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薄一波继续说，国内还存在黑市和投机倒把。一些城市，尤其是上海，许多日用品短缺，奸商们组织了非法的私人企业（大部分都很小），生产短缺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同时，奸商们钻国家经济计划缺点的空子。国家计划自然不能考虑到所有细节，薄一波说，国家计划有时太死，不灵活。国家计划中的空白给了奸商们以可乘之机。例如，国营裁缝铺只能制作3—4个型号的服装，而私人可做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服装，自然价格高。居民餐具的供应也存在这种状况。黑市上短缺商品价格高，但居民还是买。

国家机关不急于取缔非法企业和二类商品奸商。同时，薄一波指出，奸商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帮助国家机关揭露和纠正计划中的缺点。奸商们使国家机关明白，哪些商品不足，这样在以后作计划时好做出纠正。在这方面，薄一波风趣地指出，可把奸商看成是国家贸易机关的一种特别老师。

1956年底和1957年初，薄一波继续说，国家允许有自由市场，这时自由市场开始发展。一些城市专门划出地方允许自由买卖花生、猪肉、蔬菜这类商品。但实践表明，自由市场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国家定购任务难以完成。由于自由市场的发展，国家贸易机关开始难于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因为农民都想以高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自由市场导致总的物价上升了2.8%。这一切表明，必须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监督，限制它的发展。

在转到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话题上来时，薄一波说，国务院已批准1958年的经济计划，1月25日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今年还将大体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但批准这一草案只能等来年开人大会议时。考虑到1957年某些经济计划指标定得有些低，薄一波说，今年我们打算提高相应部门的计划指标。至于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计划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5%。钢产量增加到600万吨。煤产量增加到1.5亿吨。1958年的经济计划草案，薄一波指出，已在各部代表会议上详细讨论过，他们都同意所提出的指标。

谈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薄一波说，1958年计划征购粮食3900亿斤，即1.96亿吨；棉花8500万担；生猪1.5亿头。农村现在出现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农民积极兴修水利，大搞积肥。例如，仅安徽一个省，由于广泛动员农民群众，1957年底

已完成土方1.6亿方。中国劳力非常便宜，薄一波继续说，例如，雇佣农民干这些工作，挖一方土仅支付0.5元。这样，完成1.6亿方仅需8亿元。这不算贵，薄一波指出。此外，农村兴修水利基本工作，薄一波强调指出，主要是靠合作社的力量；国家只要给合作社不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为1958年获得好收成奠定了基础。

不久前，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全国时参观了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高农业生产的途径问题同农民和地方党的干部举行了座谈。

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7年增加近10%，达到335亿元。所以，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到140亿元（1957年为120亿元）。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820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485亿元），即每年投资增长13%—1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财政收入为136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加560亿元，达到192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1958年和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重工业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企业的建设中，中国还将依靠苏联的帮助。至于普通机器、车床、石油设备、化学品生产的调整，相应企业的建设，薄一波说，我们试图自己建设。

谈到中国的外贸，薄一波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得不够积极，他本人对此也不满意。1958年出口总额与1957年持平，达到54亿元。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薄一波说，发展顺利，我们甚至出现了外汇剩余。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外汇则不足。苏联给中国以巨大的援助，为我们提供成套的设备。当然，薄一波强调，我们努力做到在同苏联的贸易中进出口平衡，但现在中国是苏联的债务人。据不久前所作的初步统计，到1958年1月1日，中国欠苏联3亿—4亿元。1958年中国未必能偿清这一债款。薄一波同时指出，不久前他已同中国外贸部的工作人员们商量过，苏联需要什么货物，中国能供应什么。

苏联贸易代表И.А.叶廖明问中国外贸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展，薄一波同志回答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加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将放缓。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将增加矿产和有色金属的出口。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东南亚国家，将扩大机器出口。薄一波预先声明，他记不清所拟定发展出口的准确数字，到1962年，出口大致增加到85亿—90亿元，1957年出口额为55亿元，即增加60%—70%。

至于国内贸易，薄一波说，有充分的根据指望，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将是稳定的，供应基本上能满足需求。国家贸易组织手里有大批商品储备。收

购的粮食，国家现在手里还有 870 亿斤（4350 万吨）。1958 年将大大改善棉纱供应。如，1957 年生产棉纱 460 万件，计划 1958 年将增加到 526 万件。

1958 年企业和国家机关将召收 70 万新的工人和职工，但工人和职工总数没有大的增加，因为有许多机关职工将下放农村劳动。1958 年工资总额将比 1957 年增加 5.4 亿元，达到 158 亿元。在工人职员数量没有大的增加而工资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工资总额有了增加，其原因是，下放农村劳动的国家干部在一定的时间里还将从国家基金中领取工资。计划规定，与 1957 年相比，1958 年劳动生产力提高 2.5%—3%，而产品成本下降 4%。

这就是 1958 年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安排，薄一波说。

在计划国家经济发展时，薄一波继续说，1958 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特别注意工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比例，注意工业材料部门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精力放到了工业的发展上，而对农业关心不够。现在，在考虑新的需求和必须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规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以对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将有所变化。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占总投资的 9%，那么 1958 年这一比重将达到 12.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的投资比例是 7 比 1，而 1958 年将调整为 5 比 1。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几年显出来：煤炭、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工业原材料的投入将有所增长。

在结束谈话时，薄一波再次强调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薄一波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中国也可援助其他国家，因为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非常巨大。但是现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得依靠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须学习苏联的口号，薄一波强调说，这意味着不是从形式上，而是真诚地深刻地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对于中共来说，不仅要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研究苏联出现的错误出偏差和教训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苏联的经验可帮助中国人民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少出偏差和不走弯路。现在，薄一波继续说，苏共给苏联人民提出了在生产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号召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生产水平上超过英国而奋斗。这一号召，薄一波说，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动员意义。

我们两国的合作一年比一年紧密。薄一波强调说。他指出，他不是外交人员，

但他经常同苏联同志们见面，他可以说，中苏工作人员的关系一年比一年好。任何力量也不能离间我们，薄一波强调说。这不仅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同所有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关。继续改善我们的关系不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前几年不好。我们的关系以前也很好，薄一波强调；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更懂得苏联，更理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应该说，薄一波指出，以前中国某些同志不太理解苏共的措施。例如，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立刻理解 1956—1957 年苏共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内部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谴责。一部分中共党员怀疑这些措施的是否适宜。一些共产党员尽管知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错误行动，但还是说，对待这一集团成员过分粗暴，不该在报上公开此事和公开点名。薄一波同时强调，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考虑到部分党员中存在着类似的不健康情绪，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使全体中共党员对苏共中央的措施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共经常在群众中做这种教育工作，薄一波说，解释加强中苏友谊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我们两国的团结和联盟——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对薄一波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给我们做了内容充实的谈话。我说，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感到高兴。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某些比例失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发展中的困难。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在扩大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我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干部顺利地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同时我祝中国朋友们在进一步掌握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劳动经济等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营范围方面取得成绩。

会谈进行近 4 个小时。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 И.А. 叶廖明；使馆参赞 К.А. 克鲁季科夫，Н.Г. 苏达利科夫，Б.Н. 魏列夏金；副经济参赞 Н.П. 布瑟金等同志。会谈翻译是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和使馆随员 Р.Ш. 库达舍夫。会谈记录是使馆二秘 А.В. 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20-38

文件 02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4 月 5 日）

我在武汉毛泽东的临时住所拜会了他，目的是向他递交苏共中央今年 4 月 3 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周恩来参加了会谈。

我问他感觉身体如何，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他无大病，但是感觉不太好，老毛病常犯。毛泽东承认，他非常忙，感到很疲乏，而这引起了各种疾病。

我说，我受委托想再谈谈南斯拉夫问题，并亲自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回答说，他还未看到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译文，并问我是否读过了这一文件。我做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毛泽东请我首先详细叙述一下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我对这些原则的意见。我大约用了 40 分钟向毛泽东讲述了南斯拉夫新纲领最主要的原则。

在听取对苏共中央信的翻译和我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通报时，毛泽东时常插话和发表简短看法，表示对纲领中某些论断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鉴于南共联盟纲领中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很明显，铁托认为，他可以肆意对待苏共和苏联。毛泽东说，铁托甚至喜欢使拌子："杜勒斯开始这么做，而铁托紧随其后。"

涉及纲领中攻击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毛泽东微笑地指出，南斯拉夫人"看来发现了苏联有某种剥削者：似乎出现了剥削阶级，新资产阶级"。这涉及的正是南斯拉夫自身，毛泽东这时指出，据我们（中国）同志的观察，他们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独裁，权利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

谈到南斯拉夫歪曲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嘲讽地说，按照铁托的意见，战胜希特勒原来是用不正确的方法夺取胜利的：本不应该使用武力，而应代之以哲学讨论或向希特勒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指出，应为苏联政府和苏共在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范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至于我们中国人，毛泽东说，我们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当时未把中国放入"社会主义范围"。"当时还指望蒋介石，所以达成了协议：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而斯大林说服我们。"

在自己的纲领中，毛泽东继续说，铁托攻击苏联在东欧国家的作用。坚持这种思想，看来对于铁托来说，倘若东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件快事。因为没

有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强调，东欧国家现在就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了。我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忍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因为它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存在。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没有苏联的帮助，南斯拉夫则不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军队解放的。

我说，按照南斯拉夫人的意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应包括两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时毛泽东立即指出，还必须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共产党的统一和相互援助。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人企图阉割和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感到气愤。

我说南斯拉夫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属于这些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微笑着指出，共产党会议宣言可以高出我们这些国家的立法文件。"因为法律，"毛泽东解释说："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里有效，而我们这些党发表的宣言通常是宣布长期有效的原则。"

谈到南斯拉夫指责苏共是"霸权主义"，毛泽东强调说，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自己所追求的正是对于其他党的"霸权"。比如，假如说在某种程度上铁托有可能领导匈牙利人的话，那末决定匈牙利事情的将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南斯拉夫人了。因为众所周知，铁托曾干预匈牙利事件：他想支持纳吉。为了讨论纳吉的问题，毛泽东说，不久前铁托曾会见卡达尔。

我向毛泽东引述了南共纲领中间接驳斥莫斯科声明的一段话。于是毛泽东轻蔑地指出，"铁托根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国际大会：他也积极主张召开高层次的会议，他也不反对参加这种会议。"毛泽东继续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实现这些决定，这是各兄弟党自身的事。

我提请注意南斯拉夫人断然批评各兄弟党的活动。同时我引述了纲领草案里的一段相应文字。毛泽东指出，虽然南斯拉夫人没说是哪些具体的党，但十分清楚，他们所指的是谁。毛泽东认为，南斯拉夫人指的是法国、英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很可能，"毛泽东指出："南斯拉夫人不想把这些批评加在意大利党的身上。"

我说，纲领草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党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南斯拉夫人认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借助工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毛泽东指出，铁托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积极活动的、时刻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明显，铁托主张资产阶级政党可以继续存在，而共产党不行。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同资产阶级活动家接近。例如在美

国，只存在一个不大的共产党，而美国资本家已很讨厌它。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迫害它。现在铁托说，没有共产党也行。

当我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真空”的论断时，毛泽东笑了，他说，“可怜的铁托必须好好学习。”“原来，”毛泽东补充说：“不仅阿拉伯人那里出现了真空，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也有。”

毛泽东非常赞成苏共中央的信中的结论部分，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然后说，关于南共纲领草案和如何对南斯拉夫这一步做出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 4 月 5 日和 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接着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人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

毛泽东说：“在中国支持铁托的只有右派。”毛泽东说：“当时我们公布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结果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快查明了我们这里的许多右派分子，他们赞成铁托的口号。”毛泽东通报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正在这里积极地做工作。例如，它给中国各地右派分子写给大使馆的信一一做答复。我们在四川、黑龙江和其他省份发现了大使馆给右派分子的回信。”“您知道，右派分子现在在中国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看来，在我们中国，铁托只在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有影响。”

在翻译完苏共中央的信之后，毛泽东立即问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暂时我还不掌握这方面的消息。这时毛泽东说，根据他的看法，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11 个党一定不会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看来，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会派自己的代表去。也不排除，波兰人也不往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自己的代表团。据我看，在许多问题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我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毛泽东附带地说。他提起，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的是否定的立场。只是在辩论和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们才投票赞成会议宣言。在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如果波兰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引起不满和许多批评意见——毛泽东强调说。而且波兰领导人这一步将给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多困难。

重大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说，任何时间也轻视不得和掩盖不得。这时毛泽东引

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纸里包不住火。"如果波兰人想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那就让他们去好了。我指出，谁也没禁止波兰人往南斯拉夫派代表团。毛泽东补充说，波兰同志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切。

毛泽东说，我们总是把类似不愉快的事件看成是对我们共同前进有益的事。他说，我们不仅需要用阐述正确的或对我们友好的思想的文件教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够的。为了教育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利用我们敌人的行动，还需要揭露他们敌对的思想。

所以，南斯拉夫人现在的行动对我们来说还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接着说。在他们的纲领中，集中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各个时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表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这一行动迫使各兄弟党认真考虑和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面前和其余所有共产党的面前，就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困难的位置上。

出去同北京通完电话的周恩来回到屋里报告毛泽东，说刘少奇今天白天报告：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会议赞成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同意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向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还通报说，北京认为4月5日不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委员还未来得及读南共纲领的译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过一天，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拟好草稿之后，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对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请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毛泽东说，请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在类似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表明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他补充说，虽然我还未亲自读完南斯拉夫纲领，但我完全相信对我所说的关于纲领的看法。"对于我们，"毛泽东微笑着说："谈到关于铁托的意见，一切都是明白的。中国有句俚语，叫做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在谈话过程中我谈到《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判南斯拉夫纲领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声明说，对南斯拉夫人的类似行动，可以而且必须给予回应。

周恩来指出，苏联大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指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当年也是苏共二十大的观察员。

南斯拉夫人，当然会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友好，毛泽东说。他们会说，南共曾派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中共的八大。当然，他们还

会说，中国人这样做是受了苏联同志们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毛泽东说，都吓不倒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在纲领草案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南共的代表大会。我们自己常说，由于我代表团应在大会上发言，多多少少得对南斯拉夫拉夫人说些褒奖的话。然而我们类似的发言会使南共队伍中许多人、南斯拉夫得居民以及其他国家误入迷津。这些人会认为，实际上我们几乎赞成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南共七大上的发言可能对南共领导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毛泽东总结说："铁托以他的纲领，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迷惑。"

周恩来问我，苏共中央是否给南共七大发贺词。我回答我不知道此事。毛泽东说，即使苏共中央发，我们不想发贺词。毛泽东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驻南大使伍修权可能被任命为大会观察员。

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我们共同决定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强调说，各兄弟党有完全充足的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毛泽东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已完全弄清这件事了。

毛泽东说，从整个情况看来，从1948年起，尤其是苏南关系正常化之后，南斯拉夫人早就想不使两党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强调说："很明显，他们想把关系发展限定在国家范围里，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行动自由，争取时间。"

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主张采取措施，使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南斯拉夫现在走上我们所期盼的道路，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那当然很好。但现在的事实说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走这条路。第一个最能表明他们真正立场的事实，就是他们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南共纲领草案。我说南斯拉夫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没有全文发表莫斯科宣言。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害怕那些原则使他们原形毕露。

现在南斯拉夫人，毛泽东说，非常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铁托的新纲领大概很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高兴。"我指出，美国人对这一文件已做出积极的评价。

毛泽东说，铁托的新纲领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很害怕。南斯拉夫人明显害怕原子战争，想站在这一战争之外。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大的亚非国家集团的思想，这一集团处在……南斯拉夫的思想领导之下。[1] 他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

们把自己宣布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反对者，想以此逃避原子战争。必须指出，毛泽东说，铁托的计划在亚非国家中没有引起任何兴趣。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领袖，如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等。

毛泽东说，南斯拉夫人当然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能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但是，毛泽东指出："铁托知道，他的市场不大：他的'思想'只能在兄弟党中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找到需求。"

铁托的新纲领，毛泽东重复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对我们大家也是有益的，即它迫使兄弟党更多地考虑反击修正主义。我说，铁托的这一纲领，在集中表现当代修正主义思想方面起着当年伯恩施坦言论的作用。然后，会谈中，毛泽东又几次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南斯拉夫人类似伯恩施坦，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

我指出，南斯拉夫人制定自己的纲领，看来是想以此博得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赞许。南共邀请这些党派观察员出席七大。我还讲了英国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社会党人拒绝了南斯拉夫的邀请。于是，毛泽东说，对于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南共的纲领草案显得太左了：其中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铁托，"毛泽东强调说："大概不会放弃这些词句。只有靠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词句。铁托才可以站住脚。而且十分清楚，铁托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从整个事情来看，毛泽东指出，杜勒斯将有利可图。顺便指出，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杜勒斯是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比工党强；铁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看来对杜勒斯没有什么影响。"

我指出，南共七大可能不会有外宾参加，到时铁托将彻底孤立了。对此毛泽东说，某些集团还是要支持南斯拉夫人。这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说，许多修正主义分子不会放弃支持任何反对我们和你们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起，我们当时把赫鲁晓夫和铁托率领的苏共和南共代表团所进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情况通报给了中共中央。我同时指出了双方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秘密公报中所规定的义务。我强调指出，现在南斯拉夫人完全违反了这些义务。对此毛泽东指出，铁托不只一次表现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周恩来插话说："铁托简直是一个流氓。"

然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南关系。他说，我们一直支持 1948 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决定，但我们不同意 1949 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它把我们大家都置于被动

的地位，铁托至今还经常提起这一决定。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南斯拉夫。斯大林死后，众所周知，我们都积极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同南斯拉夫有一个好的关系，但铁托仍和以前一样。他曾两次要手腕反对我们：一次是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再就是现在这次。他要这些手腕目的是一个：出口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道，南斯拉夫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当时通知苏联驻华使馆。说我们不准备接受南斯拉夫人的承认，但也不公开拒绝。如果中国同意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就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是有分寸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布，现在继续宣布，它准备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时自己也说，南斯拉夫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毛泽东，当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可以把南斯拉夫归入热爱自由的国家。

在 1955 年之前，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打破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的梦想——毛泽东说。

谈到目前的中南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开始反右斗争很使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感到沮丧。毛泽东强调说："因为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右派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至于我们现在全国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奋发建国以及诸如'大字报'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这一切都没使南斯拉夫人高兴，而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毛泽东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盼望中国政府邀请铁托来作客。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次南斯拉夫人向中国同志暗示铁托有访问中国的打算。但是我们，毛泽东说，拒绝邀请，现在对他来访也不感兴趣。铁托访问中国，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我们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托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出了邀请。不久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也邀请了铁托。当然，铁托很难实现承诺，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没邀请他到这里来。毛泽东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南斯拉夫人讲，我们不喜欢铁托来访，但也不表示我们想在身边看见他。

在和我道别时，毛泽东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问候，他再次祝贺赫鲁晓夫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毛泽东说，任命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

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

我简要地介绍了苏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说，他毫无动摇地赞成这一决定。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88-100

文件 03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7 月 31 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1958 年 7 月 31 日，怀仁堂。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他说，两党领导层有效的合作，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毛泽东：不必做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测，可以讲，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一万年。

赫鲁晓夫：就这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合作 9999 年，以便同意在下一个一万年再进行合作。

毛泽东：然而，我们还有某些意见分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种分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假如我们用十个指头来比较，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九个指头，分歧只是一个指头。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因此可以签订一个一万年的协议。他建议会谈转到共同关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接到尤金同您会谈的报告。根据报告判断，其中有许多“复杂

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您谈一谈，这样一切都会得到澄清。

毛泽东：好的。

赫鲁晓夫：根据同您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我将不详细讲述我们看法相同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局势的问题、对中东事件的评价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我们也同意您的说法，即我们之间不存在产生不同观点的问题。对贵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对我们取得成就，你们也同样感到高兴。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我将谈到我们双方突然发现的问题，那就是有关建立海军的问题。您说您一夜没有睡觉，当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由于这件事首先是我同尤金谈的，他当时也仅仅是接受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指示，因此首先就我所知，我们没有人有您和您的同志们所产生的那种理解。对联合舰队的想法，我们简直是一无所知。您了解我的观点，当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反对合营。在菠萝罐头工厂的所有权问题上，我就反对他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我现在强调这一点，即斯大林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是因为斯大林并非愚蠢到不能理解这一点。然而，那是他头脑硬化的开始。

毛泽东：我也经常引用这些例子，我一直说，是赫鲁晓夫取消了这个权力。

赫鲁晓夫：我是政治局中直言不讳地向斯大林讲不要就特许权问题向毛泽东发电报的成员之一，因为作为原则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当时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我现在已经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在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立即提出取消合作社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这种东西了。

毛泽东：过去还有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东北。

赫鲁晓夫：那里不正常的状况也消除了。

毛泽东：按照中苏协议，那里还禁止第三国的公民居住。您也清除了这些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是的。因为它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毛泽东：我完全同意。

赫鲁晓夫：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芬兰，我们也取消了军事基地。

毛泽东：您个人还取消了旅大的基地。

赫鲁晓夫：不可能有其他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样做甚至更为正

确。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特权也只能带来伤害。我们取消了在奥地利的合营，我们把它们卖给了奥地利政府。这一行为产生了成效。否则，那里将一直会有同奥地利政府产生不断冲突的根源。当我们接待奥地利代表团时，我们举行了友好的会谈。在早些时候，我们还不可能举行这样的会谈。我们同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极为明确。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在我们的条约中不存在损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或包含侵犯我们援助的独立国家的单独条款。这样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由于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而不强加政治条件，我们就赢得了这些国家的人心。已经向叙利亚、埃及、印度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援助。最近我们同意与阿根廷签订协议。这将影响拉美人民的思想，特别是阿根廷人民的思想。我们同意向它们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石油工业设备。我们这一行动是针对美国的，这样南美洲就不会感到必须完全依赖美国，他们能够找到出路。

毛泽东：这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可能会用您同尤金会谈时所讲的那种方式对待你们？（开玩笑地）现在我要发起一场进攻了。

毛泽东：那么请解释一下，什么是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谈这个问题使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大使不在场。我给他指示，同他单独谈话，然后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谈这个问题。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担心他误解我的意思，我就问他：

“你清楚这个问题了？”他说：“清楚了。”但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告诉您我对他讲的核心的东西。

毛泽东：真的是这样吗？

赫鲁晓夫：就我所知，他对问题的理解，如同月亮离地球一样遥远。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同尤金没有关系。

有关建立舰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我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让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退休，让他退出现役，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海军建设 10 年计划，那么我们将以既没有海军也没有金钱而告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要求商谈援建海军的信件时，我们感到难以回答的原因。

毛泽东询问有关这一计划的费用问题。

赫鲁晓夫做了回答。

你们要求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一艘航空母舰非常昂贵，而建造港口以及舰队停泊的地点也同样花费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加以拒绝。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按照军事技术已经变化的形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军学说的批评。

1956 年，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一次海军会议，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朱可夫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海军呈送了一份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的报告。提出这份报告后，他们都应该被扫地出门，不仅是扫出海军，而且是扫出军队。

您可能还记得，当 1954 年 10 月我们从你们这里返回的时候，我们通过旅大绕道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到克摩索摩尔斯克。我们乘一艘巡洋舰进行航行，途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演习。库兹涅佐夫元帅陪同我们。在演习中，我们的潜水艇和鱼雷艇攻击巡洋舰。鱼雷艇上没有一颗鱼雷击中巡洋舰。潜水艇只有一个击中目标。我们想，假如海军处于这样的备战状态，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海军力量。这是我们采取审慎态度的起因。演习之后，我们命令库兹涅佐夫起草一份报告，并准备一个计划。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的计划没有被接受。他变得愤慨和无理起来，责问："什么时候中央才能对海军采取正确的立场？"然后我们之间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将库兹涅佐夫赶出海军。在斯大林时期，我们建造了许多巡洋舰。我在伦敦逗留期间甚至建议艾登买一艘巡洋舰。今天，人们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感到迷惑不解。您还能记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吗？不能。海军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被毁灭。美国和日本都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日本是靠飞机给美国带来沉重打击的，美国同样是在飞机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海军的。问题是应该把钱投向什么地方。当我们接到你们的信件时，我们开始考虑派军事人员到中国去；然而他们在海军建设方面还没有一致的观点。我们已经三次讨论这个问题了，最近一次决定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呈交他们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停止建造巡洋舰。炮塔已经建造完毕，但还是把它们扔进熔化炉。它们所含的金子还有价值。我们还有几艘在船坞建造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分成两派：一些人说，将它们扔掉；其他一些人说，我们应当建成它们，然后停止建造。在我回去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海军人士也分为两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停止建造，钱就白白花掉；完成它们，将需要更多的开支。在战争中将不需要这些军舰。在我前去度假之前，马利诺夫斯基请求我研究这个问题。在国防军事委员会上，我反对完成建造巡洋舰，但并

不是决定性的。马利诺夫斯基劝诱我，我决定支持他。我们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许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明确反对停止建造。当时我们决定推迟决定这一问题，直到马利诺夫斯基休假回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到时我们将决定将它们扔进熔化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军界将会同你们进行什么样的磋商呢？因而，我们对自己讲，我们必须同可以负责的中国同志一起，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依靠军方，因为他们自己都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想同你们一起讨论，在海军建设方面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例如，今天我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什么观点，或海军司令部司令有什么观点。如果我们派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就不能说他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们的，还是他自己的。因此，我们想同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同军人和文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不想强加我们的观点，将来也不会；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海军这个问题上，你们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是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火箭的存在，由于巡洋舰有限的火力，谁还需要它？我在伦敦时告诉艾登，他们的巡洋舰只不过是漂浮的钢铁棺材。

海军建设的问题非常复杂。军方会问：那么美国为什么继续建造海军？我相信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它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地处美洲，它准备在欧洲或亚洲发动战争。它们需要海军进行运输和支援。否则他们就应该抛弃自己的政策，宣布门罗主义。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向他要同尤金会谈的记录。邓小平将会谈纪录递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这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因此，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同尤金谈的，指示他告诉您这个情况。我问他一切问题是否清楚了，他的反应是肯定的。但他从来没有同海军打过交道，因此他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的关键。苏共中央过去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建立联合海军。

毛泽东（气愤地）：我不能听你说。你当时在莫斯科。只有一个俄国人同我谈，那就是尤金。因此我问你：你说向我“发动一场进攻”的根据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并没有那样做。

毛泽东（发怒）：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毛泽东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是不是我长时间的解释使您感到厌烦？

毛泽东：一点也不。你谈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赫鲁晓夫：至于我提到的那些原因，我们需要与您的同志共同讨论需要什么样

的海军这一问题，讨论海军的技术以及实战应用。我的确同尤金说过，毛泽东同志在战争时，我们协调行动。在1954年我们访问期间和您1957年在莫斯科期间，您都谈过这件事。不幸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任何行动。因此，我指示尤金说明情况。对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应当建造潜艇和鱼雷艇，不是携带海基导弹，而是携带海空导弹，因为潜艇舰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同敌人的海上舰队进行战斗，而是要摧毁它的港口和工业中心。我同尤金谈话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撤销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是不错的，我们不需要它们在那里；如果要在这些地区建造一些东西，那就应该建造规模中等的潜艇。既然是这样，我们应当在哪里建呢？在摩尔曼斯克地区，从那里不易突破美国的防线。在英格兰和冰岛，它们可以采取措施中途拦截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比较好，那里有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在那里监视我们潜艇的活动，打击我们。我对尤金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广阔的海疆，从那里易于同美国进行潜艇战。因此，同中国讨论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是有益的。更为特殊的是，在许多大河中的一条（黄河或其他河流），我们需要一个工厂生产较大批量的潜艇。我们相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去建立联合工厂或联合舰队。我们不需要类似于这样的任何东西。

毛泽东：尤金不止一次地讲到要建立联合舰队，他说黑海和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从摩尔曼斯克指挥海军不方便，海参崴的出路被日本封锁等等。他还指出，中国海岸线非常漫长。按照尤金的说法，由苏联来生产核潜艇。他的谈话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建造了海军，也可以使用它。这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使用它是困难的，但它可以用来对付敌人。总的来说，战争本身就是一件难做的事。

毛泽东：我问尤金，谁将拥有这支舰队，中国人，苏联或者是共同拥有？我还强调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需要把这支舰队作为自己的财富，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将向苏联提供一切。但是，尤金坚持舰队应该是联合舰队。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其他同志会见尤金。尤金在这一次会谈中重复了他先前讲过的话。我们的同志都反对联合舰队。他改变了方案，不谈“联合舰队”，开始谈“联合建造”。我们的同志同样批评这种说法，并说我们把联合建造视为共同拥有舰队。然后尤金开始谈论“共同努力”建造舰队。

赫鲁晓夫：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指示尤金来管这件事，来向您通报。但是

我们没有想就这个问题给您写封信，我们想口头上告诉您。

毛泽东：我们从以下方面理解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想要获得援助，我们就必须建立一支首先对付美国的联合舰队。我们感到，赫鲁晓夫想，加上我们的同志也想解决有关联合建设海军的问题，还想把越南也拉进来。

赫鲁晓夫：我说过，战争爆发时，我们不得不广泛地使用海岸，包括越南的海岸。

毛泽东：我也已经说过，假如战争爆发，苏联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港口，俄罗斯水兵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港口行动。

赫鲁晓夫：我不谈论“俄罗斯水兵”。如果战争爆发，共同努力是必须的。也许中国水兵要行动起来，也许联合努力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会提出有关任何领土或我们在那里的基地的问题。

毛泽东：比如，如果在一支舰队中有100名海军，你我各自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赫鲁晓夫：舰队不能两个国家所有。舰队要有人指挥。当两个国家指挥时，就不可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那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您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加以考虑，您可能说，我们反对这一点。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同样会反对的。

毛泽东：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赫鲁晓夫：本来一开始就没有乌云。

毛泽东：但是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想睡觉也是徒劳的。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可能会强加这件事，完全背离党的原则?

毛泽东：我甚至告诉我的同志们，从原则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理解这一建议，也许其中有误会。您取消了斯大林强加的错误的东西。我个人和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也许这个建议是苏联海军司令部的某个人提出的。您的顾问4次建议我们发电报请求援建舰队。他保证这种请求将会得到积极的答复。

赫鲁晓夫：应该甩掉这样的顾问。

毛泽东：顾问们没有提联合舰队的事。

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对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才提出。

毛泽东：顾问们建议向苏联提出帮助。在此之后，周恩来提出请求，我们想，是带有火箭发射器的舰队。

赫鲁晓夫：没有指示尤金提出这种建议，只是指示他传达一个提议，共同讨论建造潜艇舰队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指示尤金进行建造潜艇舰队的谈判？在党务上我们了解和信任尤金，但在核潜艇谈判的问题上，他是难以胜任的。

毛泽东：他说，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共同建立海军的谈判。我请他通报，我们不能进行这种谈判。

赫鲁晓夫：他基本上想做正确的阐述，但是他肯定误解了我们的指示，做了不正确的说明，结果使我们发现，彼此处在错误的相互关系上。

毛泽东：但是尤金说得很明确。当时安东诺夫也在场。现在是刺痛了谁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在我看来，是刺痛了您的自尊心。

毛泽东：那就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

赫鲁晓夫：同样也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你们怎么会误解我们的政策呢？

毛泽东：您的代表做出这样的阐述。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种提议，不会接受。我说："你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将在陆地进行游击战。"

邓小平：问题起因于对中国和苏联海岸线的分析。尤金说中国有很好的海岸线，而苏联的海岸不好，因此需要联合舰队。然后毛主席就说，这是不是合作社？

毛泽东：合作社就包括两部分。

赫鲁晓夫：一切都非常清楚了。我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相信，中国同志将会更加尊敬我们。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相信你们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担心了。

另外一个方案是——联合舰队。如果没有联合舰队，那就没有援助。

赫鲁晓夫：尤金这样说的么？

毛泽东：没有，他没有这样说。我是在告诉您，他的话语的关键。

赫鲁晓夫：然而，那是您的推断！

毛泽东：第三个方案是，我们撤回请求，因为第二个方案不适合我们。即使一万年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我们也不会同意建立联合舰队。没有它，我们也能活。

赫鲁晓夫：您没有在信中写核潜艇舰队。

毛泽东：我们是没有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考虑到舰队携带核武器是一致

的。尤金谈到了核潜艇。

赫鲁晓夫：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讨论建立什么样的舰队的原因。谁给您提出的建议，格尔什科夫[1]？我不能肯定他给了您正确的建议。当他给您提出建议时，您应该考虑是我们在给您提建议。那么您就会把它挑出来，并告诉说，他们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建造大规模的舰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谈到鱼雷艇和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潜艇。我们已经在信中说了。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想谈完海军的事情，再谈电台的事。我认为尤金对指示的这一部分做了不正确的说明。也许他没有仔细确切地说明这一问题，这样就有误解他的借口。

毛泽东：但是当时有七八个人在场。我当时说那不是一种合作。当听说这一建议时，每个人都震惊的直喘气。因此，我一夜都没有睡觉。

赫鲁晓夫：我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睡着觉。我同意我也应该受到指责。是我提出倡议，我对尤金说明，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并作了错误的说明。尤金是个诚实的人，他非常崇敬中国和您本人。他是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做了许多事情来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指示而产生误会的结果。我要说的是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我重复两三遍问他一切是不是清楚了，因为我给他的指令，是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我也给您带来了难以处理的问题。如果您发现问题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那么您就应该睡个好觉，告诉自己这是个误会，并试图重新澄清一下。（开玩笑地）您看，我在催促您了。

毛泽东：我说过，这也许是一场误会，我希望是误会。

赫鲁晓夫：您可以去睡觉了。

毛泽东：有好几次谈话都是讲联合舰队的，因此当时我发动了反击。现在您在反击我了。但是等一等，我还要再进攻您。

赫鲁晓夫：物理学中有一个定律，作用力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

毛泽东（执拗地）：我有我的道理。我当时就说过，我们可以给你们整个中国的海岸，但就是不同意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上帝帮助我们来处理它。

---

① 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格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时任国防部长兼海军总司令。

毛泽东：这是第四个方案——给你们全部的海岸。第五个方案是——我习惯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现在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了整个海岸线，我们只有到内地去了。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那好，让我们就海岸线做个交易，但最好还由各自保留自己的海岸，我们对自己的比较熟悉。

毛泽东：我同意将一直到越南的海岸都给您。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胡志明。否则的话，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会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合起来对付他。

毛泽东：按照第五个方案，旅大给您，但是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现在，您是否真的认为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什么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攫取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 4 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了解我的观点。但是在旅大港的问题上，我认为斯大林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蒋介石当时还统治中国，苏联军队占据旅大港和东北是有利于你们的。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应当在人民中国取得胜利后，立即结束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好像是在 1954 年，当时我们提出从旅大撤军的问题，您表示出疑虑，认为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您认为苏军的存在是制约美国侵略行径的一个因素。我们请求您研究这个问题，您答应考虑。您经过考虑后同意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政府中的一些民主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利于中国。您讲过这件事吧？

毛泽东：是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斯大林不仅在中国犯了错误，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而且批评我批判斯大林。而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我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我过去经常说，有时也在莫斯科说，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要公正合

理。我们只是反对毫无界限地进行批评。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是要三七开。

赫鲁晓夫：我认为要多一些。

毛泽东：不对。关键是他的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

赫鲁晓夫：是的。要说斯大林的成就，我们也是他的一部分。

毛泽东：这就公正了。

赫鲁晓夫：斯大林过去是，将来还是斯大林。我们批评他，特别是由于他年老所产生的错误和争斗。但是，当铁托批评他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现在开始二十年以后，学校的孩子们将在字典里查找谁是铁托，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斯大林的名字。字典里将会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他寻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字典里也会说，斯大林是个战士，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但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主要错误，不是两个半殖民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给蒋介石写了不少谦恭的信件，支持王明。

毛泽东：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他的第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丢失了她曾经拥有的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第二个错误是，当中国革命成熟的时候，他建议我们不要革命，并说，假如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就会有毁灭整个民族的危险。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一个民族并不能被毁灭。

毛泽东：但是斯大林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相信，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可能会这样认为。

毛泽东：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不想取消过去在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好处。我记得费德林和科瓦廖夫向我传达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到苏联各地走走。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有三件事情去做：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仅仅给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也只好这样。我就完成我的三项任务。去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谈话中，布尔加宁在场，我听说当时斯大林对我们进行窃听。

赫鲁晓夫：是的，是我对他们这样说的。他对我们也进行窃听，他还偷听他自己。一次我同他一起度假的时候，他承认他不相信自己。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

人，我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建造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会按照库兹涅佐夫元帅的计划来建造一支舰队。

赫鲁晓夫：在舰队问题上，我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毛泽东：我们只是想在建造潜艇、鱼雷艇和小型水面舰艇时得到帮助。

赫鲁晓夫：我们也是这么想得。我们有一支携带导弹的强大的潜艇舰队，鱼雷艇不是携带鱼雷，而是携带导弹。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在信中所请求的。

赫鲁晓夫：我们相信，需要的是携带导弹的驱逐舰；我们也相信，应该按照以军事用途使用商船的观点来建造商船。我们正在建造几艘可以携带火箭的航空母舰。我们认为，还应当建造可以携带火箭的护卫舰、扫雷艇。最为重要的是，要建造携带火箭的飞机。我认为，你们首先需要这个东西，这样您可以从空中有更远的射程。我们首先需要海上防卫。旅大港的岸炮群用处不大，它的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需要的是海岸火箭发射架以及携带火箭的航空母舰，或者是机动的海岸防卫。这是我们采取的建造舰队的方针。

毛泽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赫鲁晓夫：我建议，首先需要发展携带火箭的航空母舰，潜艇舰队更为昂贵。在携带火箭的航空母舰的帮助下，可以使敌人处在距离我们海岸相当远的地方。

赫鲁晓夫：完全正确。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谈过。

赫鲁晓夫：飞机具有更大的潜能。我们准备给中国我们已经拥有的飞机。图-16作为轰炸机已经失去其意义，但它们携带火箭进行海上战斗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处在危机之中。军方一片混乱，因为对战斗机来说，已经出现了替代品——火箭。

毛泽东询问苏联、美国、英国火箭部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特性和类型。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使敌人害怕我们火箭的原因。我们给土耳其人写信说，只要用三到四枚导弹，土耳其就不复存在。十枚导弹足以扫平英格兰。在英国，他们进行辩论：一些人说，九枚导弹就可以摧毁英国；另外一些人说，不对，七到八枚就可以了。但没有人会怀疑，一旦爆发核战争，英国将会遭到毁灭。他们所争论的是需要多少枚导弹。当我们在苏伊士事件期间写信艾登和摩勒时，他们立即停止了侵略。现在，由于我们拥有洲际火箭，我们同样可以卡住美国的咽

喉。他们认为美国不在射程之内，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工具避免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挽救伊拉克了。

毛泽东：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进攻伊拉克。

赫鲁晓夫：我认为75%是正确的。

毛泽东：大约是90%。

赫鲁晓夫：这是中国的方式。这里也是我们的“意见不一”。

毛泽东：它们害怕战争。

赫鲁晓夫：是的。它们非常害怕。特别是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革命激起了那里的人民，它们可能会重演伊拉克事件。

毛泽东：我们明天再讨论国际形势。我想海军的问题就解决了。

赫鲁晓夫：是的。双方不分胜负。

毛泽东：那就不存在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但是有3个苏联同志谈过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这里有4位苏联同志，我们都说没有联合舰队。

毛泽东：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误会。

毛泽东：同意，把这一点记下来，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同意。把这一点写下来。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问题。这是误解的结果，是尤金错误地说明问题的结果。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现在我不激动了。

赫鲁晓夫：我也是，让我们睡个好觉。

现在我想讲一下长波电台的问题。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决定。我国军方的同志说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这样，当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指挥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我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同中国同志接触，以便建立这样的电台。如果中国同志同意我们通过贷款或其他一些方式参加电台的建造，那就更好了。这个电台是必需的。当你们拥有自己潜艇舰队时，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它。问题是如何利用。我认为这个电台不能有两个主人。因此，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样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同你们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不谈所有权的问题。它应该属于中国。我只是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其使用问题达成

一项协议。你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想我们军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反对，我们也不再坚持。

毛泽东：可以建造这个电台。它应当归中国所有，由中国政府投资，我们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不是共同使用，仅仅是部分利用。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战时情况下和平时训练时才用到它。

毛泽东：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马林诺夫斯基在信中提出的方案。

赫鲁晓夫：我没有看到这封信，我们没有在中央讨论这件事。

毛泽东：这是另外一个合营。中国占有 30%，苏联占有 70%。我们给马利诺夫斯基答复，就是您刚才听到的精神。

赫鲁晓夫：我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的通信联系。也许这是我们军方之间进行联系的结果，而这种联系出现了错误。

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 7 月份的第二封来信，包含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条约草案。如果在第一封信中中国还占 30%，在第二封信中，整个所有权都归苏联。

赫鲁晓夫：我猜想，就我国军方而言，这是他们的好意。我们需要这个电台，但这是一个耗资不菲的计划。所以他们仅仅是想要进行帮助。但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法律的一面。

毛泽东：我们以彭德怀的名义给予答复，在信中我们说，我们建造它，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军方告诉我，他们已经同中国同志达成了最后协议。

毛泽东：这里是全部的往来信件，您可以看。

赫鲁晓夫：我不必看了。如果这件事通过苏共中央，也许就不会允许出现这样愚蠢的行为，也许会由我们负担来建造，但是在苏共中央，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出钱建造，那就算了吧。

毛泽东：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己建造这个电台，可以共同使用。您同意吧？

赫鲁晓夫：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它会耗费许多钱。不要拒绝援助，不要让友谊干扰了工作。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共同分担负担。我们可以为电台建造提供贷款。你们可以偿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必偿还，因为你们也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建造这个电台不需要任何贷款是可能的。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我们将来会需要的。

赫鲁晓夫：但是，首先是我们需要它。

邓小平：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建造，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也许是因为我们军方告诉我，中国人已经同意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中文的细微差异。他们一直感到奇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整个协议似乎已经达成了。

毛泽东：我们同意自己建造，但是可以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认为贷款还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援助。

毛泽东：如果你们坚持援助，那我们就不建这个电台了。

赫鲁晓夫：现在谈谈米高扬。我们对您的说法感到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同米高扬同志有着可能是最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他对中国有不忠实的行为，尽管有一些态度妨碍我们的友谊。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我们也从未看到这类事情。他在你们党代会上的讲话，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过的，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建议他把讲话给您看，采纳您的评论和意见作为应做的事情。1954 年我在这里谈话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讲话拿给您看，征求您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欢迎您的讲话，是因为它反映了平等的精神。米高扬同志的讲话也不是很坏，好的与不恰当的比例是九比一。讲话的腔调有一些像是说教。会议的一些代表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委婉地告诉米高扬同志这一点。当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的时候，这是一条毫无疑义的真理。但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米高扬讲话中的有些东西，就类似于老子同儿子的关系。

赫鲁晓夫：我最近没有重新读这些讲话，但是我记得我告诉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讲国际问题。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但是米高扬作了一些解释，我也表示同意。如果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情况，不能只归咎于他。我们都忽视了这些问题。

现在谈谈在西柏坡期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他的举止有些傲慢。好像他是一位监察官。

赫鲁晓夫：我感到惊讶。

毛泽东：我也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像老子对儿子讲话。

赫鲁晓夫：对此，我很难解释。您应该告诉米高扬，他知道如何倾听，如何注意以及如何得出结论。

毛泽东：他是一位好同志，我们在邀请他回来看看我们。

赫鲁晓夫：他现在正在度假。

毛泽东：我们欢迎他在任何时候到中国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在他的讲话中找到了不恰当的东西。

赫鲁晓夫：他当时到中国来，是斯大林的指令。斯大林要求他每天都向他汇报，指示他观察您身边的每一件事，看看您身边有没有间谍。按照他的方式，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斯大林的动机是好的。当时斯大林坚持逮捕两名美国人，你们就逮捕了他们。斯大林去世后，米高扬说他们是无辜的，我们就此写信给你们，你们就释放了他们。您应该想到，米高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他不愿意做的，是斯大林想做的事。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驱逐出莫斯科，后来又恢复了她的名誉。我相信斯大林这样做是阻止她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斯特朗是个间谍。现在斯特朗要访问中国和苏联，我们不会反对，尽管她写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愚蠢的文章，你们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些文章。

毛泽东：我没有读这些报纸，但人们谈论过这些事。

赫鲁晓夫：我读过，并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毛泽东：是的，这个报纸当时控制在右派手中。

赫鲁晓夫：文章是直接反对苏联的，我们甚至当时想就此事写信给你们，假如它是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决定不值得写信了。

毛泽东：报纸属于右派分子，现在由我们控制。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没有问题了，但斯特朗是错的。

毛泽东：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局势已经得到纠正。

赫鲁晓夫：这是你们的事。我们也认为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我认为米高扬的事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他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在我们的讨论中，他所占的份额是一比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你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 100% 正确？

毛泽东：超过 90% 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的专家非常精通他们的学科领域，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你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人，您担保他们不会做蠢事。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从你们那里要求担保。

赫鲁晓夫：但是你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来了他们做了蠢事，我还不得不请求原谅。

毛泽东：你不必要找借口。我们必须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毛泽东：我们在这里谈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如此。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干蠢事。

毛泽东：中国也可以讲同样的话。

赫鲁晓夫：要是没有这些蠢事，我们也不会准许俄罗斯人这样做。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品质问题，这种品质应该让所有的民族佩服。但是条件对我们是不平等的。你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我们必须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你首先要进行革命。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对此负责？

毛泽东：这就是你不得不派专家的原因。你将来还不得不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么让我们共同做这件事，分担我们之间的责任和错事。

毛泽东：我们的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苏联人，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中间的所有人，你们中间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他们有时提出的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的不合适的看法，但都没有造成危害。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似乎你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你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仅仅是谈论少数人，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这些顾问经常换来换去，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你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也许国家安全部门的党组织和军事部门的党组织要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如此一场战争，获得了这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评论，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人与你们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人，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你们，不要支持他。卡加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他表示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彼得鲁瑟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但是，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彼得鲁瑟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杜鲁方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错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很高兴有杜鲁方诺夫。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不需要。

赫鲁晓夫：你们可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政治部门，我们甚至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你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你们是不是要对那些界限以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你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真的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所有共产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工作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好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问题，你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明智。我让你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你们不想让俄罗斯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永远不会是这样。你们却忍受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他脑满肠肥，可肚内空空。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呆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待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四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它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你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毛泽东：对。这是一个坚强而理智的国家。应该给它援助。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还反对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我相信，我们应当讨论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一支舰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援助它——合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将同霍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某种形式的合作是必要的。请不要为此责备我们。

毛泽东：是的。同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赫鲁晓夫：没有。仅仅在波兰和匈牙利有驻军。当我访问匈牙利时，我向卡达尔提出撤出军队。他不赞成，仅同意削减一个师。他们在沿着奥地利边界部署我们的军队，但是奥地利人并没有威胁我们。我相信，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好，卡达尔是个好人。

毛泽东：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合作。您看，有多少军事基地，像钉子一样布满我们周围，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等。

赫鲁晓夫：是的。在欧洲又有多少？到处都是基地。

好在我们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

毛泽东：由于你们的火箭，我们还都活着。

赫鲁晓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人们这样说并不夸张。它威慑着敌人。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是好的。

毛泽东：我也这么看。董必武同志也是这样总结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会见了他。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44-47

文件 04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8 月 3 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四次会谈，1958 年 8 月 3 日，勤政殿。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

毛泽东：我想弄清楚两个小的、但重要的问题。第一，在禁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上，你们单方面命令停止试验，但西方却在继续试验。您认为有必要恢复试验吗？

赫鲁晓夫：他们通过不停止试验，解除了我们做出的保证。现在，我们继续生产原子弹和氢弹。当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恢复试验。当然，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就禁止试验达成普遍协议的话。

毛泽东：我明白了。您说洲际火箭飞行时穿过太空，当它们进入大气层时，它们不会烧毁吗？

赫鲁晓夫：不会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毛泽东：你们如何估计，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这个事实？

赫鲁晓夫：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军事基地非常靠近我们的边界。但是他们

主要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离我们很远。使用轰炸机到达他们本土很困难。但是现在，由于火箭武器的运用，力量对比已经平衡了。

我们目前正在克服困难，试验射程远的火箭，这样，我们的国土是不够用的。

毛泽东：你们不能在北极区域发射它们吗?

赫鲁晓夫：但是这个距离确实很短，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越过北极发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极地地区进行监查，这样他们才能够探测出我们的火箭基地，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

毛泽东：我读了艾森豪威尔就您对防止突然攻击提出的建议所作的答复。看起来这是一个恰当的回答，他似乎准备就此问题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他们显然害怕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看到这封信。

毛泽东：我同意您提出的有关代表团离开问题的建议。但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欢送仪式，在机场公开举行，排好仪仗队，邀请外交使团。

赫鲁晓夫：昨天，我们似乎已经一致同意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让我们的协议更加明确。这样，那些无端的谣言就更难找到借口。否则的话，西方就会写道，他们秘密来访，因为他们就不期望会谈会成功，也许中苏之间有矛盾。然后他们会谈，达成协议，并决定举行华而不实的欢送仪式。让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更好，让会谈的事实产成效果。

毛泽东：我认为有必要对你们的来访保密，这样帝国主义者不会在您不在的时候，发起一场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认为他们还不敢这样做，力量的对比对他们不利。现在，他们不得不吞下另外一颗苦果——承认伊拉克。假如他们发动战争的准备只做了一半，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毛泽东：是的，英国当然不会发动战争。

赫鲁晓夫：法国和德国都不敢发动战争。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他们化为灰烬。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吃过德国“V-1”和“V-2”飞弹的苦头。但现在，它们同火箭比起来，就是一堆玩具。

毛泽东：但是，到处都是他们的基地，在土耳其就有 100 多个。

赫鲁晓夫：不，在土耳其没有这么多基地，而且它们都处在我们的瞄准仪之中。他们打算在希腊建立基地，那就更容易了：人们可以从保加利亚的山上推一块巨石下去，关于基地仅仅这么多。甚至美国也处在攻击的威胁之中。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科学家制造了洲际火箭。

毛泽东：还有德国科学家吧？

赫鲁晓夫：不。他们仅仅是在开始阶段参加了。我们不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德国人。现在他们全部回到德国去了，去讲关于他们做过工作的故事。美国人相信这些故事，认为我们没有洲际火箭。当我们宣布我们试验了洲际火箭时，他们还不相信。然后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

毛泽东：当各国首脑最高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依然想，您在国外的行程，同可能的危险联系在一起。我建议您在出访的时候，宣布任命一位副手。因为当您离开苏联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

赫鲁晓夫：是的。有某种风险，特别是首脑会议在纽约举行时：那里有许多感到怨恨的匈牙利人和其他敌人。日内瓦的情况好一些。我想起了1955年7月日内瓦会议时一件有趣的事。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的保镖当总统在街上行进时，必须跑在总统的前面。但是制定宪法的时候，人们还是坐着马拉的马车。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来到日内瓦，坐在汽车上的时候，他的保镖跑在前面，这使得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发笑。然后，人们都在猜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如何行事。我们来到日内瓦，坐着敞篷汽车在街上行进。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害怕，会坐在防弹车里。后来真的是坐进了防弹车，是因为瑞士警察告诉我们，有一个恐怖组织企图攻击我们。

美国人还写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不敢面对群众。但是，当我们访问匈牙利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了。我们要去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纪念碑献花圈，我向卡达尔建议，穿过人群走向纪念碑，这样美国人可以看到匈牙利人是“如何把赫鲁晓夫撕成碎片”的。这件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写匈牙利人反对苏联了。

毛泽东：斯大林拒绝去日内瓦。但是，我还是想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危险。

赫鲁晓夫：这是头脑衰老的缺陷。

我们现在不考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经常命令军方，按照他们的资料准备局势的草案。最近他们汇报说，没有理由相信，有突然爆发战争的危急情况。

毛泽东：您认为杜勒斯还会留在他的位子上吗？

赫鲁晓夫：不会，他可能会离职，尽管对我们来说他继续留任会更好。同一个傻瓜打交道，比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会更容易。

毛泽东：按照您的观点，史蒂文森会不会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他有过于自信的个性。

毛泽东：最为可能的是，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权，那么，尼克松将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是的，最有可能如此。他比艾森豪威尔更糟糕。艾森豪威尔作为国家英雄进入政治舞台，是战争的结果。作为政治家，他不是最好的，他缺乏政治经验。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官，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在战争结束时的阿登战役，德国人几乎打败了他。当时。丘吉尔请求斯大林援助西方盟国。

毛泽东：你们当时就不应该去援助他们。也许那样就不会有西柏林，甚至可能不会有西德。

赫鲁晓夫：是的。也许今天我们都是多列士的客人。然而当时局势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停止战斗，向美国人投降，对我们进行顽强抵抗。局势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占领柏林。斯大林同艾森豪威尔达成谅解，他给我们占领柏林的机会。在维恩战役中，德国人甚至从我们这边跑开，向艾森豪威尔投诚，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战俘接受。由此，就您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还懂得一些情理。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向他建议的。

毛泽东说，签订公报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好的，那就让我们签吧。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151-156

文件 0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 172 号：中国之行

（1958 年 8 月 4 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列·伊·勃列日涅夫、А.Н. 柯西金、О.В. 库西宁、Д.С. 波良斯基、П.Н. 波斯佩洛夫、米·安·苏斯洛夫、Н.М. 什维尔尼克；会议是由尼·谢·赫鲁晓夫主持的。

一、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通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库兹涅佐夫、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勃列日涅

夫）。

1. 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之中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是，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

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

关于米高扬同志的演说——采用了宽容的口气。对他说了，他的话让人感到生气。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人员，对于顾问人员他们觉得很勉强。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审理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

赞成这次访问，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4-45

文件 06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别尔乌辛与王国权的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8 月 5 日）

我会见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

在会谈过程中，王国权同志说，7 月 3—16 日，在布拉格召开了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会上研究了一系列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会上对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当今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两个阵营之间的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王国权同志说，我们觉得，在亚洲、并非所有国家在宣传时充分强调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争取和平，但不害怕战争。这当然不包括我们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我们两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是有充分觉悟的。

二、会上研究了中近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问题。

三、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

家间在思想和政治问题上加强意见交流的必要性。会议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指出了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

四、会议指出中国驻外大使缺乏紧密联系。决定成立一定地理区域的大使活动协调中心，活动形式暂未定。可能决定定期举行大使会议。中国驻外使馆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会晤。以前，王国权指出，没有北京的同意，大使不能外出，比如到布拉格来。现在，将无需北京同意，根据大使的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将可以到邻近国家去。

会上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外交部对大使的工作。为此目的，中国外交部各副部长巡视了许多驻外使馆。不久前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巡视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和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使馆。

王国权说，像布拉格这样的中国大使会议，决定以后一年举行一次。

王国权说，在会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达成的协议不多。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人指出，必须继续通过批判南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和缺点，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继续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就此我指出，在批判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同南斯拉夫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以便不使它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给南联盟领导人留下利用我们的批判为其错误的政治路线辩护的机会。

王国权指出，会上没有涉及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问题。我认为，王国权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国家关系，如他（王国权）同南斯拉夫驻民主德国大使沃什尼亚克的关系就“很冷淡”。

王国权问有没有中近东形势的最新消息，我说，除报上公布的，没有任何新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我指出，继续增兵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他们未放弃他们占领这两个国家和这一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在黎巴嫩和约旦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地，达到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政策以及使他们回到以前完全依附于美国和英国道路上来的目的。

毫无疑问，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兴趣是很大的，因为美英垄断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石油可以发大财。美英国内有一些资本家集团在策略上意见不一，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的国家。

如果不是苏联、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社会舆论的坚决抗议和行动，美国和英国早就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但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社会舆论制止住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侵略。

美国和英国想一下子把中近东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压下去，但在世界社会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现在他们企图对伊拉克新政府施加影响，利用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新政府内部找到自己的支柱，收买民族资产阶级，从而使伊拉克政府离开正确的道路。美国和英国表面上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自己的军队，实际上这仅是一个阴谋。不能忘记，美国和英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增兵，所以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策略的变化，我继续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两国（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次会晤大大加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夺取自己正义事业胜利的信心。

事态进一步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王国权说，为了进一步向中近东渗透，西方国家不仅企图在黎巴嫩和约旦制造紧张局势，而且企图在东方制造紧张局势。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国权说，美国第七舰队现正在日本海岸游弋。近来蒋介石飞机经常对中国大陆实施野蛮突袭。

谈到中日相互关系，王国权指出，现在日本国内反华宣传有些收敛。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本打算恢复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这样的消息，法国政府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法国继续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所以我们要求断绝这些联系。我们决定，王国权说，对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表示出特别兴趣。

王国权继续说，现在在中国，所有经济领域都呈现出大的劳动高潮。1959 年，他说，除电力生产外，我们打算在煤、钢、水泥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今年加强了铁路网的建设。现在在中国正在兴建中的有 50 条铁路线。其中一些，如通往阿拉木图的铁路将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已做出决定，修建另一座黄河大桥。

会议指出，王国权说，我们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因此对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不表示特别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国内开展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将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提到格罗提渥同志请求为他探明东南亚国家和中近东国家邀请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问题，王国权说，中国同志们将尽力完成德国朋友们的这一请求，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国家或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拒绝邀请格罗提渥同志的可能性。

然后王国权问我如何看待中近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据我看，现在不该发生战争。

王国权说，中国外交部认为这具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一、妥协，中近东形势得到缓和；

二、局部战争；

三、局部战争发展为世界战争。我们认为，现在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不过应该考虑到，美国在黎巴嫩增兵制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说，美国人现在不准备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东，他们也不想陷入大的战争。确实，他们在向那里增兵，不过这样做他们是想以威胁来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各国的目的。

我们两国，我指出，对战争无论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果不干扰我们，再过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冒险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有意拖延战争。的确，我指出，正如不久前我们两国公报中指出的，这不只取决于我们。

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三秘秦玉环（Чин Юй-хуань）。苏联使馆二秘博戈莫洛夫担任记录。

别尔乌辛

ЦХСД，ф.5，оп.49，д.129，л.182-188

文件 07

齐米亚宁关于中国状况和苏中关系给外交部的报告（节录）

（1959年9月15日）

人民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一致利益和在各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

当我们讨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初3年间苏中关系发展中的总体成就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双方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利和最高利益。这些消极因素反映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签署的一些双边协议中，例如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和新疆地区的协议（1950年2月14日），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以及为国家银行规定卢布和人民币元汇率的协

议（1950年6月1日），以及其他这类文件。[1]

自1953年起，苏方采取措施，全面摒除了那些旨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联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而阻碍了以完全平等、互助和信任为基础的苏中关系的成功发展的各种作法。自那时以来，对上述协议中那些不符合兄弟般友谊精神的内容进行了修订，或是予以废除。1954年10月，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对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那次访问的结果，双方签定了有关苏中关系、国际形势以及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公报。此外，双方还签定了关于苏方将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用于科技合作项目的基金转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协议、关于建设天津－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等等。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被认为对于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次会议创造了一种气氛，有益于更经常更友好地相互坦率交换观点。中国朋友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困难，同时还（站在一种友好的立场上）表达了对苏联机构、苏联专家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苏中关系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的做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尽管没有直接说明，但在对斯大林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却是同我们的立场并不一致的。稍后，中国同志们再次检讨了他们对于斯大林功过的评价，这反映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讲话中。例如，他说过："……总而言之，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同苏联共产党一致的。"在几次讨论中，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批判性分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与此相关，中国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苏联哲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学术观点进行批评。这无疑给那些反对苏联和苏中友谊的右派分子的反苏态度提供了推动力。右派分子指责苏联没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断言，苏联的援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是低水平的。他们还宣称，苏联没有偿还从满洲掠走的设备的费用；还坚持说，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中援助的武器向中国榨取钱财，而中国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大量鲜血。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

① 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满洲和新疆地区的禁令并没有在1950年2月公布，事实上直到齐米亚宁起草他的报告时都没有公开发表。人们最初得知这一协议的存在是在1969年，当时出版的一本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选集中发表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一次秘密讲话（第159–172页）。

的，即使是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揭穿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以便对其所有观点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来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声明在中国受到极大欢迎。1957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一项苏中联合声明。声明着重指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重要因素，声明还驳斥了关于“苏共与中共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毫无根据的流言。根据这一声明，苏联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以利于进一步发展苏中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完全信任基础上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在1957年，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探讨了有关世界局势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和具体问题。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满意地谈到这些磋商的成功经验，并表示中国同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再度就有关事务进行共同讨论。

苏联重新组织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步骤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和其他各次全会的决定，虽然中国报刊并没有对于这些会议决定做出官方评论或反应。当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情况在中共中央公布以后，中国朋友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更加坚定。毛在莫斯科宣称：“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内部获胜，那不仅会给苏联带来危险，而且也会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危险。”

鉴于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攻势，鉴于他们试图利用1957年中国进行的几次思想战线的运动——特别是“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来煽动分裂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团结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上述内容（1957年11月），并且在同南斯拉夫官员谈话时，以及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波兰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时，做了详细论述。1959年，中共中央在讨论过苏共中央关于澄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模式的建议之后，再次肯定必须长期维护这一模式。

苏中之间的持久关系和牢固友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中东国际危机时期和1958年夏天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中，这一力量都发挥了强大作用。在那一年中，苏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是七八月间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那次会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通过交换意见，他们探讨了有关苏中关系、特别是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自己的进攻，这一讲话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我们关于将为对中国的核攻击实行报复性核攻击的承诺极感满意。作为回报，中国政府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苏联受到攻击的时候，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同它站在一起。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和苏共中央的一些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御能力的合作条款，关于减少在华的苏联专家人数和取消苏联顾问团的问题，关于苏共中央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计划草案的看法，以及其他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大会期间其他报告中反映的这一主题公开发表之后，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

以同样的腔调，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制定的文件涉及反对“迷信外国”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同时宣称“大跃进”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就，会议使得中国的许多骨干工人头脑发热。他们开始过分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对于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表现出对立态度。有些人开始宣称，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中国则正在飞速地奔向共产主义。中国报刊相当积极地发表对于苏联正在执行的按劳分配、以职务为基础付酬等等社会主义原则的批评文章。一些作者还从根本上论证公社与集体农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

此后，经过代表大会以后对于实际情况的研究，经历了在建立农业人民公社和实行“大跃进”过程中的许多挫折教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于苏共二十一大的观点有了更现实的认识，例如关于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刺激原则的地位和劳动分配问

题，以及其他问题。

苏共的立场是，提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准则和规律的一些原则性解释，这些准则在中国的“大跃进”过程中和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中被忽视了（见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后的讲话）。苏共的这一立场帮助了中国同志，使他们正确估价形势，改正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中友谊持久巩固的声明扫清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的宣传，那些宣传极力散布我们两国相互不信任和苏中关系正在恶化。……

一项关于过去十年来苏中关系的分析证明，友好和睦与互利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持久的日益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实力与凝聚力的增长以及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巩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ЦХСД，ф.5，оп.30，д.307，л.49-79

文件 0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9 年 10 月 2 日）

绝密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的会谈记录。

1959 年 10 月 2 日

今天，我应毛泽东的请求，同苏斯洛夫同志和葛罗米柯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住所同他举行会谈。

毛泽东：向我们通报艾森豪威尔给您的口信的内容，按照您的要求，今天半天听您给我们说。

赫鲁晓夫：好的，除此之外，我还想向你们通报，我 1959 年 9 月 27 在美国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情况，然后在我访问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彼此交换一下看法。最好将前面提到的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主要内容，请翻译口头翻译一下。

阎明复和李越然口头翻译了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节录。

吸引中国人最大注意力的问题是，有关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的问题，就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苏联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在德国问题上一样的立场。

赫鲁晓夫（在翻译结束之后）：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急忙向中国传递口信的原因。

毛泽东：就我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观点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他要执行温和而有节制的政策。

赫鲁晓夫：是的。

毛泽东：艾森豪威尔还说，已经有45个国家宣布承认台湾，而承认我们的只有极少数，战争也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口信中有积极的成分，特别是他说，不要让战争爆发。我们也不想要战争。

赫鲁晓夫：您理解得很正确。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制订了恢复谈判的条件。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恢复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计划。我们不同意。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军。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按照我们的想法，把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第一次午餐会上，艾森豪威尔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只要他们愿意，

我们也不会阻拦他们。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问题同德国问题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是以金日成和我们为一方，美国人为另一方而划定。越南划分为北方和南方，是按照日内瓦协定划分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他首先必须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这是真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赫鲁晓夫：我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扣押了 5 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只能在北京提提这个问题。

周恩来：1956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我们同美国就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返回美国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但是我们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罪，他们将被逮捕。中国法律也规定，如果一个犯人在监狱里表现突出，他就可以减刑。协议中有权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在中国安东地区击落过美国飞机，而不是在朝鲜。这架飞机上的 18 名军事人员作为战俘，我们把他们全部都释放了。您记得，联合国曾经讨论过美国战俘的问题，1955 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到北京来讨论这件事。在这之后，哈马舍尔德还到法国探讨此事。美国通过英国告诉我们，他们想同中国举行谈判。我们表示同意，会谈就开始了。我们采取主动，释放了 13 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美国人没有什么借口来对付我们。这之后，在我们的监狱里只有两名美国人，费克图和唐奈。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被当场抓住。当他们试图驾机逃跑时，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飞机上找到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殊装备。中国法庭判他们长期监禁，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 20 年。当哈马舍尔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谈这些美国人的命运，并不是他此次使命的一部分。另外 3 个人长期居住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像这样的美国人一共有 90 名，绝大多数已经释放，只有 5 名还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间谍，按照中国法律被判监禁。我们相信，我们中国人已经让太多的美国人走了。

赫鲁晓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假如要听我的看法，如果我是你们

就不会这样做。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交换新闻工作者，假如你们不打算采取对抗路线的话。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如果说想“逗弄母鹅”的话，那当然应该把美国人关起来。因此，我们用一名我们关押的匈牙利间谍，交换了拉科西。照我们看来，一句话，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

毛泽东（带着明显的不高兴和恼火）：当然，放是可以的，我们就是现在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毕竟，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赫鲁晓夫：那好吧，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的态度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使得交换意见复杂化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众议员，也不是代表美国利益的经纪人，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挑出这个问题，向你们陈述我们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毛泽东：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也搞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相当多的理由向美国提出我们的要求。毕竟，他们也扣押了为数众多的所谓的流放者。我们立场的软弱就在于，这些人的大多数都不愿意回到苏联。当然，我们不会同美国讨论释放在中国监禁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以友好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也是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台湾问题很清楚，不仅我们在 10 年、20 年，也许 30 年不会碰台湾，而且也不会去碰沿海岛屿。

赫鲁晓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对这个原则问题我们是同意的。至于 5 名美国人，我们的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您说您可以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不解放台湾。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策略问题了。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但是对外界我们就不这样讲了，我们会说，一旦因为台湾而出现侵略行为，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周恩来：就台湾问题而言，我们已经在两个方面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大陆与台

湾的关系是内政问题，中国和美国有关台湾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

赫鲁晓夫：这很清楚，这也是你们从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节录中看到的，我们同他谈的是什么。任何问题肯定有它的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一开始提出什么。许多年以前，列宁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这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但是列宁临时承认了它。后来，正如它应该如此的，远东共和国重新回到苏联。

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国，不知道你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措施，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在这一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对我们来说，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你们，也事关卷入这些问题的您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寻找这样的方法，既可以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不损害中国的威望和主权。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转达一切情况。我还可以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尽管我们向沿海岛屿打炮，但是我们并不想解放台湾。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了解杜勒斯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到的这个指令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向沿海岛屿打炮，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打炮。我不理解你们的政策。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当我听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很纳闷。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而仅仅是其他一些措施。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十分不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也许你们会认为，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你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对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你们有什么看法。

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军，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军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从苏联脱离出去的事实，您应该认识到，那是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出现的。

赫鲁晓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自决问题。至于远东共和国，它是俄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赫鲁晓夫：我们对台湾问题有着共同的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仅仅是战术策略的问题。你们总是拒绝在我们可以沟通的这个问题上通过努力而达成一项政策。你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是我们仅仅是表达自己的考虑。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又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赫鲁晓夫：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按照美国的要求做，保证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人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在 1955 年 3 月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个，在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以及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之间明确划线。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部事务。

（休息一个小时，会谈重新开始。）

毛泽东：我们做什么？

周恩来：继续吧。

毛泽东：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做，对我们不利。美国人不想要报答，应该照我们

的意见办。

赫鲁晓夫：你们这样做，就使我们处于一个难堪的境地。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是我们在支持美国的立场。我们是站在苏联共产党的立场上的。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无限期地推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离美国很远，是美国，不是我们，把舰队派到我们的海岸。

赫鲁晓夫：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也都会犯错误。是我们把美国人拉进了南朝鲜。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这些步骤也使得美国人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我们应当寻找缓和局势的途径，寻求改善局势的方法。您知道，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在决定镇压反革命事件时非常果断。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假如还需要的话，我们将再一次履行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责任，你们毫无疑问也会这样做。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系统的措施，这样人们才能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可以再讲一次，我许多次都不同意斯大林。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莫斯科周围随时可以开炮的防空火炮。我们期望随时遭到进攻。我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局面，并为此感到骄傲。想一想，我们取得这种成效，并没有放弃自己任何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特别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人在边界问题上有 150 年的争端。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多 5 万平方公里，或者少 5 万平方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阿尔特温划给土耳其。直到今天，在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是我相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们这些的目的是向你们表明，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超越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这样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小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跑出来，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对情况还不了解。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但我们也没有开罪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政治家那里可以得到一切东西。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会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你们应该在那里有情报，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企图。

毛泽东：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除此之外，在苏联，他们在同印度冲突的问题上发表塔斯社声明。

赫鲁晓夫：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就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你们应该能够看出我同尼赫鲁的一些差别。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那就会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尼赫鲁的印象。塔斯社的声明使得这个问题仅仅成为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错误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时，我们同大多数西藏民众还没有建立联系。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没有同西藏人建立起联系。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的认识。

赫鲁晓夫：当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这样说，你们收留了从金日成那里跑出来的朝鲜人。但这并不成为恶化同金日成关系的理由，而且我们还是好朋友。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跑走，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如果他在棺材里就更好了，可是他现在在印度，也许会到美国去。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不能禁止他离开，同印度的边界线那么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走。

赫鲁晓夫：问题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错在让他跑走了。如果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那么，尼赫鲁如何处理这件事。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赫鲁晓夫：那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匈牙利事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美国的错。请看一看，我们在匈牙利有驻军，我们支持那个愚蠢的拉科西。这些都是我们的错，不是美国的错。

毛泽东：您怎么能把拉科西比作达赖？

赫鲁晓夫：假如你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以这样比较。

毛泽东：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属于他们的。

赫鲁晓夫：我们了解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知，尼泊尔想让我们派个大使，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做。你们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让苏联和中国在那里有大使。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对尼赫鲁不能期望得到什么。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同他搞僵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揍揍他。

赫鲁晓夫：为什么在同印度的边界上你们杀了人？

毛泽东：他们首先攻击我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 12 个小时。

周恩来：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

赫鲁晓夫：陈毅是外交部长，他能够掂量出自己讲话的分量。他不应该信口开河。我们已经存在了 42 年，30 年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从来没有迁就过任何事，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都受到同情，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生活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能在 10 月中旬来访。这里有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

赫鲁晓夫：看看这个左倾论点。陈毅同志，如果您转向左派，您就不可能再转向右派。橡树坚硬，但它也会折断。我认为，我们应该抛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此看法不同。

周恩来：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在印度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林彪：在苏联和德国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军队追击法西斯，进入柏林。这并不意味着是苏联挑起了战争。

赫鲁晓夫：这一课不是我这个中将可以给您这个元帅同志上的。

苏斯洛夫：林彪同志，您是在试图比较不能比较的事情。在卫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而这里发生的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周恩来：印度人不想从他们渗透的地方撤军。我们寻找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过去建议，现在还建议，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你们这样做，我们同意。这也是在我们产生分歧之前你们已经做的事情。

周恩来：直到这次挑衅之前，印度人已经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大规模反华宣传。他们首先越过边界，首先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事端？

赫鲁晓夫：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他们则如同诺亚方舟。周恩来同志，您对这一点的理解不会比我差。

苏斯洛夫：在某种意义上，在诺亚方舟上，每一种生物都有一对。

彭真（极为激动地）：纳赛尔一直毫无理由地滥用苏联给他提供的无条件援助。其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一面。既然苏联同志可以痛斥民族资产阶级，我

们为什么不能?

赫鲁晓夫：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但是，射击和批评是不一样的。

彭真:“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泽东：同印度的冲突，还只是小的边界问题，又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本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事件发生后，我们又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所有这些，不仅尼赫鲁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西藏军区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当尼赫鲁得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时，他下令让他们撤回来。我们也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如果在小规模战斗爆发后立即做这些工作，冲突就不会发生。另外，你们在边界事件爆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向我们通报。

刘少奇：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您通报了边界的情况。没有早一点通知您，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理出头绪来。

周恩来：塔斯社的声明，是在您收到我给尼赫鲁的信件之前发表的。信件是在9月6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苏斯洛夫：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那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葛罗米柯：印度驻苏大使对我说，中国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平静下来，实际上是将一切事情都推翻了。

苏斯洛夫：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带有怒气地）：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

苏斯洛夫：不仅是这样，还有你们政府的决定。

刘少奇：9月6日我通过安东诺夫给您的信件中讲，我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反击印度人。

苏斯洛夫：你们政府的决定，已经大大缓和了您的解释。

赫鲁晓夫：尽管印度首先进攻，但是，中国没有死人，而印度却死了人。

周恩来：如果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总不能对空鸣枪吧。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最近将要来访，这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和平解决问题，通过谈判解决。在我今年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们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赫鲁晓夫：周恩来同志，您担任外交部长多年，应当比我更清楚，如何通过不

流血的方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完全没有提出边界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这就不是我一个俄国人能够干预的了。我只是反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

周恩来：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另外，我们正在谈判中印之间 3 块有争议的地区。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首先开火。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例如，如果芬兰人进攻苏联边界，你们会不会反击？

苏斯洛夫：我们不会对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赫鲁晓夫：中央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新鲜事。我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赞成什么。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禁止开枪还击，开枪还击的命令是后来才下达的。斯大林的解释是，这也许是挑衅。当然，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仅仅是丧失了信心或勇气。但是，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的。

朱德：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中国 9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毅：西藏叛乱后，在印度出现了几个反华、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出现了针对我们在德里使馆和在加尔各答领事馆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辱骂中国领导人，高呼反华口号。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也没有一点借口，说我们有不友好的行动。

赫鲁晓夫：同你们相比，我们苏联代表在国外被杀的人就有不少。从我国建立以来，有不少苏联大使在国外遇害。在苏联，仅有一位德国大使在 1918 年被杀。美国大使馆和西德大使馆的窗户被砸烂过，那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陈毅：讲到如何有效地工作，能够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的方法会更有效，你们的方法则是机会主义的。

彭真：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问我，如何理解塔斯社的声明，如果还没有发现谁对谁错，就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那还算是老大哥吗？

王稼祥：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不是我们。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开了枪，然后死了人。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你们谈谈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因为任何人都认为，我们会同你们谈这件事。

周恩来：中共和苏共之间会有争论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在对外宣传上，我们一直强调同苏联的团结。

林彪：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打了 12 个小时，直到他们打光了子弹。人们会承认处理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方法，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边

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打了 12 个小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不得不击退它们，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主动击退它们。

毛泽东：是当地军事机关决定这样做的。

林彪：中央没有下命令。

毛泽东：我们不能看住达赖喇嘛，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大，他从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跑掉。

苏斯洛夫：你们应该事先知道他的企图和阴谋。

毛泽东：我们想把西藏地区的过渡推迟 4 年。

赫鲁晓夫：这就是你们的错误。

毛泽东：推迟西藏过渡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这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打击他们。这可能是你们不能领会的。这以后您自己也会看到“麦克马洪线”还会存在，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则没有了。

赫鲁晓夫：那就好。但问题不是“麦克马洪线”。我们不了解这条线，也不想了解。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将通过谈判解决。

赫鲁晓夫：如果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欢迎。

周恩来：您在 1 月 22 日向尼赫鲁建议，举行边界问题的会谈，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了。

毛泽东：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我们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

赫鲁晓夫：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原则性的共产党路线。

毛泽东：塔斯社的声明，使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兴高采烈。

苏斯洛夫：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推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搞僵了，那帝国主义者才高兴。我们有情报表明，美国已经在接近尼赫鲁，向他提供有关印度同中国冲突的情况。我们的行动是冷却反革命分子过热的期望。

林彪：整个问题是，谁先开的枪，而不是谁死掉了。

周恩来，按照你们的理由就是，如果窃贼闯进你的家，你把他揍了一顿，结果你还有罪。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更有甚者，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你离开了会场。这是一个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事实上，我也可以收拾我的提包，然后离开，但是我不会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课。他谴责我们对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做法。我们听了这一课。结果，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回来说：有一句套话叫“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不是说我们太傲慢了吗？

毛泽东：我们是以相互信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们这次也是如此。这很好吗。这样才能推进共同的事业。但是当你们采取公开立场时，我就想到了塔斯社的声明，那是不好的。

葛罗米柯：塔斯社的声明并没有破坏印度同中国的关系。

彭真：我们必须讲，的确是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然后开火，持续打了 2 个小时。毛泽东同志刚才说了，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什么事。

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你们的傲慢。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的声明就是偏袒印度，就是偏袒小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毛泽东：那么，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现在也相信，你们和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而且，我们把你们当成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我不明白，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不也从你们那里跑掉了。

赫鲁晓夫：达赖喇嘛跑掉，你们就没有错误？我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的确，让克伦斯基从苏联跑掉，是我们的错，但应该想到的是，这发生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列宁还有条件释放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丁将军。至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赶走了他。尼赫鲁可能会倒向美国。当同我们在一起有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同盟军。当我们给纳赛尔援助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反对我们。我们给他贷款建造阿斯旺水坝，这是一个策略。如果我们不给他贷款，纳赛尔可能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毛泽东：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没有看到另外一面，通过我们的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边来。

赫鲁晓夫：我们不相信纳赛尔会长期同我们站在一起。这是一条连接我们的很好的线，它随时会断掉。

陈毅：我非常气愤的是，你说的“同印度关系的恶化是我们的错”这句话。

赫鲁晓夫：我同样愤怒的是，你说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当权执政。

毛泽东：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

毛泽东：我想澄清一下，当米高扬同志在八大讲话时，我根本就没有参加。我想同米高扬同志个别谈谈。

赫鲁晓夫：你不参加会议，主要是因为米高扬要讲话。周恩来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是个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刘少奇：我们从未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必须听我们讲。收回你们政治上的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不说假话。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迁就，即便是我们的朋友。

陈毅：但是，你却对我们进行两个政治指责，说我们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现在的行为依然是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你们注意一些特别的疏忽，不要再进行猛烈的政治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陈毅同志，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怒。

赫鲁晓夫：你不要从你元帅的那个高度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到的人。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不再讲“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原因。我们不想任何党来当头。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是一个错误的局面。

毛泽东（用调和的方式）：陈毅说的是特殊性，你不要加以概括总结嘛。

王稼祥：整个事情可能是翻译出了错，陈毅没有讲，机会主义就是某种主义。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却经常说它们自己坠毁。这个你们不能贴上机会主义的标签吧。

苏斯洛夫：你们现在准备同印度谈判，这就很好嘛。

葛罗米柯：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宣布，准备促进局势的缓和？因为我这样说事先没有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要保留这个建议。

周恩来：不必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已经通知印度方面，在 10 月 15 日到 11 月 1 日这段时间里，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来访。

赫鲁晓夫：我想说一下有关副总统访问的问题。如果是副总统，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迷惑，为什么不是总统和外交部长访问中国。

周恩来：拉哈卡里什南的人选是印度自己决定的。印度总统和外交部长已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给我们发来最美好的祝愿。作为回应，我们再次邀请拉哈卡里什南访问中国。

毛泽东：《真理报》只是发表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的一部分，而塔斯社的声明却全文刊登。也许我们现在该停止讨论这个问题了。谈谈老挝问题吧。

赫鲁晓夫：好吧，让我们谈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是一个极不重要的问题，但对此谈的太多了。今天胡志明来见我们，给我们谈了老挝问题。我让他去见你，因为你们应该更关心这个问题。在波匈事件期间，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刘少奇同志和我立场不同，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好多天，我们都不能形成共同的看法。我们的立场变换，但我们达成协议，问题解决得很好。

毛泽东：我们反对老挝战事升级。

赫鲁晓夫：我们也反对。

刘少奇：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有一个扩大老挝斗争的计划，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他的立场。

赫鲁晓夫：我们不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如果扩大的话，美国人就会卷入。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上，肯定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当我们从民主德国进行大规模调动时，它们会立即驻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周边地区。如果局势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会极为迅速地摧毁民主德国，我们则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按照我们的观点，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不要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

毛泽东：我们完全赞同你的观点。我们基本上不仅不赞成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而且赞成保持台湾地区的现状。1958 年 8 月当我们对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打炮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打算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2 卷，第 3210-3222 页

文件 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

（1959 年 10 月 14 日）

摘自安东诺夫的工作日志

1959 年 10 月 21 日

绝密，№3

按照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消息。在交给毛泽东这条消息的原文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作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消息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条消息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势。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 H.C. 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

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 200 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这样一支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继续说，在 10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苏联关于裁军建议的作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 H.C. 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

对此，毛泽东指出，H.C. 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 10 到 20 年，甚至 30 到 40 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 年（1918—1940）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 1958 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在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来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论。"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 12000 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 600—7000 人。大约有 5000 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 80% 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为了表明西藏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尽力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问题。毛泽东说："达赖喇嘛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毛泽东进而又说，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倒比留在中国好，如果他留在中国，许多西藏的农民们就不会投入到民主改革中去了。毛泽东继续说，如果我们逮捕达赖，就会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抗。

毛泽东补充说，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是很难理解的；只有在西藏，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此，西藏的农奴阶级对地主的仇恨和憎恶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大部分地主已经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农奴自发地、热烈地赞成现在正在实施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说，西藏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结

构。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在中国甚至还有外国殖民地，比如说澳门。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400 年前就从中国掠走了这样一大块土地。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共中央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制定出现在不触动澳门的方针。

毛泽东特别提到："当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在一定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稳定。比如说去年，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指责中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但是，美国最终是孤立的。在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之后，美国并没有履行保卫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职责，他们处于了一种被动地位。"毛泽东继续说，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补充说，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与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毛泽东继续说，总的说来，我们去年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可以看作是为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麻烦中的另一部分是苏联制造的柏林问题的发展。中东危机、炮击海岛和柏林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事件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毛泽东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你们在欧洲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可能性。他继续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和蒋介石发生战争。"

毛泽东说，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尽了我们所能。美国人不想承认我们，并且每天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在报纸上和官方声明中以各种方式诅咒我们。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美国终止占领台湾的期限问题，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 5—10 年或者 15 年内撤离台湾，我们就准许美国在台湾呆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我们和他们做一种交易：你们美国人喜欢哪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永远保持紧张的局势，还是在一段时期后履行离开台湾的义务？毛泽东评论说，这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在华沙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果美国同意，那么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太愚蠢，他们寄希望于动用武力和制造高压。毛泽东继续说，中国没有派飞机飞往台湾，就连中国防空部队的侦察机也没有飞到过那里。同时，一直有美国制造的飞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实际上，不久以前，借用从苏联得到的武器，我们在北京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我对毛泽东说，从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来看，目前，这种武器已经从苏联运到中国，而且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使用上了这种武器，并且掌握的很好。但是击落这

架飞机的荣誉属于中国防空炮手们。我插话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们的武器的评价，并且将这次胜利与我们的帮助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听了苏共中央关于 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又说："你们的估计（比如对苏美关系）是正确的。我们表示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而又说，冷战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不利因素了。而只有在冷战真正成为对他们不利因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才会结束冷战。毛泽东强调说，在他与 H.C.赫鲁晓夫同志在 1958 年 7 月至 8 月的会谈中，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现在想要结束冷战，似乎对他们不利。毛泽东继续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冷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如果美国像以前一样，坚持强硬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得更强硬，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毛泽东随即又说，1957 年 12 月在莫斯科和 1958 年 7 月到 8 月在北京举行的他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曾就关于冷战将要成为美国的不利因素，关于哪一方害怕战争和关于好战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特征这些问题，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换了意见。这些集团的特征不仅仅是具有攻击性。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还具有侵略性。如果我们内部非常稳固，那么这些集团的成员将会采取守势。他们建立基地，就像用水坝阻挡洪水一样。上面提到的各个集团，就像是这种水坝一样。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的细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毛泽东进而又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殖民地，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许多范围内都有势力。毛泽东说，比如说美国，每一件事——从台湾到土耳其，其本质就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掠夺了许多东西，他们企图在每一个地方抓住每一件东西，不想让任何东西逃避他们的掌握，甚至是我们中国的金门岛。毛泽东继续说，比如说，在我们看来西柏林的版图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美国人非常害怕失去它，他们从各方面抓住它，他们显然害怕失去西柏林之后，会降低他们的国际威信，就好像他们失去西柏林就会失去其他一切一样。

毛泽东进而又说，至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列强应该开始明显地减少他们在西柏林的驻军。这需要很长时间，大约 10 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些西方人将被迫完全放弃西柏林。

毛泽东反复说，美国人害怕放弃任何东西。他接着说，但是，现在，即便是在

远东，我们也不会碰他们，甚至是在像澳门或金门这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方。通常，美国不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碰他们，那怕是最轻微的。他们不希望我们碰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任何地方。毛泽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骚扰他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国土，我们可以用 20 或者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生存、发展，最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

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

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目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他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对此，毛泽东讲述了 1957 年 5 月 24 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遭到破坏的那天（这件事是由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关系紧密的人组织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如何发现美国讨论推翻蒋介石计划的机密文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文件是在美国大使馆遭到破坏的时候，在示威者们用大铁锤砸开的保险柜中发现的。由此可见，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毛泽东同志对给他的那个机密报告表示感谢。他请求我们代他向 H.C. 赫鲁晓夫同志和那些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的所有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问候。

我本人对这次谈话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简要地向他讲述了苏联 1959 年经

济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已经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

大使馆顾问B.N.韦尔夏金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翻译阎明复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9-96

文件 10

苏共中央主席团第244次会议记录

（1959年10月15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A.Б.阿里斯托夫、H.И.别利亚耶夫、Л.И.勃列日涅夫、K.E.伏罗希洛夫、H.Г.伊格纳托夫、Я.Э.卡伦别尔津、A.П.基里连科、A.И.基里琴科、Ф.P.科兹洛夫、Д.C.科罗特钦科、A.H.柯西金、O.B.库西宁、K.T.马祖罗夫、B.П.姆扎瓦纳泽、H.B.波德戈尔内、Д.C.波利扬斯基、M.A.苏斯洛夫、E.A.福尔采娃；会议是由H.C.赫鲁晓夫主持的。

一、关于党和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勃列日涅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科兹洛夫、库西宁。）

问题的紧张程度——应该进行改善。

不进行辩论活动。

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

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

斯大林所执行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着反对派，如果它出现了，那么，就要彻底地消灭。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民主化。

我们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

与中国朋友的会谈记录，没有被保留在档案馆里，而是被销毁了。

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口头通报了会

谈情况。

把尤金与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告知金日成。[1]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情况。

代表团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的活动受到了赞扬，并认为访问的成果是富有成效的。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准备材料。

关于安东诺夫同志的电报——委托通过大使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

关于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三封信件——应该转交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答复。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2-33

文件 11

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草稿）

（1959 年 12 月 18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呈上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要做的《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请让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阅，如他们对草稿意见，请另行通知。

M. 苏斯洛夫

1959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0 周年国庆的报告，主席团同意代表团的活动，决定把这一问题通报给中央全会，同时也把我们

---

① 指 1956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1960 年 6 月赫鲁晓夫请金日成到莫斯科，并给他看了这份谈话记录。

同中共中央的关系通报给中央全会。

代表团今年9月赴北京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朋友们通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并就一系列现实的当代国际问题与兄弟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和在会见时所进行的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们一直深刻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千方百计支持他们的斗争。苏联人民为人民中国，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当代主要的根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同时，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

在向中央全会通报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中央主席团的出发点是：全会不仅应当知道这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还应该知道它的困难方面，为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坚定地贯彻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方针，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

在革命胜利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现在，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千方百计加快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任务，以便在今后10—20年的时间里使国家摆脱长期以来的贫穷状况，使之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根据自己的国情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只是同情，而且实际上总是帮助兄弟的中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可以充分地说，在291个工业企业和59个独立的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上，苏联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重大援助。其中135个企业已完全或部分投产。在设计，提供设备、材料和给予其他技术援助方面，从1950年至1957年期间，苏联所给予的援助以出口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0亿卢布。

在过去10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1.1万人。在苏联企业学习和实践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达7.5万人，大学生和研究生超过7000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中国援助，帮助中国100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或提供其他援助。

同志们，这是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小贡献。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有点儿被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明显地巩固了冲昏头脑。出现了骄傲和自大的成分，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在这次会议上，实质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计划，采取实施所谓“大跃进”的方针。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达到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8%—19%的速度还不够。他们抛弃了1956年所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多次改变计划，过度扩大计划。

为了给自己的新的经济计划找科学根据，中国的同志们开始发展值得怀疑的“以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经济不应有计划的逐步发展，而应采取跃进的冲击方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直接讲，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跃进”，应该按照“马鞍型”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遵循“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原则。马鞍型，刘少奇同志继续解释说，这意味着两头儿高，中间低。

中国的同志们认为这种跃进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是真正的群众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民经济似乎是靠加大劳动力的紧张程度，靠紧张再紧张。不难理解，这种领导国民经济的方法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了实现“大跃进”，中国的同志们大搞所谓的“小高炉”。他们认为借助这种办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大提高生铁和钢的产量。不顾对其他部门，首先是对农业的损害，大约有9000万人被投到了“小高炉”工作中去。1958年为建设自制的小高炉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结果炼出300万吨钢，但他们不得不从国家指标中划掉，因为这些钢，连中国同志自己都承认，回炉都不能用。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时代，当生产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时候，哪里还需要这样的金属呢?

顺便指出，在1959年整个苏联黑色冶金部门，其中包括采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总共才70万人。这年，我们的黑色冶金行业为国家生产矿石9440万吨，生铁4300万吨，钢6000万吨，轧材4690万吨。

尽管中国朋友们利用人民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违反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原理，结果造成了国家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普遍的紧张。1959年初，开始暴露出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部门严重落后。国内出现了紧张形势，居民粮食和工业品短缺。农业感到劳力不足，城市有将近1000万多余的工人，他们不得不被工厂解雇，重新返回农村。

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隐患，曾同志式地坦诚地给中国朋友们讲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及时地提醒中国人注意他们计划中的严重缺点，但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中国领导人才承认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失误。在中共中央1959年8月召开的全会上通过了大大缩小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决议，使之适应国家的现实能力。改变了对待小高炉的态度。尽管中国同志至今仍在报刊上继续强调用土办法大炼钢铁运动的意义，但实际上去年建起的成千上万座小高炉现在已停止使用，大多数已被遗弃或拆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同志们放弃跃进式前进。类似的跃进在中国农村还可以看到。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为取代现有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成立农民联合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中国的同志们企图实行明显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以军事化的方法组织劳动。在这种公社里，大体联合有5000个农户。地方工业、贸易和财政问题交给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建立劳动连、营、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有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直接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领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方针，强调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

位”。

我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中国报刊和个别负责同志的讲话，在这些报刊和个别的讲话里，中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少地方简直与共产主义没有差异。

在过分夸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同时，某些中国理论工作者公开攻击和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实施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把这一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某些“理论工作者”公开宣布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过时，应当被新的分配原则所取代。中国人所主张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建立公社吧，尽管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不具备。

自然，中国同志们的所有这些危险的表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简单粗陋的理解，不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到1959年初，中国的农村形势严重地恶化起来。按照统计资料，去年中国获得了大丰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城市，连农村都出现严重的粮食困难。

所谓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导致了商品粮的急剧减少。中国人自己承认，农村已卖给城里的粮食开始就地加工，没几个月就被公社吃光了。采购部门已付款临时存在公社里的粮食也被公社吃光了。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导致公社劳动纪律松弛；部分农民开始不好好出工；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在农村按证定额分配食品。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化迫使中国的同志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改变了对人民公社的许多观点和方针。生活严肃地纠正了他们。他们被迫在公社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纠正把农民财产充公的路线，取消了农村军事化制度。现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大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企业。中国的同志们现在强调这些联合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公社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现在是生产队，是实际上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房舍和小副业不再公有化。给农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励农民个人饲养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现在采取自愿原则。

当我们谈论中国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时，我们没忘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错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同志们领导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经验不足。当然，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但是，别人的经验，即便是最好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经

验，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共产党员和全体人员最理解的经验。需知中国同志们所犯的许多错误，当年我们都犯过。我们也曾试图建立公社，组织劳动大军，在集体农庄收入分配上允许平均主义。自然，中国同志知道这一切。但他们没吸取我们的经验。在进行类似的实验时，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能绕过去的。应当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人将清醒地估计事物的形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同志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怀疑。中国共产党 1956 年提出的这种思想工作方针，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实示上意味着放弃党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按照这一口号，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获得了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广泛可能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反动派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在学校讲坛上，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百花齐放”的理论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导致了 1957 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公开的反革命进攻。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同志们开始改变对“百花齐放”口号的初始解释，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这一口号，宣布将只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观点和学说的发展。结果，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又回到唯一正确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上来——在科学和文化上实施党性原则，但并没有公开放弃“百花齐放”的口号。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同志们试图赋予他们的某些措施以普遍意义，不仅仅对中国适用。在《人民日报》，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等等被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词汇来加以描述。

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开始效法中国，尽管在那里实施类似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后果。甚至在地方上我们也有一位同志，不分辨怎么回事，就试图宣传和贯彻中国朋友们的类似创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乍看起来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报告中央全会的理由。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正面报道、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

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而加深了这些错误。我还不用说，这样做我们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苏共和中共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现在让我转向我们同中国同志们存在一定分歧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确定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增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业、为保卫和平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主要的对外政策措施，与我们一起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而斗争。

然而，最近以来，尤其是从 1958 年开始，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出现骄傲和急躁的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对外政策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不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1958 年，中国出版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小册子，于是上述命题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下面从小册子中摘录出的几句话，代表着对帝国主义的典型看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中国领导人发动这场思想运动，试图以此教育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一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时令人产生吹牛和对战争威胁满不在乎的情绪。甚至试图为这种立场找理论根据。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就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1957 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言中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讲：“问题是不能用钢铁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

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继续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所有这些见解离对国际舞台力量对比作具体分析相去甚远。中国朋友们这样简单地号召不要怕帝国主义，要相信“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等等。看来，他们只是根据自己过去同蒋介石的斗争和朝鲜战争经验出发的，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现代战争估计不足，不知现代战争可造成数亿人的毁灭。

当然，不应该拿原子战争蕴藏的危险吓唬人民，但是也不应该安慰人民，说战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轻视它。

当教育人民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就可能对现代战争产生错误概念，国家和人民就可能对战争处于无准备的状态。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应该教育人民树立相信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信念，让每一个人都坚信，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斗争多么残酷，胜利将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战争。在苏共二十大决议中，兄弟党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包含着当代正确的结论，在当代条件下，不存在所臆想的战争不可避免性。捍卫和平事业的是当代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所有这一切力量可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和保障和平。正是这一点决定着我们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长期维护和平的路线。这就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战争和和平的观点；我们不止一次给中共领导人讲过这些观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他们解除了警报。

例如，去年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紧张的时候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收复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着正义的斗争。他们不止一次声明，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支持这一立场。

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

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盟友的义务把我国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从我们截获的秘密文件中得知，美国统治集团已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准备把上述沿海岛屿交还中国。然而，当把沿海地区的形势弄到白热化程度，而且按照自己的声明走了很远之后，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同志们却踟蹰起来。他们开始强调，说什么中国不急于解放沿海岛屿，它似乎对蒋介石在这些岛上驻军感兴趣。

此后整个事情变成了定期炮击列岛和对美国发表警告；“严重警告”现在已达70多个。

我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怎么能对武装敌人呆在它的岸边和家门口感兴趣。当时很清楚，中国的同志们只是动用福建前线的大炮，然后又改变主意，其行动是不谨慎的。这被国外看成是退却。美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大力宣扬这一事实，肯定这是“实力政策”的结果。

对此还应该补充的是，美国当局为了宣传目的，极力把中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行动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他们挑衅性地强调，说中国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我们协商过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它对日本的关系上。在1958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是逐步同这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中国人努力设法同日本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国释放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并遣送他们回国。

中国朋友们对日本的策略路线在1958年上半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导火线是一次在日本长崎市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这次事件之后中国方面停止了同日本的所有进出口业务，拒绝在渔业协定上签字，中断了文化联系。中国报刊展开了反对日本岸信介政府的广泛运动。

1958年6月5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发言时威胁说：“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继续加剧紧张形势和组织类似的挑衅，那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使1945年的事情重演。”

中国的压力，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被看成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结果日本借口保障国家安全开始积极地武装自己，加紧了日美所谓“安保条约”的审议谈判。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所指望的日本进步界人士的支持。

近来中国朋友们，看来开始明白，他们对日本施加如此猛烈的压力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重新调整中日联系。不久前，应周恩来邀请，前日本首

相石桥湛山来到中国。在周恩来和石桥湛山签署的公报中强调，中国人民应根据万隆原则“改善两国关系”。

今年春天，中印关系严重恶化。这与1959年3月西藏叛乱有关。大概印度的反动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但是，假如在西藏及时实行民主改革，根据西藏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实施相应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对反动分子保持应有的警惕，西藏的叛乱就不会出现了。很遗憾，中国的同志们没从苏共中央的警告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苏共中央早就提醒注意反革命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同志们坚决镇压西藏的反革命叛乱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声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加剧国际紧张形势。在最近联合国大会第14次会议上，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其中包括利用中印边界争端给人民中国脸上抹黑的企图。

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在于，把西藏问题变成首先是中印之间的纠纷之源，使亚洲的这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加剧东南亚的紧张形势，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立场。美国报刊上公开写到：对于消除中国的威望，印度说一句话胜过美国说一万句。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没考虑到帝国主义分子策略的这些特点。为了回答帝国主义报刊所掀起的关于西藏的议论，他们发起了自己的宣传运动，集中火力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他们指责印度和尼赫本人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中国。还是基于这种原因，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长篇社论。

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世人所知。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他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尼赫鲁表现得十分克制。在自己的多次演说中，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建立所谓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强调印中友谊的意义。印度不只一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正因如此，同美英资本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资产阶级右翼猛烈抨击尼赫鲁，指责他对待人民中国“不彻底”和“退让”。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尼赫鲁，改变印度中立的对外政策，恢复它同西方结盟的权利。假若印度的反动集团实现这些目的，那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尼赫鲁政府的现今对外政策是争取巩固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

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如此不调和地反对尼赫鲁目的何在呢？他们自己解释说，他们这样作是出于“团结——斗争”的原则。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他们给尼赫鲁戴上了“两面派”，“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绅士，一半是流氓”的桂冠，似乎是“迫使”他加强同中国的友谊。

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同这些“鬼”相处？如何同印度建立关系？中国的同志们找到办法：迫使尼赫鲁悔过，通过施压迫使他同中国合作。而且中国人还说，他们考虑到了尼赫鲁政府垮台的可能性，即使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上台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这只能加快印度的革命。

很清楚，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同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果不出所料，西藏叛乱平息之后，中国军队前进到了中印边界。

人民中国和印度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这里不可能再去纠缠历史问题的某些涉及喜马拉雅山地区领土问题的实质。但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同志们以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使双方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搁了起来，待以后解决。他们强调，为了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不立即强行划定边界，将来要考虑实际形成的状况。但是中印争端由于西藏叛乱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边界领土问题又尖锐起来。8月25日，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印度方面死伤了几个人。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利用这一冲突大肆叫嚣，指责“人民中国实施侵略”。在印度国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同时对尼赫鲁和印度共产党也展开了攻击。

应该指出，上述事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出访美国之前几天里发生的。敌人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利用印中冲突破坏苏联的和平行动，把中国行动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想以此挑起我们同印度的争论。

考虑到这一切，苏共中央决定致信北京，表达我们对由于中印冲突所出现的形势的关切。同时还决定由塔斯社发表声明，促使和平调解所出现的冲突，让国际社会正确理确我们的立场。苏联的行动当时暂时制止住了冲突的发展，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危险把戏。中国和印度政府声明，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再继续扩大分歧，他们将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边界问题。

但事态进程表明，印中边界问题蕴藏着新的危险。众所周知，10月21日印中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出现了人员伤亡。此后印度又爆发了更大的反华运动。

应该指出，在印度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妄图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帮了印度反动分子的忙，使他们能够

容易地动员本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人民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境。

中国的同志们肯定，他们是从考虑自卫和本国声望出发，真理和正义在中国一边。所以必须向全会报告，我们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塔斯社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声明，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国朋友们在信中指出，该政府的“内外政策早就有了反动趋向”。信中接着说：“我们认为，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仅仅实行迁就退让政策，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在他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只能助长他们的猖獗，如果中国不予以还击和谴责他们。这不仅对中印关系不利，而且也不利于让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再继续向西方靠近。”

信中包括有这样的内容，指责“塔斯社声明把中国和苏联对中印边界事件的不同态度暴露于全世界，这只能使印度资产阶级、美英帝国主义者高兴，让他们利用这一点挑拨中苏关系。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分析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他们是：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冲突，中国领导对印度形势和尼赫鲁行为的评价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主观臆断的。

请允许我援引一下我们的印度朋友在致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在指出由于冲突，印度形势在不断恶化时，印度朋友们说：“如果再继续争论，这将对印度的反动势力有利，对广大印度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印度的同志们正当地认为，印中关系继续恶化。可能削弱印度的民主运动，深刻动摇印共的阵地，使其面临被禁止的威胁。用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话说，印度共产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中国的立场，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提出边界问题，不知其中隐藏着什么目的。所有印共领导人都示表诧异，为什么中国政府给印度反动派提供了介入这一边境冲突的机会。

至于中国同志们肯定，说印度反动派、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苏对印中边界事件立场不一表示惊喜，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主义者确实惊喜过。但是在印中冲突发生的时候，假如苏联也介入这一冲突和造成这种印象，似乎为反对尼赫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应该认为，将更加高兴和感到惊喜。事实表明，当苏联主张和平调解印中冲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喧嚣明显地降低了。

中印关系紧张和中国同志们的其他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什么结果？导致了中国

国际威望的下降，导致了它在亚洲阵地的削弱，导致了许多亚洲国家同西方和美国结盟趋势的加强，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非常仇视他们的长期以来的敌人——殖民主义者。

中国和印尼关系目前变坏便是其标志，在此之前两国关系一直很好。

事情在于，在印尼生活着 200 多万华侨。大部分华人从事贸易，对印尼经济有着很大影响。这早就使印度尼西亚人产生了压力，但在最近以前他们没敢采取任何措施。今年 11 月苏加诺总统颁发决定，禁止外国（其中有 10 万以上中国人）在农业地区经商。印尼的反动派利用这件事发起了广泛的反华运动，并企图使其具有反共性质。

中国朋友们试图抗议印尼政府所采取的似乎是歧视中国公民的措施。但是中国人的抗议没有也不会有成效。它只能加剧印尼的反华情绪，因为客观上事情显得是这样的，人民中国政府庇护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印尼人的故乡剥削印尼人。

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努力利用中印（尼）争端挑拨印度尼亚西同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使印尼更加依附于西方国家。难道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阵营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吗?

如果考虑到中国同缅甸和泰国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朋友们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同亚洲和远东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同志们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孤立。是的，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主要怨中国领导人自己。在苏联和其他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努力维护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同志们对待亚洲许多中立国家的行动实际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相违背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缺乏应有的一致性是不正常的。所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利用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上述问题。同时还打算，在苏斯洛夫同刘少奇或周恩来同志会谈时讨论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存有分歧的某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这样做了。

参加对外政策问题讨论的，我方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中方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等同志。

会谈于 10 月 2 日在中共政治局驻地举行。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他访美和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消息。同时指出，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间普遍存

在着一种有利于对悬而未决的争端问题进行和平调解的情绪，对于继续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坚定前进出现了种完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我们完全不理解他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印度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我们两党的领导在最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必须更好地互通消息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的盟友，不知道明天中国同志们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什么措施，不能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仅被共同的思想和目的，而且被盟友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国家不正确的行动会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形势造成困难。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宣传直接把中国同志们的行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各个共产党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对外政策方针。

至于苏共中央，我们定期向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的领导通报苏联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行动，必要时还要同他们一起协商。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同志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所做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宣布，他们对待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还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他们对待尼赫鲁政府所采取的路线也是正确的。我们的会谈一时气氛非常紧张。事情僵到这种程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对待尼赫鲁所采取的路线似乎有些迁就，看风使舵，而中国的政策比较坚定和正确。很明白，对类似说法，我们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鉴于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怎样理解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他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否认为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

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的同志们表面上承认世界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倾向于只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临时的策略手段。

中国的同志们对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承认同社会主义阵营对话的思想的动机理解得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变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不久前取得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影响的增长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内爱好和平力量影响的不断增长。

甚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比如著名的美国记者 S. 苏尔茨贝格今年在纽约出版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瑕疵》一书，其中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西方在同社会主义竞争中失败了。苏尔茨贝格这样写道：

"1945 年……美国和它的西方朋友的战略形势很好。今天，其形势可以这样概括，即使作乐观估计，也只能称不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了自己在中东和亚洲的城堡。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站起来了——他们大多数反对我们。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我们失去了我们一时的核优势，而苏维埃俄国在惊人迅速的复苏之后在所有方面变成了超级大国。

"我们亲眼看到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这一惊人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现在不能不看到力量对比中的这种变化，从中得出结论以改变自己破产的对外政策。然而某些中国同志把这些进展看成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新的阴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中国的同志们不是把美英当局某些人士出现的有益于和平的情绪变化用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用来发动新的反美攻势，实际是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报刊近来加紧了反美和反英宣传。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电影在中国一些城市仅放映了 2—3 天就停止了。

从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完全同意我们的和平共处方针。他们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原则，需要有益于防止战争和有益于和平的相互退让，需要想到考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利益。列宁很好地指出了它的理论根据，他教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善于贯彻灵活的对外政策，善于协商，当生活需要，事业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当然，在原则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退让过，将来也不会退让。但是，正是为了这些原则的胜利，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迅速向共产主义推进，必须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原则。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和平共处是必要的，因为它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建立良好的对外政策条件的可能性。它可以为我们为保障社会主义力量超过资本主义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蕴藏的所有可能和优势赢得必要的时间。不难理解，在我们时代，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提醒我们注意的列宁的这一指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现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时代对我们有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此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世界的革命进程。时代对社会主义有利，赢得 7—10 年

的时间意味着保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竞赛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里胜利的不可避免性，今天不只是为共产主义者所承认。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胜利。我们坚信，在未来时代，社会主义体系会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力量优势会不断地增长，追随我们的榜样，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一定能胜利。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不是靠外部武器的力量，而首先是靠榜样的力量，靠自己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力量取胜。

我们全身心倾注于这一胜利，为此我们正在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为了接近这一胜利的时刻，必须冒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今天这一战争可能是导弹核战争。这种无数人牺牲和广袤千里变为废墟的战争不仅不能加速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会大大制约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迟滞它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

在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我们党考虑到，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种危险扎根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的反人民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之中。存在军事进攻的威胁，要求我们对侵略势力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做好保卫苏维埃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成果的准备。只要战争危险未被消除，没有达到撤底全面裁军，我们就应该一直关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自己武装力量的实力。

当我们说和平共处原则和我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业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我们明白，在这些集团中有不少“冷战”和热战的疯狂追随者。有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热衷于军备竞赛。最后，还有不少失去理智的疯子，他们憎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准备盲目地冒任何风险。自然，不能为这些人的行动，为他们努力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形势做担保。

但是，如果单从帝国主义分子可能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出发，那么就可能忽略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巩固和平、制止战争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放过这种可能性，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千方百计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孤立他们和钳制他们，保障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支持和平事业。正是这样才是当代条件下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所有世界人民的期望，而报之以穷兵黩武则形是而实非。

应该指出，在10月2日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们宣布，他们不希望战争，将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通过谈判调解同印度的冲突。他们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同我们有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目的。我们对此表示了满意。

在会谈过程中就老挝形势交换了意见。而且我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我们达成协议：应该继续坚持执行1954年的日内瓦老挝问题协定。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这个国家内战扩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不能不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注意他们接受苏共代表团批评意见时的神经过敏和抱怨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说，这不符合共产党兄弟大家庭里所形成的平等和同志关系原则。应该指出，中国的同志们在过去对苏共中央提过批评意见，而我们对此保持了应有尊重——尽管我们对这些意见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共领导说出我们的批评意见，况且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共的领导作用，虽说我党中央反驳过这种说法。

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同中国的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把你们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以高傲的态度同我们讲话，即使是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中国的朋友们开始平静下来，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立场。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也对同我们存有某些分歧感到不安并想消除分歧。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在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

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为了广泛讨论苏共与中共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共领导人以前也见过面。这方面重要的一次是赫鲁晓夫同志同毛泽东1958年在北京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国际形势由于美英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而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我们讨论了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情况下实施共同防御的措施问题，制订了防止近东冲突的共同路线。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永远是一致的。“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比做十个指头，”毛泽东对我们说：“那我们有九个指头完全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指头有分歧。”我们认为有必要消除这些分歧。

我们同人民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而全面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兄弟般关系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由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来丰富的。我们党继续以该有的注意力对待包括中国同志们在内的国外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同时，必须创造性地批判地思索这一经验，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勇敢创新同“左倾”幼稚病和标新立异相区别，以便为我们的干部指明方向，不使他们迷途。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

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所以，应该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加大力度宣传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措施，坚定地捍卫为我

们党的整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对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毫无疑问，关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总路线依然未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警惕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友谊，不给人以破坏中苏关系的机会。应该说，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势力，他们正企图寻找我们同中国相互关系中的缝隙，挑拨我们相互争吵。可以坚定地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应坚决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陈述的、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原则，应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谨慎、尊重和分寸感，对需要我们两党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的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千方百计促进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

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文件 12

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 年 7 月 13 日）

兹寄上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的草稿，其题目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如果有意见，请告知。

Φ. 科兹洛夫

1960年7月13日

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的报告》

同志们!

1960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在6月28日报刊公布的公报中已经报道过了。另一次会议由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51个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就当代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共运的一些结论交换了意见。

会议参加者认为，世界发展的整个过程，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绩，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事业斗争的开展，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削弱完全证明了苏共第二十和二十一大的决议，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是正确的。

在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宪章和它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斗纲领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布加勒斯特会议参加者一致宣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人民对战争危险必须保持警惕性（因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仍有侵略战争的土壤），关于不同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结论完全适合于当代的情况。

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同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问题的错误观点。

事情在于，近来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许多原则，公开反对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从而在这些问题上把自己置于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与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兄弟党的所有代表完全一致，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各兄弟党的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指出了我党和苏联政府近年来的活动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

一、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

同志们！

去年 12 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黩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 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 1958 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不能允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 90 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和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的列宁指导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做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 Л. 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 6 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

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6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6月5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做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Б.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动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当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应他们的请求，苏共中央接见了他们。出席会谈的我方有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伊利乔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中方有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同志。会谈从早上 3 点持续到晚上 11 点。在会谈中讨论了同中共领导所有的基本分歧。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我们认为，第一，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认为他们的措施是极端危险的，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直接对彭真和其他人讲：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在讲述了我党对中国人观点的实质的批评意见之后，我们对他们说，他们背离了列宁主义，不理解列宁学说的精神，不认为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永垂不朽的列宁的指示。

在这次会谈中，我们还分析了中国领导内部政治的某些阴暗方面，表示相信必

须对我们存有分歧的所有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必须消除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当代的原则问题建立统一的观点。我们表示，希望中国的同志们冷静地掂量自己行动的后果，应该懂得他们对最重要的国际发展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能给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带来重大损失。

几天之后，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国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把中国同志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看作是派别活动。他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等待的是尊重的态度。

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但同时又怀疑我党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明显的事实所作的解释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政策的矛盾性。

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中，完全证实了中国的领导同志们不仅与苏共，而且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系列当代国际形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他们认识不到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中所发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的意义，实际上否认在当代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正确地理解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会议宣言，否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存在两条道路的可能性，错误地以宗派主义对待中立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一系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中国人的这种立场证明他们走上了修正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根本原则的道路。

还彻底弄清了，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批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立场的措施和形式是不对的，在兄弟党的关系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座谈中不仅驳斥了中共领导的反列宁观点，还详尽地阐述了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二、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苏共中央今年 6 月 21 日关于中共领导行动和立场的新闻简报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看到苏共中央简报的还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的代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不正确的措施和行动，看出在兄弟党关系上他们背离所确定的规章和原则，看出在当代世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同志观点的错误性。

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会议宣言看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的问题。但中共领导人近来断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似乎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借口弄清这些问题，中国同志们的确试图推翻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最重要的原则，以自己特殊的教条主义的立场与之相对抗。

请允许我阐述一下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和他们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实质。

首先谈当今时代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指出，“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界限及其成为世界体系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这样，我党二十大在总结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舞台上力量分野的根本变化。

按照这一结论，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宣言中宣布：“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开端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是由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决定的……”

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帝国主义的瓦解过程，二、这一革命进程已发展到这种程度，所出现的社会主义体系正给予世界发展进程以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同志们在自己的理论发言中努力回避该宣言对我们时代的评述。他们认为，似乎苏共背离了列宁关于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认为列宁几十年前所做出的这一论断应保持不变。

然而只有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才可以这样讲话。从列宁对他生前时代提出自己的论断时起已过去许多年，发生了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等这样一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须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不只一次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和它的变化”，真正的群众政治领导，应该善于抓住需要改变政治口号和策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

看来，中国人不懂或装作不懂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低估我们时代主要特点——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发展的意义，贬低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影响的力量，即实际忽视当今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世界舞台力量对比中所出现

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他们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提出的许多原则。

我们的时代不像1917年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这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和巩固的时代。

列宁说过，1917年之后，如果不把苏维埃俄国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已变成当代强大因素、对世界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伟大列宁的预见实现了：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正在解决“变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存在于一个国家而不能决定世界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对整个世界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

现在不是帝国主义势力，而是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庸国家人民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强大洪流震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使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独裁，剥夺了它肆意妄为的可能。难道在帝国主义绝对统治的时代殖民体系的崩溃是可思议的吗？不，当然不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和加强的条件下，人民斗争浪潮的不断增长才导致殖民主义的垮台。

中国同志毫无根据地断言，似乎我们在评价帝国主义的本质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但这是对我们党的诬蔑，是有意歪曲我们的政策。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讲，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没有变，它的侵略本性我们谁也没有否定。

在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文件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的发言中，都在努力强调，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而在我们时代它反而变得更加凶恶，因为它看到，历史的发展将无挽回地导致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中共领导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是由于他们低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力量，没看到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削弱。

况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该忽视帝国主义正经受它的崩溃和瓦解时期，它的力量远不是50年前甚至5—10年前的时候了。现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考虑到世界形势的这些巨大变化，从中为自己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战略战术找出了必要的结论。这完全来自列宁的著名指示："……最高的和唯一正确的学说标准……"应该是"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过程"。

现在我们转入我们同中国人分歧的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问题。

政治上稍微有一点儿知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并列即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依某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结果。世界上并列存在两个敌对的体系，这一事实似乎造成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否同时存在？问题在于，这一同时存在将采取什么形式——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在现今条件下，唯一理智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共产党人——是有现实思维的人。他们考虑到，热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结果。须知氢爆炸的火焰可以吞噬亿万人的生命，而某些国家和民族可能整个从地球上消失掉。共产党正为建立一种能够避免新的世界战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奋斗。和平共处原则——这不是暂时的策略口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中国同志以前奉行的也是这一立场。但近来他们实质上开始背离在其制定中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潘查希拉"[①]原则。和平共处逐渐被他们解释成"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时间"。下述事实说明了他们对待和平共处思想的态度：在签署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蒙古公报时，周恩来同志把蒙古同志们写进草案里的和平共处一词删掉了。

中共中央代表在北京同工会活动家们会谈中公开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称作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还讲，"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而帮帝国主义的忙"。

然而，放弃和平共处原则则意味着世界战争方针。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两条路可走的原则：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毁灭性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中国领导人近来强调，似乎他们不大理解这一原则。"和平共处，否则就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不太理解"——彭真同志今年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这样说。

---

① "潘查希拉"，印地语，意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同志看到了什么出路？他们讲，似乎有第三条路——“局部战争”和没有世界战争的“冷战”。刘宁一和其他中国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会议上也公开这样讲过。刘少奇同志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中也表露过这种思想。

但是，每一位有健康思维的共产党员都十分清楚，这所谓的“第三条路”通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局部战争”不会保持多久，它很容易变成世界战争。沿着局部战争之路往下走，这意味着滑到深渊的边缘。所谓的“第三条路”意味着继续人民厌恶的军备竞赛。试图实现这条道路将给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提供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描绘成“局部战争”、“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追随者。我们党认为这“第三条路”是冒险之路。

彻底实现和平共处政策将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得到巩固，保障它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给予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可能。另一方面，和平共处可促使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内部离心力的增长，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削弱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阵地。

中共领导人试图强调，似乎苏共实施和平共处原则的方针意味着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阶级斗争，放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但他们明显地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弄混淆了。只有不懂列宁主义实质的人才看不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是别的，正是世界范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正是从中赢得胜利的。

争取和平共处反对以帝国主义者为其载体的战争的斗争正在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从而促进人民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辩证主义者，谁就不能对当代最重要的现象做创造性的分析。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倡过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坚定地说，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开始越来越尖锐。事情的确是这样。和平共处的形势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劳动者社会解放的斗争，为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创造了广泛的可能。

同志们，这是事实，在国际气氛缓和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碉堡发起了猛攻。大家仍记忆犹新的是，朝鲜人民起来反对李承晚专制制度，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规模空前，土耳其推翻了曼德列斯的恐怖制度，此外，近来还有许多重要事件。

由于彻底贯彻和平共处路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人民中博得了巨大威信。苏联的国际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世界人民越来越坚信苏联是和平政策、和平共处政策的旗手。

正是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爱好和平的政策，人民现在才把共产主义和和平政策等同起来，把帝国主义和战争和侵略政策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我们党的伟大成果！

列宁遗言嘱咐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坚决地毫不动摇地遵循列宁这一英明的遗训。

中国同志还反对我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中以及莫斯科宣言中所提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则。我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到底坚持什么主张呢？

考虑到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情况，我党二十大做出了在当今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这一命题获得了所有兄弟党的全力支持。莫斯科宣言写道："在当代和平的力量获得了如此的增长，以致防止战争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共领导现在似乎背离了这一立场，尽管它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比如，在《红旗》杂志上写道："……只要在存在帝国主义制度，世界上就绝对不会结束最尖锐的暴力形式——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同志 6 月 17 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也问道："怎么能说在人类生活中有排除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这里的事情不在于中国领导人设想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是可能的，有谁没看到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也认为，帝国主义会试图发动战争。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说："在当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依然存在，决不能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同中国人的分歧不在这里。

事情在于，中共领导认为世界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布尔加勒斯特同彭真会谈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他说："我们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你们断言——如果我们理解中国方面是没有错误的话——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策略——让人们做战争不可避免的准备？"对此彭真回答说："是的，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中国同志对待战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

的，所以应该给人民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坚持战争方针。按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宣传战争不可避免，而不是动员人民为防止战争而斗争。所以在中国流行“全民皆兵”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有这种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观点？问题依然在于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估计不足和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依然有能力任意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否以战争代替和平问题，是否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还是放弃侵略行动，是进行局部战争还是总体战争，等等。

《红旗》杂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终是由帝国主义总司令部决定的。“当然，帝国主义者最终是否发动战争，”——该杂志里写道——“这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总参谋长。”这一声明不是偶尔的词句，它反映的是中共领导的观点。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参谋长，”——他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能替他们决定他们的事情。”这样，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意见，我们只好向帝国主义军队的将军们投降。但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国际舞台上现实力量对比的蔑视。

苏共二十大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做出在我们当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所依据的主要是以下决定性因素：苏联实力的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和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组织性和觉悟的增长；诸如广泛的和平拥护者运动这种因素的增大；拥护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数目的增长；帝国主义现在没有当年殖民主义体系时那样可靠的后备力量了。

当共产党人说现在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说存在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平。他们的出发点是，和平只能靠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积极而坚决的行动来捍卫。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作为最热忱的不疲倦和平斗士，把这一斗争看成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关于在我们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论断，不是抽象的智慧，而是动员巨大力量的战斗口号。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争取和平斗争胜利的前景，帮助人们克服内心悲观情绪、信心不足和宿命论，坚定人民可以捍卫和平的信心。相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命题可以瓦解人民积极的斗志，使人民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

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治活动家，如艾森豪威尔现在都被迫承认，帝国主义已无能力打赢新的世界战争，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他们的悲鸣！难道在类似的帝国主义头子的声明中我们就看不到他们对我们力量的估价，对我们政策对人民

群众的巨大吸引力的承认吗?

在当代，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把侵略者和军事冒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在争取自由和保卫自由免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的斗争中给人民以最有力的援助。正是由于苏联的坚决行动才打破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干涉，防止了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好了的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进攻。否则，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冒险行动有可能发展成为危险的世界冲突。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的成就，他们在世界经济领先中的成果使社会主义正在变化成这样一种力量：即使最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觉得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毫无希望。这样，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的一部分还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人民一定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不久之前，中国同志们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讲:“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争取 15 年的和平，那时我们在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也不敢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全世界巩固的和平将有保障。”现在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这一正确的观点。

同志们，总而言之应该说，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和不彻底的。一方面，他们宣布，帝国主义衰落了，变成了“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没有制止它的力量。

这种不彻底性的基础，看来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对现代战争没有正确的观念。毛泽东同志 1958 年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计算各国居民的数量，军队的实力并以此确定各方面的力量。但是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至少是 19 世纪甚至是 18 世纪的立场，那时必须要求以刺刀消灭敌人。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装备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军队手中。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无论给人民造成多大牺牲，这一牺牲都是值得的。1957 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在涉及到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后果时，毛泽东同志说：可能全世界 27 亿人口死掉一半，或者更多，达到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通过热核灾难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经过废墟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同志们想引导人民所走道路的实质。

不难看出，中国同志们的类似立场对于人类孕育着最可怕的后果，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革命理论不需要导弹和氢弹为它开辟道路。赫鲁晓夫

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正确地称需要通过原子弹氢弹战争走向共产主义的主张为疯人呓语。绝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世界战争永远孕育着革命，但革命不一定必须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革命的基础，而某一国家革命形势的出现不一定要有军事形势。

所以，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原则，绝不是像中国同志们企图断言的那样，要使被压迫的人民永遭被奴役的命运。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革命解放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们把反对腐朽的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看成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战争，而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向人民提供武器的方式。说苏联的政策似乎在制约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这是昧着良心诬蔑苏联的政策和实践。

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现实地看待当代形势。我们清楚地知道，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在垂死挣扎时可能铤而走险，发动战争。所以苏联政府努力制止这种冒险，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胆敢挑起战争，那就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苏联的军事实力为世界所知。为了制止所有的侵略，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各种型号的导弹武器。最近几天我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在 1 万 3 千公里的距离上精确地命中太平洋预定目标就证明了这一点。

5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消灭美国侦察机；声明我们将对美国人及其盟友企图用来对我国领空派遣飞机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我们坚决声明，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开始武装干涉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人民——这不是在“劝说”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在“乞求和平”，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行动，是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和发动战争的积极斗争。

苏联的武装力量捍卫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使之不可侵犯。关于这一点哥穆尔卡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倘若不是苏联在发展防御武器首先是导弹武器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倘若苏联没有这种实力，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拥有这种武器就可能同我们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之所以不敢进攻，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攻，他们的司令部没有拟定出进攻期限，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共产主义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促使战争的发生，而是结束所有的战争。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肯定要灭亡，这是历史注定了的。但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在灭亡过程中尽量给人类少带一些痛苦，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地球上不留下废墟和灰烬，人民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人民自己服务。

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里的胜利不需要发动热核战争。我们共产党人遵循最人道的思想，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分子消灭亿万人的生命，毁坏当代生产中心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们的生命和繁荣高于一切。

同志们!

在我们时代，裁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志们的观点同其他兄弟党的共同立场是相矛盾的。

我们党认为全面彻底裁军是防止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基本途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但中国同志把这种支持连同我们的裁军建议都看成是外交手腕。既然存在帝国主义，如列宁所说，全面裁军——这只不过是幻想。所以，谈论裁军的可能性，意味着散布幻想，扼杀阶级斗争。

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对待裁军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裁军问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提出来的，正是遵照他的训令，我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裁军建议。

通过把裁军问题提到国际生活日程上来，能使苏联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加强和平共处事业。为了保障和平，不能只口头上承认和平，必须迈出实际的步骤。通过向人民群众宣布全面裁军的思想，这就为争取和平指明了具体的目标。这一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反对它。裁军政策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的代表者。

第二，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现在也可做到某种程度的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限制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使用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民的巨大胜利了，它大大有利于在世界上建立安宁的环境。同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方面也可赢得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样在全世界面前他们成了拯救人民免遭核战争灾难威胁的救星。难道能像中国同志那样，把这看成是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吗?

第三，提出裁军口号今天就限制着军国主义集团扩大军备竞赛、增加军事税收的可能性。

第四，通过提出裁军问题，我党帮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消灭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我们消灭这种军事基地的要求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是一致的，日本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最后，提出裁军问题，使苏联共产党给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打击，促使拒绝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的数目增多，使由于奉行不明智政策被吸引参加这些集团的国家容易脱离他们。

由此看来，裁军斗争不只是外交手段。它是严肃的政治行动，它是以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的冷静分析为依据的。苏联共产党认为，存在实现裁军措施的可能性，必须充分利用之。

当然，我们对在近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不抱任何幻想。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是及时的，应该为它的实现进行不懈地奋斗。放弃裁军斗争或放弃停止军备竞赛的斗争，中共领导的立场实际上就是要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将给整个和平事业带来损失，给和平事业的敌人以帮助。

也不能同意中国同志们这样的论点，认为裁军口号将使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中国这一命题最积极的正是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员。“对于我们未独立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比如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达格利奥同志声明说:“十分清楚，和平和裁军对于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援助。”

真奇怪，怎么能够这样看待问题，把全面裁军看成是涉及受殖民者压迫的没有武装的人民的事？在苏联的建议里，首先讲的是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大国的裁减军备。

中国同志怎么也不能理解，如果宣布裁军是不能实现的理想，是幻想，那就不能动员群众起来为裁军即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当直接对群众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实现的事的时候，群众能站起来为裁军而斗争吗?

中共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和和平共处问题的不正确的观点，不是没有干系的理论练习。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同志的实践活动，导致完全消极的后果。近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和平运动，国际工会、妇女、青年运动，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等）中的代表的行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努力阻止这些组织的活动。

中共领导人试图怀疑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外政策措施的正确性。

正如出席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回来的许多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劝他们“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建议他们“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这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

苏共中央认为类似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教导共产党人要有灵活的策略，善于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遵循列宁的指示，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政府进行谈判。同志们，请想象一下，假如苏联坚持这种“不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的政策，世界将发生什么。正因为

苏联遵循了列宁的指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成立了反希特勒联盟。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积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孤立侵略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苏联政府在不作原则让步的情况下，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策略，达成协议和做出理智的妥协。

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出访资本主义国家，为广大群众了解苏联政策的真相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提供了良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访问对社会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大大巩固了共产党、和平和进步拥护者的阵地。例如，美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E. 弗林同志讲："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对我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激起了他们对苏联的友好感情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

苏联政府首脑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法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取得这些访问的成绩是不易的，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势力拼命破坏访问，制造困难，不让赫鲁晓夫同志宣传苏联爱好和平政策的真相，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近几天，赫鲁晓夫同志对中立的奥地利的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功。同志们，奥地利人民给予赫鲁晓夫同志的热烈接待和艾森豪威尔不久前远东之行的可耻失败（日本人民不允许他进入日本）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是人民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是苏联国际威望和它不懈地争取和平的斗争深入人心的有力证明。

赫鲁晓夫同志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行和他在最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演说——这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积极的活动形式。这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直接在资本主义巢穴里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具体的实际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帝国主义分子让过步。回忆下面一件事就是以说明这一点了：在美国人以侦察机挑衅飞行破坏高级会议时，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是以何等的尊严和对我们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捍卫了我们的立场。

同志们！下面我想分析一下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暴露出来的分歧。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宣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苏共的分歧已有 4 年多了，即从我党二十大开始。

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结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论述为其依据的。

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坚决反对所谓“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理论”。他说:“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全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在二十大决议中阐述的通过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不仅总结了我党的经验，而且总结了许多兄弟党的经验，他们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除了非和平道路外，可以利用和平道路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存在两种可能的道路——非和平的（即使用武装斗争）和和平的（即通过各式形式的、积极的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利用议会）——的结论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支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以通过两种道路的命题写进了兄弟党的纲领文件和会议宣言中。

现在中国同志宣布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上述结论。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假装不理解，说:“让苏联同志们告诉我们吧，哪些国家存在这种可能性，哪有先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提法！假如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对待革命理论和实践，那世界工人运动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难道马克思在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难道列宁在创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的时候已有了成功的先例？当然，当时教条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不少，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了，跟随列宁前进，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尽管中国同志强调，他们赞成莫斯科宣言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们了解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不分具体情况如何，都应坚持一条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共领导人甚至没有停止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苏共只主张和平道路，只引导兄弟党走这条道路。

只要重温一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文件材料，苏共代表团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苏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足以相信类似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许多兄弟党请求苏共给予建议和提出咨询意见。在所有这样的会谈中，苏共中央都提醒外国同志们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强调必须全面考虑利用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

中国同志以宗派主义、书呆子习气对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正如列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他们的立场表面上显得“惊人的革命”。实际上他们的号召——不分每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的民族条件，都把重心放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训练上，只准备一种斗争形式——武装起义，这种号召是纯粹的宗派主义。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积极争取实现广泛的民主要求——土地改革，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限制垄断资本的恣意妄为，等等。中国人称这些为机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争取群众、争取盟友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去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7国共产党会议呼吁书，便是这种争取群众斗争的范例。中国同志们傲慢地宣布这个呼吁书是机会主义的，称这些资深的有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只有那些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经验的人和在工人运动中没有社会民主传统的人才能这么说。这些人企图教训拥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和成长起来的经受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中央领导人肆意把多列士、陶里亚蒂、雷曼、伊巴露丽、科普雷尼希等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在地下和法西斯监狱中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我们运动中的老战士诬蔑为机会主义，这引起众人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马克思也说过在个别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他曾预见在工人阶级有能力赎买资本家的银行的时候出现这种形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当有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远不是理想而成为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当社会主义思想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时候，这种道路不可能？为什么在我们今天，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看到苏联正在顺利地为保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奋斗的时候，需要抛弃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呢？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给予榜样的力量，我们的经济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的榜样力量将动员资本主义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改变本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己应做好准备，同时教育工人阶级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推翻资本家政权。

同志们，现在请让我分析一下印中冲突和对中立国家的态度。从12月全会的材料中你们可以知道苏联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苏共中央阻止了中国领导想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拉入他们挑起的同印度的民族冲突之中去的企

图。我们不能支持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普遍和平的利益的。

如果中国真的面临受进攻的现实威胁，那苏联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保卫它了。比如在台湾危机中国受到威胁时就是这样。苏联立即直接支持中国。中印冲突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公开对中国同志讲，他们选择的用军事力量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不是好办法。我们对他们说，他们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想挑起争端，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各兄弟党的利益，尤其是印度共产党的利益的莫大打击。

印共领导不只一次请求中国同志采取以他们为转移的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当时既没听印共的话，也没听苏共的话。毫无疑问，这给印度共产党带来了损失，尤其是影响到了喀拉拉邦的形势，大家知道，该邦共产党人执政达 28 个月之久。冲突对尼赫鲁有利，这给了他败坏共产党人名誉的借口，把自己打扮成印度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保护者。

中国领导对苏联的立场表示了不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欠没有支持他们，也不应该支持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立场给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能，说我们这些国家背离了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同志的行动更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印度，众所周知，没有加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奉行的是中立立场，在许多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的同志至今也不明白，他们的行动帮了那些企图把印度和尼赫鲁政府从现今对外政策立场推向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一方。

至于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干预冲突，那就会给美国找到借口站在印度一边干预冲突。另外我们还得知，艾森豪威尔曾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苏联有远见的立场使美国挑衅者失去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生活完全证明，苏联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印共中央主席古普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满有根据地宣布：“在这一冲突中苏联明智的立场揭露了共产主义的敌人，提高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同志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中国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态度。由于印度尼西亚对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商人采取了限制政策，中国同志企图与印度尼西亚争吵。这只能损害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中国同志这些理论和实践错误的实质在于，他们低估了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断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

成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建议对其采取敌视的立场。中国政府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和建立友好关系，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现在他们突然转变了方向，称苏加诺为“血腥刽子手”，称尼赫鲁是“半个帝国主义分子、半个鬼和半个流氓”。现在北京称这些活动家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称他们这些人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领导建议共产党人改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认为这些资产阶级不会再反对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政策中已失去反帝的方向。

他们把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清一色的。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亚西、缅甸等奉行中立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加入了帝国主义集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把尼赫鲁的政策和伊朗沙赫或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的政策混为一谈。

我党的立场是，在东方推行有远见的政策，扩大同中立国家的联系。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以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激励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一切力量和可能为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熟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这样，同志们，从引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具体的世界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现在完全清楚了，早在 1957 年签署宣言时，他们就不同意其中的许多原则。现在中国同志们越来越倾向于背离这一世界共运的总纲领。表面上他们还重复宣言的原则，提起和平共处和可以防止战争，等等。但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是努力证明和平共处政策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幻想，承认社会主义和平道路是机会主义，等等。

按其实质，中共领导是在号召各共产党放弃宣言中所确定的总路线。为了把它危险的路线强加于我们的运动，中国领导人仍继续以不能允许的方法歪曲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搞秘密的宗派活动以反对神圣地捍卫列宁伟大旗帜纯洁性的苏联共产党。

我们列宁的党不能同中共领导的这种方针妥协。苏共中央认为深刻批判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路线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因为他们的路线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和共产主义前景孕育着危险的后果。

同志们！

在 1959 年 12 月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报告了中国在国内政策上所犯的严重

错误。当时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他们反映在：建立人民公社和实行不符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组织劳动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取消地方人民政权机关，把它的职能转交人民公社。在全会上还指出，中国同志背离了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一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原则称作是“资产阶级残余”。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同志们“大炼钢铁”的错误。

当时苏共中央告诉中国同志们，我们严重怀疑他们某些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强调指出，这是他们的内政，要他们自己解决。

中共领导没有考虑兄弟党的意见而是继续执行自己的方针。而且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把自己的措施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人民公社“是旨在领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公社被说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而且中国的生活事实越来越雄辩地证明，中共中央的许多国内措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国，实际上修改了其国际意义已为1957年宣言所肯定的列宁某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应该起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国同志违反这一规律提出了“大跃进”的政策。他们违反生产不断高速提高的经济规律，提出“高潮和低潮”规律。

这正是造成国内经济不断出现狂热状况的理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必然伴随生产起落，从而降低速度、减少工资、出现比例失调和其他消极现象。

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的实践再次证明，按人口分配原则导致吃光储备，使生产发展失去动力。这正是迫使中国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物质利益原则的原因。

同志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分内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

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

但是，当事情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时候，当我

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

同志们，6月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会议，交换对当代国际共运现时问题的看法。

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通知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建议晚些时候开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只商量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商量新的宣言或新的文件的准备问题。

苏共中央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愿望，又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了这件事，表示了在布加勒斯特预先会晤时除不对问题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对这一意见所有党都表示了同意。

按照达成的协议，在布加勒斯特于6月24—26日举行了两次会晤，这在报告开始时我已谈过了。尽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但两次会晤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批评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时候各兄弟党表现出意见一致，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已是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坚定地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各兄弟党的代表以大量事实材料证明，中国同志背离了宣言原则，教条主义地以列宁的原则掩饰自己，试图把自己的左倾立场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彭真同志在会上强调说，分歧确实存在，而且分歧，用他的话说，是实质性的。但他试图反击并把产生分歧的罪过推到苏共身上，指责苏共背离宣言，破坏列宁的原则。而且彭真再次说我们的分歧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并劝人们相信，中共领导似乎将一如既往站在宣言的立场上。

参加会议的同志不禁问他：假如中国同志们站在宣言原则立场上，那为什么他们又大加批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的观点呢？彭真同志回避正面回答，没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党的代表逐条逐条地批驳了中国代表的立场，批驳了他们没有根据的和不怀好意的对苏共的责难，揭露了中国同志们所持立场的真正用心，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立场将导致什么结果。诺沃提尼、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卡达尔、日夫科夫和其他同志愤怒地给中共代表指出，他们的观点

只能被看作是明显地背离了宣言，他们的行动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间的相互关系的普遍准则格格不入的，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矛盾的。

卡达尔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他公正地指出，中国同志的发言是与各兄弟党的方针相对抗的，“给我们的队伍带来了混乱”。卡达尔同志说，根据中国同志们的概念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盼望战争，而且应该宣传战争，甚至应该亲自挑起战争，以便尽快让帝国主义完蛋。”

乌布利希同志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反对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发言不能动员群众为和平斗争，宣告失败论，“只能帮助敌人的忙”。中国同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声明，乌布利希同志说，与西德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发言相吻合，所以说中国同志已“堕落成阿登纳的好邻居”。

诺沃提尼同志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完全赞成我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苏共中央的结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情况通报的内容，中国同志可以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我党的观点。”中国同志不想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诺沃提尼同志说，但十分清楚，这里涉及的“正是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今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观点”。

乔治乌·德治同志在发言中宣布，“中国同志们不正确的立场帮了帝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宣传的忙，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把社会舆论引入迷途。”“我们不同意在中国流行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战争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唯一的途径”——乔治乌·德治说。

应该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修斯尼·卡博同志的特殊立场。他宣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似乎超前，苏共和中共的分歧是这两个党的事，应该由他们解决。苏联代表团对卡博同志不理解问题的实质表示遗憾，并对他做了解释：中共领导不仅是同苏共一个党有分歧，而是同所有坚持宣言纲领的党有分歧。所有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通过解释，卡博同志谴责了中国同志的非党行动。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席会议上，各兄弟党仍然是意见统一，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发言的人都一致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正确的政策给困难斗争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莫大的援助。同时，他们指出，中国同志的立场和行动给各共产党争取群众带来了损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们以该党活动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批驳了中国同志没有根据的如下主张：争取和

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夺取政权的斗争似乎是扼杀阶级斗争，消弱工人阶级在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途中的立场。

在批驳中共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错误观点时，意共领导成员科隆比同志说："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基础上的政策……将使我们变得孤立。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失去力量"。这种政策，同科隆比的话讲，将使拥护和平的运动失去目标，使其必遭失败的下场。

美国共产党代表伊丽莎白·福林同志坚决捍卫和平共处政策，反对中国同志们的观点。她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从宗派立场出发开展和平运动。我们有一些派别小组，他们是极端左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制造混乱，反对和平共处。"福林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他们的错误行为正在帮敌人的忙。

各共产党的代表们正确地向中国同志们指出，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他们是和平的捍卫者还是战争的宣传者。

应该谈谈正在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的发言。这些同志们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下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似乎和平共处政策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损害，使之迷失方向和削弱它的力量。"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强调说："不仅不妨碍，相反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会议的参加者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代表不正派的派别作法。乔治乌·德治、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同志，法国、美国、摩洛哥、以色列共产党的代表，其他许多共产党的代表，通报了中国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6月会议期间采取非常方法的新例证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散布他们的印刷材料和相应地收买各兄弟党干部的活动。而且这些同志们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破坏苏共的威信，使各兄弟党脱离苏共。

在指出中共领导的非同志式行动和虚心假意时，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措施，让人怀疑他们涉及苏共和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的漂亮声明是不真诚的。"

中共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如何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议刚一开始，彭真立即把自己摆在了会议参加者的对立面。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是谴责我们的党还是交换意见？这次会议是审判我们的法庭？"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党的同志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对中国代表们解释说，对现

实的国际问题预先交换意见不能对中共领导对这些问题的特别态度避而不谈，是中国同志自己错了，是他们首先开始公开辩论的。当中国同志看到他们不能逃脱批评时，就试图装出受委屈的样子，宣布会议进行得不民主，其指责矛头主要对准苏共代表团。但这遭到了各兄弟党的一致反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完全有机会在会上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彭真同志，尽管他比其他代表好一些，发了三次言，但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歪曲事实，多次重复，按他的话说，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

对兄弟党代表对中国人的批评，彭真同志报之以粗野和凌辱的态度。“听了这些批评，”他说：“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认为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和诬蔑。”彭真的另一种意见更具代表性：“苏共中央信函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但他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信函。

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对中共代表们给予了应有的反攻。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露了中国人想把各兄弟党引入迷途的企图，指出了中共领导在最重要的当代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立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

赫鲁晓夫同志列举许多事例说明，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不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企图贯彻自己的特别政策，把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际主义利益之上，想让所有兄弟党都听命于北京的意志。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多次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义运动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令所有与会者瞩目的是，这一团结被中国人解释成了完全另一种团结。实际上他们不想让兄弟党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是团结在中国党定的条件之内，想让兄弟党支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

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反对中国人的这种企图，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统一只能以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为基础。

中国同志不相信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统一（这代表了他们在会议上的全部立场）。在会议结束阶段，当提出通过公报问题时，这再次表露出来。彭真同志推说事先没有达成发表什么文件的协议，推说他没被授权，等等。

发表公报的建议是一些兄弟党提出来的而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一致支持。中共

中央代表团在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也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它作了附加说明，说它签署公报只是“为了保持一致”，其实所有人都清楚，它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它就会自我暴露，说明他们是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各兄弟党表现出了统一的意志，他们宣布，中共领导人应该考虑对他们的批评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以便保证在根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保持一致，使其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总结布加勒斯特会议时，满意地指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意见一致和团结精神，各兄弟党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并一致支持和赞许她为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活动。

苏共中央主席团赞许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坚决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和坚决反击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观点和行动所进行的活动。

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一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彻底实行之。我们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的伟大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最亲密、友好和兄弟般的相互关系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把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援助看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按其规律和内容，我们这一兄弟般的援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为中国291个工业企业，49个独立的车间和其他项目和装置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最完备的设备。到1957年期间，苏联给中国的供货总额，包括设计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在内，共有147亿卢布，至1960年1月1日供货已完成60亿卢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起了崭新的工业部门——航空、拖拉机、汽车、铝工业等部门。

在建立各种现代国防工业部门方面，苏联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建设了95座军工厂，其中24座已经投产。

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48年至1960年1月1日，苏联给中国提供了一万套设计技术文件和样品，价值近50亿—55亿卢布。

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方面，我国也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

为了清楚起见，同志们，还应该说，为补偿我们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苏联提供了货物和原料，其中包括有色金属。

苏联给中国的全面援助——这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但是不能说苏共的这一真正的列宁路线得到了中国领导的应有理解。而是适得其反。我们给的援助越多，中国同志胃口越大。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尽量多的东西。而且中共领导有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企图得到苏联军事科学技术最新的和秘密的成果。

我们想说，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伤及苏联人尊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之后，整个中国开始拼命吹牛，公开号召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人”。在口头宣传中和在报刊上，越来越少地提到苏联国家、党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完全不提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考虑到上述事实，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某些措施，表明我们不能同中共领导人的不正确行动妥协。

我们不再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中国同志们为纪念列宁 90 诞辰所发表的文章。苏共中央嘱咐相应的苏联机关停止购买中国阐述中共领导立场的书籍和宣传材料。

我们建议中国同志不再出版《友谊》和《中苏友好》杂志——这两份杂志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出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近 8 期中国《友谊》杂志上开始刊登中国中央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宣传他们不正确的观点。

现在在中国有 1200 多名苏联技术专家，他们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中国同志也经常提起。

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所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去了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正如你们看到的，同志们，中共领导人明显的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

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找：中共著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陋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他们不善于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

造成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这种崇拜在国内首先被用来让劳动群众盲目相信国家领导一贯正确，使领导逃脱批评，转移群众对由于内外政策上的愚蠢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麻烦的注意力。

我们不是刚刚认识毛泽东，同他共事也不是一次了。我们深知他的弱点，他很傲慢，虚荣心很强，喜欢别人巴结和奉承，不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行动。

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对于他的每一句话，现在在中国都成了绝对正确的和绝对的真理这种状况，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每一句话都被赋予法律的力量。在那里，现在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被说成是“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各省党代会的报告里已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敢地按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道路，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方法前进”；或“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等等。

难道像中共这样一个大党，至今尚未考虑必须把马克思全集译成汉语，到1959年只出版了列宁选集这一事实还不说明问题吗？而就在这一时间。所有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材料和书籍以及赞美他的生活和活动的无数小册子都在不断出版。在国内，从行政中心到偏远的农村，到处都竖立着“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这样的标语。这些口号以斗大的汉字刷写在田头、屋顶、路旁山岗、河边和稻田之野。印刷了无数的标语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当然，只把中国这些实际现象看作是对党的主席的阿谀奉承和逢迎是不正确的。这里有更多的内涵。中国同志吹捧毛泽东同志和他在当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功勋”，其用心是以他们对基本的国际发展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错误解释，对抗我党和我党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对这些问题和任务所做出的解释。

绝不能认为，同志们，近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起劲地过分颂扬斯大林是偶然的。

你们很清楚，苏共二十大坚决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受到了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热烈赞扬。唯独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特别立场。

在苏共二十大上，中共代表团把斯大林捧上了天，之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宣布，他们不同意“斯大林问题对半分”。现在，当中国领导和我们党加深了分歧的时候，他们这样描述这一“思想”：共产党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磨快斯大林这把刀子并用它武装起来”。这样做并非无目的，一是为了证明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并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针，二是为了用斯大林的政策和方法同苏共中央的列宁政策和方法相对抗。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

必须报告中央全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致认为今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适宜的。由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和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起草会议决议草案。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会议。

同志们！在布加勒斯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我们党的名义对中共代表宣布，为巩固我们的关系和协调一致立场，在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把我们争取工人阶级事业、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斗争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将付出我们的一切努力。

中国同志是否准备从批评中吸取教训和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呢？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根据这样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各兄弟党代表同中国同志的会谈和会见表明，他们关于团结的声明看来是为了伪装，掩人耳目。

在这种掩护下，中国同志根据整个情况，打算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做详细“准备”，准备在会上发言宣传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7 月 3 日在北京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曾对匈牙利同志宣布，尽管他们，中国人，“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布加勒斯特公报上签了字，但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还准备阐述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个事实。我已经说过了，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通过自己的驻外机构在许多国家散发材料，首先是他们发表的纪念列宁 90 诞辰的文章。在布加勒斯特，许多党的代表提请中国同志们注意类似行动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之后仍继续寄发材料。我们得到了通报，其中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说中国大使馆散发了 1960 年 6 月 29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中重新坚持在布加勒斯特遭到各兄弟党一致谴责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对来北京的兄弟党代表团加紧作工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东方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很明显，他们企图争取支持者。不能排除，他们可能把一些国家未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锻炼的干部搞胡涂，加强“左”倾宗派集团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提高警惕，积极地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想破坏同中国同志的友谊。但是，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我们要对中共领导当面讲真话，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发展，保卫和平事业才能发展。

我们被同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希望为了形式而统一。我们希望的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和正确的列宁路线基础之上的符合所有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彻底而不知疲倦地贯彻实施自己的进一步巩固统一和团结，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协调行动的列宁主义方针。

同志们!

近年来世界事件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已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战斗指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英明和生命力。

某些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该党代表团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国会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某些省委员会的全会上，都细心阐述了会议工作结果。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总结到处都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1960 年 7 月 1 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详细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法共中央在决议中说:“中央委员会赞成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符合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所载原则，符合不久前布加勒斯特宣言中所肯定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所忠

于的原则。”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向全国劳动群众解释苏联共产党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安全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指明我党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阵地的巩固，保障揭露战争贩子的侵略阴谋，鼓舞人民积极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反对当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宣言指出的：“当代修正主义企图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宣布它‘过时了’，对社会发展似乎已失去意义。修正主义者企图毒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动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宣言指出，修正主义，或曰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

但宣言同时指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一些党一定发展阶段的主要危险”。现在中国同志的“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动措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应该指出，我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同志的行动，如果不给予及时的反击，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

所以，为顺利地完成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展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他们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质相违背的，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整个革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力量去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忠于列宁遗训的苏联共产党将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统一！

我党将一如既往带领苏联人民沿着经过考验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奔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РГАНИ，ф.2，оп.1，д.458，л.1-74

文件 13

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撤走苏联专家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

（1960 年 7 月 18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奉命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下：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 1958 年 8 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接指责。然而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们接受专家和顾问中的任何一个人。早在 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培养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在 1958 年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如同在 1957 年一样，这次中国方面仍然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针显然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与条约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是相抵触的。按照当局的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竭力引导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去讨论那些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某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他们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在那些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中，领导干部们固执地试图让他们加

入上述问题的讨论。例如在 5 月 19 日，在广州的中国电子工业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在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提议，讨论用俄语特别出版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选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让他们表达对文选中选编的文章的看法。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苏联专家组，中国官员还强迫每个苏联专家接受这一文选，众所周知，其中包含着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在一次有苏联军事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宣传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而那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和与 1957 年 11 月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机构和企业中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事例，那里的领导干部竭力引导苏联专家参加讨论，向他们施加压力，影响他们，促使他们持有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行动是不尊重他们本人及其工作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考虑到这一系列事实，苏联专家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再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而这是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所必需的，更别提他们为中国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军事建设所提供援助而应受到的尊重了。还存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忽略，或者对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不予考虑的情况，尽管事实上这些意见是基于专家们基础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提出的。甚至苏联专家们准备的文件，包括个人意见和技术规范，也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没有机会履行他们职责，也不能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他们实际上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无私的工作不被赏识，他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只是忘恩负义。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正如我们的一些专家指出的，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表明，这些怀着深切的感情，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理解。

的确，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中国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指出，中国方面上述的举动对苏联是极不友好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苏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些协议中，中苏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友好合作，完善和巩固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就中方的这些

举动而言，让苏联专家们继续留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大使馆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苏联方面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本身以前也曾提出过命令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确理解苏联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3 卷，第 3418–3421 页

关于台湾海峡危机的俄国档案

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炮齐轰金门岛，引起台湾海峡危机。由于事前中国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一早已策划的军事行动，从而招致赫鲁晓夫的严重不满。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中苏是一致的，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资本主义阵营。但是双方采取的对外政策叟完全相反，苏联主张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赫鲁晓夫要与美国和平相处，毛泽东则偏要向美帝国主义头上套“绞索”。台海危机的出现，以及中苏在危机处理中的意见分歧，鲜明地反映驻他们之间的矛盾。

这里刊出的有关上述内容的部分俄国俄国解密档案中译文，节选自沈志华、李丹慧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即将出版)，原文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1-15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

文件 01

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6 日)

今天我到中国外交部同王永田进行了会谈。

受中央委托，我对苏联学者的下述错误行为向中方表示了抱歉。

今年 7 月，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竺可桢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中国科学家出席该委员会会议。

竺可桢复电拒绝了邀请，因为该委员会有国民党代表参加，但普什科夫教授又第二次致电邀请，重复原来的意见。这时中国对外文委工作人员李明将此事通知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普什科夫的不正确行为。

我对王永田说，大使馆把普什科夫的无礼行为报告了中央，所以他受到了严厉处分。我强调指出，遗憾的是，不理解中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个别事实，在我国科学、体育和卫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有时也能遇到，这证明这些同志在政治上不成熟，这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支持和完全理解中国朋友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路线。

王永田说，他们清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感谢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一贯支持。他们还理解，个别同志的错误同我国的这一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看来，这些错误是因为苏联组织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一些同志未被通知到而犯的。

我让王永田放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向王永田提供了关于老挝的一些新闻材料，我还要求他组织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司的工作人员就西哈努克在中国逗留结果问题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国朋友们也可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发表看法。我还请求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有关苏发努冯新政府纲领和实际步骤的情况为我们通报一下老挝的形势。

在会谈结束时，王永田主动给我简要地介绍了金门、马祖地公布的新闻中有8条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首先，最猛烈的炮击，8月21日[1]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方打了28000发炮弹。国民党在这些岛上的炮兵阵地被压制住，没能进行回击。我方没有伤亡。根据他们的声明，国民党伤亡几百人。根据我方情报，他们伤亡很大。

现在国民党在金门、马祖岛屿集结有7万人的精锐部队并继续调增援部队来。

王永田说，我们还将继续打击沿海岛屿，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我们将解放他们，这是我国的内政。对我们的炮击，美国的立场暂时还不清楚，但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卷入这一地区的事件。

我感谢王永田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

① 原文如此，此处日期有误，应为23日。

给我的印象是，王永田是主动简要通报沿海岛屿的战事情况的，事先没有准备，他很拘谨。

参加座谈的有使馆翻译罗加乔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苏达利柯夫

ЦХСД，ф.5，оп.49，д.131，р.8892，л.196-198

文件 0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11 日）

摘自 С.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拜访了张闻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张闻天转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在 1958 年 8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第 80 号信函中表达的请求的答复，以便使张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个答复。

请张闻天向周恩来通报，他在 9 月 10 日转交给我的“中美关于缓和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的声明”草案，也就是在华沙为指导中美谈判而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那份草案，我已经于当日向苏联政府做了通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 安东诺夫

分送：

В.В. 库兹涅佐夫同志

Ю.В. 安德洛波夫同志

М.В. 齐米亚宁同志

УВИ

归档

由沃先金执行

1958 年 9 月 25 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文件 03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19 日）

摘自 C.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应张闻天的请求拜访了他。他通报说，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全体委员，阅读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台湾问题上给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函，完全赞同这个文稿，并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张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谢意，感谢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文本他提出了两个意见，也就是：1. 建议用“紧张局面唯一的和真正的来源”替换“紧张局面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来源”；2. 把数字“35”（也就是承认中国的国家的数量）改为“30 多个”，因为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 31 个国家。

张闻天还向我介绍了关于中美华沙谈判协定美国草案的文本，这是美国大使比姆今年 9 月 18 日在华沙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以下是这份协定草案所阐述的内容：

为了停止在金门和马祖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远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比姆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一、王炳南大使向比姆大使通报说，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之外，中国放弃针对金门和马祖岛屿使用武力行动，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确信，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将不采取进攻或者其他旨在反对金门和马祖岛屿的挑衅行动。

二、比姆大使向王炳南大使通报了以下情况：

1. 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外，美国政府放弃在金门和马祖岛屿采取军事行动；

2. 美国政府将实行监督，以便使金门和马祖岛屿不采取进攻或者旨在针对大陆和其他岛屿地区的挑衅行动。

3. 两国大使应该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寻找不断地缩减近海岛屿和与大陆毗邻地区的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具体措施。

张闻天强调指出，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草案”。

出席会谈的有外交部的译员方祖安和大使馆一等秘书 A.Д. 杜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分送：

B.B. 库兹涅佐夫同志

Ю.В. 安德洛波夫同志

М.В. 齐米亚宁同志

УВИ

归档

由杜勃罗夫斯基执行

1958 年 9 月 25 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

文件 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 184 号：台海危机

（1958 年 9 月 27 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 阿里斯托夫、列·伊·勃列日涅夫、А.Н. 柯西金、А.И. 基里琴科、Н.А. 毛希丁诺夫、Е.А. 福尔采娃；会议是由米·安·苏斯洛夫主持的。

1.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

（苏斯洛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库兹涅佐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柯西金、费留宾）

勃列日涅夫同志：赞成邀请法国人参加。

苏斯洛夫同志：邀请法国人未必合适——它是殖民主义强国。

关于函件。

批准修改意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毛泽东的信（未加修改）；给尼赫鲁的信（未加修改）；给其他人分别发出了信函（被邀请者）。

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

给作为总统的诺沃提尼的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人的信——单独寄发。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9

文件 05

苏共中央关于为中国提供核保护给中共中央的信

（1958 年 9 月 27 日）

……葛罗米柯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他和周恩来同志 9 月 7 日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形势，从事实出发，认为美国将发动一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并且在这一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苏联将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但是不参加战争；仅仅在美国使用战略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我们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决定把我们意见告诉你……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产生幻觉，即如果美国或者日本这些最有可能的敌人，或者另外的国家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苏联将袖手旁观。

一旦对手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为了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运动，如果原子弹开始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并且中国开始付出其儿女们的生命，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却不允许他来援助你，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将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的、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神圣信念的倒退。

对你们宁愿承受打击，不使苏联卷入的高尚气节表示感谢。不过，我们相信，并且确信，你们也同意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让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朋友，尤其是让我们的敌人看到，在对我们事业的理解中，我们是坚定的、团结的。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出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的共产党的团结是毫不动摇的，我们将互相联合，断然回击所有侵略者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分开，为了不发生分裂，使敌人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必要的。

……这是必然的，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敌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我们也确信在对苏联的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履行其兄弟般的革命义务。如果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决定我们的政策，依靠我

们目标的一致，依靠我们国家的力量，依靠我们共同的努力，依靠将我们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那么这将是对抗我们共同敌人的无敌的盾牌……

文件 0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27 日）

摘自 С.Ф. 安东诺夫工作日志，экз.№2

1958 年 10 月 9 日

Исх.№381

绝密

今天，根据苏联外交部的委托（今年 9 月 26 日电报）我造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倡议召集一系列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远东地区军事冲突危险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说，他一定将我们的建议转达给毛泽东同志并在中共中央对之进行研究。周承诺中方将会尽快对这一问题做出答复。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认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目前并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美国人对该地区的局势极其担忧，但他们对采取某种重大行动来支持蒋介石也是心存顾虑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总是想拖延中美华沙谈判。周恩来同志说，在华沙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岛屿，而美国人则一再要求中国停火（停止炮击）。美国代表多次试图探明这样一些问题，即上述要求是否是中国的最后立场，或者中国政府只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同意停止炮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坚决地对美国人声明，只要蒋介石的军队仍占据着中国沿海那些岛屿，那么要让中方停止炮击便无从谈起。近两天，原先大家都在等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演说，可是这个演说因故推迟了。9 月 25 日，只是由杜勒斯讲了话。他的讲话更大程度上带有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的。其中，他通过使用各种诡辩术以论证美国挑拨政策的正确性，但正如某些美国新闻媒体所指出的那样——杜勒斯的讲话没有一点新意。例如，周恩来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艾森豪威尔便曾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让步比作“远东的幕尼黑”，而杜勒斯也将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所形成的

局势比作当年的西柏林。而杜勒斯之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可能是想说：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像当年共同保卫西柏林那样来一起斗争，以便使蒋介石军队始终占据这些沿海岛屿。可是，周恩来强调，当年西柏林的情况与现在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波茨坦宣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都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目前，美国的盟国内部的社会舆论均反对本国政府参加争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战争；美国人无法动员其盟国的军队来共同保卫这些岛屿。不仅美国人盟友——英国、法国等不愿意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战，甚至连美国人自己（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至今也没有彻底表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曾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可信的情报：美国政府打算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即如果人民解放军向沿海诸岛屿发起进攻，那么美国将会帮助蒋介石军队。周恩来说，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人只是有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的打算，而他们本身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将为争夺这些沿海岛屿而将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即使美国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自己把脑袋钻到了这个绞索里来了。而当其被纠缠在这件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再玩弄什么花招了。而我们那时候，周恩来玩笑式地指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收紧或放松这个“绞索”。那时候，即使给美国人机会，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脖子从这个“绞索”里挣脱出来，因为这是个事关威信的事——美国人害怕“丢面子”。到那时，如果再想做出让步，那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会遭到国内各界的批评。

周恩来强调，我们准备给予美国人以应有的反击。看来，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形势不太乐观。在美国本土反对美国参加争夺中国沿海岛屿战争的呼声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有鉴于此，周恩来指出，目前美国人主动中断中美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最实际和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拖延这些谈判并最终使之陷入僵局。

周恩来继续道，美国人现在正采取措施以便蒋介石分子能够向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多增加些力量。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好像是给病人送牛奶——于事无补”。美国人极力安抚蒋介石，可后者并不买账，始终鼓动和催促美国人亲自参与争夺沿海岛屿的争斗。可结果是，蒋介石催得越紧，美国人就越是疑虑和犹豫不定。有鉴于此，周恩来说，我们当前的斗争策略也应作如下调整：将军事行动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等三个层次；对这些岛屿实施围困，但并不对之实施登陆作战；实施围困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炮击。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大炮不间断

地对蒋介石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舰只和飞机实施攻击。但仍留有一定余地，即使蒋介石军队乘夜间或恶劣天气之时仍能够借助一些小型船舶和飞机向这些被围岛屿输送少量物资。总之，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围困会使蒋介石军队感到非常难过，但又不让其彻底绝望。这种情形也将有助于加速美国人的动摇和抑制其采取极端措施以倾全力来帮助身处这些岛屿上的蒋介石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不断向美国人发出呐喊，但美国人仍会谨慎从事。

周恩来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沿海岛屿的围困逐渐不再成为世界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这件事也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了。关于杜勒斯把中国沿海诸岛屿与西柏林相提并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西柏林的物资供应只能借助“空中通道”，无法长期维持，而蒋介石与沿海诸岛屿的联系相对广泛；西柏林局势的尖锐和围困是在四大强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生的战争只是在中国与蒋介石军队之间进行，并非与美国，且美国的其他盟国均距离较远，而未干预这场冲突。因此，目前中国沿海诸岛屿所形成的局面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虽然这种局势长期持续对美国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其已把自己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力量都集中在了台湾地区，这对其后勤补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总之，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来看，关于这一事件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有如下三种可能：其一、当相关条件成熟之时，美国会做出一定让步以求得妥协。其具体表现为：美国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诸岛屿，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讨论其他问题。但是，周恩来说，对此所需的条件目前仍不成熟。其二、目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中美华沙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指出，目前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美国人“把脑袋伸入绞索中”，即美国人亲自参与中国沿海诸岛屿的武装冲突。不过，周恩来强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很小。

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继续坚持提出如下要求：蒋介石军队立即撤离这些沿海岛屿，即使当美国人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一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由于担心中美谈判陷入死胡同，其他国家一些代表针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

1、有些人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周恩来说，我们坚决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虽然我们知道，正义属于我方，也并不担心将台湾问题交由

联合国讨论。但我们依然认为，由联合国来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合适，因为蒋介石分子目前仍在联合国内；如果我们的代表去联合国，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拥有完整权利的参与者身份。而届时，美国代表完全可能又援引联合国过去所做出的旧决议来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又会把自己打伴成“和平卫士”，并藉此要求中国“停火”。这种情况对中国有不利。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因为至今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仍没有被恢复。

其实，蒋介石也是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的，周恩来以玩笑的口吻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他的观点存在着“共识”。蒋介石分子们也不愿意交由联合国讨论，因为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向中国做出让步——把这些沿海岛屿交给中国。另外，蒋介石分子还担心联合国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又提出所谓台湾中立化的问题，从而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来负责托管，对此蒋介石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2、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幕后外交活动极其活跃。对此表现最为积极的有梅农、哈马舍尔德和日本人。哈马舍尔德通过挪威代表（而不是通过瑞典，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周恩来同志指出）试图了解中国是否有意与美国人达成妥协。周恩来同志说，针对这一外交试探我们并不急于做出回应。如果美国人同意做出些许让步，而为了不丢面子又不方便在华沙谈判期间这样作，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中间人好了。最近，梅农已放出了杜勒斯愿意与中国总理会见的口风，但我们将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积极。在此，周恩来指出，杜勒斯只不过才是个外交部长。

总之，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并不急于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如今，对此更感到不安的应当是蒋介石分子们，因此他们才不断要催促美国人来钻“这个绞索”。周恩来同志强调，美国人可能会向这一地区派来很多大炮和飞机，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因美国人侵犯其舰艇和水域已向后者多次发出警告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他，中国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严重警告”，但为何又不采取任何反应性举措，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当中即包括印度驻中国大使，也包括很多中国领导干部，甚至小孩子。周说，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这样回答道：因为中国是否做出反应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美国人。我们（对美国人）所发出的每一次警告都是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这种账越多，将来

美国人必须向中国人还得债也就越多。周恩来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是否中国又向美国发出了新的警告的问题。照毛的话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美国人新账、老账一起算，直到他还清欠我们的每一分钱为止，甚至包括很高的利息在内。但现在我们得沉得住气，以便最后能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因为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耐力和承受力的时候。周恩来说，你们可能会说，如此忍耐力和如此行为方式是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才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气质。

周恩来同志请我将他以上所述向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做出报告。

我对周恩来同志提供上述情况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将立即把这此情况汇报给莫斯科。在此，我也指出，美国人的确在台湾和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陷入窘境。目前，可明显看出他们正在极力寻求出路以摆脱困境。其中包括：传闻哈马舍尔德正就台湾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还听说有在台湾居民中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周恩来同志再次强调，如今美国人的情况的确是悲观的，可谓是情绪低落。

我对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蒋介石军队撤离沿海诸岛屿，中方似乎就不解放台湾了。

周恩来同志答，西方外交使团可能是从驻北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与周恩来同志会谈以前，张闻天同志曾说，前不久美国作家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来到了中国，并已与周恩来同志见过面。张闻天同志还说，中国政府已批准著名美国银行家和活动家伊顿以私人身份来中国。

同志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助理方祖安和苏联使馆二秘 A. 谢尔季耶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文件共五份，分送：A.A. 葛罗米柯、Ю.B. 安德罗波夫和 И.B. 齐米亚宁，情报管理局，档案室，执行者——谢尔盖耶夫，1958 年 10 月 4 日，第 727 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

文件 07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10 月 10 日）

摘自 C.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志

1958 年 10 月 13 日

机密，№3

由于毛泽东不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我。会谈伊始，我便向其转交了 H.C. 赫鲁晓夫同志于今年 10 月 4 日给毛泽东所写的一封亲笔信。

刘少奇承诺，将按照苏方的要求转交此信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之进行讨论，并随后做出相应的答复。

我们此次会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期间，我问刘少奇，关于台湾问题有什么新情况，中国民众对彭德怀最近发布的关于停火和举行直接谈判的呼吁书有何反应。

刘少奇谈了关于 10 月 10 日清晨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和人民解放军飞机之间发生的空战情况。在这次空战中国民党共损失飞机 3 架，人民解放军损失 1 架。刘少奇认为这一结果很不错。他强调，源自福建前线的关于双方战斗损失的情况通报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任何夸大或低估，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我们仍打算坚持这样做。至于国民党，他们往往夸大我们的损失，而有意隐瞒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情报没人相信。

刘少奇说，鉴于在（我方）停止炮击之后美国人不再为国民党向金门岛运送粮食的船只护航，我们打算延长“休整”期限，即在彭德怀公告中所规定的停火期限期过了之后也不开炮。我们想继续看看，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如何动作。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

对此我指出，据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人认为，人民解放军停止开炮与他们在华沙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有关。

刘少奇说，这是一派胡言。我们停止开炮绝不是因为美国人所提出的要求。刘继续道，今天在中国大使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华沙谈判中，我方大使向美国人重复了自己先前所提出的条件。至于美国人是如何答复的，我们暂且不知。

刘少奇几次重复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中方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很多时间。

刘少奇说，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作。我们正集中一切力量大炼钢铁。最近，中国所有的领导干部又都奔赴了各地方，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和组织大炼钢铁的运动。甚至在“中南海”里我们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集中力量建了一个小锅炉来冶炼金属。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请我转达（中方）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成员的谢意——感谢他们始终不渝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 5 份，分送：库兹涅佐夫、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执行者——苏达利科夫，1958 年 10 月 10 日，第 745 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6-268

文件 0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 189 号：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1958 年 10 月 30 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 阿里斯托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克·叶·伏罗希洛夫、Н.Г. 伊格纳托夫、Ф.Р. 科兹洛夫、А.Н. 柯西金、阿·伊·米高扬、Н.А. 毛希丁诺夫、米·安·苏斯洛夫、Е.А. 福尔采娃、Н.М. 什维尔尼克；会议是由尼·谢·赫鲁晓夫主持的。

3. 毛泽东同志 1958 年 10 月 15 日的信和周恩来同志的 1958 年 10 月 12 日的信。[①]

米高扬、阿尔希波夫、赫鲁晓夫。

给图 -16 发放许可证。（“图 -75”——发放两个许可证）。“Сопку”——在 1959 年上半年发放。在解决了具体问题之后。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毛希丁诺夫、阿里斯托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

① 指的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航空和炮兵装备的问题。

对毛泽东 1958 年 10 月 15 日电报的复函没有发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应该仔细研究；应该压缩一些，但不是急剧地。

委托书记处审理杂志和报刊的问题（处罚了许多）。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4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俄国档案

中印边界冲突是指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问题）在1959年8—9月发生的边界交火事件和1962年10月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印边界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959年的冲突中，苏联对中国的对印政策表示不满和担心，发表了中立性声明，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中苏领导人曾为此发生激烈争执。1960—1961年中苏关系出现短暂缓和局面，但内在分歧和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于是，当1962年苏联在中印军事冲突中再次宣布其中立立场时，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极大愤慨。半年后，中苏两党关系终于走到了终点。

这里刊出的有关上述内容的部分俄国解密档案中译文，节选自沈志华、李丹慧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即将出版)，原文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15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

文件 01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

（1959年5月6日）

绝密，文本第2份

莫斯科，1959年5月6日

给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Н.Н. 克留科夫同志的信

德里

苏联驻纽约常设代表处于 5 月 1 日向苏联外交部通报如下。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贾在早餐时对联合国副秘书长多勃雷宁说，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非常担心因西藏事件印度同中国关系的恶化。在他看来，尼赫鲁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反对派在国会中向他责难，指责他对外政策的失败，并号召同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在孟买工业贸易区支持进行这种密切联系的力量更加强烈。尼赫鲁有足够高的威信来压制目前的各种倾向。但尼赫鲁的年龄也不小了，他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成立的政府将不能压制这种倾向，特别是如果印度同中国的关系继续紧张的话。

贾说，现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被印度政治界理解为首先是针对尼赫鲁本人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继续下去，并且还是这样强烈，那么印度政府将会反击。事态的这样发展会对亚洲和平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贾接着说，尼赫鲁对达赖喇嘛留在印度不感兴趣。几个月后世界将会忘记达赖喇嘛，但中国将不会忘记他。他将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一点可以尝试利用尼赫鲁的影响和帮助来调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排除达赖喇嘛“在一定条件下”返回中国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这样的话（贾顺便说，印度的一些人不是特别确信这一点）。为什么两国政府不能平静下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或许甚至可以通过安排尼赫鲁和周恩来个人进行会谈？贾说，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以个人立场说的，并且他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向中国进行了这样的试探或采取了措施。

贾在谈话中也谈到了印度政府对尼赫鲁个人的强烈不满。由于他未能调解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地图。用贾的话来说，根据这些地图，一些属于印度的边界地区被标识成中国领土。贾确信，边界问题现在成了尼赫鲁反对者手中反对他对外政策的工具。

按照苏联代表处的看法，尽管贾声称上述谈话是从其个人的立场说的，但也反映了印度政府在自己对西藏事件上的政策越来越陷入了死胡同。对此要注意一种状况：加强了对尼赫鲁个人困境的强调，并足够明确地暗示了其对印度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对此不排除会考虑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为此向您进行通报，以便了解情况。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 波德采罗布

АВПРФ，ф.090，оп.21，папка.64，д.1，л.12-13

文件 0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

（1959 年 5 月 7 日）

1959 年 5 月 22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工作日志

195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9 日

第 126 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 年 5 月 7 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安排了午宴。

宴会时，我把自己对赫鲁晓夫同志接见崔庸健一行的印象告诉了乔晓光。

乔晓光讲了平定西藏叛乱的经过，讲了西藏的经济与政治状况。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那里至今仍存在着奴隶制社会。在西藏叛乱之前，那里所有的土地全都属于僧侣和地主们的享有特权的上层统治集团，也就是 40% 的土地被地方政府成员所掌控，30% 的土地在僧侣手里，还有 30% 的土地则在地主的手里。在西藏占据统治地位的是 300 个家庭，其中的 20—30 个家庭最具影响力，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众多的农奴。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在这一小群人的手里。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搞政教分离，并建立地方民主权力机关。

在西藏实施土地改革是按下列方针来进行的：参加过西藏叛乱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全部充公，并分配给以前的农奴们。此外，政府打算向地主和僧侣们购买大部分土地，并把它们免费分给贫穷的农民。在实行土地改革时，西藏广大农民群众向

政府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和帮助。

西藏地方政府反动的上层人物利用一切手段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开展，因为这些改革触犯了他们的财产状况和政治地位。

西藏政府的反动集团在一些唆使他们并向他们提供物质帮助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命令自己的农奴和地方军队对抗人民解放军的驻防军队。然而，农民没有对地主和僧侣予以支持。参与叛乱的一共只有将近 2 万人。现在西藏的叛乱已被完全平息了。

乔晓光说，全西藏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居民在会上对反动集团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农民讲述地主和僧侣对他们的残暴态度，并坚决要求惩罚罪犯和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教育和提高西藏人的自觉性的好形式。

溃败的叛乱分子逃到了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的印度。现在印度国内正在进行肆无忌惮的反华宣传。扩张分子在印度组织集会，在会上要求让西藏享有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久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主席英迪拉·甘地公开号召党员们协助正在进行争取西藏独立斗争的“起义的”西藏人。尼赫鲁的妹妹在英国发表了一份针对中国的诽谤性声明，并表示要支持“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几乎在所有的发言中，其中包括尼赫鲁的声明，西藏的叛乱都被认定是“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的“起义”。

接着乔晓光指出，随着英国人撤离西藏，印度的统治集团就竭力加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早在 1950 年，印度政府的照会里就有了想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妨碍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自己主权的企图。从 1950 年至 1954 年，印度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邮政事业、贸易机关等等。在 1954 之前，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国民）。

接着大使说，印度政治集团的代表们发表反华演说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害怕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就，其中包括在西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会对印度人民起很大的影响。印度的政治家们希望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至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在此可以实行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有利的原来的农奴制度，以便在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个牢固的、可以使印度免受中国影响渗入的地区。在印度进行的公开反华运动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并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放弃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改革。印度领导集团深信中国会做出让步，因为中国害怕同印度的关系恶化，而印度曾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帮助和支持过中国。

我对大使说，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完全支持和赞成中国政府在平定西藏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资本主义集团及其走狗们围绕着西藏叛乱这件事大肆叫嚣，企图破坏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各国人民中的影响。然而，这一番喧嚣却是白费心机，将来也决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按照 H.C. 赫鲁晓夫本人致纳赛尔的一封信的精神，向乔晓光讲述了我们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关系。

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乔晓光，我认为可以像去年在我们的外交使团里所做过的那样，让各国派驻平壤的大使们就各国迫切的外交和内政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和交流信息。特别是我表示想要给大使们讲一讲在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听听乔晓光介绍西藏的情况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等等。

乔晓光同意我的建议，我们约定一起去同外交使团的使团长商谈。

会谈和午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袁志清（ЮаньЧжи-цин）和大使馆随员王保民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 H.E. 托尔宾科夫和大使馆二等秘书 B.M. 巴库林。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78-116

文件 0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

（1959 年 5 月 27 日）

受中央委托，我拜访了邓小平，向他转达了关于日内瓦会谈进程的消息。

邓小平请我转达他对苏共中央向他通报这一消息的感谢，而且说，他将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邓小平顺便说，毛泽东身体欠佳，患了感冒。刘少奇身体也不大好，右臂疼。周恩来现在不在北京。

在谈到召开高层会议问题时，邓小平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即看起来这次会议能够召开。然后他想知道对美国新任国务卿赫脱的评定，我根据我们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情报向他作了介绍。

在提到哈里曼即将前往苏联，并且他也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说，他们讨论过哈里曼访华的适宜性问题，结论是现在访华没有好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不排除哈里曼未来访华。

根据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消息，我同邓小平议论了苏加诺访问土耳其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表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现在在亚洲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为友善，以印尼对西藏事件的态度为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然后又谈到南斯拉夫问题，谈到铁托访问东南亚国家，南斯拉夫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南斯拉夫严重的经济形势等。在会谈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接受南斯拉夫的思想。我们一致同意，为揭露南斯拉夫的挑衅政策，我们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加强我们的共同宣传。

邓小平强调，在某些方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比美国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还危险，因此，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南斯拉夫提出特别抗议的原因。邓小平说，在中国报刊登载了新华社关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罢课抗议饮食不好的报道之后，南当局提出抗议并警告中国记者，再出现类似情况，他们将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

谈到铁托和纳赛尔提出的4国领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和苏加诺会晤计划（鉴于日内瓦会议协调中立政策），邓小平说，尼赫鲁坚决反对这一会晤。苏加诺似乎对这一计划表示出了某种兴趣。国外通讯社报道说，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好似已经决定同该计划的提出者（铁托和纳赛尔）就这一建议的细节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说，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定苏加诺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立场，但有一点已很清楚，铁托和纳赛尔对这一会议的召开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邓小平说，美国人需要像现在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样的工具，而美国人对这一工具利用得也不错，对此不惜金钱。邓小平相信，最终这些钱将会白费，就像当年在蒋介石身上花的钱一样。

我问当前台湾形势怎样。

邓小平表达了他的看法：蒋介石很可能不会放弃政权，仍然将担任第三任“总统”。如果蒋介石仍然担任“总统”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比陈诚、或者胡适当“总统”更好一些，美国人对胡适最为满意，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同意陈诚当选，他们对蒋介石最为不满。在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表示，中共与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将西藏问题提交给联合国。

我问台湾经济形势如何，邓小平指出，蒋介石现在是靠美国生存的。他认为让

美国人出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终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当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也会等待一个时期。局势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在台湾的蒋介石等领导人会越来越严肃地看待他们所期待的将来，有许多因素会促使他们这样：人民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威望，及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台湾长期远离祖国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明白，美国人想抛弃他们。美国不信任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信任美国。

在接下来进行的会谈谈到了一些关于苏联和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

我向邓小平介绍了我国正在为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开展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指出，在目前看来，总的来说中国今年农业将会取得大丰收，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将比 1958 年提高 50%，全国小麦的总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 20%。早稻的情况要差一些。一些地区遭受了洪灾，一些地区遭受了干旱。如果干旱地区近期有了降雨，那么情况会变得好一些。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严重失误，邓小平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大丰收的许多粮食，被人民公社的农民免费吃饭而消耗掉了。邓小平强调说，这对城市粮食的供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邓小平说，在实行免费吃饭之前，农民们消耗的粮食要少得多，很节约用粮，如果出现了粮食困难，他们也会克服。而现在 5 亿人口总是需要大量的粮食，需要丰盛而美味的饮食。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现在最大的不足在于：农民自己需要很多粮食，但向国家缴纳的粮食不足。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公社的决议，就是要逐步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整顿秩序。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简要谈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他说，以前尼赫鲁期望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计划中起到重大作用，认为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将会发生混乱。但一切正好相反，没有达赖喇嘛西藏的工作进行得很好。对尼赫鲁来说，达赖喇嘛反而成了他的负担，尼赫鲁和美国每个月要花 20 万卢比来供养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人员，现在尼赫鲁正打算使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邓小平补充说，如果达赖喇嘛回来，我们给他的供养会比印度人和美国人给他的高得多。过去达赖喇嘛每次出访北京时，我们都至少给他 20 万元的开销，当他在拉萨时，我们每月支付给他和随从人员 70 万元人民币。

关于这一问题，我指出，由于西藏事件，西藏农奴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渴望摆脱农奴制度。

邓小平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西藏的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民主改革。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同志、翻译阎明复、苏联驻华使

馆一秘莫丘尔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40-44

文件 04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1959 年 7 月 9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1959 年 7 月 13 日

第 169 号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①]的会议记录

1959 年 7 月 9 日，符同志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造访。

会谈期间，他说，近年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明显右倾，试图与美国亲近。他认为，印度国内的亲美集团对尼赫鲁施压，而后者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抗拒这一压力。

关于西藏问题，符同志通报道，中国所掌握的材料充分证明，西藏事件与印度有着直接干系。在我们所掌握的文件中直接涉及到了尼赫鲁本人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中国政府目前并不想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并不想因此而对印中关系造成损害。印度政府实际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现在它正在改变以前的立场，试图寻求与中国和解的渠道。符同志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想走极端——因为西藏问题而破坏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符同志指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符同志说，实际上中国是有意让达赖离开西藏的，虽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放他出去；中国现在认为，如果达赖不在西藏，那么政府将更容易整顿当地的

① 原文如此，估计是中国驻印度政务参赞符浩，下同。——编注

社会秩序和对西藏实施必要的改革。

符同志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如今就是印度人的走卒。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现在是否可能让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符同志答，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只能在达赖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下才可能接纳之，但后者是不会同意这样作的。符同志说，中国研究印美关系的同志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美国正想办法与印度亲近，并为此试图协调印巴关系。

此次会议持续 1 个小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基哈切夫和图加里诺夫等同志，档案室第 252 号，1959 年 7 月 11 日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36-37

文件 0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8 月 29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59 年 9 月 7 日

机密，文本第 2 份

苏联大使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 年 8 月 29 日

8 月 29 日，我应邀参加了使馆武官 Г. 帕夫洛夫上校举办的招待会，在那里遇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并询问了他对印中边境事件的看法。

他对我说，8 月 25 日两名印度士兵靠近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一个名为郎久的边防哨所并向其射击。当中国军队开枪还击之后，印度人便扔下武器和一名被打死的士兵逃走了。8 月 27 日，中国向印度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印方也于 28

日就这一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反抗议。稍后在与我的翻译交谈的过程中符同志又说，（印方）挑起这一事件的目的之一便是迫使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对此，中国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符同志对我说，据他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前不久阿尤布·汗给尼赫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两国）签署盟约以保卫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或中国对印、巴两国实施侵略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将向印度提供军事基地并与之相互交流军事情报。符同志还说，他（阿尤布·汗）这样作，是由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压力。我对符同志说，我手中也掌握了类似的资料。我还告诉符同志，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阿尤布·汗为了说服尼赫鲁这样作，甚至不惜以搁置克什米尔问题为交换条件。关于阿尤布·汗的来信，尼赫鲁已与潘特和捷萨伊进行了讨论，似乎后者并不反对信中所提出的建议。符同志说，9 月 1 日在与尼赫鲁会见时阿尤布·汗还可能会提及这一问题。符同志继续道，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尼赫鲁已在内阁会议上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但并未说明自己的意见，该信也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符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即印度报纸上关于印中边境事件所发出的鼓噪，印度国会中所提出的各种挑衅性问题和喀拉拉事件均表明，某些势力正希望促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将其纳入到某个侵略性条约之中。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印度右翼势力正在进行积极活动并向更具侵略性的方向演变。

接下来，关于不丹问题，符同志说，在关于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已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还极力试图将作为主权国家的不丹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并以中国的侵略为借口对后者实施恐吓。符同志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不丹总理所发表的声明给予关注，后者在声明中一方面对尼赫鲁所做出的——在中国实施侵略之时印度将会为不丹提供保护——承诺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声称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符同志所掌握的资料，不丹总理则倾向于与印度交好，但国王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符同志认为，不丹总理要想推行亲印度政策也并不太容易。

我对符同志说，不丹希望与一系列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不久，一位亚洲国家的大使曾向我通报道，不丹总理在 9 月初访问印度期间可能会在尼赫鲁面前提及此事，也可能向我们（苏联）驻印度使馆提出这一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经济参赞拓（Ta）同志对我说，中国决定不参加 1959 年 12 月份在印度德里举办的世界农业展览会。他说，中方已通知印度，中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中国正忙于节日庆典的准备活动。而实际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认

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参加展览会一定不会取得所希望的结果。

此次会谈的译员为俄国使馆一级见习翻译 A. 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15-117

文件 06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9 月 9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59 年 9 月 14 日

исх.№347

秘密，文本第 1 份

苏联大使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 年 9 月 9 日）

9 月 9 日，我在保加利亚公使举办的招待会上同符同志举行了会谈，他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他说，他刚刚从印度外交部回来，周恩来同志托他向（印方）转交一封关于印中关系的信件。据符同志说，该信件对印中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断言即使在 1913—1914 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也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符同志声称，在 1921 年以前中国出版的边疆区地图与印度和英国的地图还几乎没有区别，但稍后印度人和英国人已开始有意地对其出版的地图进行改动。符同志还说，中国准备与印方举行谈判，并就一些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以便恢复边境的安定，以便在双方进行仔细的准备之后，最终划分边界。据符同志说，虽然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人从来也没有破坏过这条线，反倒是印度人越过了这条线侵入了中国领土。符同志继续说，该信件要求印度人必须将自己的军队撤出中国领土，这样才可能显著地缓解印中间的紧张局势。

据符同志说，中印间的冲突事件只有一次，而所有其他关于印度侵略的报道均纯属杜撰。他认为，其他所有报纸上的鼓噪和在印度议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均表明，在印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试图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与某个西方侵略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能，这只是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即首先破坏印度与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进而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而后者将向印度保证——防卫印度的边界，使其免受中国和苏联的威胁。也可能，印度的一些社会集团之所以要破坏印中关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印度。总之，符同志认为，周恩来同志给印度政府的信件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反动派，加强了进步力量。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的这封信很快将会公布。

据符同志说，昨天印度驻伊朗大使 T.K. 考尔又到他那里来了一趟，而在前不段时间造访他的还有其他一些印度著名人物，如克里斯纳·梅农[①]、拉达克里希南[②]主席等。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来是想向中国施加压力，但大多数还是怀着一个良好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印中关系得到改善。符同志继续道，正如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那封信件中所言，印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中印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印度自己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

符同志还向我通报道说，他打算明天第六次向印度外交部递交抗议书，原因是印度出现了针对中国驻德里、孟买和加尔各达代表处的示威游行。

符同志认为，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上，而且在印度的报刊上，要对反动势力——纳里扬、克里帕拉宁等予以应有的反击和驳斥。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小时，翻译为使馆一级见习科员 A. 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129-131

① 克里斯纳·梅农，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编注

② 拉达克里希南，时任印度副总统。——编注

文件 07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

（1959 年 9 月 25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 年 9 月 28 日

机密，文本第 1 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 年 9 月 25 日）

9 月 25 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拜访了我，他 9 月 23 日刚刚从中国返回印度。

我通报他说，昨天晚上巴里佳博士拜访了我。巴里佳通告我说，他刚刚同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会谈，并且使我明白，他当时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也是尼赫鲁的看法。我向中国大使通报说，按照巴里佳的话，尼赫鲁现在不满意的是，中国没有正式邀请印度政府某一成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因此巴里佳放弃了他关于中国国庆邀请的建议，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与当前印中关系的气氛不协调”。

我也向中国大使通报说，巴里佳对我说，印度准备进行任何层次的会谈来调解印中关系：从总理级别到大使级别。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本人和阿伦·阿萨夫可以开始这样的会谈。但这只能在节日后进行，那时才会有相应的气氛。

潘自力同志对我说，中国正式邀请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至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一些部长到中国来，是他们自己表达了前来参加国庆的愿望，因此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至于对巴里佳和帕尼卡鲁的邀请，尽管他们是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名义转达的，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正式的，因为这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何况中国不久前邀请了文化部长卡比尔，并进行了关于邀请拉达克里希南的谈判，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些邀请作出回应，关于访问的日期什么也没有说。确切地说，卡比尔已经把自己的访问改期，而拉达克里希南，已经通知他说，他可以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只是对此表示了同意，但关于他访问的日期什么也没有说。因此，由于不知道这一点，中国就不能向他发出正式的邀请，

哪怕是他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访问。

接下来，对于我的问题——正如在印度人们所议论的，中国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否同边界事件有关，中国大使回答说，这同印中边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由于他的右倾观点。

潘自力同志通报我说，前不久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并同他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并且他补充说，在印度，他本人很难获得印度外交部和尼赫鲁的接见。

中国大使对我说，尽管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西藏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现在中国主张恢复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并赞成尽快开始谈判。

他通报我说，同印度的一个分歧是，印度坚持要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中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条线，中国的军队也从来都没有越过这条线。何况在一年内印度国内发生了两次反对中国的运动——因为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

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拒绝参加在德里举办的国际农业展览会，因为，首先，在现在的气氛下这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第二，他们现在非常忙于准备中国十周年国庆庆典和组织自己的展览会。

谈话的最后他通报我说，前不久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没有公布）：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免除一名元帅的国防部长职务。尽管这名元帅还被保留了副总理的职务。在告别的时候他请求与我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就印度的国内状况详细交换意见。

这次会谈持续了 45 分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____[①] 同志和见习科员 A. 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

АВПРФ，ф.090，оп.21，папка.64，д.1，л.141-143

① 原文如此。——译注

文件 0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

（1959 年 10 月 20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 年 11 月 10 日
第 425 号

机密，文本第 1 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 年 10 月 20 日）

今年 10 月 20 日，我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在举行的会谈中，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1. 根据印度媒体的资料，美国打算为印度建造一座冶金联合企业，试图以此削弱比莱联合企业的政治作用，并渗入印度国营冶金工业部门。

2. 在印度完全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反华运动。或许，这场运动会被安排在将于今年 11 月份例行召开的印度议会会议前夕。

3. 中国人民一致赞同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将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为巩固世界和平是不遗余力的，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担任此次会谈翻译工作的是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秘常启忆（Чанг Чи-и）。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印度）使馆译员菲阿尔科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3 卷，第 3249 页

文件 09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1959 年 10 月 26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 年 11 月 2 日
第 413 号

机密，文本第 2 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谈话记录

1959 年 10 月 26 日邀请了阿约艾·高士携夫人前来午餐，这是考虑到他愿意同我进行会谈，他委托别人说了这一点。在午餐时高士谈了如下的话。

印中关系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再次发生的边界事件引起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舆论的强烈不安。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冲突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印中关系的恶化被美国人和印度反动力量用来改善同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把印度纳入军事集团。以前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矛盾使印度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并促使印度同苏联和中国接近。反动势力已经得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印度同巴基斯坦在水上运输航道上的冲突得到解决，关于东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举行的会议结束，寻求途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印美关系有了改善。

在这种背景下印中关系急剧恶化，短时间内，在印度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许多朋友。

不排除印中关系的恶化会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印中关系的恶化，以便造成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奉行的对外政策的不满。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按照中央政府的一名部长通报给高士的话说，10 月 24 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关于 1959 年 10 月 21 日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冲突问题。尼赫鲁在进行讨论时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他希望印中边界争端能够很快解决，并准备做出领土上的让步。10 月 21 日，中国人向印度边防

巡逻部队的开火证明，中国政府不愿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调解边界争端。因此，印度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打算让步。尼赫鲁在这次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他说，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能够尽快解决。尼赫鲁称赫鲁晓夫为最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他真正地做到了预防战争。

正如那名部长向高士通报的，在内阁会议上，内阁部长潘特、财政部长德赛和铁道部长拉姆都建议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把印度共产党当做在对印度来说如此重要的边界争端问题上中支持中国的“反民族的党派”。尼赫鲁说，这样的建议还为时过早。他就此强调说，在印度共产党内存在尖锐的矛盾，印度共产党已经开始瓦解，印共现在几乎脱离了人民。高士难过地说，由于印中冲突印度共产党内确实存在尖锐的矛盾。丹吉公开宣称，他不同意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印中争端问题的意见。南布迪里巴德、高帕兰、阿赫米德和其他人事实上同意丹吉的观点。其他的一些同志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反对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敌人开始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如果说，在印中边界冲突之前印共领导人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喀拉拉邦的选举中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印度共产党现在将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乌塔尔普拉德斯邦的市政选举显示，在一些城市中印度共产党候选人都遭受了失败，其原因是，许多选民不支持共产党，尽管他们以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

今年11月4日，在秘拉特召开的党的国民会议全体会议上，由于对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其明显的征兆就是丹吉今年10月25日在孟买的公开声明。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是否对印度国内局势和印共党内局势评价得过于严重。高士说，由于印中边界事件而引起的印度国内局势，印共领导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政府和国民会议中的亲美分子要利用印中边界事件来恶化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共产党进行攻击。党的领导人对此非常清楚。反动势力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共产党在和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何况反动派也没有正当的理由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现在一些州的领导人提出了通过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法律问题。西孟加拉首席部长罗伊早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现在的局势是，各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在谈到印中争端的时候就会谈到党的关系，就会指责印度共产党是“反民族的政党”，并要求禁止印共的活动。如果现在这样的局势再持续几个月，那么政府将会禁止共产党在印度的活动。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国内的所有进步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对和平主义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影响。维护和平的任何一次谈话都会导致印度人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政策的指责，也就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因为到过北京，从谈话中高士明白，在评价印度局势以及对待印度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人认为，印度已经投向了西方大国阵营，为了不允许印度继续同美国接近，中国方面必需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现在正在推行这样的政策。高士试图说服中国同志改变看法，并且他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而，10 月 21 日发生的事件使印共领导人都感到震惊，别说是在资产阶级宣传影响下普通的印度人了。

根据高士的意见，中国驻印度大使没有认真分析印度的国内局势以及印度国内对边界事件的反应，因此，他也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事情的真实情况。中国人认为，在印度只有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和空谈的知识分子反对中国的政策。但事实上印度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高士对此的解释是，中国驻德里大使，看起来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正确的导向。

高士认为，在调解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人应主动提议。为了保持印度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防止印度同美国接近，就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为了缓解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国内所有进步力量面临的困难状况。尼赫鲁个人对调解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是感兴趣的，因为不这样做他的中立政策、同苏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尼赫鲁个人本来也表现出可以首先提议，但他担心中国领导人对他的提议不做出回应，而这会被右翼利用再次向他攻击。

至于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态度，高士强调说，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和尼赫鲁个人的良好关系在印度总是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并且有利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力量的工作。因此，当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苏联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对此应当指出，苏联在 11 月 14 日——尼赫鲁 70 大寿的日子，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发了贺电，苏印友好协会召开了会议，苏联报刊发表了关于尼赫鲁在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中的作用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受到欢迎的。这是对尼赫鲁及其拥护者的支持。尼赫鲁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对印度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尽管他在内阁和国民会议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目前印度还没有一位国务活动家能够比尼赫鲁更好地继续推行中立政策和保持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高士请求苏联政府寻找机会，施加影响，尽快调解印中关系。高士所说的话都

证明，对于印中边界事件的后果印共领导人非常担心。

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以及资产阶级媒体的声明说明，政府中的右翼分子和执政的国民大会党企图利用印中边界冲突来恶化印度同中国、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改善印巴关系，使印度同美国接近。这指的是反动势力事实上企图改变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资产阶级媒体多次批评中立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

1959 年 10 月 27 日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州长会议上作了发言，号召“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Г.Г. 叶非莫夫参赞参加了会谈并做了翻译。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61-167

文件 10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

（1959 年 11 月 13 日）

摘自 Г.М. 普希金的工作工作日志

1959 年 11 月 14 日

第 2818/ГС 号

机密，文本第 36 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 **К.П.Ш.** 梅农的会谈

（1959 年 11 月 13 日）

根据印度驻苏联大使梅农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印度大使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在中印边境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 Н.С. 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中阐述的立场。

印度大使又说，自己受本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原本希望简要地向 Н.С. 赫鲁晓夫

介绍一下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情况。但鉴于H.C.赫鲁晓夫公务非常繁忙，他就不再提出关于自己同赫鲁晓夫进行会见的问题，而只是请求把如下信息转告给他：

众所周知，前不久在印度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边境冲突事件。印度政府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要再重复。然而，这样的边境事件最近又在拉达克地区重演。于是，印度政府便在今年11月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印度大使向我方转交了该照会的复印件）。印度大使强调，目前印度政府已收到了中国的答复性照会。在其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没有提及印度政府在所发照会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建议两国军队沿存在争议的边境线各后撤20公里（其中包括各自占据的阵地）。对于上述建议，印度政府并不认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便对它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以便向中方做出建设性的答复。印度政府还要向了解中国所提建议的印度军方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印度大使继续通报到，当总理尼赫鲁结束自己对一些国家的4—5天的出访回国之后，印度政府将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鉴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印度政府对中方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表示担心。在1959年10月21日发生的边界冲突中印方被打死9—10人，7—8人被俘。10月24日，中方同意向印方移交死亡士兵的尸体和俘虏。为了协调这一问题，印度于10月26日专门派出了一个小组，但由于中方的原因导致其至今无法完成既定任务。

中方在这一问题解决上的拖延作法引起了印方的担心，即中方是想赢得时间以便对在押印度人施压。而中方的这一举动将可能导致整个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

印度大使指出，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是印度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但这里已涉及到国家领土的完整问题了。由于印度右翼分子和一些机关报刊的煽动，总理尼赫鲁已很难控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印中关系已有4000年的历史，两国边界长度达到4000公里，两国还从没有发生过边界冲突，更别说战争了。

针对苏联政府真诚希望中印关系保持和平和友好，印度大使表示感谢。

我答复印度大使道：大使先生说的很对，关于中印边境冲突，我们的立场印度政府应当是非常了解的，具体可参见塔斯社所发的声明和H.C.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共同的朋友——印度和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并能够通过谈判和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

我承诺，将会把他所通报的情况向本国政府做出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翻译局随员 П.В. 卡萨特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签名）

分送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克罗特钦科、卡利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潘友新、葛罗米柯、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齐米亚宁、波采罗布和图加里诺夫等，顾问小组，东南亚司，苏联驻德里和北京大使馆，档案室（3 份）

第 мб№4992/гс 号，1959 年 11 月 14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3 卷，第 3269-3271 页

文件 1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

（1959 年 12 月 1 日）

1959 年 12 月 8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工作日志
195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
第 292 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 年 12 月 1 日

应乔晓光的请求，我接待了他，并与他举行了会谈。

乔在谈话时讲，昨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费舍尔拜访了他，并把外交使团的公文案卷转交给他了，费舍尔在长达 4 年的时间内任该使团的团长。

我祝贺乔接受了外交使团团长的职务，并祝他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的事业中工作得富有成效。

乔同我商量该用什么方式去组织一次欢送外交使团团长里·费舍尔的仪式，后者为在那些派驻朝鲜的大使以及整个外交使团的工作中建立友好气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大使们的名义组织一次告别宴会，并赠送一件礼品留念。

然后我对乔讲，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审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 1959 年 10 月 27 日致世界各国议会的信，并发出了复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旨在用和平民主方法恢复朝鲜民族统一的措施。接着我讲述了复函的内容，同时着重指出，解决朝鲜问题应该从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离南朝鲜开始，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去年秋天之前撤离那样。

乔也讲了美国人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的事。

由于这一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拘留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鉴于这种诬蔑性的声明，外交部于今年 11 月 30 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驻孟买的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揭露。

我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冷战”的拥护者们所感到厌恶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今后也将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的途径去维持国际紧张局势。

我向乔打听了一下，尼赫鲁对周恩来最近的一封信是否有了复函。

大使回答说，他没有被正式告知，复函是否已被发出。然而，印度报刊正在大张旗鼓地评论尼赫鲁给周恩来复函。印度报刊在自己文章中声称，尼赫鲁不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从边境撤走边防军的提议，并提出了要中国边防军单方面撤离的要求。

接着乔讲，尼赫鲁不愿意会面和进行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总理级别的和平谈判，并宣布，只有在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提出的关于从拉达克地区撤出军队的建议之后，才会进行谈判，尼赫鲁认为拉达克是印度的领土。在这一问题上尼赫鲁的考虑是，在拉达克的领土上曾有过一个独立国家这一事实。接着乔说，拉达克的统治者们同西藏打仗，结果失去了独立，被并入了西藏。乔说，尼赫鲁以此为由，认为拉达克地区的中国领土是印度的，并要求中国政府把这块面积等于 4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交给给印度。乔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印度过激分子的凭空臆造

出来的理由。

接着乔告诉我，现在印度国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在给这场运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印度的一些著名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印度国防部长不久前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在解决同中国的边境纠纷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将会用直到动用武力为止的一切方法来捍卫自己的领土。

接着乔说，美国和英国在煽动反华运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从自己这方面出发说，印度的反华运动是一连串旨在燃起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敌意和仇恨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行动中的一个环节。帝国主义分子心里非常明白，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领头国家，所以他们竭力用一切方法破坏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保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印度右派分子和他们的美英主子们的扩张图谋注定会破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和亚洲的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都非常明白真理在哪一方，并且都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58-292

文件 12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

（1959 年 12 月 31 日）

机密，文本第 3 份

致伏罗希洛夫同志

科兹洛夫同志

福尔采娃同志

苏联外交部向您们呈上关于同印度和尼泊尔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会谈提要的草案。

请告知您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并将这份文件提交给苏共中央审议。

葛罗米柯（签名）

1959 年 12 月 31 日

第3213/ГС号

机密，文本第3份

在印度的会谈提要

伏罗希洛夫、科兹洛夫和福尔采娃等同志访印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印的友好关系，加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发展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趋向，使印度致力于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活动获得更积极的支持。

此行的情势特点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12月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对印度各界主张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抵制上述影响，苏联代表团的出访应当促使那些主张在印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的力量团结和积极行动起来。

代表团在会晤、会谈和公开演讲的场合下，必须遵循下列要点。

现在国际关系明显趋向于紧张局势缓和以及政治气候变暖。这样的形势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和苏联过去和现在共同努力的结果。

促进美苏关系改善、对整个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产生积极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访问，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最为重要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代表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极大的意义，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支持和许多国家政府的赞同。

最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外长会议，各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各领域交流的加强等等，有力地促进各国政府更好地互相了解。

上述因素对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我们认为，应完全利用这些机会。要表示，相信在1960年，各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的实际措施来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将具有重要意义。在会上将研究当代这些迫切的问题，如：全面彻底裁军、签订对德和约，包括关于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苏联政府将竭力

设法，使会议在高层领导人中取得成功，使会议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及推动各国走向进步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进行的访问，我们希望，这不仅是改善法苏关系，而且是东西方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世界持久和平的建立不能没有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参与这一事业。这对解决国际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是被公认的。

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实践上采取的每一个措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总的情况，取决于“合作精神”的维护与发展，取决于各国为避免新的冲突与分歧的努力。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而现在刚刚出现了新的各国相互关系的最初萌芽，表现出更多地互相谅解和务实合作的愿望。这些新的趋向当然需要予以重视和关切。

印苏关系

（1）政治关系。在同印度国务活动家会谈时，应对苏印关系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着重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加强苏印友谊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印苏关系的顺利发展经受住了一系列考验并证明了其牢固性，它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方国家采取新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共处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印度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互相支持，使得这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促进了和平与安全。扩大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既符合印度，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国际紧张局势总体趋向缓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苏联政府仍然认为，加强印苏合作是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将促进一些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就一些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广泛地交流信息是非常有效的，在此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很好的实践。苏联政府认为尼赫鲁总理个人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并愿继续同印度政府交流信息。

（2）关于印度和苏联国家领导人今后的个人接触。会谈时应表示，印度和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个人接触，尤其是两国政府首脑正式互访，大大地促进了印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苏联政府认为，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的个人接触，是促使各

国相互亲近的重要方法，并且会促进和巩固相互理解。

苏联政府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展印苏合作，应扩大两国领导人间的个人接触。关于这一问题，代表团受到委托宣布，苏联政府对赫鲁访问苏联的邀请仍然有效，如果他能够在1960年方便的时候同其女儿英迪拉及孙子们一起对苏联进行访问，我们将非常高兴。

在预先同尼赫鲁商谈后，应邀请内阁总理及其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克里什纳·梅农、潘特、莫拉尔吉·德赛、拉梯利亚等到苏联访问。

在同普拉沙德总统会谈时，应提出，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并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他在1960年来苏联。

(3) 经济关系。指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印度对这种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政府愿意在今后全力发展苏印经济技术合作的互利形式。

如印方提出新的贷款问题，则答复印度人，我们认为，应当在印度偿还苏联提供的贷款、包括偿还最近一次提供的15亿卢布贷款之后，再提出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到在执行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过程中可能会另外出现的储备金。

(4) 贸易关系。应表示，印苏贸易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尚有一些条件尚未被利用起来，以便显著扩大互利的贸易量。苏联准备按通常的商务条件，根据印度需要的数量，扩大机器和设备的销售，供应石油、石油制品以及其他商品。因此，签订苏印长期贸易协定（现在要每年商定货物清单），以及签订有苏联和印度参加的三方贸易协定，这将是积极的因素。应表示，希望双方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扩大互利的贸易。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应表示，希望印度和苏联能够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发展各国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彻底废除关于贸易问题的歧视政策。

关于中印关系

若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在会谈时提及中印关系问题，则出发点应当是，应当广泛地讨论这一问题。在谈到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问题时，应限于阐述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明的立场以及塔斯社1959年9月10日声明。应当强调：通过谈判尽快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符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

若印度人提出关于苏联调解中印边界争端这一问题，则应指出，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自己能顺利解决这一争端，无需第三国的帮助。

若印度人提到关于苏联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问题时，则说，这一复杂问题要由苏联的主管部门认真研究。

关于克什米尔

若印度人关心苏联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已表明了立场。在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的这一立场至今未变。

关于西藏

若印度人以任何形式提到西藏问题，应回答说，苏联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完完全全是中国的内政。

关于苏联－尼泊尔关系

由于苏联代表团被邀请到尼泊尔访问，不排除印度人在会谈时将会提到关于苏尼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完全理解尼泊尔同其邻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紧密和友好关系，并衷心地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尼赫鲁进行秘密会谈的时候，关于苏尼关系问题应补充指出，关于这一问题，正如苏联驻德里大使当时已向印度外交部通知的，苏联政府在同尼泊尔的关系中总是会考虑到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今后打算继续遵循这条路线。

关于联合公报的发表

认为，应当发表关于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的联合公报。

1959年12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п.73，д.301，л.241-258

文件 13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1962年1月17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工作日志

1962年1月17日

今天我接到了古普塔的请求。古普塔转告我说，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全体会议将于1月16日至17日在德里举行。会议将讨论高士去世后，印度共产党将来的工作问题。古普塔说，他希望苏印两党的关系不会因为高士的去世而受丝毫的影响，同时请求苏联给予援助。古普塔强调，苏共中央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和同志式的忠告，对印度共产党都是巨大的帮助。古普塔接着说，任何一个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不可能取代苏共在印度共产党心目中的地位。

古普塔汇报说，在高士去世后，他担心苏共给予印共的资金援助会中断，而目前印共正在准备参加竞选，现在竞选资金非常缺乏。古普塔强调，这些问题以前都是由高士亲自处理，高士从没有与他商量过，甚至也很少与南布迪里巴德和奈尔两位助手商量，所有这类问题的处理都是由高士自己秘密进行的。印度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任何报刊也都没有刊载过与这方面有关的内容。古普塔说，他不能单独处理有关援助的问题，他必须和南布迪里巴德一起商量。南布迪里巴德本人诚实可靠，高士最信任他。古普塔非常肯定地说，高士对于接受援助的问题从来没有与阿赫麦德和丹吉商量过，高士曾经说过，他只相信自己，所以所有的外援全部由他个人签收和处理。

古普塔明确否认了中国向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他说印度共产党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将来更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古普塔阐明，印度共产党也绝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要求。会谈中有人插话说：中国方面不太清楚苏联向印度共产党提供援助的事。古普塔接着说，有关苏联提供援助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人接着插话说：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只有旁遮普的党组织从居住在英国的锡克教徒那里得到过；至于通过贸易接受的援助，一般都是由丹吉负责的。

古普塔几次重复说到，印度共产党目前非常需要得到援助，因为竞选斗争将于2月份的第一周展开。竞选之后，印度共产党在培养和提高党的骨干分子的理论水

平方面，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古普塔坚信，印度共产党在竞选中不但能够保持在议会中的原有席位，而且还会有所增加。

古普塔说，在竞选斗争中，国内反动势力的矛头将会直接指向苏联，特别是在有关果阿、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印度共产党在选举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完全是无私的。

AVPRF，f.090，op.24，p.80，d.5，ll.14-19

文件 14

贝内迪克托夫与程浩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5 月 19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5 月 31 日
第 497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工作日志

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武官程浩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6 月 22 日）

在民主德国贸易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使馆武官程浩进行了交谈。

程浩说，印度政府看来不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因为印度政府更喜欢派军队而不是派使节进入中国领土。程浩这里指的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已经有 10 个月没有在北京露面了。程浩强调，印度政府坚持要派军队进入两国有争议地区，并在那里加修防御工事、更换军队和运送武器弹药。中国武官还对印度国防部长上星期的克什米尔之行感到不安。不过，程浩也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两国存在争议地区所部署的军队并不太多。这一方面说明，那里属于高山荒原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粮食供应不足，难以驻防大部队。另外，关于印度在那里派驻军队程浩还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这是印度军方所运用的整体战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程浩认为，印度人这一战术的目的就是想使印中边境地区一直

处于紧张状态；在不动用大规模部队和进攻的情况下不断使用小股部队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领土。而且，在印度军队每次得手之后，印度报刊都要大肆鼓噪一番。印度人的进攻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一次接着一次。但是，程浩指出，印度人的这一政策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使自己失去一切支持，到那时候，印度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必然无法避免。

程浩说，中国当然希望与印度和解。但印度军队无休止地侵犯中国边境，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和报刊对这些小规模冲突的大肆吹嘘均无助于两国间问题的和平解决。程浩再次强调道，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要达到这一点很难。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翻译专员 A.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2 年 5 月 30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53-3654 页

文件 15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

（1962 年 6 月 6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6 月____日

第 387 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6 月 6 日，根据我的请求，贾·尼赫鲁接见了我。

我把关于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实施侵略政策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该地区危险局

势的看法告诉了贾·尼赫鲁。贾·尼赫鲁在仔细地听取了苏联政府的想法之后说道：印度也对东南亚的形势感到忧虑。贾·尼赫鲁承认，在南越的确存在着美国的武装干涉力量。贾·尼赫鲁认为，无论我们对哪一方有好感，我们都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国际委员的报告就应当以事实为基础。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北越也与在南越发生的事件有关。贾·尼赫鲁请求我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外交部民族合作国家事务司秘书古尼杰维亚进行交谈。说了这些话后，他便立刻将后者叫了来。很明显，贾·尼赫鲁已就此次会谈向后者作了相应的指示。

我告诉贾·尼赫鲁，自己即将返回莫斯科休假。贾·尼赫鲁请我向苏联政府领导人，尤其是向赫鲁晓夫转达自己最良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克什米尔问题时对印度的支持。他说，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形势相当复杂。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是纵使一些小国在安理会上提出了所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而这一决议案由这样的小国来提出明显是不妥的。

贾·尼赫鲁看起来神色疲惫，我感到，他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执行人——尼基弗罗夫，发送人——阿尼西莫夫

1962 年 6 月 7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61-3662 页

文件 16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7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7 月 7 日
第 460 号
摘自 M.Φ.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7 月 7 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国大使说，他得到指令需要回北京一趟，因而前来告别。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驻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卡里姆宾格的两名政治参赞和所有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已经关闭）的工作人员也要回国。照中国大使的话说，近期中国不会派新大使来印度。至于中印关系，潘自力说，当自己从北京返回印度之后（今年 6 月 26 日）便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委托在两天内两次造访了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P.K. 尼赫鲁，并声明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边境冲突问题，只是希望印方不要为谈判预设任何条件。中国大使在第三次访问中向印方再次重申了在以上两次访问中所说的话。潘自力继续道，作为答复，P.K. 尼赫鲁立即回应道，印度政府只会在如下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谈判，即中国边防哨卡均撤离拉达克地区。在这一问题上，P.K. 尼赫鲁根本不提及在两国东部边境的一些地区印度边防哨卡已深入到了中国境内。

总之，潘自力继续说道，从 P.K. 尼赫鲁的回应中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印度政府不希望协调解决两国的边境冲突问题。中国大使认为，印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待在德里已没有太大意义。

潘自力补充道，在中国外交部最近发出的一份照会中，中国已向印度政府发出了警告，即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这种冲突依然存在，那么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应当由印度政府承担。中国大使指

出，印度政府不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边境冲突的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希望维持中印两国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极力想向美国展示自己对中国和共产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以便藉此从美国那里获得印度所需要的经济和其他援助”。

中国大使又指出，自己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认可。

关于台湾侵犯大陆的危险，潘自力说，当他离京来印时获悉，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中国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战备）动员，要求相关部队随时保持战备状态并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以便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并彻底消除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

潘自力指出，国民党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攻大陆，中国民众便会起来响应。潘自力继续道，“据我们估计，把国民党的反攻部队与美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45万—50万人。中国领导人坚信，侵略者必将被粉碎，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会谈结束。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分送：Г.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МЧ/ла

1962年7月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6-3668页

文件 17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年7月14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年7月17日

第474号

摘自 M.Ф.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纪要

1962 年 7 月 14 日

今天，我设午宴为中国驻印度大使饯行。同时参加此次午宴的还有中国驻印度使馆所有参赞。在宴会期间我与中国大使作了如下交流。

关于中印边境事件，潘自力说，在中印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局势已紧张到了极限，双方随时都可能爆发武装冲突。

潘自力说，在拉达克的喀尔湾谷地印度士兵已深入到了中国边防哨的后方，并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哨所。中国连队指挥官要求印方停止这一举动，但遭到了拒绝。

潘自力还通报道，印度军队指挥官迅速地在拉达克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中国大使断定，国民党和印度人在行动上已达成了一致，以便从不同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

潘自力说，7 月 13 日他参加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举办的午宴。“午宴举办得相当正式”。按中国大使的话说，尼赫鲁的讲话内容非常全面，但对中印关系却只字未提。(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午宴期间尼赫鲁曾告诉中国大使，印度政府坚决抗议中国人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后者将所有中国军事哨所撤出拉达克地区)，

此次宴会的其他话题均只带有一般性质。

宴会组织得相当好，并且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Ф.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第 626 号，分送：Г.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69 页

文件 18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26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7 月 27 日

第 492 号

摘自 M.Φ.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7 月 26 日

今天，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来向我辞行。他说，自己已得到指示，很快将启程返回北京。因此想来向我告个别，并对在印度整个逗留期间苏联使馆所给予他的各方面协助表示感谢。

叶成章指出，中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没有期待中印关系的紧张会迅速消除。

叶成章认为，中印两国间现有的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原因在于：其一，印度政府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从西方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援助；其二，印度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将中国边防巡逻兵从本属中国的领土上排挤出去。

叶成章通报，目前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实际上业已中断，因此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将压缩到最低编制。他还补充道，前不久全印和平大会主席松洁尔拉特曾得到了去中国的邀请，他本人也已同意前往，但印度外交部就是不让他去。

印度外交部在向印度公民发放边境签证时均依照相关程序在上面做出说明，即严禁前往中国。

在稍作犹豫之后，叶成章询问道，报纸上说 A.И. 米高扬同志在德里会见了梅农，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对这一传闻，我坚决予以否认，并指出米高扬同志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的确曾在德里停留，但当时梅农已去了孟买。而当 A.И. 米高扬在德里停留和从雅加达返回莫斯科期间，梅农则已到了日内瓦。

叶成章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

会谈的其他内容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Ф.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第 652 号，мч/нш

分送：Г.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2 年 7 月 27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70-3671 页

文件 19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 年 8 月 26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8 月 __ 日

第 575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8 月 26 日

在与（国防部长）梅农进行会谈的时候，我向他问道，报纸上公开的关于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之事是否属实。梅农坚决予以否认，并说道："印度人没有开枪。我们已向本国军队发布了严格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特殊情况除外。"

梅农说，中国人将自己的哨所设置在印方的交通线上，导致印方无法向自己的前沿哨位运送装备和粮食。这些前沿哨卡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印方不得不派遣小分队去营救。目前，两国的前沿部队均深入到了对方的后方，从而为冲突的随时爆发埋下了隐患。梅农说，类似的冲突无疑会恶化印中两国的关系，并导致印度国内

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这明显只会对反动势力有利。

梅农提到了自己与周恩来的会谈情况。期间，梅农对周谈了自己的看法：印中关系的恶化对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国家都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梅农又指出，外界所有关于贾·尼赫鲁的继任者究竟会是谁的传言都是毫无任何意义的。因为尼赫鲁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好，他将会在今后6—7年间继续管理国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第745号，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2年8月2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2页

文件 20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纪要：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

（1962年9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9月4日

第600号

摘自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会谈记录

1962年9月4日

我拜访了萨·拉达克里希南总统，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名义诚挚地祝贺他的生日，并祝愿他及其家属在崇高岗位的活动中取得成就，身体健康，长寿。他对祝贺表示了热情的感谢。

与总统的会谈是在非常热情、友好和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拉达克里希南对赫

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的活动给予了极高评价，强调他在国际事务中、在执行英明的对外政策中、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说明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并说，他多次向印度政府指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合乎情理的典范。总统特别强调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签订采购“米格－21”协议的谈判中显得非常英明、理解和极有分寸。他指出，苏联并没有把这份协议强加给印度，而只是迎合印方的愿望；明智地对协议保持平静和沉默，在大家都冲动和叫喊时，美国人的举动“简直愚蠢”，经常提出这一个问题，并以此表示对自己的不公平。总统声明：“我们深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政府仍将平静、满怀信心、英明而不声张地执行自己英明的对外政策，并将取得成就。”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说，他在声明中，甚至在公开的言论中，对苏联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以军事基地包围谁——是苏联包围美国还是美国包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这样的一个对比，足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作出评价。他提起他在科伦坡的一次讲话，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指出，美国在制造了原子弹后称，这一创举是恩赐，并在日本使用了，而苏联在制造了原子弹后声称，这对人类来说是个该死的东西。

总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但他不否定，由于偶然性、挑衅性或不幸的情况而有可能发生战争。他引证说，因苏伊士、老挝和柏林等问题引起国际形势紧张，最近双方都放弃了用战争途径进行威胁和解决冲突，并走上谈判和协商的道路。他指出，“苏联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是抑制战争的因素，不让战争发生”。

总统说，他认为，印中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他遗憾地说：“这样的小事引起如此的噪音。”他说，他明白中国对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道路的利益关切。总统声明，“他认为，印度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国使用，如果中国承认印度对这些领土拥有主权的话”。总统声明，“印度认为这些领土属于自己是有法理依据的”，并举例说，1870 年英国大地测量学家征得克什米尔大君的特许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勘察。

拉达克里希南继续说：“当这一争端得到调解，不仅中国和印度会感到庆幸，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庆幸，因为苏联非常希望这两个大国成为苏联的朋友，并与苏联走同一条道路。要知道列宁早就希望加尔各答、北京和莫斯科能够遵循共同的目标。”

拉达克里希南在会谈中提到，总理的健康虽比春季时好得多，但还不是非常

好。他说，尼赫鲁的工作非常多，又不保重自己。现在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竭力帮助尼赫鲁，把他作为“国家第一号人物”。

总统饶有兴趣地询问了苏联的近况。我向总统讲了关于我国取得的成就，关于工业、科学、农业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拉达克里希南认真地听完后说：“我感到你们的情况很好。甚至肯尼迪不得不承认，美国落后于你们，而他是很明事理的。我常对我们的人民说，我们看苏联，看它在20—40年内取得的成就，看苏联人民如何从1917年把一个遭受破坏的落后的国家建成为一个世界上伟大的强国，看他们如何不断努力，增强自己的国力。而我们谈论和讨论了很多，但做得很少。为什么印度不能取得这些成就？！ 我们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我们需要纪律、人民的创造热情以及为达到目的而集中力量。可是我们却时常夸夸其谈，把一切归咎于总理；反对党极其不妥、无礼、粗暴地对待尼赫鲁，攻击他，而不去做一点正面的事。他们最怕尼赫鲁使印度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把他们吓坏了。”

总统请我向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以及苏联政府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最后，总统希望苏联大使近期不要离开印度（显然由于报刊发表了即将召回大使的消息）。拉达克里希南说，苏联大使应留下较长时间，以帮助将来发展印苏关系，尤其是就解决印度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议。他希望很快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当提到印度的农业问题时，他不愉快地印度农业部长帕梯勒（Патиле）先生进行了批评。

大使馆翻译专员 A.Л. 尼基弗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伊·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3-3676页

文件 21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10 月 10 日

第 885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1 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进行了交谈。

针对印度总理贾·尼赫鲁近期发表的关于印中关系的声明，我询问他的看法。

叶成章同志说，他从尼赫鲁的声明中感到，印度政府的立场并没有任何改变，本质上与印度军方和国内在野党所发布的声明没有任何区别。叶成章指出，不能指望在近期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因为印方根本就没有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叶成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印方的不断挑衅，两国之间的边境争议将会不断加剧。印度把很多军队运往东部边境并始终在那里驻有重兵。

叶成章同志通报道，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今天举办招待会期间，印度人民同盟和人民社会党等印度在野党在中国使馆周围专门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在通往中国使馆的所有街道上都部署了岗哨以拦截和驱逐所有前来参加中国招待会的印度公民。叶成章说，关于印度国内在野党的上述举动中国使馆已通知了印度外交部。

叶成章同志说，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去年，其中主要农业作物的收成都比较好。

我也向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如下情况：今天，Н.С. 赫鲁晓夫和 Л.И. 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发去了贺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翻译专员 А.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AH/гк，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2 年 10 月 2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77-3678 页

文件 22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纪要：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

（1962 年 10 月 2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10 月 3 日

第 656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绝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国防部代表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 日

我接见了以达特少将为首的由五人组成的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该代表团是根据印度国防部的委托来造访的。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苏联尽快向印度派遣专家，以便为印度设计能够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印度代表团强调，这些苏联专家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不仅能承担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作，而且能够组织飞机及其附属工厂的生产活动。印度国防部代表答应将向苏方提供相关的问题清单，第一批苏联专家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只是在苏方作了相应的解释之后，印度代表团才表示同意，让苏方的飞机设计小组先来，以便对印方感兴趣的问题做出相应的答复。但印度代表团仍坚持要求，这些苏联专家必须拥是多方面的并能够被尽快派往印度。

我指出，印方常常要求苏方迅速地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答复，但当得到了莫斯科的答复之后，他们往往又不急于解决问题，拖延信函的发送和苏联专家的签

证办理。印度代表承认我的意见很对，并承诺他们会竭力不使类似的拖延再度发生。

我建议他们迅速成立大型的设计机构以便完成相应的（飞机）设计工作。他们说，印度已组建了两个专家小组，正在对飞机厂的厂址和占地面积进行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经济问题参赞罗曼诺夫 Б.С. 同志，苏联驻印度贸易代表维里津和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资料共计 3 份，ан/нш，分送：Г.М. 普希金和 С.А. 斯卡奇科夫等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п.6，л.88-89

文件 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冲突

（1962 年 10 月 1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2 年 10 月 14 日会议第 59 号记录[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Ф.Р. 科兹洛夫、А.Н. 柯西金、Д.С. 波利扬斯基、М.А. 苏斯洛夫、Н.М. 什维尔尼克、В.В. 格里申；苏共中央书记：Л.Ф. 伊利切夫、Б.Н. 波诺马廖夫、А.Н. 谢列平；会议是由 Н.С. 赫鲁晓夫主持的。

第 33 项 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

由 Н.С. 赫鲁晓夫同志继续阐述：

---

① 在由 H. C. 赫鲁晓夫签署的会议记录誊清稿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标注的日期是 10 月 18 日。——原注

1. 暂停向印度派遣米格 -21 飞机。[①]

2. 关于给驻印度的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志的指示。应对尼赫鲁说："我们感到失望"。

是否想象到，冲突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麦克马洪线"是谁确立的?

谁承认的？什么时候划定的?

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把军队撤离到 20 公里以外的建议是理智的。

印度方面关于把军队再撤出 20 公里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损尊严的。

我们赞成消除冲突，因为它是不会带来益处的。

印度未必能够从冲突之中赢得什么。

什么时候提出了关于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的倡议——在 1962 年 11 月 6 日之前。[②]

电报：

（1）给波诺马廖夫同志——关于 1962 年 11 月 20 日会议。

（2）给乌布利希同志——关于农业问题。[③]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35

---

① 在 1962 年秋天中印边界冲突再一次尖锐化之后，苏联不希望恶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停止向印度提供苏联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包括暂时不发出在 1962 年 8 月 29 日两国协定中规定的新型米格 -21 飞机。这使驻中国的苏联大使 C.B. 契尔沃年科在回答周恩来针对苏联给印度提供军事装备提出的抗议时，有理由声明说：苏联"到目前为止"，仅仅向印度提供了 8 架安 -12 和 20 架米 -4 飞机。自然，这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原注

② 1961 年 11 月 6 日，联合国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呼吁有关各个国家在签署必须的国际协定之前停止继续试验核武器。在 1961 年 8 月前单方面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的苏联，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1962 年 10 月，在联合国第十七次大会上，由 30 个中立国组成的委员会，对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例行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苏联在这种场合下决定投赞成票，因为这个决议规定自 196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原注

③ 指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关于给德国提供农业产品，首先是肉类产品的援助请求。——原注

文件 2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

（1962 年 10 月 15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23 日
第 702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2 份

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布佩希·古普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15 日

我接见了布佩希·古普塔，并与他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布·古普塔首先声明，在最近一次国民会议全体会议之后，党的情况显著改善了。他巡视各邦后，感到组织加强了，对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的讨论在绝大部分组织进行得都很好，对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政治决议都得到了赞同，甚至大会就阿尔巴尼亚问题作出的决议，大部分人也支持苏联的观点。唯一引起了某些争议的问题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其中包括道路、城市的改名，等等。古普塔说，他号召各组织不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古普塔提到了现在正在召开的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喀拉拉邦的情况、目前印中边界局势以及日常事务。他说，边界纠纷，特别是公开的武装冲突，使印共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印度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困难，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古普塔请我把印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印共与中共关系的意见转达给苏联领导人。

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古普塔说，印共没有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关于边界问题的任何信息。“所有关于边界事件的信息都是从一般的资产阶级庸人的报纸那里得到的。由于我们一点准确的信息都不知道，因此产生了许多困难和互相矛盾的看法”。古普塔通报说，不久前印共通过接近国防部的一位人士获得秘密消息，印度军队现在在离边界以北 3 英里的中国境内。他指出，不能保证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古普塔肯定地说，最近两年半以来，中国同志拒绝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也不听取印度同志的意见。他们不想弄清楚印共的立场以及边界

争端给他们造成的困难。"要知道，他们都很熟悉我们——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和我。我亲自会见过所有这些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现在全不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则不能伸手接近他们"。古普塔提到，他在莫斯科时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未能实现苏斯洛夫提出关于古普塔与陈毅会晤的建议，当时陈毅途经莫斯科前往日内瓦。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也没兴趣与印度同志会谈。根据古普塔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一月前收到了中共中央从北京寄给印共书记处的信。但是，收件人至今仍未收到这封信，因为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丹吉、南布迪里巴德或古普塔三人领导小组中某一位到大使馆去看这一封信。古普塔对此批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是充满同志般的态度，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小官吏，"永远不理解我们"。

古普塔确信，因印中两党关系形成的不正常状况，到了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他赞成各兄弟党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各党的立场，讨论因持续的边界争端造成的困难，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不能去北京"。他说，大部分同志赞同他的意见。

他同时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应当进行会晤和会谈的时间到了，就像男子汉和男子汉的会谈一样，因为中国同志在世界上除赫鲁晓夫外，谁的话都不听"。

同时，他注意到了越来越剧烈的反华运动、孤立中国的运动、离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资产阶级利用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使苏联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图谋。他建议加强反对这类宣传的斗争。

古普塔说，印共领导人收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关于派遣一个由三名党员组成的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的邀请，但至今仍未对这次邀请作出答复，显然是不接受了。他还提到，党报《新纪元》在9月初错误地刊登了订阅南斯拉夫出版物的广告。因此，印共书记处指出，不准刊登南斯拉夫党报刊上广告式的宣传，同时也禁止刊登中国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这一广告式的宣传。

古普塔谈到了关于书记处内部的职责分工问题。他说，他主要负责印共在议会的活动和党的学习；丹吉负责工会活动、《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纪》杂志的工作；南布迪里巴德从事《新纪元》周刊工作，这三人都负责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戈文丹·奈尔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书记处的各地成员则负责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在谈到关于创办中央机关日报的问题时，古普塔讲了书记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书记处作出的结论是，在德里发行英语或印地语版日报是无效的，因为，在德里的党组织很弱小（只能推销2千份），当天报纸到晚上只能送到4—5个地点，其

余地点要 1—2 日后才能送到。这使报纸的作用低效；党每月将亏损 1 万—1.5 万卢比。因此决定，在中央领导下在比哈拉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发行 3 家报纸。比哈拉邦的报纸将于一月出版。

我强调了中央日报的重要性，并提示《火花报》和《真理报》对组织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意义。古普塔对此表示同意，并说，他明白党的中共机关日报的极端重要性，但对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这类报纸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古普塔说，书记处授权他收集赫鲁晓夫、其他苏联领导人以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言和文章，特别是关于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问题的发言和文章，并在各地用印地语发表。他请求对此事提供帮助，并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关于物质帮助问题我没有进行讨论。

在谈到苏联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的组织方案时，他强调说，对此事必须极其谨慎。只有书记处三人领导小组才能讨论这问题，并与苏联同志联系予以实施。在这一问题上古普塔说："我不支持中国同志的观点，我也明白，近年来印苏关系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和改善，需要珍惜，使它免受各种不愉快事件的影响。"古普塔建议，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在各大城市建立良好的苏联图书刊物阅览室，以抗衡美国和英国建立的阅览室。

我请古普塔采取措施，加快办理同志们到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手续。古普塔答应去办，并补充说，印共代表团在去参加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莫斯科时，可以了解关于党校的工作。古普塔解释说，印共将在这里举办一系列党校，因为这对培训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但不能全部都派到莫斯科来。所有这些党校都将在中央的严格管理下进行工作。

我通知他说，《真理报》编辑部邀请各地方党报 10—12 名编辑访问苏联，并参加 11 月 7 日的庆祝活动。

古普塔说，可以通过列札·阿里（Реза Али）与书记处联系。

会谈持续了 2.5 小时，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伊·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印发 4 份 №.907

1. 苏共中央波诺马廖夫同志

2. 苏联外交部普希金同志

3. 苏联外交部军情局

4. 存档
1962 年 10 月 22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2-3696 页

文件 25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纪要：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10 月 24 日
第 425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德赛的谈话记录

1962 年 10 月 18 日

我应邀与德赛见了面并同他进行了交谈。期间，他主动谈起了关于印中边境争端和所谓“麦克马洪线”等问题。

我声称，由于自己没有得到授权，因此无法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德赛答，他了解苏联的立场，也理解我为何要这样说，但仍希望向我通报一下引起中印两国争端的几个问题。

他说，在最近 3—4 个月，印度一直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来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但中国人却无意维持近两年来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区的安定，从 9 月初开始不断派自己的军队深入到印度境内，并觊觎印度东北边境特区（НЕФА）的大部分领土，结果导致了最近的武装冲突。中国的上述举动是对印度合法权利的侵犯，引起了印度国内民众的激愤。德赛认为，中国此举无疑使印方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尝试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即使这样，印度总理仍声明，如果中国尊重印度的领土主权、尊严，放弃对印度的威胁并将本国军队从所占地区撤往“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不过，从中方所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不但

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试图让本国军队向南方推进。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印度外交部发出了抗议印度军队的行动的照会，以配合他们的侵略行径。中国人在照会中断言，中印两国军队间的冲突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

德赛提出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理由。

他向我转交了“麦克马洪备忘录”的文本和1962年9—10月间中印两国互换的照会文本，其中包括两个最新的印度照会文本在内。

德赛指出，印度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虽然中国已经侵占了印度很多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印度绝不会让中国军队继续这样做。他警告道，在1960年的谈判中中方曾表示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以印度承认中国占领拉达克为交换条件。如今，中国又向“麦克马洪线”发起挑战，试图利用拉达克问题对印度施压。德赛认为，近期内解决两国争端的前景渺茫。“如果因此而导致两国间的战争，那就可能持续10—15—20年”。

我对德赛谈了苏联政府对印中边境争端的看法，并强调双方理应以和平谈判手段解决争议。我指出，在边境上开火远非解决争端的明智之举。

我向德赛通报道，苏联政府已同意印度政府的最新任命，即由T.H.卡吾里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对此，他代表印度政府表示感谢。

我告诉德赛，根据两国间现有贸易协定，要很难取得向印度供应苏联商品的许可证。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印度外交副国务秘书梅农——和我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АН/гк，分送：Г.М.普希金和斯卡奇科夫等同志，档案室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87-3689页

文件 26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

（1962 年 10 月 22 日）

苏联外交部翻译局

1962 年 10 月 22 日，译自英语

第 3136/ Г С 文附件

印度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意，并敬请关注中国蓄意和无端侵略印度的事实。

在中印边界西段，即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深入侵犯印度领土。在东段，中国部队于 1962 年 9 月 10 日渡过很高的分界线，对印度境内的印度哨所发动了袭击。1962 年 9 月 20 日上午 5 时，大量中国军队用重型迫击炮和机关枪协同对印度西段和东段的几个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数周前，中国政府建议开始就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建议由印度政府提出，并讨论过谈判的日程、代表级别和日期。现在明白了，中国关于谈判的建议，只不过是为掩盖其侵略印度的计划作准备。

印度从来都不希望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但现在中国人把军事行动强加给了印度，印度军队正在击退中国的进攻。只要中国积极地继续和扩大对印度的侵略，显然就不可能在某一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印度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印度不止一次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地位的要求。印度对制止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所作的努力众所周知。印度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现在，正是中国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原则，侵犯了印度。

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抗击中国的侵略。

大使馆借此机会，再次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2 年 10 月 22 日

于莫斯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0-3691 页

文件 27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纪要：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

（1962 年 10 月 24 日）

摘自 И.Ф. 什佩季科的工作日志
1962 年 10 月 24 日
南亚司第 501 号

机密，文本第 3 份

与印度驻苏联临时代办扎伊帕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4 日

应印度驻苏临时代办扎伊帕尔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他向我通报道，今年 10 月 23 日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马拉维亚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之邀来到莫斯科访问。后者目前为印度内阁成员，与贾·尼赫鲁交往甚密。马拉维亚部长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C. 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B.B. 库兹涅佐夫能够接见他。

扎伊帕尔说，目前印中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已发生了真正的战斗，期间在一些地段中国军队已推进到了印度国土腹地。这引起了印度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安。马拉维亚明白，赫鲁晓夫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希望能与他见一面，即使 20—30 分钟也行，以便向他解释一下印度政府的担忧。而关于印中边境地区的详细情况，马拉维亚打算在与 B.B. 库兹涅佐夫见面时再说。

扎伊帕尔补充道，马拉维亚在上述提出的关于与赫鲁晓夫会见的请求带有保密性质。扎伊帕尔希望苏联方面明白，马拉维亚这样作可能是为了完成贾·尼赫鲁的委托。扎伊帕尔说，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马拉维亚在苏联的逗留期限为 10 月 28 日以前。

我答复扎伊帕尔道，他上面提到的关于马拉维亚的请求之事，我将会向苏联外交部领导汇报。

在随后的会谈中扎伊帕尔指出，目前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均公开声明，他们都站在印度一边。印度明白苏联的立场——苏联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理应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印度人民渴望得到苏联在道义上的支持。扎伊帕尔强调，对于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而言，中国军队竟会发动如此猛烈的进

攻，这是印度全国上下始料不及的。

我对扎伊帕尔说道，目前印中边境地区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而要是再听信挑唆者的话那就更加危险。正如扎伊帕尔所言，苏联与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印中两国边境冲突伊始，苏联便呼吁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如今，当局势复杂的时候，印中双方代表就更有必要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共同努力和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以解决边境争端。

扎伊帕尔说，他理解苏联的立场，并认为这一立场是客观的。印度也非常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印中争端。扎伊帕尔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苏联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南亚司随员菲阿尔科夫斯基。

南亚司副司长

什佩季科（签名）

文件共 6 份，АФ-НЯ ЮАМ/1213，1962 年 10 月 24 日，分送：В.В. 库兹涅佐夫、Г.М. 普希金、图加里诺夫和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等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7-3698 页

文件 28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纪要：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24 日

第 1007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4 日

今天，我与印度新任驻苏联大使 T.H. 考尔举行了初次会面。他 10 月 20 日刚

从英国回来，11 月 2 日便来莫斯科赴任。他强调，他很希望到苏联来，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政府派他来苏联工作的。此次会谈是根据 T.H. 考尔的提议举行的。此前，他曾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多位领导人进行过长谈。

会谈伊始，考尔便提出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问题。他说，自己曾两次去中国，认识一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并自认为是中国的朋友。他断定，自己以前非常敬重的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模式，已明显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考尔继续道，"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不遵循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且似乎已完全放弃了这一发展原则。他们否定和平相处，并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考尔指出，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看法存在着误解。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印度政府并没有得到人民真正的支持，印度人民很乐意接受另一个政府。考尔认为，中国的宣传将贾·尼赫鲁比作一个拿着宝剑与北京作对的将军，而一个脖子上戴着山姆大叔用美元作成的花环的尼赫鲁是不会得到印度民众的拥护的。考尔断言，中国近期在印中边境上所采取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印度的和平外交，迫使其放弃中立、不结盟的既定路线，加入西方强国的军事集团，并公开放弃和平共处政策。考尔继续道，"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无论如何印度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虽然我们并不拒绝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援助，虽然为了我们暂时仍相当弱小的军队，我们可以与任一向我们提供了更优惠条件的国家做生意和购买武器，但我们并没有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并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考尔强调，印度政府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自己不加入到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列强所组织的集团之中，不参与任何冲突，以防自己成为新的冷战热点。

我对印度外交官就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的等问题所发表的上述观点和结论表示了异议。我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均具有爱好和平和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而不懈斗争的性质。我强调，印度当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全面的准备战争，而是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和尽快平息边境军事冲突的办法。我认为，中印双方越早开始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尔回答说，印度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尼赫鲁在自己给 H.C. 赫鲁晓夫的信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可是，中国也应当明白印度从来都不会向专制力量屈服，不会在威胁和中国军队的不断进攻下举行谈判，从来都不会在投降的条件下走上谈判桌。任何军事上的挫折和困难，都不会击垮我们和让我们

屈服。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直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印度人——具有热爱和珍视和平的天性。他们的反应可能比较迟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反击必然更加有力而持久。印度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受过很多次的外族洗劫，但我们对祖国的命运怀着坚定的信念。尼赫鲁曾在自己的广播演说中表达过印度民族的这种信念、决心和镇定”。印度大使再次强调中印之间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军队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后才可能进行，并断言印度已经容忍中国军队的入侵长达三个年头了，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印度人民对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充满了信心。考尔还试图证明，印度有能力承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有与中国进行长期冲突的实力。不过，他又说，中国应当明白，不应当扩大与印度的冲突，因为此举会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构成威胁。考尔指出，就印方而言，我们已命令军队只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考尔表示坚信苏联一定会在这次印中冲突事件上对中国施加影响。他告诉我说，尼赫鲁也对此寄予厚望。

这里，印度大使还顺便提到，1953 年他作为印度外交部的官员也曾参加了当时和以后年间印中两国间所举行的历次边境谈判。他回忆道，当时中国谈判代表一直借口说时间仓促，没来得及仔细研究老地图。中方向印度保证说，印度方面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两个友好国家是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与苏联等都有很长一段边界没有界标。但是，随后中国便开始抢占两国在边界上有争议的领土，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于界标的问题。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翻译专员 А.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АН/гк，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2 年 10 月 24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9-3702 页

文件 29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纪要：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6 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1962 年 10 月 26 日

今天我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主动要求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E.M. 南布迪里巴德举行会谈，并通知他有关苏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发表的声明。他认真、仔细地听取了中央的声明，并保证马上将苏共中央的意见传达给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全体成员。

南布迪里巴德说，目前书记处的 4 个成员正在德里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苏联《真理报》10 月 25 日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他要求我转告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以及苏共中央在信中对印度共产党提出的忠告，都将帮助印度共产党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南布迪里巴德说："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感到孤立无援，现在我们有信心摆脱困境。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请转达我个人和 B. 古普塔同志对苏共中央的谢意。"他同时指出，印度共产党正在积极纠正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发生的偏差。用他的原话说，许多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不能清楚地区分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不同造成的，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他接着说，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在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印度共产党认为"麦克马洪线"才是两国边界真正的分界线，印度共产党内许多普通党员和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认为，边界冲突的引发和加剧的责任，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古普塔指出，苏联《真理报》的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地会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使他们重新考虑有关的问题。书记处的成员奈尔和夏尔马也指出，《真理报》的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志，反而批评了印度共产党的立场，并说由此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南布迪里巴德在印度共产党书记处讨论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后发言说，这篇

文章的发表将会在印度国内掀起一股新的反苏浪潮，使反华的情绪转变为反苏，并进而扩大到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指出，由于苏联《真理报》这篇文章的影响，许多中立国家也会强烈呼吁印度尽快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印度政府会因此得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的结论。南布迪里巴德表示，非常希望帮助印度共产党弄清楚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同志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在不损害尼赫鲁本人威望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促使中国与尼赫鲁举行和平谈判而不采取武力对抗。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一致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也抱着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愿望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这对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整个进步力量的反帝斗争都具有重大意义。

AVPRF，f.099，op.24，d.6，p.80，ll.134-139

文件 30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

（1962 年 10 月 30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1 月

第 1005 号

摘自 И.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P.K.** 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30 日

我在招待会上会见了 P.K. 尼赫鲁，并表示想了解一下关于他对中国最近提出的关于调解印中边界争端建议的意见。

外长首先声明，他是和平调解这一问题的坚决拥护者。“谁也不比我更想和平调解”。但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国的建议没有为谈判提供可以接受的基础。他说，1959 年 11 月 7 日的界线与 1962 年 9 月 8 日的界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 1960 年前印度人在拉达克的那部分领土上没有自己的哨所，但在 1960 年 4 月中印两国总理谈判失败后，在远离这条界线的后面建立了自己的哨所。因此，用他的话

来说，在拉达克地区的 1959 年 11 月 7 日的界线对印度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大片领土。他强调说："假如中国人确实认为，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声明，即他们的建议与 1962 年 9 月 8 日界线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差别，那么，他们必须同意我们明确的建议，把部队从今年 9 月 8 日的界线后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强调，只要中国人不执行从 1962 年 9 月 8 日界线后撤军这一条款，他就不会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

P.K. 尼赫鲁暗示，印度政府希望，苏联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迅速解决。

他顺便说，他否认国防部长梅农辞职。

在这次招待会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后来为新任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T.H.Кауль）举行的欢迎午宴上，P.K. 尼赫鲁对苏联大使特别殷勤，在两次招待会上创造了毫无拘束的气氛，对所有苏联外交官表达了十分热情的态度。

大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南亚司、外交部情报局、存档

1962 年 10 月 31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709-3710 页

文件 31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纪要：印共对中共的谴责

（1962 年 11 月 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1 月 4 日

摘自 И.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

与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4 日

应丹吉的请求我接见了他。他转交了印共全国委员会决议中不公开发表的一段原文，只供党内部传达以及通报各兄弟党。他请我把他的信转交苏共中央，他在信中阐述了这段决议的意见（信件另发）。这段原文如下："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印度的行为是对 1960 年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和平共处问题、对待刚解放国家的态度问题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举行的代表会议在共产主义世界达成的共同协议的最粗暴的破坏。社会主义中国对印度的态度，不惜以损害世界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代价，堕落于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想。"

会谈时，丹吉同志发挥了他在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阐述的论点，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他首先尖锐地谴责了中国同志对待印度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是他们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评价问题在实践中的运用。他坚信，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就是说，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是有过错的。他提到，早在 6 年前尼赫鲁就请中国领导人承认印度对拉达克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以租借为条件移交中国在拉达克所需的领土。他深信，由于中国的过错而发生的边界纠纷，在两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宣布"潘查希拉"[①] 原则的那些年，没有得到调解。这时，丹吉表示完全不相信中国同志关于实现全面和平以及关于愿意通过谈判调解这一冲突的声明。他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和平共处和裁军。他们认为，印度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工具，因此他们的行为会被看作是没有过错的。"

我回应说，假如中国不愿意和平调解，那它就不会提出 1962 年 10 月 24 日的建议了。丹吉声明，中国提出的建议对印度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中国是不可相信的。他举了中国内战历史的例子，当中国同志在 1949 年集中了三百万大军抵抗国民党阵地时，也同时建议和平谈判。他认为，战线上的平静是暂时性质的，要预料情况会复杂化。

丹吉指明，冲突的延续会造成对国内局势失控的威胁，使反革命势力增强，并会给进步力量和印度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危害。他深信，在冲突持久的情况下，印度

---

① "潘查希拉"，印地语，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注

确实会转向西方大国集团。和平调解冲突的拖延会更加剧这一切趋势，因此，印共的最终目的，据他说，就是和平调解冲突，尽管共产党现在更多强调的是努力防御，以便：1）共产党不被指责叛国，假如所有带头的共产党员都被捕后，共产党不被赶入地下；2）夺取目前公然掌握在反动派手中的主动权，竭力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使反动派退却；3）在这一国家困难的时刻同人民在一起。丹吉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共产党，使其不被完全消灭；印共领导人以此为出发点采取行动和制定决议，需要以此来解释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要求采取防御的情绪。

他指出，共产党等待和动摇将近三年了，但幸运的是，现在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他指出，由于反动派和有势力的沙文主义狂徒的强大进攻，现在一切进步力量，不排除尼赫鲁本人，不得不表现得比他们在事实上更加是热情的护国主义者。

印共主席指出，尽管党采取支持政府及其努力防御的路线，党仍将时常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并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解释说，反动分子无疑会宣布，印共支持政府和拥护国防的声明是虚伪的，并要求禁止共产党；另一方面——印共左派活动分子不同意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企图破坏党关于加强防卫的措施：为军队募集经费，停止罢工，等等。这样，他们也将促使反动派努力把共产党赶入地下。

丹吉对《真理报》的一篇文表示极大的遗憾，他同时表示完全不同意文章中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评论，据他说，这篇文章“使印度人民受到了屈辱”。他实质上指责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支持中国的观点，甚至暗示，在印共“左派”中出现了一定的联合，他们以前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同意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都同意得到苏联共产党赞同的中国同志的理论原理和实际行动：“现在左派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了”。他谈到，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要求宣读苏共中央来信，因为该信支持他们的建议。但是，丹吉不许宣读此信，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此信将马上会被资产阶级报刊所利用，导致外交及其他方面复杂化，并沾污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良好声誉。用他的话来说，“左派”认为他不同意宣读此信会造成失去大多数的危险，因为他们认为，对苏共中央建议的了解一定会影响全国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大多数就会站在“左派”——《真理报》文章的拥护者方面。

丹吉证实了书记处三位成员辞职的事实。他说：“他们自己请求辞职，我们立即就满足了他们的请求。”据他说，南布迪里巴德同志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明，他现在“处于这样的混乱情况下，既不能讲，又不能写，也不能工作”。但是

丹吉承认，他曾请求他留任，并说，他自己将承担全部工作和所有的指责。

他反对印度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的联系。“只有对中国同志说，他们是对的，而印度和尼赫鲁是不对的以后，才能到北京去。要知道他们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两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到北京去把他们的错误告诉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苏联同志不能说服他们，那么我们这个不大的党能做什么呢。”他也指出，中国同志早就拒绝与印共进行任何联系。

丹吉宣称：“我们在莫斯科也什么都干不了——难道就“麦克马洪线”进行争论吗。”他通报说，原定各地方党报 12 名编辑人员的出访取消了。起初他解释这是由于印度外交部因非常情况而不发给他们签证。后来，当告诉他外交部给大使馆的照会中已表示准备发签证后，他说，现在出访不合时宜。他本人也没有表示到莫斯科访问的意愿，并反对南布迪里巴德到苏联访问。他还通报说，印度外交部拒绝给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印共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

丹吉说，印共没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特别的呼吁。他声明，印共组织一系列的游行反对反动党团是为了抗议他们的反共示威和暴行。他顺便提醒我们，各反动党打算在 11 月 7 日在大使馆前示威游行。

在回应两名印共活动家在旁遮普被捕的问题时，丹吉有点冷漠地答道，这是不支持全国委员会决议的“左派”。他说，今后可能还会有人被逮捕。

丹吉说，他打算近期会见贾·尼赫鲁。

我对苏共中央在信件中、《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中提出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深信不疑，并提出丹吉未能回答的一系列反论据。其中我阐明了，继续冲突对双方不利，这（对印度来说）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使薄弱的经济过度紧张，削弱尼赫鲁政府本身，降低印度在世界的威望，并对中国和印度制定的“潘查希拉”原则带来危害。

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和参赞维舍诺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716-3720 页

文件 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

（1962年11月5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2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5日

今天，我邀请P.K.尼赫鲁共进午餐。会谈期间，我让他看了《真理报》在今年11月5日发表的社论的文本，并给了他一份由我使馆编辑印刷的信息简报。

P.K.尼赫鲁主动谈起了关于目前印中关系的话题。在讨论过程中P.K.尼赫鲁说，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理论方针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认为赫鲁晓夫的路线以及苏共为和平共处和和平而斗争的作法是明智的，而中国所坚持的是一条军事冲突和暴力的路线，他们甚至现在仍在加紧研制原子弹。P.K.尼赫鲁强调，印中冲突只是反映了中国对和平问题总的态度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它拥有更为深刻的根源。

P.K.尼赫鲁表达了与苏联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目前已陷入孤立（其中原因并非只在于他本身）。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不了解现实的国际形势的复杂性。P.K.尼赫鲁说，他的这一看法是当他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时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过程中形成的。

以中国的错误立场为例，P.K.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反动政府。P.K.尼赫鲁指出，中国政府的作法明显与苏联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例如后者便认为印度不加入任何集团的作法便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而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的不结盟是“假装的”。中国似乎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虚伪的印度“缓慢地倒向”西方阵营。P.K.尼赫鲁继续道，中国人试图以武力来迫使印度就范，但他们的作法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中国领导人便失算了。他们似乎期待着

印度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印度空前地、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P.K. 尼赫鲁说，自己很难解释中国人采取行动的原因。极有可能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内部的困难和危机。

P.K. 尼赫鲁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深深地伤害了印度人的民族感情。须知，当美国企图以军事集团来封锁中国时，正是印度帮助中国与亚洲国家建立了关系。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却被中国的军事行动毁于一旦。尽管如今中国的广播仍在高唱着中国人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后者实际上都在一致地谴责中国。甚至印度共产党中的多数人也在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指责。P.K. 尼赫鲁说，我个人并不赞成目前印度国内掀起的激烈的反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但这的确是人民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强调了印度政府希望两国尽快开始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之后，P.K. 尼赫鲁再次重申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即印度与中国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军队撤退到两国在今年 9 月 8 日的边界线之后才可能开始进行；当中方完成撤军之后，在双方专家所作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和中国便可以进行谈判。P.K. 尼赫鲁认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是明智的。他说，我们甚至没有要求中国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印度领土，没有要求他们立刻撤出所占领的位于拉达克的印度部分领土。印度政府同意在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这样的谈判只有在中国军队从印度东北部边境诸省撤出，当那里仍像今年 9 月 8 日以前一样——没有一个中国人之时，才可能开始。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不会开始谈判，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印度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P.K. 尼赫鲁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就是有预谋的侵略。他之所以肯定这一点，是因为印度边防军都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而中国军队则根本不同。他补充道，即使假设领土是存在争议的（虽然他个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但事实是中国的确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动用了武力。

P.K. 尼赫鲁承认，如果印度政府在 1954 年时便对印中边界的划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那么双方可能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冲突。另外，冲突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两国在对方的首都均没有大使，从而妨碍了两国政府的联系和沟通。

P.K. 尼赫鲁认为，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印度无疑将承受经济上的困难，但印度政府仍将坚决支持如下计划：

1. 继续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

2. 抵抗侵略。

3. 在印度民族尊严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随时准备举行谈判。

P.K. 尼赫鲁强调，近期中印之间原本已缓慢地出现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迹象，但由于 10 月 20 日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前一阶段的所有努力都毁于一旦了。

P.K. 尼赫鲁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为消除因古巴事件引起战争威胁所做出的最终决定。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不顾及自身威望的作法是明智的。不过，在印中冲突这件事上，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作法并不能作为印度仿效的楷模。因为前者是中国以武力占领印度领土，在这件事上印方要是妥协的话，就有些不明智了。P.K. 尼赫鲁还试图以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纵容为例，来为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妥协的作法进行辩护。

针对苏联政府希望印中两国应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P.K. 尼赫鲁给予了高度赞赏。后者同意苏联的观点，即继续冲突对印中双方都没有好处。与此同时，P.K. 尼赫鲁表示希望苏联能够向中国"施加善意的影响"，以便中国转向与印度一起和平解决冲突的道路上来。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根据我方的一贯立场，向对方表达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印中两国立刻结束冲突，开始谈判。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 A.M. 瓦维洛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721-3724 页

文件 33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纪要：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1 月 13 日）

摘自 Г.М. 普希金的工作日志

1962 年 11 月 15 日

第 3354/гс 号

机密，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莫斯科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3日

考尔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造访。陪他一同来访的还有印度驻莫斯科使馆参赞P.扎伊帕尔。

考尔跟我谈了自己13年前来苏时对莫斯科的印象。如今，莫斯科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建筑，甚至大街。在这段时间，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印度虽然也很重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很遗憾，忽视了国防问题，而现在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印度始终赞同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她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不过，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的这一政策。中国之所以能够对印度发动侵略，就是因为他知道，印度对国防的准备不足。

我回答说，考尔非常了解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印中两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放下各自的所有架子，并开始举行谈判。

考尔说，这里谈不上架子的问题，要知道，印度从1959年便一直忍受着中国对印度领土的侵犯。如今，今年9月8日之后，中国军队竟然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直接对印度的侵略，这实际上无异于对印度宣战。对此，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的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所有印度人民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印度党派和各阶层民众都对尼赫鲁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至今，中国人仍不同意撤退到今年9月8日以前他们所在的阵地，更谈不上进行任何谈判。

我回答说，印方不能根据印度国内民众的情绪义气用事。因为这种情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并使两国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考尔说，印度总理已竭尽全力来安抚民众情绪以将其纳入到建设性的轨道。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已无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的侵略问题。究其本质，实际上便是关于（中国）统治整个亚洲的问题。印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已得到了另一个不结盟国家元首——纳赛尔的支持，但中国却拒绝了这些建议。因此，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提出了一些领土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而在于，中国是想迫使印度屈服于自己的武力。

我对考尔说，在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多封信件

中，在赫鲁晓夫与印度部长马拉维亚和考尔的会谈中以及在《真理报》上，关于印中两国间冲突的解决我们的观点已表达得相当明确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不应当向后看，而是应向前看；各自都应当放下一切架子和脸面，在不提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判。否则，这种冲突会就会发展到双方永无宁日的地步。

考尔再次强调，只有当中国军队退出今年 9 月 8 日所占的阵地之后，印度才可能与中国开始谈判。印度不会作出大的妥协。因为这不是地区冲突，而是大规模的侵略。尼赫鲁在国会演说中将之与希特勒的侵略相提并论。

我对考尔说，战争毕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迟早都是要坐下来谈判的，而且谈判的越早，问题就越容易得以解决。

考尔再次声称，他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考尔继续道，印度过去和今后都将始终信守不结盟政策，但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她也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为何苏联不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提供保护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让苏联公开地去保护冲突中某一方。而是说，苏联可以帮助找到进行谈判的基础。毕竟，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

我回答说，苏联与印度是友好国家，与中国是兄弟国家。如果苏联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它所采取的立场就可能让双方都不喜欢。因此，印度和中国应当自己去寻求谈判的基础。

考尔说，在印度国会中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目前形势下苏联是否还会履行自己与印度于今年 8 月份签署的关于向印度提供飞机，以及在飞机厂的设计、建造方面向印度提供技术援助。关于这一问题，T. 考尔说，他将与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商谈，并在稍后希望与我再次会面。

本次会谈的记录：翻译局随员阿列尼科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签名）

文件共 17 份，分送：葛罗米柯、拉宾、马立克、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波德采罗布、斯米尔诺夫斯基和图加里诺夫等同志，第一顾问组，苏联外交部情报司，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驻印度德里大使馆，档案室（3 份）。

1962 年 11 月 15 日

第 мб-5998/гс 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7251-3727 页

文件 34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

（1962 年 11 月 1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2 月 8 日
第 837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14 日

我造访了印度总理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并在其生日之际转达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C. 赫鲁晓夫对他的衷心祝贺。

贾·尼赫鲁请我首先向 H.C. 赫鲁晓夫转达自己对其祝贺的诚挚感谢。他说道："请再对他说，我们将会一如继往地珍视 H.C. 赫鲁晓夫本人、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我们国家的友好感情"。

接下来，印度总理又主动说道："关于我国北部边境的状况，我认为，您和您的政府是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了解这场灾难对我们所造成的诸多困难和不便的。我已在（给苏联政府的）多封信函中陈述过我们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仍然希望大使先生把这一问题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做出报告，因为您一定对此事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更透彻。我希望，您能提请苏联政府关注印度广大民众对此事（印中冲突）的强烈反应，请苏联政府注意我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尼赫鲁对在自己生日之际能接到 H.C. 赫鲁晓夫的温馨祝贺感到高兴。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翻译专员 А.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第 1009 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28 页

文件 3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纪要：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

（1962 年 11 月 14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2 年 11 月____日
第 884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2 份

与印度共产党代表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14 日

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主动来访的丹吉。

丹吉通报道，今天印度共产党秘书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他有必要在近期内前往莫斯科的决议。关于他此行的目的，他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与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委员会面，并向其汇报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 1962 年 11 月 1 日决议；说明印度共产党的困难和问题，与苏联领导人商讨这些问题。丹吉认为，自己到苏联之后再从莫斯科前往北京将会更合适、更有好处，以便让中国同志根据第一手资料了解当前印度国内的实际状况，并与中国同志讨论相关问题。丹吉说，他前往苏联的正式理由是苏联邀请其来苏休养。丹吉又道，他在与贾·尼赫鲁的交谈中已说了自己打算出国的事，并告诉他说，印度共产党应当向兄弟党解释印度的国内形势和印度共产党做出的决议，只是并没有提关于自己可能去北京的问题。丹吉请求苏共中央通知他，自己究竟何时动身去苏联讨论上述问题比较合适。丹吉表示，希望届时可以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以便在苏联作一次旅行，因为他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那还是 1947 年的事。丹吉还请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转告他的口头请求，即他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丹吉通报说，印度秘书处不同意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与丹吉一起前往莫斯科，因为目前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还很不成熟，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由于思想上动摇不定，他甚至都无法为报纸写文章。这样，他自然不能在出访苏联期间执行党内多数人所确定的路线。丹吉说，如果我与他一起去苏联，那么“他到时候就可能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有鉴于此，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决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兄弟党面前，只能有一个人来作为印共的正式代表，他将有权以党的名义讲话。最终，丹吉被任命为党的代表，而南布迪里巴德则由于自己的动摇不定被取消了前往苏联的资格。丹吉明确声称，他个人也反对让南布迪里巴德去莫斯科和北京。

丹吉说，自己与贾·尼赫鲁的会谈进行的很顺利。据丹吉说，贾·尼赫鲁了解国内右翼势力的危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贾·尼赫鲁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丹吉建议贾·尼赫鲁加强国大党的活动，对政府的政策和贾·尼赫鲁本身提供支持，并提请贾·尼赫鲁重视国大党在在野党活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悲观情绪。于是，贾·尼赫鲁问：“我该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在国内5—6个大型中心城市举行国大党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政府的政策和拒绝右翼和反对派所提出的纲领和论断。据丹吉说，贾·尼赫鲁已经同意在明天举行的印度国有企业职工大会上发表演说，然后他还要组织一个国大党大型集会并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丹吉说，贾·尼赫鲁很快还要前往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并在那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丹吉继续说道，“在与尼赫鲁会谈期间，我没有直接表示希望梅农辞职的意思，但已向他作了相应的暗示。我说，如今印度国内所有针对政府的指责都集中在梅农身上，但我们有可能揭露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对的实际上就是尼赫鲁本人。”丹吉认为，当前线第一次失利之后梅农就应当立刻递交辞呈，那样就可能对挽救政府有所帮助。其实那时就应当让他走人，至于现在更不必帮他。由于承担着联合国的工作，梅农实际上对印度军队的状况并不很了解，只是由于他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才在国家各部门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丹吉补充道，梅农在国内树敌颇多，不说各种政治上的原因，仅就他沉闷的性格和尖刻的言语等主观原因而言，便已使许多国大党人和与政府亲密人士非常反感。据丹吉回忆，自己曾与梅农在伦敦共事两年，从到达那里的第二周起他们便绝了交。丹吉声称，“拉达克里希南对梅农也怀有很深的恶感，因为后者曾经挖苦他，说他作为一个教授和律师，根本就不了解印度的实际，对印度的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丹吉认为，正是由于梅

农的原因，作为政府的组织者之一的拉达克里希南才被撵出了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拉达克里希南与尼赫鲁本人的关系。现在，总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地支持总理了。外界的传闻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即自尊心很强的总统希望由自己来掌握行政权力，而让尼赫鲁退居二线，这充分说明总统的政治积极性正在明显加强。

丹吉认为，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查万（Чаван）是右翼势力的核心。他会在主要问题上支持尼赫鲁，但这并非出于其坚定的信仰，而是他本人对总理的尊敬。表面看来，查万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在政治上他也不像梅农那样强硬。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显然是得到了尼赫鲁和德赛的支持。他曾经与我们一道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随后于 1921 年与我们分道扬飙，并加入罗伊派别。他参加了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坐过牢。当孟买邦因方言而发生分裂之时，他原则上赞成印度共产党的观点，但实际上却支持了尼赫鲁的主张。就在这时，他与德赛发生了不和，此前他们是密友。当德赛在孟买邦任第一部长时，查万曾在德赛的内阁里担任过部长职务。由于美国人的帮助，查万被任命为印度国防部长，因此便有人认为他是德赛的追随者。丹吉说，“查万实际上仍与德赛维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当他来德里时，经常会在后者家里逗留，我就在那里碰到过他。如果查万看到，多数内阁成员都支持德赛的话，那么他也就会支持他。但总体而言，他基本上仍属于尼赫鲁派别”。查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与他很难开诚布公。有传闻说，查万不同意尼赫鲁提出的关于 1962 年 9 月 8 日边界线的建议，并表示要追随印度共产党。丹吉指出，“不管怎样，德赛要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逮捕共产党事件负责”，印度共产党拉纳迪威小组决定在国大党全会开幕前夕召集秘密会议，这就给人提供了借口。在会上“左派”组织决定公开放弃本党的纲领，公开反对党的多数的意见，为了对外公布自己的纲领，他们甚至准备随时转入地下斗争或坐牢。丹吉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该左派组织准备将拉纳迪威的纲领印在传单上，但传单尚未印出，北京的广播已在今天公布了其中的内容”。丹吉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然是‘左派’自己将这些资料送给中国人的。”

对此丹吉指出，中国在对印度的广播中说，中国驻印度使馆向北京所通报的情况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如据中国使馆通报：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并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假装拒绝保卫祖国，尼赫鲁的反动政策已经背离了不结盟政策，等等。丹吉对中国使馆的整体工作情况极其不满。他认为，该使馆中“那些不负责的官僚们”只从各种信息中挑选那些与其想法相吻合的、并能证明其想法正确的东西。丹吉提到，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可以写一篇文章，对《再论在印中边境冲突问题上的尼

赫鲁哲学》一文作出回应。

会谈临近结束之时，丹吉强调，“如今当‘左派’退出印共之后，印共书记处的情况已得以迅速改观。过去，书记处要通过一些决议得需要 10 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 10 分钟。这就是说，在印共书记处内已经没有能够妨碍我们的人了”。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参赞维修诺夫和翻译随员 A.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

文件共 4 份，分送：波诺马列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第 1012 号

1962 年 11 月 17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29-3733 页

文件 36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纪要：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

（1962 年 11 月 23 日）

摘自 Я.А. 马立克的工作日志

1962 年 11 月 24 日

第 03420/гс 号

绝密，文本第 14 份

与印度共和国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23 日

10 点，我会见了印度大使 T.H. 考尔并向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以答复他给苏联外交部的致函。

“鉴于您就今年 8 月 29 日协议问题致苏联外交部的信函，兹通知如下：苏联政府准备履行在该协议中承担的任务，具体包括：苏联将按照协议规定的期限给予印

度技术援助，帮助印度设计和建造飞机厂。

至于提供现成的米格 -21 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我们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实际能力。原因如下：苏联国内对此类飞机的需求增加；整个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对此已不必再作专门的解释。至于什么时间可以向印度供应米格 -21 飞机，可以在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还想提请印方注意的是，在 8 月 29 日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之时双方已有约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得公开本协议的内容和条件。可是，印方在自己所发表的声明中竟暴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从而致苏方于十分微妙的境地。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如果这样，印方也会得到苏方的相应理解和评价。

至于安 -12 飞机，苏联相关部门将会根据双方所签定的合同向印方提供。关于印度要求苏联提供的六架米格 -4 型直升机，苏方将在 1962 年内满足印方的要求”。

对于苏方将履行 1962 年 8 月 29 日苏印协议的保证，印度大使表示了感谢，并指出，此举不仅对印度的当前事务，而且对印度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随后，他又说，自己前不久还向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为印度补充提供一定数量的用于和平目的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为印度现有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提供所需燃料等请求。

我对印度大使说，由于他提出上述请求的时间比较短，对此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仍在研究。我补充道，我会关心这些问题的审议结果。

印度大使还询问了关于印度直升机和运输机驾驶员机组赴苏联接受培训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印方打算再向苏联派遣一个由 82 人组成的学员队来接受培训。

我借口不熟悉这方面情况，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

关于我在上述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印方透露了苏印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印度大使辩解道，不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驻苏联使馆均未向外界透露过该协议的内容，虽然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的事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大使又道，印度政府只是当需要回应报纸上出现的与该协议相关的投机性言论和为了打消印度民众对苏联是否会履行该协议的疑虑时，才以一般性的方式提到它。

鉴于印度大使的上述表态，我再次重申了我刚才在声明对他说过的话，即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 8 月 29 日协议的事。

印度大使接着说，苏方认为不可能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这使印方感到失

望。他补充道，因为印度并不想只从一方进行自己的军事采购，从而违反自己的不结盟原则。他还提醒道，他受到委托通知苏方，印度政府对任何向其提供具有国防意义的装备的国家都会表示感谢的，然而他并不想使苏联感到为难。

我对印度大使说，我们希望印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方的处境。苏方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内对米格 -21 机型不断增长的需求。不过，正如我在声明中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大使首先表示他明白苏方的立场，接着他又询问我对近期中国方面所提出的提议有何看法。

而我则反问大使先生对中国的提议有何评价。

大使说，印方希望在中国的单方面提议之后能够实现双方停火，而中国也能够真正兑现自己所承诺的撤军。不过，目前对这一提议的普遍看法是，这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方面的建议。这里，大使让我看了尼赫鲁于今年 11 月 14 日给周恩来所写的一封信。印度大使指出，尼赫鲁在信中对中国最新提出的建议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以前所提建议的评价几乎没有区别。

我对印度大使说，如果提议本身是好的，这与它是单方面提出的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有利于解决两国间的纠纷。

大使强调，印度希望得到的谈判条件是，双方军队所占阵地都恢复到 1962 年 9 月 8 日的现状，而并非从“实际控制”线后撤。而我们都不清楚，中方是否指得就是这一概念。

我对大使再次提起了我在上次谈判中所表达的希望，健全的头脑终将赢得胜利，对两国都有利的解决办法也一定会找到。我们希望，双方都在谋求问题的真正解决。

大使说，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可不能作一个乐天派，而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中国的提议含有胜利者对被战胜者的意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接下来，大使对 H.C. 赫鲁晓夫与他会谈时反复提到的关于苏联相信和平共处原则的态度表示了满意，并希望中国也会赞同这一原则。不过，他同时又说，我们倒是被自己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信仰所欺骗。进而，印度大使强调加强国防力量对印度的必要性。他说，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防安全问题是当前事关印度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印中武装冲突问题，大使说，中方指责印度是侵略者，这完全是令人气愤

的一派胡言。印度根本不可能在那块前一段时间爆发了冲突的边境地区对力量超过自己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再说印度在那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正是中国人发动了进攻，虽然她立刻便通过广播提出指责——似乎这场战争首先是由印度发动的。大使最终的结论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及其提出的新的建议。

我指出，看来，最好是通过双方正面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方式来确认中方单方面提出的建议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仅从书面上来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

印度大使询问我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应当请联合国出面来解决印中争端。大使声称，在这件事上印度并不打算请联合国帮忙。

我代表苏方指出，这是印中两国之间的事，如果印中双方有能力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解决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最好不要让第三方插手。

此次会谈持续 1 小时 50 分钟。当时在场的还有：印度（驻苏联）使馆参赞扎伊帕尔和苏联翻译局顾问 O. 克罗哈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 马立克（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4，папка.86，пор.3，л.9-12

文件 3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2 月 12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2 月 12 日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谈记录

1962 年 12 月 12 日

遵照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今天我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我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其他成员向他转达了衷心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尼赫鲁首先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健康，对他热情的问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请我转达对他良好的祝愿：祝他身体健康，取得好的成就。尼赫鲁总理请求说："也请转达我对所有苏联朋友们的问候。"

我向尼赫鲁通报了关于我国工农业工作的成就，关于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关于改组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等情况。总理指出，他很高兴知道苏联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他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苏联不断超额完成计划以及农产品的增长。"

然后，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告诉尼赫鲁的问题内容。我对尼赫鲁说，苏联政府珍惜印度政府及尼赫鲁本人对维护不结盟政策，对维护及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关于以下问题的意见：必须竭尽一切可能积极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与普遍裁军，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及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我表达了赫鲁晓夫关于印中边境冲突也应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愿望。

尼赫鲁认真地、非常关心地听取了所有这些话，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记录。他对苏联和印度之间、两国政府之间以及赫鲁晓夫同志与他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了极大的满意。他也表示，坚信这些关系不仅现在保持着，而且将来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总理接着说，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先生关于我们必须共同争取和平与裁军的看法"。他提出，苏联可以指望在这些问题上得到印度的支持。

谈及和平解决一些紧张的国际问题时，尼赫鲁说，"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先生本人在古巴事件中给我们所有的人作出了伟大的榜样"。

然后，尼赫鲁详细地叙述了印度对印中边界争端的立场。他说："这一切并非始于我们方面——这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希望得到调解。"他提到自己在 1962 年 12 月 10 日在议会上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建议，"在我们双方试图和平解决失败的情况下，或在直接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同意任何形式的调停，其中包括，把问题移交国际法庭审理"。

尼赫鲁指出，赫鲁晓夫正确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存在，他们力图怂恿政府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争端。他同时声明，政府知道这些势力的行动，但他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根据他的谈话，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体印度人民，普通的农民、工人和职员，"所有人都对中国，对中国对印度采取的行动抱有最强烈的反感。当然，他们不要战争（谁也不要战争），但是，要求中国人从印度领土撤退，要求保卫我们这片领土。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向中国的领土推进，但要考虑到，人民坚决要求

解放属于印度的领土”。

作为对我提出的关于必须和平解决问题、向人们解释和平道路的正确性的话的答复，尼赫鲁说：“我们试一试解释这个必要性，并将这样做。”他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尝试目前尚未取得成果。“我们愿意与中国人坐到谈判席上。我们准备好了。但政府向他们说明，为此必须恢复三个月前存在的边界状况——9月8日的状况。”

接着，尼赫鲁从正在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的谈判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两国关系问题。尼赫鲁首先声明，巴基斯坦领导人“和那些建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些现在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士，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原则，过去没有制定过、现在也没有任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纲领。他们唯一的‘原则’和‘纲领’就是永远仇视印度”。根据尼赫鲁的谈话，巴基斯坦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和世袭的国家官员，他们对印度抱有本性的仇恨，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一贯进行消灭世俗主义的斗争，主张国家以宗教为基础，这使印度有了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可能。但在分裂以后，他们仍继续攻击印度，每一次当他们的国家处于严重的局势时，就开展大规模的诽谤运动。尼赫鲁继续说，在每次需要转移巴基斯坦人民对内部危机注意力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提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例如，当东巴基斯坦出现脱离西巴基斯坦运动的征兆时，领袖们立即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并像以往一样开始宣称，印度准备侵犯巴基斯坦。尼赫鲁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完全友好的关系，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同一个民族。我们建议他们签订互不作战条约，但是被他们拒绝了。”

“当一位英国部长和一位名叫哈里曼的美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调解好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你们与巴基斯坦总的关系？’我回答，我们早就想这样做了，假如能实现，我们就高兴了。同时，我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并说，我准备随便会见任何人并讨论任何问题，但我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向他们说明，不可能谈改变克什米尔谷地的地位问题，因为，除了其他一切因素之外，如果我们失去这一谷地，那么我们就失去通向拉达克的出口，现在我们与中国在那里出现了麻烦。这样，我们就必然会失去整个拉达克。然而，他们从拉瓦尔品第回来后，仍继续强调谈判的必要性，并带来总理与总统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会谈联合公报。”尼赫鲁指出，总的来说，他准备会见阿尤布·汗，目前他不打算会见，总之对这种会见并不期待太多。他提及，他曾建议与总统会晤并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但就在几个月之前，阿尤布·汗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是，归根到底，他同意公布联合公报，虽然其中作了某些修改。森迪斯立即打电话给阿尤

布·汗并征得他同意尼赫鲁对公报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印度总理在议会上宣读了公报，同时声明，印度的立场依旧，只能在细节上作一些小的修改，不可能对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作实质的和有害的更改。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在巴基斯坦的森迪斯“出乎我的意料地飞到德里并来到我家”。据尼赫鲁说，他证实，总理在会议的声明在巴基斯坦议会引起了喧哗，使阿尤布·汗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英国部长要我拯救阿尤布·汗，据他推断，阿尤布·汗可能被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他说，可能更野蛮的领袖、更敌视印度的人会取代阿尤布·汗进入政权。我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帮助。我想起，我曾提醒过他要当心自己的地位。那时候，森迪斯说，他大概要同我们的外交秘书德赛谈谈。我打电话给德赛，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于是森迪斯晚上一点钟赶到他家，他们商谈到三点钟。到清晨他们向我提交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草案，其中指出，会谈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我没有反对”。

谈到与巴基斯坦正在举行谈判的前景时，总理着重说，谈判会遇到严重的挫折，因为“巴基斯坦的胃口非常大”。据他说，对印度代表团的指示是允许讨论任何问题，但责成代表团坚决执行政府宣布的政策。尼赫鲁说：“可以准许讨论关于对停火线作不大的修改问题，但不能讨论关于改变整个克什米尔地位的问题。”他补充说，看来谈判要拖延，因为开始在拉瓦品第举行的会谈将是部长级的，然后是在德里，以后可能是部长与总统的会谈。

总理再次重复说，巴基斯坦的领袖没有政治原则，执行机会主义政策，企图利用印度的每一次困难。从印中关系尖锐的时候起，他们为了恐吓印度，开始倾向于同中国友好。出于同样的讹诈印度的目的以及为了获得大量的美国援助——他们不久前开展了强大的反美运动。

关于巴基斯坦最近对苏联的外交动机，关于他们企图改善巴苏关系的声明，尼赫鲁宣称，他认为，“巴基斯坦耍这个把戏是想吓唬美国并从美国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也承认，这些行动有使苏印关系冷淡的目的。然而，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用尼赫鲁的话说，是仇恨印度和对印度进行讹诈的政策。他坚信，巴基斯坦的领袖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他们为了获得军事援助参加了军事条约，这些军援会使他们比爱好和平的印度更强大。总理说，他不排除敌视印度的势力提出关于“自由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他说，所有关于分裂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什么自治国家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提到关于在克什米尔成立两个自治区的建议，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会成为在这一地区造成内部和外部经常紧张

局势的源泉。尼赫鲁指出，关于“独立的克什米尔”的国际保证的建议也没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联合国的保证，还是各大国方面的保证。

总理谈到巴基斯坦经常在克什米尔居民中进行的破坏工作，并反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他甚至声称，印度政府每2—3天就要镇压巴基斯坦派遣来的暗中破坏分子。

尼赫鲁说，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反对克什米尔邦总督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出访苏联。他指出，然而将来出访的时间，显然要直接依据国内形势以及印中边境局势而定。

总理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我，在整个会谈期间他很殷勤，对苏联大使表示特别关切。意见的交流是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并具有十分坦率的特点。

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印发4份，分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军情局、存档

1962年12月17日

第1108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38-3744页

文件 3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纪要：印共与中共的关系

（1962年12月2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1月31日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27日

我在大使馆接待了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他自己主动来访，并说，他为党的命运

感到严重不安，因此决定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他交给了我一份报告，其中有他关于当前国家和当前政治形势的意见。他请我把这份报告转交苏共中央，请苏联同志“向我提出建议”。南布迪里巴德要求不要透露他的意见内容。他说，现在只有古普塔和戈帕兰知道这些内容，但最终他可能把这些内容提交印共中央执委；他想在这些意见定稿前能知道苏联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建议。

南布迪里巴德表示，他想对自己的报告口头补充几点意见，他认为把这些意见直接写入报告是不适宜的。首先他强调说，虽然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比停火前稍有好转，但党内形势“非常不好”。他说：“许多同志（尤其那些现在被监禁或过去被监禁的同志）认为，现在绝大多数党员利用非常局势以及与这种局势相关的共产党员被捕的情况，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运动；因此，在恢复正常状态，在所有同志出狱的情况下，大概不可能同那些与现在的大多数党员站在一起的人工作。我本人不会说明，我是怎么不能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他同时说明，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经所有被捕党员讨论及中央各机关原有全体成员开会后，将很难维护党的团结，或使党保持原有状态。“在这样的关头将遇到非常严重的局面”。问题在于这些同志对当今领导人的政策感到非常痛心，这些领导人有时毫无根据地对一些著名的印共党员进行指责。他举了穆萨菲尔·阿墨达（西孟加拉邦）的例子，他是印共创始人之一，被指责忘记了印共的利益，又如拉马穆尔蒂同志（马德拉斯邦），当他知道自己要被捕后，他告诉同志们，包括书记处某些成员，他将躲藏一周以逃避警察逮捕，因为他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并安排有病的妻子往某处去；他这样做了以后，因此受到了自己所在邦的党组织领导人的指责。

南布迪里巴德说，他看过各党机关致当局的请愿书，其中要求从狱中释放共产党员，他本人确信，请愿书写得很不好，而且结果是，他们要求释放的只是那些以反华情绪称著的印共成员，而不是那些似乎亲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久前内政部长要求各邦政府再审被拘押共产党员的案件，这只可能是再审和释放那些在押的党外人士，而不是所谓“亲华派”。他提醒，直到现在，印度仍在继续逮捕共产党。

在谈到政府中的力量对比时，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关于贾·尼赫鲁与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相互关系的议论；甚至说，拉达克里希南联合莫拉尔吉·德萨反对尼赫鲁。南布迪里巴德表明，现在总统不可能反对尼赫鲁，虽然，这些言论可能是在危机时期发表的，特别与克·梅农的辞职有关，总统对他不能容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他的下台。他指出，国内确实在广泛流传这样的看法，克·梅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领导一切的尼赫鲁对前线的不利形势负有责任，于是尼赫鲁没有办

法，只好把梅农从政府撤职。但是，在他看来，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尼赫鲁本人的指责。

我向南布迪里巴德介绍了苏共中央 11 月全会的基本情况。他说，他看过赫鲁晓夫在全会以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有一系列问题：

“古巴危机”的解决，防止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此的批评；

古巴同志对苏联行动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否真的在未经与古巴同志协商的情况下被迫作出了决定——“这是我唯一的疑问”；

现在中苏分歧是否比以前更大；

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如何？

我以赫鲁晓夫的讲话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中央在古巴危机时政策的正确和英明。给人的印象是，南布迪里巴德同意了我们的看法，消除了自己的“疑问”。早在这次讨论之前，他就说过，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印中冲突的谈话“非常好”，在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问他，印共书记处 1962 年 11 月 20 日关于印中冲突的信件都发送给了哪些党。他回答，准确的不记得了，稍候再告知，这封信会发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国除外，还要发给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他提到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据他所说，其中提出，希望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他推测，中国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大概是他们认为，现在他们获得了比上次会议时更多、更大的支持。他还指出，中国广播电台在古巴事件期间力图玩弄苏联的政策。

会谈结束时，南布迪里巴德转交了共产党领导人和以阿图里亚为首的多数派小组的文件。

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翻译专员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印发 4 份：分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军情局、存档

1963 年 1 月 31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56-3759 页

文件 3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

（1963 年 3 月 24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3 年 3 月 29 日
第 348 号
摘自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志

机密，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Р.К. 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63 年 3 月 24 日

在波兰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 P.K. 尼赫鲁。后者今天早上会见并送走了乘机途经德里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会谈期间，P.K. 尼赫鲁对我说，他从机场一回来便立刻会见了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并详细地谈论了关于自己与马利诺夫斯基的会谈情况。他对印度总理说，苏联国防部长从印度尼西亚返回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前预计的要晚一些，因为他已接到了奈温将军的邀请——在返回的途中访问缅甸。据 P.K. 尼赫鲁说，印度总理当时便说：在这种情况下马利诺夫斯基必然将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里，并可能在德里停留几个小时。

P.K. 尼赫鲁对我表示，希望马利诺夫斯基能够与印度总理本人贾·尼赫鲁见个面。P.K. 尼赫鲁说，如果能与苏联国防部长会晤，印度总理将感到非常荣幸。P.K. 尼赫鲁明确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很希望进行这次会见。

有报道说，中国军队正在沿印中边境全线集结并可能再次向前推进。关于这一问题，P.K. 尼赫鲁表示，不论这些消息是否可靠，在去年秋天中国人对我们发动进攻之后，印度都要小心防范。P.K. 尼赫鲁说，印度希望和平解决印中冲突。如果中国人接受科伦坡提出的对双方都非常合适的建议的话，即使“明天”便举行谈判，印方都愿意。印方已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P.K. 尼赫鲁强调，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建设国家的新生活和发展本国经济。P.K. 尼赫鲁指出，中

国也需要和平，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已证明了这一点。P.K. 尼赫鲁例举了自己与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时后者所说过的话，即中国至少需要 50 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于是，P.K. 尼赫鲁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便可能成为中方接受科伦坡建议和两国开始谈判的基础。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翻译专员 А.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资料共计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3 年 3 月 25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65-3766 页

文件 40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

（1963 年 10 月 18 日）

苏联驻印度使馆

1963 年 10 月 5 日

第 855 号

机密，文本第 4 份

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会谈记录

1963 年 10 月 18 日

我对美国（驻印度）大使作了礼节性的回访。

谈话是从有关中国的问题开始的。切斯特·鲍尔斯认为，再过 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必然会垮台。其理由如下：首先，中国的领导人承担的责任过多，但其能力又很有限；其次，老一辈革命者退出历史舞台，担任国家领导的都是些年轻人；最后，中国无法养活整个国家，最后一点，鲍尔斯认为最关键。他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能在粮食收获年景好时可能勉强维持国人的粮食需求，而在年景中等和欠收时就会出现饥荒，成百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中国适用

耕种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只及印度的1/3，但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中国必须使用大量的化肥，但中国工业生产又无法满足其实际需要。

美国大使认为，在中国没落的情况下，苏联和美国都不应乘中国崩溃之际，染指中国。因为这样作是非常危险的，必然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那时，美国不应当利用蒋介石，因为“后者已经完全失败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使中国保持中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中国都不应有优势地位。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并推行温和（外交）政策。其他国家应当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应当“维持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平衡”。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鲍尔斯将之定义为“遏制”政策。

我对鲍尔斯的以上言论及其所设置的前提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相信，中国通过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和加强劳动的组织管理就能够使其粮食产量翻一番。我指出了鲍尔斯所陈述理论中所包含的漏洞和错误，并根据苏联政府和党的文件的有关精神，阐释了苏联对中国的立场。我表示，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在谈话期间，美国大使公开宣称，美国将会竭力扩大和加深中国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指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世界强国不要再相互采取那种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行动。这里，他例举了古巴和德国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最尖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鲍尔斯得出如下结论：“你们可能，比如利用古巴来反对和激怒我们，也可能以此来给肯尼迪政府制造麻烦，甚至可以使伯利·戈德华特当不上美国总统。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干。最好以协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好以克制的态度行事”。我指出，在古巴问题上达成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苏联为了满足美国付出了许多。美国也应采取举措改善这一地区的状况。

我也对该地区各种反革命集团无休止的军事准备表示了担心。后者公开宣称，打算入侵古巴，推翻那里的合法政府，而所有这些集团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大使同意我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纵容政策是相当危险的。他说，美国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措施以安抚苏联。鲍尔斯呼吁，在德国问题上都保持克制态度。

关于自己前不久在加尔各达发表的声明——这一声明在印度引起了非常不良的反应，鲍尔斯解释道，他认为，目前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已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不结盟

国家对某个其他国家的态度了，即他暗示，这已经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敌视态度。不过，在此鲍尔斯仍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印度依然维持原来的立场，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鲍尔斯断言，美国并不反对印度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例如，去年印度政府曾就获得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询问美国的意见，A. 哈里曼便说过，美国不仅不反对印度这样作，甚至还对此表示欢迎。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美国大使表示希望能够再次与我见面，以便就印度局势和印巴关系的调解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鲍尔斯说，"必须想办法调解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印度由于担心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就不断武装自己，并组建 30 个师。要知道，印度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 A.Л. 尼基弗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分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情报司，档案室

1963 年 10 月 24 日

补充发送材料 3 份，具体包括如下同志：A.A. 葛罗米柯、拉宾和多勃雷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6 卷，第 4103-4105 页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布拉希莫夫，П. А. Абрасимов，P. A. Abrasimov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I. V. Arkhipov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A. B. Aristov

阿里斯托夫，Аристов，Aristov

阿延加尔，Ayangal

埃尔科利，М. Эрколи，M. Erkoli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Эйзенхауэр

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Iu. V. Andropov，

安东诺夫，А. И. Антонов，A. I. Antonov

安东诺夫，С. Ф. Антонов，S. F. Antonov

岸信介，Nobusuke Kishi

巴卡耶夫，В. Г. Бакаев

巴枯宁，М. А. Бакунин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L. P. Beria

别涅季科夫，И. А. Бенедиков，I. A. Benedikov

波克罗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波立特，Harry Pollitt

波梁斯基，Д. С. Полянский，D. S. Polianskii

波诺马廖夫，А. Д. Пономарёв，A. D. Ponomariov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勃列日涅夫，А. А. 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L. I. Brezhnev

布尔加宁，Н. А. Бурганин，N. A. Bulganin

布鲁克，Wilbur M. Brucker

达维德，Давид Вацлав
戴高乐，De Gaulle，Charles
董卡诺夫，Дунганов，
杜波罗夫斯基，А. Д. Дубровский
杜伯洛维娜，Дубровина
杜德，Dude
杜勒斯，Allen W. Dulles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Дж. Ф. Даллес
杜鲁方诺夫，Ф. Ф. Труфанов，Trufanov
杜鲁门，Harry S. Truman，Трумэн
多列士，Maurice Thorez，Торез Морис
范桑，Jean Vincent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N. T. Fedorenko
费多托夫，В. П. Федотов
费留宾，Н. П. Филюбин，N. P. Filiubin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弗拉基米罗夫，П. П. Владимиров
伏龙芝，М. В. Фрунзе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K. E. Voroshilov
福尔采娃，Е. А. Фурцева，E. A. Furtseva
高兰，John Gollan
高士，Ajoy Kumar Ghosh，Аджоя Гхош
戈尔什科夫，С. Г. Горшков，Gorshkov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Владислав Гомулка
格利巴诺夫，М.Геибанов，M.Gelibanov
格列波夫，Глебов
格罗斯，Ernest A. Gross，Гросс
格洛托夫，Глотов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A. A. Gromyko
汉佛莱，George M. Humphrey
汉弗莱，Herbert Humphrey

列特文斯基，Летвенский，Letvenskii
罗多夫，С. Родов
罗高寿，А. Рогачев，A. Rogachev
罗加乔夫，В. П. Рогачев
罗科索夫斯基，К. 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
罗申，Н. В. Рощин，N. Roshchin
罗斯，John C. Ross
罗斯，Keller E. Rockey
洛马金，Я. Ломакин，P. Lomakin
马克思，Karl Marx，К. Маркс
马克斯韦尔，Maxwell
马利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R. Ia. Malinovskii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G. M. Malenkov
麦德维杰夫，罗伊，Ж. А. Медведев，Zh. A. Medvedev
麦德维杰夫，若列斯，Р. А. Медведев，R. A. Medvedev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梅农，Menon
梅农，V. K. Krishna Menon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Микунис
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
缅希科夫（缅什科夫），М. А. Меньшиков，M. A. Men’shikov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V. M. Molotov
纳赛尔，Nasser Gamal Abdel，Насер Гамаль Абдель
内维尔，Edwin Neville
尼赫鲁，L. K. Nehru
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Пандит Джавахарлал Неру
诺索夫，Носов，Nosov
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Новотный
帕塔萨拉蒂，Parthasarathi